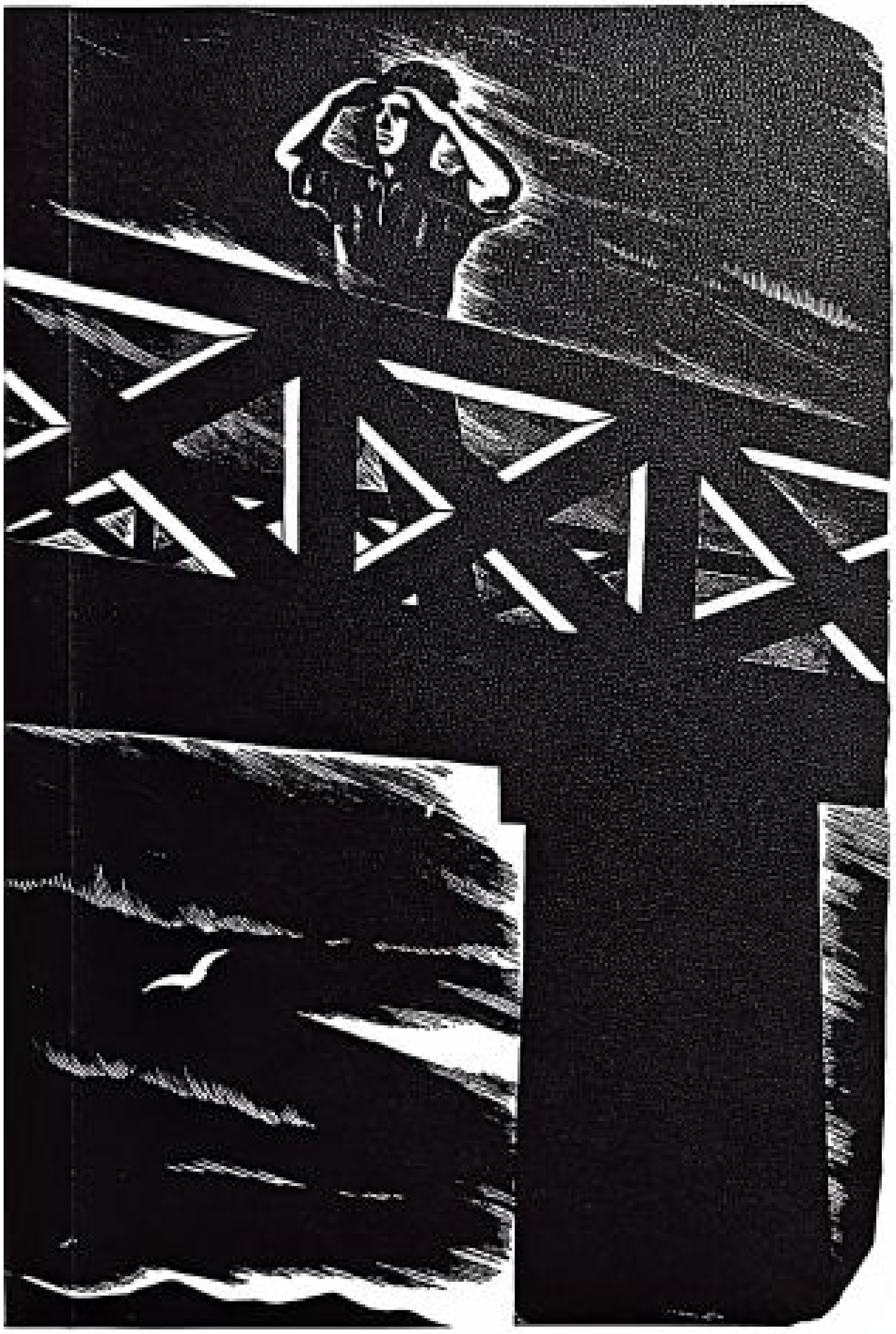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1920年代中国的党派与青年研究

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

李志毓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李志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

封面图片：

黄新波版画《无题》（1943），感谢黄元老师授权本书使用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1920年代中国的党派与青年研究

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

李志毓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0年代中国的党派与青年研究：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 / 李志毓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1. --ISBN 978-7-5228-5853-1

Ⅰ. D693.74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62C116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920年代中国的党派与青年研究

——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

著　　者 / 李志毓

出 版 人 / 冀祥德
责任编辑 / 陈肖寒
责任印制 / 岳　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72千字
版　　次 / 2026年1月第1版　202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28-5853-1
定　　价 / 89.00元

读者服务电话：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引　论 …… 1

第一章　风云际会：国民党左派的形成 …… 11

一　扶持国民党左派 …… 13

二　国民党左派的思想理论 …… 21

三　在革命大潮中 …… 41

第二章　相互借力：国民党左派视角下的国共合作 …… 49

一　巩固广州的斗争 …… 50

二　从巴黎到武汉 …… 58

三　军队政治工作 …… 68

第三章　唤起民众：国民政府的群众政治 …… 81

一　情感动员 …… 81

二　群众的分裂 …… 88

三　左派阵营的瓦解 …… 95

第四章　左右之间：改组派的理论与实践 …… 108

一　国共合作的“叙事” …… 110

二　改组派的理论 …… 119

三　民权和民生实践 …… 134

第五章　投身洪流：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 …… 153

一　知识青年的激进化 …… 153

二　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 …… 163

三　革命的高潮与幻灭 …… 168

第六章 “娜拉”走后：前进中的革命女性 …… 179
一 解放自我 …… 181
二 冲出重围 …… 189
三 走向大众 …… 196

第七章 再上征途：小资产阶级哪里走 …… 207
一 追随国民党左派 …… 208
二 学术和文艺道路 …… 219
三 从“波西米亚”到民众先锋 …… 233

结 语 …… 243

参考文献 …… 255

后 记 …… 269

引　论

1925 年，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时代，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在广东，孙中山已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国民革命已发动起来。而中国大部分地区，还被大大小小的军阀盘踞。在山东，一条小船上，四个从农村出来、流浪异乡寻找出路的青年，正端起酒碗，互报身世。一个说："我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去济南求学。"一个沉吟片刻，昂然说，他杀死了逼债的地主，"为躲避官府通缉，逃出家乡"。一个说："我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最后一个是文艺青年，握着画板，说："我为了美好的未来……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四人当下结为兄弟。文艺青年拿起画笔，画面上出现了四只正展翅飞出牢笼的小鸟……

这一幕出自 1965 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影片《大浪淘沙》。剧本根据原八路军第 115 师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几个青年的原型，就是朱道南和他的同学。[①] 影片真实再现了大革命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知识青年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求索、选择、分化的故事。最后，四个誓愿生死与共的青年分道扬镳，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枪决了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参加秋收起义，走上工农武装革命道路。文艺青年则在痛苦失望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影片刻画了一个革命/反革命二元对立的世界，最后的结局表明，青年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找到光明的前途。该片自 1978 年上映即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史叙事文本，它传达了一

---

① 朱道南，1902 年生于山东枣庄，1924 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 年夏在济南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入长沙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学习。192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全民族抗战期间，在鲁南地区组织抗日武装，领导过四支抗日游击队，包括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参见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于炳坤《我和电影〈大浪淘沙〉》，上海市黄浦区档案局（馆）、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老干部局编《黄浦：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第 157—166 页；葛爱民主编《光影：影视作品中的党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第 237 页。

种理念：革命洪流中总有人落荒，有人叛变，也总有人能迎风斗浪，走向胜利彼岸。“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①

大浪淘沙，意味着正确的革命道路是从无数错误、挫折、失败中探索出来的，也意味着人要经历千锤百炼，才能成长为一个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人。吹尽黄沙始到金，历史最终关注的，是经过千淘万漉筛选出来的“金”，它要求人们记住“金”，努力成为“金”。朱道南说，他之所以要写下这段经历，是因为想要“激励更多的青年去参加革命”，同时，“还怀着这样的感情，总想把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们的高贵品质使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好像不这样做就对不起革命的先烈们”。②

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革命史叙事曾深入人心，影响了很多青年的成长，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人们的生活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在思想、观念领域也产生了新的需求。为了全面理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理解20世纪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心灵世界，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历史真相和更复杂的分析框架。

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中国就成了各种主义、信仰和政治实践的试验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体、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动员民众，是很多政治力量都试图面对、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各种党派和主义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每一种政治势力都试图以理论把握现实，以行动左右现实，让历史沿着最符合自己的思想主张和现实利益的方向发展。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回望大浪淘沙的历史，有必要将更多的历史经验纳入视野。有人说：“大浪淘沙不能光看金子，重要的是浪淘沙的瞬间，沙子和金子混合着被浪卷起来。”③ 这是因为随着历史变迁，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的历史环境、生活和价值观念，会淘洗出不同的金子。今天的中国，已经从曾经的革命战争年代，走向和平建设、稳定发展的时代。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对

---

① 于绎讲述，刘澍整理《大浪淘沙始到金》，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编《品味红色经典》，大有书局，2022，第2—7页。

② 朱道南口述，于绎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前言”第4页。

③ 孙娜琳：《栗宪庭：大浪淘沙，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做沙子》，《新周刊》杂志社编著《看上去很高雅——〈新周刊〉艺术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180—184页。

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要求我们突破原有的历史阐释框架，带着时代赋予的经验和感受，与历史人物展开新的对话。

本书将以1920年代的国民党左派和寻路的左派青年为中心，探讨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主张和政治行动，以及他们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在传统革命史叙述的基础上，补充一个历史视角；还原一些事实上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二元叙事框架中消失了的身影。

本书第一至第四章探讨国民党左派为何主张联俄联共；他们怎样借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国民党左派如何动员民众，而在大革命激烈爆发的阶级矛盾中，又如何希望避免社会撕裂；在国共分裂后出现的改组派，如何在左右两种激进道路中间左右逢源、左右为难。尽管国民党左派代表了一条妥协、动摇的中间道路，但他们也吸引过大量“革命”青年的追随。本书将揭示在特定时期认同国民党左派的青年秉持什么样的信念、是怎样一种主体状态。

1920年代国民革命中的国民党，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积累了大量优秀成果。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利用，国民党研究出现长足进展。这些进展表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外交、国民党基层组织等各个研究领域，以及对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右派和阎锡山等地方军政人物的研究上。[①] 相比上述领域的繁荣局

---

① 中国大陆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1949—1979年，在这三十年中，缺乏客观研究国民党的历史条件，关于国民党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2) 1980—1989年，这十年间涌现出许多专著和论文，其研究视角大多从中共党史出发，对国民党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但一些重要史料得到编辑出版。所讨论的问题和语言，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例如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是什么？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广东政权、武汉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等等。(3) 1990年以后，有关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研究论著开始涌现，一些专著在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利用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的组织、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张海鹏主编，王奇生著《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的第5卷（1924—1926），杨天石、牛大勇等著的第6卷（1926—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这一时期的研究趋向于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强调实证的研究方法，重视历史细节的呈现。如《中华民国史》第5卷的作者明确指出，该书为“民国史”而非“中共党史”，将尽量多地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中共一方面去考察，同时较多侧重苏俄（联）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面，国民党左派则相对少人问津，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20世纪。①

国民党左派是1920年代中国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诞生于1924年前后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聚合了国民党内部分功勋元老和新兴势力，其试图通过向苏联学习，改变国民党组织涣散、脱离民众、政治依附军事的局面。在长期的斗争中，国民党左派高层随着形势发展而发生着分化和转化。有的很早就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廖仲恺、邓演达；有的在求索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同盟，杰出的代

代表性专著还有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等。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运用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档案等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全面探讨国民党与苏俄（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演变的来龙去脉。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突破传统政治史研究集中于高层政治的视角，研究国民党基层政治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态，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丰富和深化了国民党研究。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是从派系角度研究国民党的代表作。该书意图"贴近历史事实，还原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肌理"，以"派系政治"一词概括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结构特征，揭示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人事矛盾、利益冲突、思想分歧与路线斗争，并强调派系政治背后的地域观念因素。"派系政治"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党的内部视角，许多以往在国共斗争角度下解释的事件，在国民党派系视角下得到重新解释。

① 以往大陆学者研究国民党左派，主要集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前后事实上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参见尚明轩《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黄志斌《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问题论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等）。也有学者认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左派比较复杂，其经历了一个分化演变的过程。除了那些在思想上真诚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还有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为争夺苏联顾问带来的政治、军事资源而表现出左倾的面目，但他们是"假左派"[参见张光宇、钟永恒《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演变和共产党的政策》，《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境外学者则多将国共分裂后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为首的改组派也视为国民党左派。日本学者山田辰雄的《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研究》（庆应通信，1980）和中国香港学者苏维初的《国民革命中的国民党左派》（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是两部比较全面研究国民党左派问题的专著，但他们多集中于左派高层的理论和军事行动，对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众运动以及基层左派青年的求索几乎没有涉及。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有一篇论文研究国民党左派与民众运动（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Vol. I，1975）。美国学者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研究过1930年代国民党左派的经济政策（《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戴联斌校订，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46—182页）。

表人物有宋庆龄、何香凝等。此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国民党整体左倾，“左”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很多国民党人都在特定时期表现出左倾面目，如汪精卫，中山舰事件前的蒋介石，武汉政权的徐谦，军事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等。还有大量国民党中下层党员，都曾以国民党左派自居。

1927 年国共分裂后，退出国民党权力中心的汪精卫集团仍自称“国民党左派”，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打造出一套独立的“左派理论”，在以党治军、民众运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与南京国民党不同的主张。因其倡导恢复 1924 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人们多以“改组派”称之。改组派也曾吸引了很多在大革命失败后仍要求继续革命的青年。

本书从国民党左派的视角出发考察 1920 年代的中国革命，分析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路线，研究左派青年的分化和求索，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内思想比较新、比较有理论能力、有大众民主意识的集团。就高层政治人物而言，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大多在年轻时有留学欧美或在西方成长的经历。他们比较了解西方世界，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眼光。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罪恶，体会比较深刻。对于 20 世纪世界新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为代表的国际秩序新观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例如廖仲恺，他生于美国旧金山，自幼接受西方教育，17 岁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幼年时代经历美国排华风潮，受异族小孩欺辱，萌生民族意识。回国途经香港，看到英国警察无端殴打中国码头工人，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激发。[①] 汪精卫民国初年即赴法留学，旅欧期间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为欧洲“帝国主义之况味，现已饱尝，或能促起一极大之改革”。[②] 陈公博 1922—1924 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取得硕士学位。顾孟馀 17 岁（1906）进

① 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第 8—12 页。

② 《汪精卫致吴雅晖函》（1914 年 12 月 17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吴雅晖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数位档，雅 09383。本书所引同一卷宗档案，以下不再重复注明藏所。

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这个左派群体比较了解19世纪以后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关注底层民众利益，比较重视农民问题。在中国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激化的环境中，他们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试图在中国推行社会改革，以政治手段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撕裂，代表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政治、文化变革诉求。他们也回应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武力问题，希望通过推进军队政治工作，将武力从军阀控制中解脱出来，通过党内民主集权制的建设，以党纪约束武力。

对于国共分裂后仍自称为“国民党左派”的改组派，有学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重新评估其历史意义：第一，作为国共两党对立下的“中间势力”，它如何应对民族独立、社会变革等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二，改组派提出的党内民主和由此扩展而来的大众民主问题；第三，改组派政治路线的现代意义，尤其是它曾积极评价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这对当下中国发展有何意义。[①] 这些问题的提出，是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和解立场，以及“中间道路”“党内民主”“小资产阶级”等政治诉求，相比过去简单批判改组派不彻底性的研究，应能带来更多的启发。

其次，强调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国民党左派理论的突出特点，这是我们关注国民党左派的另一个原因。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很快会失去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所占人口比例极小，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国有阶级分化，但大部分地区阶级对抗的形势并不严重，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基本力量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了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口号。

1928年以后的改组派所设计的现代化建设蓝图，首先是将关乎国计

---

①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路线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9—70页。

民生的大产业收归国有，建立国营资本，增强政府能力。他们认为，在国营经济主导下，大机器生产和小商品生产不但不会形成对立，反而可以相互补充。国民党应在农民与地主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充当仲裁者的角色，调和阶级矛盾。同时建立国家信贷机构，限制高利贷，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扩大小资产阶级数量，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实现这套民生主义理想的关键，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民党，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建设。

面对北伐成功后国民党迅速腐化堕落，改组派号召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打击土豪劣绅，吸收青年人才入党，充实政治人才，遏制贪污腐化等纷至沓来的问题。改组派“理想中的以党治国”，是将国民党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选代议制政府结合起来，党治是民治的形式，民治是党治的实质。他们认为国民党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实现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的动员能力，但反对限制党员和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这套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和社会整合方案，为同情底层民众而恐惧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们，为渴望在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人们，打开了想象空间，因而在当时吸引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

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认同，还体现在文化理想和意识形态层面。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对和平、富足的向往，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人的个体性和内在世界的维护等。小资产阶级认同的核心是“自我”，捍卫的最后阵地也是“自我”。其反抗性来源于“自我”对社会的不满，这个“不满”可能被疏导、释放、转化，也可能变成切实有效的社会变革力量。关键既在于“自我”的内在世界是否充实而开放，主体状态是否饱满，也在于个体如何被组织起来。而“组织”又必然形成与“自我”的张力。

中国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批判话语认为，小资产阶级由于长期分散的、孤立的、狭小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条件，而养成一种个人主义劣根性，在政治上常表现为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绝对平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想、追求享乐、软弱动摇等缺点。必须改造和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打造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根本质疑思想改造的合理性，并视具有广阔内在世界的“自我”为一切反思、批判和诞生创造力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

“小资产阶级”一词始终具有某种政治能动性，而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市民”① 和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小资”②。“小市民”与“小资”概念都有明显的去政治化含义。

在中国革命中自我认同为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知识青年。他们觉醒的“自我”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尖锐矛盾，促使他们迫切地要求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反过来又提出了改造“自我”的要求，并最终落实为打造一个高度组织化革命政党的历史实践。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分水岭上，形成了旗帜鲜明认同小资产阶级和批判小资产阶级两种政治和文化实践。最终，无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革命感召，走上了改造“自我”、形成中国革命主体的历史道路。但“自我”的问题始终没有消失。

本书第五、六、七章，探讨左倾知识青年从投身国民革命、追求自我解放，到走向人民革命、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革命主体的曲折历程。回到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变革中，检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求索，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自我”的丰富内涵，切实有效思考现代中国的个体性问题和价值建设问题，应能有所裨益。

最后，国民党左派与当时其他各种“中间势力”相比，是最接近国

---

① 关于“小市民”的特性，德国作家黑塞在1927年出版的《荒原狼》中有一段精辟描述：“作为人的存在状态，永远存在着的‘小市民事物’，除了试着寻求‘和解’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除了努力从人的无数极端行为中，从对立的两种事物中找出妥协的中庸之道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小市民虽然也待奉神，但也侍奉情色的陶醉。虽然希望自己具有道德，但也希望在这个人世间过得安乐些。总之，小市民想要定居在两个极端之间，在既没有暴风，也没有雷雨的适度健康地带上过着生活。……小市民最珍惜的是自我（事实上那是发育不完全的自我）。也就是牺牲激烈，换得自身的保障与安全；牺牲献身精神，换得良心的安稳；牺牲享乐，换得安乐；牺牲自由，换得舒适；牺牲炙身的热度，换得惬意的温度。”因为小市民“最害怕牺牲自己，是最容易驾驭的东西，所以小市民用多数取代权力，用法律取代暴力，用投票决定取代责任”。参见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萧逸年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85—86页。

②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小资”——有学者指出——则是一个由消费能力和“品味”界定出来的群体，有很大的依附性。商品消费体系通过无止境的品牌升级不断制造出新的消费欲望，并形成消费群体内部的等级差别，这显然造成个体之间沟通和联合的障碍，因此“小资”的趋同性很难转化为沟通和团结。在当代“小资”品味打造的“个性”和“风格”之下，掩藏着内心的孤独和脆弱。参见冷嘉《作为社会症候的中国当代“小资文学”——以安妮宝贝为例》，孙逊、陈恒主编《城市史与城市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第273—289页。

家政权而有可能将其政治主张付诸实践的。但他们的改良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没有走通。无论在国民革命中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动员都是失败的。他们未能找到真正组织和领导民众的有效方法，解决国民党丧失民众的问题；未能大量吸收真正有理想、有热血的青年加入国民党，解决国民党人才匮乏的问题；也未能遏制国民党的腐化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1928 年后的改组派用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想蓝图，取代了对现实矛盾的政治经济分析，具有批判效用，却不具有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在战争和民族危机的客观环境下，也没有和平民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存发展的历史条件。最终是国民党左派不断走向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越来越靠近中国共产党，另一部分人甚至走上汉奸道路。本书希望从客观历史环境和行动主体两方面分析国民党左派的失败，在批判他们的弱点，特别是某些领导者的软弱性、投机性的同时，打捞其在思想理论方面所可能具有的历史价值。

分析国民党左派的失败，研究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求索，除了揭示历史原本的复杂状态，还可以考察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行动主体开拓历史的意志和能力，以及那些思想、情感、意欲交织的精神世界。对于历史复杂性和历史中动态因素的强调，并不是要以偶然性代替对因果关系和历史规律的探索，而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揭示人们创造历史的真实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客观性。历史是过去的人们用生命在现实中写就的，所谓“客观规律”并不能在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显现，并为人们所掌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许会出现在主观能动性的尽头。只有那些坚定地想象过未来、勇敢地投身于改造现实的行动的人，才可能深刻地把握历史规律。只有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触摸到“可能性”的边界，从而去探究所谓的“必然性”。

我们重新讲述大浪淘沙的故事，最终也是希望把既定历史回溯到它的生成，把结果回溯到过程，把成败回溯到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时刻，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的主体能动性。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学家的任务与其说是让人们记起对过去的义务，还不如说是强加给他们一种意识，即考虑如何运用过去来实现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从现在向未

来的转变……历史能够教育人们认识到，当下他们自己的世界曾经作为一种未知的和令人恐惧的未来存在于前人的心灵中。”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他们当下的状况从来都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人类的行为改变。①

① 海登·怀特：《历史的负担》，《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第53—54页。

第一章　风云际会：国民党左派的形成

国民党左派的诞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1920 年代初，共产国际为了在中国扶持一个亲苏、亲共的政治势力，造成激进的中国革命形势，以配合苏联的远东战略，主导过一种政治策略，即在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领导和基层党员中扶持一个亲苏、亲共的“左派”，以此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亲苏、亲共的群众型政党，发动国民革命，夺取中国政权。在这一策略方针指导下，苏联给国民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包括物质援助和帮助国民党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和苏联国家势力“长驱直入”，为中国政局注入了新的力量，打开了新的空间，给国民党内新兴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共产国际与苏联国家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苏联外交机制的运行特点是，总的外交战略是通过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的，一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独立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实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政治局讨论批准。政治局还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官员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联系，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而保证统一的外交方针。同时，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毕竟是不同性质的机构，时常发生意见分歧，两者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①

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着两种意见分歧，一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给它援助，把它建设成一个群众型政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变成后者的一个“左派”。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的马林和 1922 年 8 月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外交代表团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 1—2 页。

全权代表越飞，都支持这一路线。同时，也有一种坚定的要求摆脱国民党，加速将共产党建设为一个群众型政党，独立开展工人运动的意见，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等人。在1926年2—3月和11—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和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批判斯大林在中国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提出共产党员应立即退出国民党，独立地推行无产阶级政策。

在中国，负责执行共产国际方针、在基层打造国民党左派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意见。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都曾表示，中共中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①] 虽然最终接受了“马林路线”，但中共始终强调保存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并指出，在扶持国民党左派时，必须以中共为核心。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中共“包办”国民党左派党部的局面。这使得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一种要求摆脱共产党控制，打造“纯粹国民党左派”理论和组织的诉求。例如甘乃光等人组织的“左派同盟”，就是这样一种实践。

国民党本来就缺乏牢固信仰和统一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同阶段表现出左倾的国民党人，原本社会政治主张也不相同。他们之所以能会聚在“以俄为师”的主张下，形成一个国民党左派，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基础？有哪些具体的政治诉求？联俄、联共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条件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们是在怎样的历史氛围中选择左倾的？这些

---

①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1985，第535页。张国焘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国民党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始终把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放在第一位，苏联去支持他们，是不明智的。他写道：“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中共不想“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的手中”。《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05—507页。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马林主张联合孙中山搞国共联合战线，把中共推向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非不是甚么可靠联合对象。”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第103页。

都是理解国民党左派的形成需要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和利益考虑，会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群体？

一　扶持国民党左派

1924 年至 1927 年间，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执行共产国际的策略，通过发展国民党左派，来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实施对华政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指导中共积极运用扶持国民党左派的策略，以争取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扶持国民党左派，成为 1924 年至 1927 年间共产国际影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通过确认、扶持、发展国民党内一批在国际上倾向于联俄，在国内倾向于扶助下层的政治势力，使其成为国民党中的主流派，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希望促成国民党的整体激进化，使之变成一个近似共产党的“人民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①

1924 年 1 月 1 日在于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鲍罗廷对中共进行工作部署时指出，当前中共的任务，就是使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有自己的同志，在国民党的组织中贯彻共产党的决议。在 1 月 18 日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他又指出，共产党所走的每一步，都应该是巩固国民党左派，尽可能地使它更明朗；要在组织上把国民党扶持起来，帮助它制定党的纪律。②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6 卷集中反映了这段历史。正如丛书编者所言，这部文件集中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介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革命的几乎全部政治思想方针及其实际实现机制，包括从思想上、政治上、财政上、干部上和其他方面，不仅对共产党，而且尤其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方法。……共产国际一直想借助共产党人使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民党变成近似共产党的激进革命的、‘人民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这种愿望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本书的文件之中”。《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12 页。

②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 1924 年 2 月 16 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442—445 页。

扶持国民党左派的第一步，是在国民党上层寻找亲苏、亲共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利用苏联在华势力和鲍罗廷的影响力，帮助他们取得在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以此推动国民党的整体“左转”。在1924年1月到1925年3月之间，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唯一领袖，最能代表国民党的改组路线。虽然他不是什么左派，鲍罗廷说“在他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但他支持国共合作，因此，鲍罗廷要求中共利用孙中山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便号召国内现有的真正革命分子投入实际生活，把他们无条件地团结在国民党左派的周围”。①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成了共产国际认定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他是国民党内最早与苏俄政府代表越飞接触的人，主张联俄、联共最坚决，他的追随者有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等很多人。蒋介石在当时也是左派，中山舰事件后才逐渐变为右派。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的地位开始攀升。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他已是公认的左派领袖。1926年2月15日和17日，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做报告说，自从许崇智、梁鸿楷和胡汉民被排除出广州国民政府之后，广东有了一个统一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以及“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②

从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改组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前，以及1927年4月至7月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汪精卫扮演了国民党左派中最重要的角色。他先是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积极

①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33—434页。

②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于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16页。

支持和维护联共政策，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群众运动的开展和农工政策的实施；宁汉分裂之后，又倒向国共合作的武汉阵营，成为武汉政府的领袖。另一位在北伐中崛起的著名左派人物是邓演达，他是武汉政府中的实权派，但中共在利用国民党左派旗帜时并不重视他。周恩来后来总结国共合作的教训时说："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后，"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①

除汪精卫、邓演达之外，孙科、徐谦，以及拥护武汉政府的军事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等人，也都曾是所谓的国民党左派。②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向苏联提出提供武器援助和派遣顾问的请求。1925 年起，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点，一度被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为"统管"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各军事集团而成立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向国民军提供了大规模的物质援助。③ 1926 年 5 月冯玉祥在苏联加入国民党，不久又通令其统率的军队全体加入国民党，因此冯玉祥也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 167 页。

② 有学者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左派经历过复杂的分化、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国民党一大至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是国民党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袖是廖仲恺和汪精卫，其特点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 年 8 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巩固了领袖地位，蒋介石则借助汪精卫的政治庇护成为军事领袖，形成汪蒋合作局面，直至中山舰事件爆发。（2）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爆发，随后汪精卫出走，到 1926 年 10 月，这是国民党左派的受挫阶段。左派势力受到蒋介石的打击，组织涣散，彷徨无主。（3）从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党左派进入复兴阶段，形成了以宋庆龄、邓演达、徐谦为政治首领，张发奎、唐生智为军事支柱的新的国民党左派。其主要任务是反蒋和发动"迎汪复职"运动。1926 年 10 月，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规定了左派的四条政纲：1）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2）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3）反对西山会议派；4）拥戴汪精卫为领袖。（4）1927 年 4 月汪精卫回国之后，在政治上拉拢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孙科等人，在军事上取得唐生智、张发奎的支持，最终"叛变革命"。参见张光宇、钟永恒《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演变和共产党的政策》，《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五部分"冯玉祥政变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新重点"。有关经费拨付和武器援助的具体情况参见第 139、146、152、177、183、187、192 号文件。

左派，事实上他一直是中国政局中一支独立的军政力量。

在扶持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同时，共产国际还指导中共进行了大量培养国民党左派党员和打造国民党左派群众的工作，包括设立各种党校、宣传员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造就能接近群众、组织群众的国民党左派人才，打通国民党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帮助国民党左派从右派手中夺取群众，扩大左派的群众基础，发展左派的群众组织，增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力量，减少他们的动摇性。①

国民党改组后，工、农、商、学各界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大批革命青年被吸收到国民党中，成为国民党左派。由于中共党员的身份隐蔽，入党审查也比较严格，国民党则公开活动，大部分投身革命的青年都被安排进了国民党左派的组织。为了发展出一个有领袖、有纲领、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的国民党左派，中共中央曾指示基层共产党员，不惜以“苦力”的身份去帮助国民党左派，在有左派的地方就去扶持左派，在没有左派的地方就去“制造”左派。②

为什么中共如此重视制造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共产国际制定的通过发展国民党左派来促成国民党整体激进化，是一个总体战略。分化对手、

---

① 《中央特别会议文件·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1926年1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75—576页。

② 北伐战争开始后，广东的农工运动受到压制，为了恢复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权，贯彻左派的政纲，中共中央制定了迎汪复职、促成汪蒋合作的政策，同时训令粤区同志“须加紧与左派合作。若粤区同志说没有左派，当速造成一个左派”［《中央致粤区的信——制定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318页］。中共中央还指示粤区，广东的某些左派“对于C.P.虽表示愿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仍很怀疑C.P.，觉得C.P.可怕［所谓可怕：（1）是指C.P.政策老练〔练〕深沉；（2）是指C.P.有群众］，……因此在合作之中，仍时刻防闲C.P.”。加之国民党左派还缺乏政治训练，“易为感情所冲动，更易受右派之煽动”，这便极易给右派以挑拨的机会。“我们必须使左派也自己感觉自己有群众、有力量，在与我们合作中去掉怀疑、防闲的心理。”要给国民党左派以负责任的机会，给国民党左派以接近群众的机会，扶助他们，使国民党左派能独立起来、有力起来。参见《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1926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373—374页。粤区同志回复中央：“我们始终保持了‘苦力’的身分帮助左派。但是也有例外，现在南路的农民运动，差不多是C.P.包办，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那个地方的国民党，那个地方的农会都是土豪劣绅的了。因此还要为着革命的利益作苦力，依照中央上次的指示‘如果没有左派我们就要造左派’的原则去工作。”参见《粤区来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192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638页。

保存自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性考虑。如果国民党中不能分化出一个左派，那么当激进革命行动遭到各种守旧势力反对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就只能独自面对这些势力的攻击。有国民党左派作为“外围组织”，中共的压力就会减轻。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议指出，如果国民党中没有左、右派的分别，“我们和右派冲突时，便表现出来是 C. P. 和整个的国民党冲突，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动派都愿意我们走这条路”。① 中共中央还指示粤区：“过去我们包办 K. M. T. 的工作已发生很大的错误，……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众组织更广阔的发展，一方面是使斗争性质不扩大成为左右派之争而变成右派与 C. P. 之争。”② 因此，中共中央坚决主张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左派的力量越稳固，中共的活动空间就越宽广。

此外，在当时中国的基层社会中，普通民众对于“共产”一词还普遍存在误解，特别是在农村。一般农民观念守旧，又听信反共势力的宣传，往往以为共产党就是“共妻共产”，视之如同洪水猛兽。1927 年 3 月初发生在湖北的“阳新惨案”，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地土豪劣绅造谣惑众，说共产党“要挖祖坟”“劈祖宗牌子”“共产共妻”，煽动红枪会包围县城，抓去省农协特派员和县党部机关中的九名共产党员，捆绑在城隍庙内，以煤油干柴烧死。③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发展出一个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发动工、农、商、学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被认为是广泛发动群众的更有效的途径。

发展国民党左派，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以国民党左派来领导中国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都认为，“在现时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这些群众绝不是 C. P. 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④ 国民党

---

① 《中央特别会议文件·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574 页。

② 《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1926 年 10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374—375 页。

③ 邓初民遗稿《九十述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 3 辑，1981，第 13—14 页。

④ 《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1926 年 10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374 页。

的性质是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它“不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不能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它的中下级党部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能够团结最广大的群众。[①] 中国共产党必须一面组织工农，一面“结合国民党左派以抓住小资产阶级”，才能真正领导国民革命。[②]

发展国民党左派，是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要求全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应是在“竭力赞助”左派发展、竭力扩大左派组织的同时，“又要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因为左派的发展是要以C.P.为核心的，离开了C.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③] 中共还力图将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例如1926年10月，黄埔军校招生时，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均应鼓动K.M.T.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右派分子所拿去，……其有无党派之革命青年愿往者，均可临时会之（原文如此——引者注）加入K.M.T.前去。……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惟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④]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也曾试图绕开中共，直接与共产国际建立密切关系。[⑤] 1926年2月，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后，已决定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并力求完成从国民革命过渡到社会革命的任务。共产国际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国民党认为，它有必要加入共产国际的

---

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177—17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171页。

③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192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44、46—47页。

④ 《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二十二号）——鼓动国民党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革命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79—80页。

⑤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杨天石《那力子由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153—176页。

队伍。[①] 共产国际经过讨论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没有批准。

1926 年 11 月，邵力子再次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国民党强烈希望与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并建议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当在所有党的事务和革命策略问题上给党以忠告和指导。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当参加国际革命的工作”。[②]

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自觉建设左派理论和组织、反对共产党控制国民党左派的诉求。例如 1926 年底在广东成立的以甘乃光、陈孚木、王梦一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同盟”。这个组织成立后，对中共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左派同盟”的字眼一度频繁出现在共产党的文件中。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左派同盟”有几十个人，几乎包括了广州所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按社会成分来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多半是大学生）”（括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和群众没有组织联系。它的领导人甘乃光经常同陈延年等中共在广东的领导人谈论群众问题，责备中共从国民党左派那里夺走了群众，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也试图利用“左派同盟”，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反动派。[③]

“左派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甘乃光，1922 年毕业于广东岭南大学经济系，后担任该校附属中学教员，因为学生廖梦醒的介绍而结识廖仲

---

① 《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面提要》（1926 年 2 月 13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91—92 页。

②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 年 11 月 25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638 页。

③ 参见《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27 年 9 月 20 日）。报告认为，“左派同盟”实际上是敌视群众的，从思想上来说很接近戴季陶。其主要任务是同共产党进行斗争，政治纲领的核心是“阶级合作”，以“全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作为国民党的纲领。报告得出结论说，“左派同盟”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是代表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按其社会地位来说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在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豪绅和各种封建余孽的对抗中有其革命性，但对工农暴动和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惧超过了他们“虚假的革命性”。这份报告代表了共产国际对“左派同盟”的基本看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7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 77—78 页。

恺。在廖仲恺担任国民党商民部部长期间，甘乃光任商民部秘书。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甘乃光曾代理商民部部长。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兼任监察院委员、南路行政委员、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广州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后，任命甘乃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及广东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厅厅长，但他没有就职。

甘乃光在1924年至1927年间，以建设“左派”理论和支持农民运动闻名，曾编写《孙文主义发凡》《孙文学说驳议之驳议》《以党建国》《中国国民党几个根本问题》《怎样做农工行政》等多部阐释国民党理论和策略方法的著作。他在理论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拥护国民党的农工政策，重视农民的力量。他认为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要使国民革命成功，非动员农民起来不可，并将农军看成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根本势力之一。

1926年3月，甘乃光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时，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第六届农讲所与前五届相比，不但招生规模和地区有所扩大——学员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大多是热心农民工作的青年，共计320余人，而且授课时间最长，开设的课程最多——授课时间为13个星期，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3门课。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林伯渠、阮啸仙、罗绮园等中共重要领导人都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甘乃光也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农民运动》的发刊词也出自甘乃光之手。

甘乃光重视工农运动，但不主张因此而忽视中小商人、“智识阶级”和海外华侨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他重视民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组织建设，认为在当时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拿手枪、抛炸弹，运动军队，出生入死即可，而是必须做一个民众运动者，使民众有政治觉悟，能自身运动起来以谋解放。能够使

民众运动起来的组织就是党。[①] 因此，必须重视党的建设，使党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有力的指挥能力，不但能指挥党员和各级政治机关，还要有能力动员民众。党内应实行民主集中制。[②]

尽管有自觉的“左派”理论并成立了“左派同盟”的组织，甘乃光仍公开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划分。他不以国民党左派自居，而是站在整个国民党的立场上，声称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国民党几个根本问题”。他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说：“如或有谓这只是左派的理论者，则予欲无言矣。”[③]

二　国民党左派的思想理论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本身相对缺乏一致信仰和统一思想，自称“左派”或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势力，也持有不同的思想主张，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聚集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下。国民党左派的思想如同国民党本身一样混乱。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左倾的政治势力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反帝思想，也能看到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顾孟馀研究者就指出，顾孟馀关于中国改造的基本立场是资本主义式的，他推崇英国政党政治和欧洲文官体制，以及鼓励生产、增加财富、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他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强调精神的能动性，认为“历史是人造的，人都有头脑”，思想并不绝对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也反对阶级斗争，赞成联合互助论，还反对无产阶级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寄望于以经济发展和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演进，促进社会理想的实现。[④] 武汉政府里活跃的“左派”徐谦是有名的基督徒。唐生智则有“佛化将军”之称。

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做出决策和判断的依据，乃是现实政

---

① 甘乃光：《中国国民党几个根本问题》，中国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印行，1926，第6页。

② 甘乃光：《以党建国》，中山大学训育部编辑科编印，1927，第8—12页。

③ 甘乃光：《中国国民党几个根本问题》，“序言”第2页。

④ 黄克武：《顾孟馀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第41—52页。

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客观条件，而非某种理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乌托邦主义者或教条主义者，不考虑具体条件，只根据理念或原则做出决策，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一个缺乏基本政治理念与一贯主张，只顾眼前利益，见风使舵，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官员，也不能称其为政治家。正如卡尔指出："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改造实践的作用。政治过程既不像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由因果机械法则控制的事物发展过程，也不像乌托邦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智者意识中的理论真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政治学的基础是承认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存。"① 观察国民党左派的实践，也不应忽视他们的思想理论。

（一）孙中山的党治思想

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孙中山是国民党唯一的领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争夺领导权时，也对孙中山思想进行了各种符合自己主张的阐释。关于联俄政策的确立，蒋介石后来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统一，尽可能地将共产党纳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二是为联合苏联，以反抗英法帝国主义的压迫。他说，当时革命根据地广州，正处于英法旧殖民主义势力控制之下，国民党欲在此建立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苏联共产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国民党闻此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苏联援助"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② 蒋在这里并未提及以俄为师的问题。

而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体制和方法，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和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相对于苏联的物质和军事援助，孙中山更

---

①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14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31页。《苏俄在中国》完成于1956年12月，由陶希圣等人执笔。

主张在革命方法、革命精神这个层面上学习苏联，但不涉及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①]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考，在他1924年前后发表的各种演说、训词和通告中都有充分的阐释。1923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上说，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涣散无能，党势不进，推思其故，殆有三端：

> 一、党中缺乏组织，此盖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吾人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又为本党之一党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期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因国家不自由，而个人之自由亦不能保。二、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故改组国民党，本党遂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由此消失。三、本党之基础未固。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亟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

孙中山又说：“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首须立远大之眼光，不可斤斤于目前之小利。……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现既觉悟前此种种之失，今后应振刷精神，实行奋斗。”[②]

事实上，孙中山在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已认识到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对于政治斗争的重大意义。他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将国民党由公开政党改为秘密组织，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等级区分党员，要求党员立誓服从党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并盖指模为证，其根本诉求，就是要打造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敢于牺牲的革命党。孙中山认为，在国是未定、军事斗争时期，党须有“不可侮之实力”，即武力，才能夺取政权；而创造可靠的武力，必得有

---

① 邱捷：《孙中山的对俄观》，《历史教学》1997年第11期。

② 孙中山：《过去党务失败之原因》，《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344—346页。

"敢死得力之党员"；将来革命成功，也需要有一批这样的"真民党"来承担政治责任。否则，一般旧官僚纷至沓来，不过重演辛亥故事，不能真正维持共和。①

但是，许多早期的革命党人不能接受立誓约、按指模、区分元勋公民的做法。李烈钧、陈炯明反对誓约、反对"元勋公民"。方声涛激烈反对中华革命党的专制作风，说"在东京见一班中华革命党，专以气凌人，凡同志之不入党内者，一概视为敌人，……我岂肯为威所胁。你会骂，我也会骂；你会打，我也会打；打一个和一个，你来两个，就不是人"。朱执信也以打手模、当元勋为耻，不肯入党，更进一步认为，孙中山的为人"长于推诚，短于驾驭"，所谓事权统一，不过有名无实，"事权久已旁落，而窃弄于三数小人之手"。这是历史上一切专制君主的下场，不想孙中山竟以党魁而蹈此覆辙。②

汪精卫更在致吴稚晖信中痛斥："年来国民党受人诽谤，有甚于千夫所指，然无论如何诽谤，终不至有失其立脚地。今中山党纲已成，则并立脚地而自失之矣。尽千万侦探之造谣、千万文人之曲笔，当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党纲以污革命党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来。……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③

面对这些激烈反对之声，孙中山不为所动。他认为，"专制"一词只能用于一般人民批判政府，不能用于党员批判党魁。一党之内，党魁必须有特权统领一切，党员唯有各司其职，服从命令，"安得妄以专制为诟病、以不自由为屈辱者"。所谓"一致"尽力于革命者，"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体一志，无有差二，而不可徒用虚名，不然，则是虚与委蛇者也、强为撮合者也"。④ 可见，此时孙中山已经彻底否定了模仿19世纪西方政党政治，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议会式政党的方案，而在构

① 孙中山：《致邓泽如等请物色壮勇可造之士到东受训函》（1916年4月10日），《国父全集》第4册，第407—408页。

② 《汪精卫致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谭仲逵、李圣章函》（1915年6月20日），吴稚晖档案，稚09392。

③ 《汪精卫致吴稚晖函》（1914年9月17日），吴稚晖档案，稚09562。

④ 孙中山：《复杨汉孙论统一党权与服从命令书》（1915年8月4日），《国父全集》第4册，第362—363页。

思一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全党一心、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政党组织方案，以及一种由党员担任国家官吏的以党治国模式。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此次大会之目的有二：一改组本党，一建设国家。”他说，苏联完全以党治国，可为模范。其所以能成功，即因其把“党”放在“国”上。“现在我们何常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如今日上海、广州常见之青草地上起洋楼，必先经过一棚寮时代，……党之于国家，即如棚寮之于洋楼。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故大家应有此思想与力量，以党建国。”①

1924年3月2日，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孙中山又发出《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致党员通告》，解说国民党联俄、改组的意义。阐释如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如何“从下层构造而上”，打造一个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孙中山说：

> 本党前此注名党籍之党员，为数二十余万，同志不为不多；然按之实际，则除在册籍上载有姓名外，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以故党员虽多，毫无活动，衡量党力，更属微渺。夫所贵乎有党者，盖在集合国民力能活动之分子结为团体，在一主义之下为一致之奋斗。故其要义，一在有主义，二在有团结，三在有训练。而欲求主义之鲜明、团结之坚实、训练之整齐，则不得不先揭三民主义之真解，而革力于基本之组织。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

孙中山又说，苏联能在极短时间内，对内革除根深蒂固之贵族专制，

① 孙中山：《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国父全集》第3册，第412—414页。

对外战胜帝国主义，足以鼓舞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奋斗精神。其所作所为与国民党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并不冲突，无论在国情还是主义问题上，苏联都可与中国引为同调，为中国借鉴之资：

> 夫吾国之革命在前，俄国之革命在后，俄乃以六年之短期，则除根深蒂固之专制阶级，战胜其四国之帝国主义之恶魔，且以其势力振发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奋斗精神。而吾党自辛亥造令，垂十三年，国内军阀官僚之横暴日甚一日，国外帝国资本主义之侵凌日迫一日，以视乎俄，瞠乎其后。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

最后，“通告”谈到结合一切革命力量，统一革命战线的问题。孙中山说：“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①

孙中山还谈到，以俄为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宣传能力，这宣传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宣传之力无可抵制”，“宣传这种武器比军队还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②

无论是严密的组织还是强有力的宣传，都只是一个革命党的外在形式，并非真正的灵魂。一个革命党的灵魂，在于它的革命精神，在于它有真诚的主义和信仰，以及能够为信仰而牺牲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认为，

---

① 孙中山：《释本党改组宗旨意义致党员通告》，《国父全集》第2册，第140—142页。

② 孙中山：《党务进行当以宣传为重》（1923年1月2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演讲），《国父全集》第3册，第318—320页。

以党治国的根本，是“以党的主义治国”，民众、士兵、党员，对党的主义有真诚的信赖，党才能凝聚全国人心，人心才是“立国的大根本”。而得人心的方法，“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孙中山深知，许多国民党党员已丧失了真诚勇毅的革命精神，许多国民党党员人格卑劣，以发财做官为入党目的。许多有血气、有理想的青年不愿加入国民党。因此，改组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淘汰那些品格卑劣、存心做大官的人，吸收那些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青年入党，使党除去暮气，恢复朝气，“从此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①

这篇《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致党员通告》，充分阐述了孙中山确定联俄政策、改组国民党的初衷。其核心诉求在于打造一个有能力的革命党，其要义不外四点：第一，党要有革命精神，要有优秀的、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党员群体，这样的党才能得人心；第二，党要有全国性的群众基础；第三，党要有完善的组织纪律；第四，党要重视宣传。有此四点，党的基础才能巩固，势力才能发展，才有能力以党治国。

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苏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另一方面又容纳共产主义者，这本身就有严重的内在矛盾。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只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涣散的体制，容许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领导权；另一种就是国共合作终止，或共产党主动脱离，或国民党实行“清党”“分共”，因为国民党不可能放弃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由此看来，国共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②

总之，1924 年的国民党改组，是孙中山一个大智大勇的决策。它意味着国民党将勇敢直面与共产主义交织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从华侨、会党和军阀武力的限制中走出来，与苏联结成联盟，动员全国民众发动国民革命，在此过程中实现孙中山一直以来的以党治国思想。此外，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竞争。这次改组将国民党带到

---

① 孙中山：《党员不可存心做官》（1923 年 10 月 15 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讲词），《国父全集》第 3 册，第 346—352 页。

②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 89—90 页。

了一个十字路口，它提供了机遇，为政治行动者敞开了空间，也考验着行动者的智慧和能力。坚持奉行联俄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正是要继承孙中山的志业，直面这些挑战、风险和机遇。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党内最积极的支持者与最得力的助手当为廖仲恺。1923年11月底，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从广州至上海，与国民党各省支部干部商议国民党改组事宜。1923年12月9日，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廖仲恺在会上报告国民党此次厉行改组的原因，重点强调了两点，一为建立“党军”的问题，一为建立基层党部的问题。他说，广州政治屡经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必得有一种能控制军队的力量，这就是党。党的改造，须“从下层多做功夫”，“专靠上层，必致如广州今日情形；徒赖军队，不过终为军队所用而已”。①

在12月11日举行的上海特别区党务改组特别会议上，廖仲恺报告此次改组党务的决心与目标，更充分阐释了“以党治军”和武力须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阐明党员和军队都须从下层根本改造，以明了主义的民众作为党和军队的基础。他说：

> 吾党自民五失败以来，知非由党发生一真能力不可，谅为同人所尽知。吾人知必以党义奋斗扩充，然空言多而事实少，临时致求援于军队。军队诚为有力量者，然必另有一力量以指挥之，如专制时皇帝之权威。然民国成立，人民失此权威，权威落于军队之手，原因在无一最高权威者，以致军事政治均感困难。于是吾人乃悟党的权威的扩充的必要。党之权威发源组织，总理见及于此，乃下此改组之决心。
>
> 本党在奋斗中感受困难不少，有时即能因利乘便，结果必至悲观，其最大原因是无切实之党员。党员只在党册增数，事实上实无之。欲改革此点，须从底下做起，吾党十余年来曾未下此功夫。即以军队论，军队亦由民间来之。民众若早就党义之感化，兵即为主

① 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83—584页。

义之兵。若临时运动，决无甚效力，且甚危险。若先受感化，则效用甚大矣。再三，选举亦须感化民众于未选举之前，不应以金钱运动于选举之日，由此可知吾党须先有地方上民众之根据，然后临时应付乃有效力。①

在第二天的各分部代表会议上，廖仲恺又详细报告了从基层改组国民党的原因和具体实施办法。他说："此次发起改组，原因为本党组织颇多疏漏。民四、五以后，同志均感有改组之必要，但未得要领，只知其为有不妥处而已，如组织不良、训练不周等均为重大缺点。本党虽屡经改组，但只改组最高机关，……最近在粤，感受党与政治间、军人间、党员间，绝无联络，几不见党员何在，犹沙上筑室，绝无基础。所共同努力者，只最少数政治上、军事上之同志而已，因此党之力量非常薄弱。……组党应由下而上，不应由上而下，以前只有机关而无党员，故不能发生效力。以后宜有一根本组织，以地方为标准（如区分部）建设基本党部。……基本组织在区分部。……吾党欲立于不败之地，及今计，虽已嫌迟，然因此更应积极进行。"②廖仲恺对国民党改组原因与方法的阐释，说明他在改组国民党问题上的思考与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

与列宁主义的党治理论相比，孙中山的党治理论中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贤人政治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进化论的历史观。它可以简单表述为：由"先知先觉"的党魁，领导"后知后觉"的革命党人，动员和教育广大"不知不觉"的普通民众，引领中国融入浩荡的世界历史进化潮流。这种知难行易、贤人政治和进化论的历史观，是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

1924 年 4 月，廖仲恺在广州岭南大学史坚如石像揭幕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我们若把社会分为几个阶级，我们可以分为三层：一为先知先

① 《上海特别区党务改组会议纪录》（1923 年 12 月），上海执行部抄，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议纪录"，会 999.2/1.1-14。

② 《上海特别区党务改组会议纪录》（1923 年 12 月），上海执行部抄，"会议纪录"，会 999.2/1.1-14。

觉，二为后知后觉，三为不知不觉。"[①] 这些引用孙中山的概念的表述，说明廖仲恺对于"党"的理解更接近一种"贤人政治"，而非将"党"理解为阶级的代表。在这一点上廖仲恺与孙中山是统一的，而不同于甘乃光、陈公博等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更年青一代的国民党左派。

（二）廖仲恺的社会思想

无论是国民党内社会主义思想的阐发，还是联俄政策的实践，廖仲恺都是国民党左派的核心，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亲近社会主义思想，在同盟会时期，即在《民报》上翻译发表过各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包括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布利斯（W. D. P. Bliss）的《社会主义手册》（*A Handbook of Socialism*）中的一些章节，如"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在1920年代初，廖仲恺在担任广东省省长期间，尝试将亨利·乔治的思想资源付诸政治实践。1923年，他在广州颁布了体现亨利·乔治思想的土地税方案《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草案》。

改组后的国民党，积极奉行扶助农工政策，为确立劳工团体的地位、使其自由发展，保障劳工运动的组织和进行，制定了各种劳动法律法规，保护工人利益。廖仲恺更走在保护农工的最前线。在1924年5月江门油业工人与油东和商团的冲突中，廖仲恺以工人代表会主席的身份，发出支援工人的通电，严厉斥责油东及商团"仇恨工人，借端伤杀，围困工会，拷打无辜，此等行为直同野兽"，号召广州工人"协力声援"，"与此万恶东行及蛮横商团对抗"，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毙、电请政府保护工人、成立工团军、严惩江门油东及商团的要求。[②] 1924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廖仲恺、邵元冲、汪精卫负责起草《工会条例》，同年11月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正式颁布实施。条例规定了工人在组织工会、参与规定工作时间、改良工作状况及卫生条件等各方面的权利，并用法律的形式宣布："工会在必要时，得根据会员之多数决议宣告罢工。"[③]

---

① 廖仲恺：《在广州岭南大学史坚如石像开幕纪念会上的演说》，《双清文集》上卷，第639页。

② 廖仲恺：《支援江门油业工人通电》，《双清文集》上卷，第639页。

③ 徐东辉：《试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南方政权的劳动立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廖仲恺在社会革命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使他成为广州政府中公认的左派。廖仲恺的传记作者说，这一时期，他同时担任了13个重要职务，每天办公12—17个小时。他对1924年商团事件的反应，比孙中山更为激烈。他对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态度，是认为其政治性远远超过经济性，是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先声。他对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有新的认识，所以在担任农民、工人部部长期间，特别致力于农工的组织工作。由于在农工运动中的激进态度，他被人怀疑是共产党。[①] 因为这一点，他遭到许多人的仇视。同时，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部长，要从军人手中收回财政权，因此遭到了军人势力的反对。他不避余力地投入各种实际工作，却并未积极去谋求一个领袖地位，这显示出他真纯的革命精神。

廖仲恺是国民党中最真纯的革命者，也是重要的国民党左派理论家。他虽然秉持激进的农工立场，却从未信奉和宣传过阶级斗争理论，也极少用阶级话语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1925年3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廖仲恺为甘乃光的新书《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所写的序言——“试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在文中，廖仲恺对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前途，表达了审慎的悲观，但对社会主义却表示出坚定的信念。他说：“能借革命之机会，将国计民生两个大问题，滚作一团，为比较彻底的解决，不得而知。从目前那方面去看，自然是悲观多，乐观少，便说大话，也难说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使人人相信而生希望。”但是，研究世界文明的人常说，“文明之光往往从暗黑中透出来”，中国将来之光，也是可以隐约寻见的，“现今之青年学生，确有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将来之光，就是在这一点”。[②]

什么是社会主义？廖仲恺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以社会全体动员，来做福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在这种主义之下之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但是，生产成绩如

---

① 陈福霖：《廖仲恺——一个中国革命家》，《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

② 廖仲恺：《〈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试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双清文集》上卷，第739—740页。

何，社会福利如何，仍要看“所能够利用之资本之大小、知识之多寡、机器之良窳、人民之勤怠”，这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分别。廖仲恺认为：“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生产问题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①

廖仲恺从集合生产和社会平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认为“在产业私有制度之下，资本主义绝流而渔，操毋〔母〕财而营商贾者，利乎人群生活之需，因钱币以购劳动，缘供给以肆征求，剩余价值之所归，咸趋如一。而嗷嗷待哺之众，乃与牛马牺牲同其命运。于是愤懑不平之气，酿成阶级之斗争，经济革命、社会改造之声，蜚然喙于天下矣”。② 他希望设法避免资本主义发达、贫富分化带来的阶级斗争，在发展国民经济、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为所有人谋取平等和自由。

廖仲恺认为，“近世产业进步之国家，当社会之经济制度未经彻底改革之先，为防资本集中于个人而牺牲社会故，对于交通、食水、煤气、电力、制盐、卷烟、炼钢、织造、保险等事业，其尤进者则并土地、矿山，与夫凡有专占性质或有关于公共卫生者之属”，皆行“公有公营政策”，诚能使其范围推广，则一种集产的社会主义可以达到。又说，当今世界范围之内，“利用机器，扩张工场，振兴实业”，都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若欲一面改良生活，而同时解决分配问题，以平和渐进之方，达理想组织之域”，则有两种方法：一为履行公营政策；二为广布合作组织。③

“用集合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调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这是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愿望。1932年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也表述过建立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构想。他设想将一切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产业都收归国有，建设国家资本；对外可与国际资本抗衡，

---

① 廖仲恺：《〈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试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双清文集》上卷，第741页。

②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双清文集》上卷，第927页。

③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双清文集》上卷，第929—930页。

对内可吸收大量工人，使他们成为国家工人，如此不但能集中财力物力建设国民经济，还能避免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但是廖仲恺并不十分推崇大的国营公司。在国营事业与社会合作组织之间，他更重视社会的合作组织，对于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则表示忧虑。

廖仲恺为何不信任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首先，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规模的公有公营事业很难建立。因为“政治革命顿挫频仍，腐败势力，以利相结，扫除涤荡，尚不知竟于何时。公营政策之成功，自难企于现行制度之下”。所以，用和平手段解决生产分配问题，就只能依靠人民的合作运动。“倘消费者能互相团结，以谋自助”，则资本主义之跋扈可以消灭，民主的基础可以养成。[①] 廖仲恺很重视合作社的发展，提倡广泛建立消费合作社，认为这种组织“简单易行”，可小可大，“远则为理想的国家奠定基础于将来，近则为社会除绞取之弊，为人民免生活之困苦”，或可于不知不觉之中，达成经济的自治，“友爱同胞之观念，因以增进，人类社会之本能，因以发达”。[②]

其次，在不易实现之外，廖仲恺还想到了公有公营事业可能产生的弊病。他说，公有公营政策的实施，若非人民在政治制度上，对国家营业机关能实行有效监督，且能有适当的处理办法，则“其流弊所至，轻则浪费，甚则腐败，名则以利社会，实则有以饱私囊”。在“政治罪恶昭彰之国”，其流弊尤不易避免。而消费合作社则在监督管理方面，比国营事业要有效得多。一方面，“合作社社员，虽仍以营业之任务，委托所选之少数人，然其对于业务之进行，比诸国家都市所经营者，监督之机会较多，且较直接而有力”；另一方面，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委托于选任之经营委员会，而社员全体大会，每年召开两次或四次，一切营业情况，均须向全体大会报告，经营职员有不如人意者，由大会改选，“流弊未易滋蔓”。至于国营事业，则人民处代议制度之下，监督办法只能依赖“代表”列席于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加以“会期甚短，而议案极繁”，虽有“贤能负责之议员”，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人民不能直接任免国营事业的负责人，所谓监督精神，亦不免涣散了。[③]

---

①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双清文集》上卷，第931页。
②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双清文集》上卷，第928页。
③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双清文集》上卷，第929页。

建设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会选择的发展模式，也是国民党左派的共识，廖仲恺对这一制度之弊端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对合作事业寄予很高的期待，不仅在于其经营范围可大可小，“其广狭大小，惟以社员之众寡、消费者购买额之多少为衡。苟能扩充及于全社会之消费者，则凡为人类所需用之物，合作社皆将有以供给之”，还因为合作社相比于国有事业，更能发挥民众的监督功能，防止腐败、浪费和经营不善。合作社强调人民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既本于人民之经济的自助，则其所结之果，以较凭借政治之机关，养成依赖之习惯者，佳胜多矣”。①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长久以来的官僚制度、官僚习气，人民对官员的畏惧、依赖，以及人民自发性、自主性的压抑，廖仲恺将互助合作组织与人民自主、自发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见解。毕竟，所有的国家建设事业都需要依靠一个一个的人来完成，而只有当一个人能对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施加影响，能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改变、提升自己的生活，他才会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属的那个共同体，他的生命力和热情才能被调动起来，焕发出人的尊严。陈公博说，政治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我只相信经济，不相信除了经济以外，更有政治”。② 廖仲恺则看到，经济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内含人的主体性的问题。这一见解，在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中是独特而深刻的。

廖仲恺的思想，无论是在国民党左派中还是在中国左翼思想史中，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他信仰社会主义，秉持激进农工立场，但反对阶级斗争；他从集合生产和社会平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希望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分化，为全体中国人谋平等的自由。与此同时，他更深刻地看到国有公营事业的弊端，相对于国营事业，他更重视社会合作组织，认为在政治落后、人民缺乏民主素养和有效监督、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国有公营事业势难避免腐败的危机，而合作组织既可解决生产分配问题，又可养成人民的自治能力，培养民主基础。廖仲恺的社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

---

① 廖仲恺：《消费合作社概论》，《双清文集》上卷，第929—930页。

②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7，第204页。

实践与现代化建设道路，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反帝和世界革命思想

汪精卫的政治立场以反共著称，而且在孙中山筹划联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汪精卫持反对态度。虽然他在1923年被孙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具体参与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但至少在1924年之前，汪精卫对于联俄联共政策都是心存疑虑的。孙中山在1924年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革命委员会）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① 吴稚晖也说过："在总理提议联俄之初，（汪精卫）先生因向不满于马克思之学说，故廖、蒋、胡等皆积极赞同，而先生独致冷淡。先生曾譬苏俄如孙悟空，国民党如猪精，孙悟空遁入猪精之腹中，尽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猪精毫无办法。"而且直到1927年4月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上海时，还说"苏俄不但把国民党当工具，他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工具"之类的话。② 如果吴稚晖的说法可信，那么可以说明，在整个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汪精卫始终没有真正地接受和信任过共产党，即使在国共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也不例外。

汪精卫在思想和个性上，并不认同组织严密、纪律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党。从民国初年到1920年代初，他都宣称自己是"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信徒，信奉教育救国理念。他曾在一封致吴稚晖的信中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而对于中国消除内难、抵御外侮之念，仍时时而有，亦以此非惟不抵触于主义，且为达此主义所必经之阶级耳。"③

但汪精卫一直有一种反帝思想，并且很早就表达过中国的民族革命应与欧洲工人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相结合的愿望。他在民初赴法留

---

① 蒋介石：《请总理应准胡、汪加入革命委员会函》；孙中山：《复蒋介石请应准胡汉民汪精卫加入革命委员会函》（1924年10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第243页。

② 吴稚晖：《用真凭实据再与汪先生商榷》，《中央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7年6月15日，第22页。

③ 《汪兆铭等复蔡孑民、吴稚晖及李石曾之来信》，吴稚晖档案，稚09390。

学期间，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摧残，以为欧洲“帝国主义之况味，现已饱尝，或能促起一极大之改革”。[①] 1915年2月2日，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认为，今日中国的“真爱国者”，不应主张富国强兵，而应助力于“欧洲之大改革”。他说：

> 欧恩同君恒言“欲中国之改革，不可不先谋欧洲之大改革”，铭深以其言为中。盖欧洲一日不改革，帝国主义一日植立于大地之上，我等虽日日鼓吹社会主义，终无以止中国人之热趋于帝国主义也。热趋于帝国主义而不及，则为衰落之安南、高丽，幸而及之，则为骄横之日本，殆无第三途。今日中国之真爱国者，皆兢兢致力于此。盖欧洲之帝国主义，逼之使不得不如此。其力量之弘过于社会主义，示人以当然者不啻倍蓰也。然则中国之真爱国者，日日言富国强兵，自是前门拒狼之策，而我等之热心社会主义者，助力于欧洲之大改革，实乃釜底抽薪之计。……然欲助力于欧洲大改革，必须筹极大之款以资工党。欧君以筹款事相询问，铭竟无以对也。[②]

1915年2月，正是中日双方就“二十一条”交涉的时候。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正在外交部迎宾馆展开秘密会谈，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在拒绝日本所提条件的同时，有意向中国社会“泄露”日本的无理要求，引起国内舆论大哗。中国民众的反日呼声高涨，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1915年2月19日，汪精卫在致吴稚晖信中说：

> 木屐儿蠢动之消息，已如疾风骤雨而至，此事固非意外，但前此尚希冀木屐儿有所顾忌而不敢为，今则戟喙加寒蝉，戚且为之张目，木屐儿已直视中国为被之印度。弟觉先生所注意之“政治革命问题”已非应敛之道。欧君所注意之“世界革命问题”亦非应急之道。今日欧人所言世界革命，实则不过欧洲革命，彼等尚未将欧洲以外之人类算入人类之中。一般之欧人固然，即所谓社会党人，亦

① 《汪精卫致吴稚晖函》（1914年12月17日），吴稚晖档案，稚09383。

② 《汪兆铭致吴稚晖函，谈他关于谋中国改革及世界社事》（1915年2月2日），吴稚晖档案，稚09396。

或不免。如此做去，即使一日欧洲革命大成，而东方尚有凭借强权之日本，事正未了。……如此则扑灭日本之强权，实世界革命之不可稍缺者。……今铭所认为最急者有二：（一）唤起全国人之决心，宁死不为木屐儿之奴隶（此仍是教育范围内事）；（二）设种种方法破坏彼中恶狡之势力。①

这些信意味深长，反映出汪精卫十分矛盾的思想。但有几点是确定的：第一，他反对资本帝国主义，期待世界革命；第二，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有足够的机会与实力灭亡中国；第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四，欧洲人所谓的世界革命，不过是欧洲革命，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反抗日本强权的民族革命。

1915 年 5 月 9 日，北洋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中第一至第四号部分要求。孙中山判断袁世凯必将实行帝制，国人必将起而反对，革命党人应乘机而起，发动起义。5 月 10 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等革命党人：“袁氏与某某密相结托，昨日要求条件，悉已通过，袁旦夕称帝，……从此中华民国名义，亦将归消灭。内地不平之声甚烈，即袁部如冯（国璋）、段（祺瑞）辈亦表示反对，此较满清末年铁路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洵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②

然而，倒袁则须“联日”，孙中山确有“联日”以倒袁的思想。③ 但

---

① 《汪兆铭致吴稚晖函》（1915 年 2 月 19 日），吴稚晖档案，稚 09397。

② 《国父年谱》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第 818 页。

③ 孙中山当时有“联日”以“倒袁”的思想。陈英士在 1915 年春写给黄兴的信中，谈到孙中山所定革命计划，第一即为“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睦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1919 年，孙中山写《建国方略》一书，特收陈英士信作为附录，并加按语：“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祸小而为福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得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可见，孙中山素有“联日”思想，但同时亦清楚认识到日本对华政策的横暴与愚昧，认为“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因此孙屡以“联日”为号召，呼吁日本志士明白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国父全集》第 1 册，第 396—400 页）。汪精卫则认为此时日本乃中国最大之敌人，而且此时是日本灭亡中国的最佳时机。

汪精卫不同意“联日”，认为日本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于是匆忙由欧洲回国调停。“驻沪十日，所见所闻，伤心刺骨。”他在1915年5月25日给吴稚晖的信中说：“今中日虽未决裂，而情较决裂为惨，但此时却无从着手。……盖此次条约，实已立亡国之基础，况尚有‘日后协商’之悬案与各国‘利益均沾’之成算随乎其后。自今以往，三五年间，欲中国幸不至于亡，终不免于妄想。”汪认为“二十一条”一旦签订，三五年内，中国或可为日本所亡。于是提出欲中国不亡的十三条构想，最终仍落在教育救国。①

汪之所以反对武力倒袁，主要是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这给日本独霸中国提供了最佳时机。他说：“今日之中国，其形势已大异于前，吾人前此敢于力持‘革命不致外人干涉’之说者，全以均势主义未破，不容一国独逞野心，亦难于各国一致行动。……今则欧战方亟，日本独逞野心，他国莫如之何。且日本今方偿其大欲而去，一朝革命军起，政府力能平之，不必言，苟力不能平，日本必为之代平，此殆必然之势，故起革命军，适以促亡而已。”②

对于汪的判断，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以为“虑日太过”，过高估计了日本的野心和实力。蔡元培说，清政府已经垮台，袁政府不能统一中国，即使日本攻破北京，俘虏袁世凯，而各省必不服从，日本又“岂能倾全国之师，转战于二十余行省之中”。其志向不过占领青岛，蚕食山东，承袭德国过去权利而已。③ 汪精卫却说：“孑民、石曾两先生皆以为虑日太过，铭则以为虑日犹未至也。”日本若真有野心，此时可以联合德国攻打英国，英国全力对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可趁机扫除英国在东亚、南洋的势力。若日德联合，打败英法，则德国统领欧洲，日本统领亚洲，“可以从容肆其虐”。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目睹列强宰割世界，强权战胜公理，对资本主义已毫无幻想。苏联政府率先废

---

① 《汪兆铭致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等函，告本身欲求中国不至于灭亡之构想》（1915年5月21日），吴稚晖档案，稚09395。

② 《汪兆铭致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等函，告本身欲求中国不至于灭亡之构想》（1915年5月21日），吴稚晖档案，稚09395。

③ 《蔡元培致吴稚晖函》（1914年8月28日），吴稚晖档案，稚07876。

④ 《汪精卫致吴稚晖函》（1914年9月17日），吴稚晖档案，稚09562。

除了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不远万里前来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并喊出了“世界革命”的口号，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确乎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从汪精卫在留法勤工俭学时期即反对帝国主义的事实看来，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表现，固然主要出于现实利益需要，但也并非毫无思想渊源。不过，汪精卫所理解的世界革命，其实仍是反帝民族革命，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占主导的还是民族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思想，他缺乏阶级视角。

武汉政府的另一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则表现出更加开阔的政治视野，能够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人民”区分开来，阐发一种“世界革命”思想。邓演达，字择生，1895 年生于广东惠阳县。他和廖仲恺一样，是一位真纯的国民党左派，为革命献出了生命。1924 年黄埔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 1927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在武汉政权中，邓演达是与中国共产党主张最接近的一位国民党左派，他强调工农作为革命基础的重要性，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认为国民党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工农之上，革命的目标应是解放工农，要改变土地制度。

当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进入两湖地区后，他认为“目前革命的进展，除掉了军事名义上扩充了几十军的兵额，政治名义上得了几省的地盘以外，革命并未有什么新的创获……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革命一定要失败的。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不把他〔它〕解决，那么革命简直是没有意义”。[①]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激进的对农民宣言，提出使乡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须有保卫自己利益的武装，农民最后的要求为获得土地。[②] 邓演达是这一宣言的起草人之一。1927 年 5 月，当两湖农民运动已引起国民党极大恐慌，中共准备进一步将民族革命转变为土地

---

①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1927 年 2 月 17 日），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 48—49 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1927 年 3 月 16 日），《邓演达文集新编》，第 88—91 页。

革命时，邓演达支持解决土地问题。他说："农民得不到利益，必不会起来革命，农民不起来，又怎能够打倒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没有农民参加革命，如何去反抗势力雄厚的帝国主义？"① 他认为，保障革命，即在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不只是单纯地减租，必须使没有土地的和土地不足的农民得到土地，然后农民知道革命是为他们自己斗争的。

邓演达的研究者指出，面对激烈爆发的阶级冲突，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部分国民党左派主张国民党发挥"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邓演达则主张国民党应推动群众运动的激进化，支持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目标，一是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的国民革命；一是联合农工群众，反对国内封建势力，形成民主政治的社会革命。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中国很落后，除了农工组织以外，再没有其他种类的社会原动力了。邓演达的立场与汪精卫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汪希望在反帝国民革命中取消社会革命。②

由于这种真正的工农立场，对于世界革命，邓演达也有着更透彻的认识。他不但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它本国的阶级矛盾，所以必须"把东方的殖民地牢牢的握着不放"，还将西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分为"帝国主义"和"革命民众"两方面来看，突破了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1926年元旦他在国民政府欢迎二大代表宴会上报告游欧经过，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一天重于一天，但是"英、法、德三国的民众——尤其是德国的民众，都是赞成我们中国的革命党的"。帝国主义者对本国的革命民众，用了种种威吓煽骗的办法，引起他们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鼓吹民众一致对外，"他们纵然日日造谣，但西方的革命民众，仍然是赞助我们的"。③

邓演达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他认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与欧洲工人阶级反抗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他在

---

① 《土地问题的各方面》（1927年5月），《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39—150页。该文为《中国农民》杂志编者根据邓演达1927年4—5月在土地委员会会议上的几次发言综合整理而成。

② 山田辰雄：《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立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91—94页。

③ 《关于游欧的报告》（1926年1月1日），《邓演达文集新编》，第3—10页。

1926年5月1日纪念劳动节四十周年的文章中说："40年来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者本国的劳资冲突、帝国主义者彼此互相的冲突中，最伟大的——国际的、坚实的、勇敢的世界革命战线才能构成，而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才联合起来。"欧洲工人运动只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倾覆帝国主义。只有如此，"工人阶级才有解放之可能，也只有这样，被压迫民族才有解放之可能"。①

邓演达不仅具有革命思想，还能切实组织起革命武装，布置反蒋军事力量。曾协助邓演达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任中央干部会干事的罗任一回忆说，邓演达运用自己在黄埔时期的威望，组织黄埔出身的军人，拉垮蒋的嫡系部队；又联络陆军小学、中学及保定出身的军人，共同倒蒋。"当时军事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是蒋军第十一师，其中大部分高级军官可能听从邓的领导。……此外地方部队如福建的卢兴邦、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刘湘，与邓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邓演达想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时不能推翻蒋介石，就进行革命的割据，建立廉洁政府，发动群众，与蒋斗争到底。他曾去东北调查东北军反帝反蒋的可能，还希望与红军合作，并打算亲自到江西十八军军中，强制该军起义。②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由于他对黄埔军校的影响力，可能真正动摇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又由于他忠勇奋发、决不妥协的精神，终于使蒋介石于1931年11月29日将他秘密杀害。邓演达时年36岁。

三　在革命大潮中

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代，一些原本在思想上与激进革命相抵触的人，也选择了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并能建立一套与革命相适应的论述。例如武汉政府中活跃的左派徐谦，在1926年12月13日当选武汉中央临时联席会议主席。他是著名基督徒，而武汉政府是反基督教的。他怎样调和基督教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呢？1926年圣诞节，徐谦在汉口举行的反基督教大会上发表演说，宣称："我们反对基督教，而不反对基督徒。因为基

① 《今年"五一"节之意义》（1926年5月1日），《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2—13页。

② 罗任一：《邓演达回国组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邓演达》，第106—119页。

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我们要反对，但基督徒是很热心传教的、富有精神的，我们不反对！"①

徐谦字季龙，教名乔治，是一位兼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的知识分子。他187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习陆王之学，在其母影响下，对佛教亦有所接触。1902年，徐谦考中举人，后来在京师殿试中获得二甲第八名进士，与谭延闿同科，进入翰林院译学馆攻读（后来译学馆并入京师大学堂）。1907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出任法部参事、京师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等职。1910年，徐谦与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许世英赴美出席第八届万国监狱会，在途中考察欧美各国司法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徐谦同情革命，在天津发起"国民共进会"，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主张中国"取联邦之形式，行郡县之精神，而尤以巩固共和国为目的"。他于1916年受洗，曾任北京"信教自由总会"会长，对于在宪法中列入信仰自由一条出力甚多。②

徐谦信奉"基督救国主义"，曾使钮永建及其所部海军陆战队官兵全部领受洗礼。他还积极奔走联络，游说基督将军——直系第三军司令冯玉祥反直倒吴，拥护孙中山，在1924年10月促成了冯玉祥软禁曹锟、驱散国会、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政的"首都革命"，为中国政治开创了新的局面。徐谦从未公开标榜过社会主义，但他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却与社会主义有着自然的亲和力。从1919—1920年徐谦用"佐治"笔名为《益世报》撰写的一系列社论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思潮对徐谦的影响。他承认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指出劳动者要求改善生存条件、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苏俄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并放弃沙俄政府在华不平等权益的宣言深表赞同，主张与苏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③

---

① 吴相湘：《徐谦制造赤色政权》，《民国政治人物》第1册，台北：文星书店，1964，第104—115页。

② 徐谦：《学道自叙》，中华续行委办会编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4期，1917年，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983年重印。

③ 佐治（徐谦）：《劳动问题》，《益世报》1920年5月3日；《晋国对俄之失策》，《益世报》1919年11月22日；《晋国宜早定对俄政策》，《益世报》1920年1月19日；《晋国宜与俄劳农政府通好》，《益世报》1920年4月10日；《国民答复俄案维埃政府之理由》，《益世报》1920年4月16日。

徐谦反对私有制度，认为自私自利是一种罪恶，私有制是人间一切争斗杀伐的根源，而人性中的自私自利与私有制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关系，他提出一种被认为既可以改造人心，又可以改造社会制度的方案——基督新共产制度。有学者指出，这套旨在打破私有制的基督新共产制度，事实上不过是某种主张限制资本、保障劳工利益的制度。徐谦观察到现今的劳动者不再甘心忍受资本家的压迫，因此希望提出一种制度，达到“资本劳动合力主义”，促使“资本家与劳动者有相需而无相杀，式相好而无相仇”。徐谦基督理论的基础是救人、救国、救世，而救国则是他最根本的动机。与其说他的理论是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不如说他是先认定了一套救国方案，然后再将这些方案“基督化”而已。①

或许正因为徐谦思想中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好感、对救国的热忱，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并非共产主义，而是帝国主义。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在意识形态上标举三民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改组后的国民党奉行扶助农工政策，主张限制资本，保护劳工利益，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这些都符合徐谦的主张。

两湖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有“佛化将军”之称。他也试图在佛教与国民革命之间建立关联。他宣称革命不但要打倒“有形的土豪劣绅”，更要拔出“潜伏在许多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和“旧伦理观念”，还要普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思想”。而佛法可以帮助人们确立“平等的观念”。②

在大革命中，唐生智表现出十分左倾的面貌。他对谭延闿说：“就是我们的部下、家里是大土豪劣绅，也是要打倒的啊。”还对手下将领说：“农民运动与我们北伐军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我们要带头稳定下来，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大局。”③ 还说：“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的组织，是丝毫不应怀疑的。”又说：“几千年的历史，农民都伏在统治者之下

---

① 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20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第93、96—97页。

② 1927年2月21日唐生智在湖南省农民协会欢迎顾问大会上的演说，见《省农民协会昨日欢迎顾问纪事》，长沙《大公报》1927年2月22日。

③ 《唐生智回忆第一次大革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第351页。

忍气吞声，现在革命的呼声将他们唤起了……封建遗迹快要消灭了，民主制度的社会必须建立了！"① 唐生智还表现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轻视态度，说"国民党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K. M. T. 没有力量，要找 C. P."。②

在一段时间内，唐生智确曾以军事力量庇护过两湖农工运动和党部工作人员。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26 年 8 月，国民党中央电饬唐生智，要求切实保护农民协会。③ 唐生智电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甘乃光，表示："生智前在衡阳，对于农工运动即极力保护，今岁奉命北伐，虽军书倥午，而推行党务曾不稍懈，所有劣绅土豪包揽之议会、农民协会业已通令取消，其由农民自动组织之农民协会亦经分别通令各县尽力扶助，务期实现总理保障农工、与民合作之至意。"④

唐生智过去并无革命历史，但中共中央认为，也"不能肯定的说他完全投机而毫无希望"。⑤ 况且，"说到投机，又有几个军事领袖不带点投机色彩呢？"至少在唐生智此种态度下，农工运动更容易发展，民众的力量壮大了，更可以促进唐的左倾，而不惧唐的反动。⑥ 因此中共对唐的态度是："用明了的同志和他亲密的接触，改变他的观念；发展民众的势力，影响他的左倾；引导他与苏联接近，使他认识世界革命的援助。"⑦

唐生智也是国民革命最大的获利者之一。加入革命阵营后，唐生智从吴佩孚、赵恒惕麾下的一个师长，一跃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

① 唐生智：《革命任务》（1927 年 2 月 5 日在长沙的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11 日。

② 《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1926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450 页。

③ 《询问粤省所订农会章程是否适用于各省，并饬令唐生智等保护农会，准其农会立案》，"五部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数位档，部 0255.1。

④ 《唐生智致中央农民部（甘部长）函，报告对农工运动极力保护》（1926 年 8 月 4 日），五部档案，部 0253.1。

⑤ 《中央复韶区信——关于湖南军事、政治、民众运动的策略和党的工作》（1926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362 页。

⑥ 《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1926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449 页。

⑦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495—497 页。

北伐前敌总指挥，监理湖南民政。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兵力从1个师扩展到5个军40多个团，成为可以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抗衡的最大军事实力派。作为两湖的实际控制者，唐生智在湖南积聚起可观的财富。他与佛教寺庙共占土地，充任很多厂商的股东，拥有航行于长江的轮船、长沙的房地产。他把没收的“逆产”据为己有，还想用自己的财产作担保，发行三百万元公债，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①] 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下取得的。

据说抗战胜利后，唐生智隐居故里，在湖南省东安县一座山庄辟设佛堂，收了十几个比丘尼，请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宣讲佛学，日日前往礼拜。[②] 还开办一所辉祥中学（今东安二中），将私宅外院划出来做校舍，学生一律免学费，贫苦学生则膳宿费全免。所聘教员多有言社会主义者。一日晚餐后唐生智与教员闲谈，说“我们在座的人，虽然我们不会去吃人，也不怕别人吃，但是要紧的要从吃人的人口里抢救出被吃的人！”唐生智“晚年久置闲散，郁郁林泉，偶闻社会主义理论，不觉憬然向往”。[③]

随着革命浪潮的推进，左倾成了一种时代潮流，扶助工农成了一种流行的“语言”。南洋烟草厂老板简琴石作为商人代表在农民会议上向农民致敬，说“农民是老大哥，工人是老二，商人是老三，对农民征收的赋税不堪忍受，不要相信诺言，要进行斗争”云云。[④] 在这种形势下，左派在国民党中越来越居于主流地位，“左”意味着革命和进步，“右”意味着保守和反动。1925年1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社论说：“不妥协不苟安便是左，不左倾的并不配说是革命党……国民党当此革命时期，只应有左派，不应有右派。因为革命党都是向左的，向右的便不是

---

①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8页。

② 谭崇恩：《“佛教将军”唐生智参加北伐的内幕》，《湖南文史》1997年第5辑，第24—32页。

③ 席宏钧、何伦：《唐生智将军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文史资料》1985年第1期，第37—42页；马玉先生（雷啸岑）：《新世说》，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1965，第149—150页。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8月1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03页。

革命党。”①

蔡和森说：“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中有一种最好的现象就是党员群众之左倾。……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革命潮流愈高，‘不左即右’的真理便愈被证明。中国国民党自去年以来，已从新进入了这个试验时期。”② 唐生智的部下李品仙也在回忆录中说：“在民国十五年北伐前后这段时期，共产党几乎在本党之内造成了一种舆论势力，只有左倾才是革命，共产党是左倾的，也就是革命的，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都是反革命。那时党的政策原是联俄容共，国民革命运动又造成了一时澎湃的风潮，……连本党很多追随国父的老同志都……慑于反革命的帽子而噤若寒蝉，其他无知的青年更是不问可知了。”③

虽然中共的纲领比国民党激进，但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出现了很多更激进的国民党青年。陈公博在讲到宁汉分裂时期两湖地区没收地主土地问题时说：“这个行动的中间自然还夹杂了许多国民党的左派。这班先生自然不是共产党，但以为国民党要胜过共产党，应该更要比共产党来的凶。”④ 1927年5月，在武汉国民党中执委会议上，汪精卫和恽代英也讨论了国民党左派左倾过火的问题。恽代英说：“纯粹国民党的左派太跑上前去了，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这并不是好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很稳固的立脚点，反而把中立的弄得莫明其妙。”汪精卫说：“他们比共产党还要凶。”恽代英接着说：“他们还骂共产党有妥协性。”⑤

这种部分国民党左派更为激进的现象，说明国民革命的形势使国民党整体上激进化了，不但那些左倾的领袖和将军热衷于玩弄左的辞藻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一般基层党员也唯恐自己不左。纷纷左转的潮流中，也夹杂了不少投机分子。共产党人党比较严格，又有相对严格的组织纪律，能对党员形成指导和约束；国民党人党随意，投机分子往往摇身一

---

① 陈孚木：《左倾与右倾》，《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8日。
② 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周报》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③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第85—86页。
④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81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154，1155页。

变而成为“国民党左派”。茅盾的小说《动摇》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凶狠的投机分子——冒充“左派”的胡国光。他原本是个土豪劣绅，混进革命阵营，以极左面目大肆活动，毁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最后原形毕露，血腥镇压革命。

1927 年 4 月国民党“清党”，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几万具青年的尸体。[①] 被杀害的并不仅有共产党，还有许多是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左派”。因为国民党的身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那些反“赤”的人，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左派。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就在回忆录中说：“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左派，不大容易认清，因真的共产党可能不露身份，而非共产党往往学时髦而故弄玄虚。”[②]

黄埔军校的甘竹溪在致汪精卫的信中说，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与共产党极为相近，“最易惹人诬陷为 C. P.”，广州四一五事变，“被捕学生至千余人之多，而遭枪毙者，皆左派同志”。当时左派青年极为狼狈，“欲进而加入 C. P.，又为 C. P. 所忌，谓为投机；欲退而加入右派，于事不可能，且深非所愿。……因此人心动摇，群各鸟散。能归、有家者则归家，不能归、无家者，则落于赣鄂之间，潜匿不敢出”。[③]

中山舰舰长、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也致函汪精卫说，九江警备司令部枪决了 26 人，其中仅有五六人是共产党员，“余皆为本党左派同志及无辜牵涉者”，请求汪精卫迅速颁布命令，今后各地“捕获人犯”，须由人民团体参加会审，以免一再滥杀无辜。[④]

直至 1927 年 7 月武汉“分共”时，国民党左派无论是在国民党高层还是基层党员中，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混乱的、涣散的。国民党左派既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来约束党员，并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左、右派的斗争，激化了

① 在“清党”中到底有多少青年遭到拘捕、杀戮，并无确切统计。中共《布尔塞维克》杂志刊载，仅 1927 年一年，全国被拘捕者就有 22704 人，被杀害者 37706 人，这是各省惩凶总会收到的数字，被秘密处决或逮捕及在各地暴动中被杀的人尚不在其中。见《白色恐怖的统计》，《布尔塞维克》第 1 卷第 26 期，1928 年 8 月 20 日，《红藏·布尔塞维克》（2），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第 436 页。

②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 258 页。

③ 《甘竹溪等函汪兆铭》（1927 年 8 月 29 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04-001。

④ 《李之龙电汪兆铭》（1927 年），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03-009。

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加重了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痼疾。

国共分裂后，南京国民党告别了激进革命路线，并迅速与社会腐朽势力妥协，从一个充满朝气的革命党，退化为一个保守的官僚化政党。但是，经历过国民革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员结构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群众动员和农工运动的思想已深入很多党员内心。有学者指出，“清党”之后的国民党，虽然在组织上割断了和共产党的关联，一些思想和语言却保留下来。一些青年党员仍把“世界革命”“扶助工农”挂在嘴边，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唯有认真执行工农政策，唯有照顾工农利益，才能真正战胜共产党。“清党”把乡村基层政权还给了豪强士绅和旧的统治阶层，但在城市中仍有相当部分的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党员还保持着激进的革命心态和热情，热心于推动工人运动和减租减息。①

许多青年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与社会腐朽势力妥协，仍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诉求。各种迎合青年革命要求的左倾政治团体也应运而生。1928—1931年，以汪精卫为首的政治派系仍以国民党“左派”自居，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一边反对共产党，一边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打造出一套国民党“左派”的意识形态，在以党治军、民众运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主张。其左翼的经济思想和民主话语一直延续到1932年汪蒋再度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后。

① 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第二章　相互借力：国民党左派视角下的国共合作

中国国民党是20世纪中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国民党研究日益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叙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史的独立视角。1990年代以后，大量关于国民党的研究论著问世，一些学术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国民党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视野和方法。[①] 国民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其内部组织和政治特性也得到日益深入的揭示。正如金以林指出："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②] 他用"派系政治"一词来概括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征，意在强调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人事矛盾、利益冲突、思想分歧与路线斗争。如今，对国民党派系政治复杂性的认识已成为学界共识，许多以往被理解为国共斗争的事件，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视角下，得到了新的阐释。

以往有关国民党左派的研究，多强调共产国际和中共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策略，以及国民党左派接受联俄联共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如何香凝、宋庆龄等）或投机革命（如汪精卫等）的一面。国民党右派则认为汪精卫左倾是因其自身能力与权力欲不相称，而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如胡汉民说："本来本党的容共，是总理的主张，不是汪同志的主

---

① 如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张海鹏主编、王奇生著《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等等。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学术论文。对于国民党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除孙中山研究一如既往受到重视外，随着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的公开，蒋介石成为海峡两岸政治人物研究的热点，大量优秀学术成果涌现出来。有关汪精卫的研究情况参见李志毓《在历史光谱下：汪精卫研究若干问题评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②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第2页。

张，……总理虽主张此事，但是同时，总理有总理的魄力，足以容他，控制他，并且能感化他，教他从命。至于除总理而外，大家统统够不上谈此，够不上谈此偏要谈此，终于被人利用，做人家的傀儡。"[①] 一些研究者也沿袭了上述看法，对这些国民党内左倾势力本身的政治诉求和行动策略研究不足。

本章将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或自称左派的政治势力为中心，以一些新披露的史料，揭示他们以往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并分析他们对于自己主张和行动的"叙述"。如果我们同意卡尔·曼海姆在讨论一种"综合性的世界观"如何可能时曾指出的——在历史中，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党派性"的，即片面的、局部的、带有自身立场的，[②] 那么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就必须考察那些相互对立的经验所构成的、整体的历史结构。本章将观察视点落在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将之也视为一个历史行动主体，探讨他们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政治诉求。包括他们在支持联俄联共主张的同时，如何与共产党相互借力，来扩充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考察他们对军队政治工作和农工运动的态度，并分析他们遭遇的政治困境和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　巩固广州的斗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为国民党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志。此时的广东，仍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派系。东江被陈炯明占据，南路被邓本殷占据，广州则是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的势力范围，大本营无法制约。这些军队与国民党分割地盘，包烟包赌，擅征捐税。大本营"危难四面，局促一隅"，政令"不能出府门"。[③]

1925年初，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以援助广州商团为名，自称"援粤军总司令"，意欲进攻广州。大本营以粤、滇、桂军组成联军，以滇军首领

---

① 《三全代会第一日至第四日速记录·第三日第五号》（1929年3月20日），"会议纪录"，会3.1/37.1.1。

②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第301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第11、19页。

杨希闵为总司令，发动第一次东征，历时两月余，沉重打击了陈炯明的势力。而云南军阀唐继尧又欲乘机东进，将两广置于滇系势力范围下。唐继尧的计划得到杨希闵、刘震寰的响应。刘震寰还亲赴云南，“纳款于唐继尧，唆其引兵入桂，以为图粤之张本”。[①] 唐继尧则以副元帅身份，委任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广西省省长。杨希闵还会同刘震寰在香港召开会议，邀请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的代表和陈廉伯参加，密谋推翻广州政府。[②]

1925 年 4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提出的“建立党军案”。13 日，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以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党军。4 月 28 日，蒋介石到汕头粤军总司令行营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及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商议，决定讨伐杨、刘，此役由党军负责。同日，杨希闵调东征部队回师广州，开始布置兵力。刘震寰也将部队从东江撤回广州，与滇军配合，准备发动叛乱。[③] 5 月 13 日，廖仲恺、朱培德、汪精卫等与苏联顾问加仑一起，到汕头会见蒋介石，告知“省局甚危急，宜克日戡定”。次日，送走廖、汪等人后，许崇智来蒋处筹商粤军回师广州计划，蒋表示：“但有八千杆步枪，尽可由余负责前往，歼灭广州反革命各军，其余军队仍留潮、梅无害也。”[④]

5 月下旬，东征军从潮、梅回师广州。驻扎在北江的湘军谭延闿和滇军朱培德部也开进省城策应。6 月 3 日、4 日，杨、刘军攻占广东省省长公署及财政部等政府机关，并擅发伪令，任命广东省省长和广州卫戍司令。5 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下令免去杨希闵建国滇军总司令和刘震寰建国桂军总司令职务，命令各军全力平定杨、刘叛乱。东征军由南向北，谭延闿湘军与朱培德滇军由北向南，对叛军形成包围之势。6 月 10 日发动总攻。蒋介石命令粤军第 1 师、第 3 师及第 6 旅为左翼，由广九铁路推进；警卫军担任正面攻击，由瘦狗岭推进；黄埔军为右翼，由龙眼洞推进；警卫军一部和李福林部为总预备队。经过激战，6 月 11 日拂

---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 324 页。

② 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 206 页。

③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1 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第 345 页。

④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1 册，第 347—348 页。

晓，平定了杨、刘叛乱，歼灭叛军2万余人，收复广州。

扫灭杨、刘之后，国民党政权进行改组。1925年7月1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确立了以党治国体制和“委员制”的权力结构。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军事委员会亦受中国国民党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军事各机关。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5年9月、10月，国民政府又进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南征讨伐邓本殷的战役。至12月，基本肃清南路各地。1925年底，汪精卫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弟四月杪南下，……抵广州后，内容复杂险巇至于此极。加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香港屡欲加兵于广州，更不能舍之他适。国民政府成立，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监督，弟不能自绝于党，即不能自绝于政治，故声明以党之中央执行委员资格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七、八、九、十、十一数月间，日日与反侧之徒及外来之强敌拼命，苦战至十二月而粗定。在此苦战中，如介石、组安、益之暨诸同志皆忠勇最著，弟亦为其中之一人。无论责备者如何，而广东统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弟终觉此心生可以见同志，死可以见总理也。”①

巩固广州大本营的斗争，牵连各方利益。此外，联俄联共政策的实施、农工运动的开展、激进青年党员的兴起，都触动了原有的利益阶层，引发了尖锐的党内斗争。李宗仁对北伐前的国民党有一种观察，他说：“国民党是个很大的政党，党员极众，可说是少长咸集，良莠不齐。其中青年的党员们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坚苦卓绝地为革命而奋斗。其革命热情有时竟发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腐败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因此在国民党内已划分成两个集团，彼此迥然有别，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长此以往，难保没有差池。”②

李宗仁这里只谈到国民党内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事实上，在新、旧势力斗争背后，是复杂的人事纠葛以及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例如，

① 《汪精卫致吴稚晖、李石曾函》（1925年底），吴稚晖档案，稚07607。

②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35页。

国民党右派代表之一邹鲁就讲过他与桂军刘震寰的深厚交谊。他说："桂军是由我为了讨陈而策动他们来粤的，我总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尤其对于桂军刘震寰，因为在秘密时期里就是同事，后来也屡次为党建功，更有意救他。但事与愿违，到了不得不解决滇桂军时，我便前往香港。因为我不愿我见招来讨贼的部队，自越于覆亡的末路。"① 国民党改组后，推行农工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帮助农民实现减租要求。国民党左、右派则分别站在农民协会与民团一边，代表不同的利益。

国民党左派核心廖仲恺，表现出鲜明的扶助农工立场，在广东各地农会与民团的冲突中，全力援助农民。1924 年 11 月广东省广宁县农会因为减租要求与民团发生冲突，民团以武力收租、锁人，并烧杀了两个村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派大本营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历时三个月，攻下民团的炮楼，迫使广宁地主承认农民的减租要求。② 同年 12 月，民团 400 多人武装袭击花县农会驻所，捣毁农会，将农会委员长王福三重伤后割耳断手。廖仲恺亲自接见受害农民代表，并通知兵工厂，按成本价售给农会七九步枪 40 余支，每支配足子弹 200 发，又从省府抽调驳壳枪 7 支赠给花县农会。③

国民党右派则完全站在支持民团的立场上。邹鲁说："广东各地素有民团，实为自卫的团体，平日捕匪，既为匪所疾视，而共产党更不欲地方有自卫的团体，以妨碍农民协会的工作，于是与各地的民团为难。我便秘密协助各地民团，和共产党势力奋斗。但是共产党把持政府，总是帮助农民协会和农团军，来压迫民团。广宁、四会，因农民协会被民团所败，鲍罗廷竟使政府于滇、湘、桂、粤、豫各军中，各抽调一团，加以大元帅府的铁甲车以会剿之。其气焰可知。"④ 邹鲁的叙述，反映出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已经触及阶级矛盾。不过后来真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牺牲了，国共分裂了，所谓的国民党左、右

---

①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 138 页。

② 《关于广宁农民运动为大元帅草拟的命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第 229—230 页。

③ 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第 138—140 页。

④ 邹鲁：《回顾录》，第 139 页。

两派重新合作了，因此在后来国民党的叙述中，一切矛盾的根源都被归咎于共产党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按照后来汪精卫的说法，右派不仅欲杀廖仲恺，也想暗杀蒋、汪。且廖、蒋、汪三人都已知道，右派欲对三人实行暗杀。他说："广州反对政府之空气日益增高，胡毅生所办之《国民新闻》日日著论，攻击汪、廖诸人，……以其为胡汉民之弟所办者，未加裁制。……胡毅生在《国民新闻》外，尚有其他之秘密机关。……表面上挂着文华堂俱乐部之招牌，其所召集为其一般徒党及粤籍之军官。八月中，乃知彼等决计对汪、蒋、廖实行暗杀。本来此三人出门，永不带卫兵，自此时起，始带卫队出去。八月十九日政委开会，廖对汪曰：'我知道有人要用机关枪击我等。'八月廿日上午九时，廖及其夫人何香凝及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至中央党部开会，……已有六七人先伏在党部，廖车到时，此六七人即出来开枪打击，廖中三枪，陈秋霖亦中枪而受伤。"①

这一说法，可与"吴稚晖档案"中的相关书信材料印证。1925年8月16日，陈璧君有一信致吴稚晖，将其子女汪文婴、汪文惺托付给吴稚晖。信中说："璧所以遣两孩从先生者，（一）故为两儿求学；（二）则更有不能言之苦心在。盖精卫苦心孤诣，我为其友，亦为其妻，目睹其憔悴烦忧之形容情绪，复知其以负责而触他人之怒，因救其友而自牺牲其身，且暮可为人所乘。则托孤之责，舍先生其谁。先生固为吾儿师，亦即他日吾儿之父母，故与其他日仓卒负托先生，则不如及其未然，早沐春风时雨也。……此书先生不必烧毁，亦不必示人，他日或需此以示两儿及汪陈亲族也。"②

廖案发生后，陈璧君甚至担心邹鲁等人会因为怨恨汪精卫而迁怒于婴、惺两人，在致吴稚晖函中叮嘱："海滨自刘、杨失败以来，态度殊不明白。廖仲恺被人暗杀，不知何故，彼忽逃匿。近来更发生种种不当之言论，散布种种奇异之谣言，因失意而愤忿，因愤忿而怨恨季兄。璧甚忧彼或将迁怒于婴、惺两人。故请先生留意，若海滨及黎民伟等欲带婴、

① 《汪精卫"自传"草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第57页。
② 《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5年8月16日），吴稚晖档案，稚07645。

惬外出食饭或游戏，切不可任其同往。海滨来校，亦不必使之与两儿接近，以海滨近事及其妻死事观之，不能不预防。"①

廖仲恺牺牲后，汪精卫接替了他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地位，继续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对与廖案有牵连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严厉处置，遭到右派仇视。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说："汪君改组国民政府，自居首长，白面书生脸孔愈弄愈凶。杀廖仲恺者本非胡展堂主谋，乃借故放逐胡氏。林直勉系彭同乡，于其行动知之颇悉，林平日好骂人，是其本性，于廖案无关，汪精卫何尝不知之，乃必羁囚数月未解，果何为者耶？熊锦帆明明冤狱，只凭竟存一方之函证，资为口实，嫁以谋危政府之罪，其后有友由广州来言，汪于此事，后有悔意。既悔之，即当释之，而必左推右挡，今日言付之特别法庭，明日又付之第二次大会，掩饰自文。是果有政治家风度耶？……自其秉政，引用一班急功贪利狂妄少年，用心黠诈，不忍细数之者。洪杨杀戮丑史，一演再演。"②

1925 年 11 月，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国民党右派中委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反共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国民党内部分裂愈演愈烈。吴稚晖试图调和左右矛盾，曾有一封长信致汪精卫，劝其对参加西山会议诸人，勿做"严正之处置"。其原因有二。其一，"法律之生效验，只有实力"，北京为国民党"实力所不及之地"，"开亦开，不开亦开。……开亦可以不承认，不开亦止是不承认，无所影响于权力所及之地"。其二，所谓西山会议派，内部也无统一之政见，"谢、居、茅、覃等一情形也，张、石等又一情形，林、邹等又一情形，沈、戴、叶、邵等又一情形，幕后之孙又一情形。决不能谓非白即黑，除丹即素"。所以，即使会议达成"出格"的决议，也不会产生实际效用。若全力制止，反而可能激起强烈反弹，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吴稚晖还进一步奉劝汪精卫及"所谓左派者"，"嫉恶最忌如驳〔剥〕蕉，始则以去甲，即纯为坚白之心矣，岂知又有乙，去乙又有丙，去丙又有丁。至于最后之结果，始知本无坚白之心，止是尽其全蕉而后已"。吴稚晖的意思是说，除恶不可务尽，因

① 《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5 年 12 月 14 日），吴稚晖档案，稚 07644。
② 《莫纪彭致吴稚晖函》（1926 年 1 月 15 日），吴稚晖档案，稚 11473。

中国之人情，终与他国不同。他还说当张继在会中说“人无情愫，何以为人”时，举座为之动容。因此一会之微，不必究之过严。①

对吴稚晖深通世故的劝告，汪精卫不为所动，而由陈璧君致函吴稚晖，请其勿再与谢持、邹鲁等右派联合发电或开会，并表达了与右派战斗到底的决心。陈璧君说：“我生平未尝誓季，惟此数月，则实心折其人。……以季明知如是辛劳，必促其寿命；亦明知如是努力，必蹈阴谋，以为仲恺之续；如是公正，必生反动；而彼尚且且且如是，明知欲行刺者满前，实不遑顾。”② 1926年2月，国民党二大后，陈璧君又致函吴稚晖，告知右派日夜策划狙击蒋介石、汪精卫，并造谣挑拨汪蒋关系，“幸两人本无自私之心，故未能得手”。③

相较日后长期的斗争，这一时期是蒋汪同心、密切合作的阶段。汪后来叙述说，在这段国民政府与敌人拼生死的时期，敌人之力量大过国民政府十倍，而国民政府终能取得胜利，其最大原因在于，自打败杨、刘之后，广东确有一种新的趋势，即以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谋求统一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形成了国民党的“新起之势力”，此势力“明明有两领导之人，一为汪，一为蒋”。当时汪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都是最高领导人，蒋所统率的军队人数虽少，但经过政治训练，士兵明白“党义”，是真正的党军，故而战斗力最强。“汪无蒋之兵力，无法破此困难。而蒋若无汪在党、政府、军委会定此主张，蒋亦无法进行，因汪蒋当时同心，故能领导此种新势力，达到战胜之地位。”④

汪蒋的裂痕源于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因怀疑中共党员、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龙欲以中山舰押送其至苏联，而下令省城戒严，扣押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宅，同时将他直辖的省城第一军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皆行拘留。

---

① 《吴稚晖至汪精卫函》，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8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568—570页。“谢、居、茅、覃等”应为谢持、居正、茅祖权、覃振等，“张、石等”，应为张继、石青阳、石瑛等，“林、邹等”应为林森、邹鲁等，“沈、戴、叶、邵等”，应为沈定一、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幕后之神”，应为孙科。

② 《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5年12月17日夜），吴稚晖档案，稚07605。

③ 《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6年2月14日），吴稚晖档案，稚07606。

④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63页。

在传统革命史叙述中，中山舰事件多被解释为国共斗争的一个回合，是蒋介石蓄谋已久、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和国民党右派精心策划的一次反苏反共、反对国民党左派的事件。[①] 1980 年代起，已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挑战，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在蒋汪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多疑的心理，散布苏联顾问拟联合汪精卫、利用苏联船强虏蒋去苏联受训的谣言，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又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军舰，以便和谣言相印证；而蒋则相信“摆布”“陷害”他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由此而发生的一起事件。[②]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也称，三二〇事件是国民党右派离间汪蒋、打击左派的一个阴谋。[③] 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国共矛盾，可能对国民党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重视不足。汪、陈等人的叙述表明，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尖锐，并不亚于国共斗争。

共产国际则认为，蒋介石的激烈行为是由苏联顾问和中共工作中的错误引起的——“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快、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度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主要职位”。[④] 这些错误加剧了蒋介石与共产党的矛盾，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1926 年 3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是 1926 年 2 月初到 4 月底苏联派驻中国的政治局检查团团长布勃诺夫，在广州召开的苏联顾问团大会上指出，三二〇事件是蒋介石旨在反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准起义”。鉴于广东政治力量的对比，

---

① 卢冀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的两面派策略》，《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②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中山舰事件三题》，《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另有《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一》《欧阳格的被辅——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二》《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三》等文章，收于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李玉贞编译《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一文（《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印证了杨天石对于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事后汪精卫为何隐匿、出走等问题的看法。

③ 陈公博：《苦笑录》，第 34—58 页。

④ 《维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 年 4 月 24 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211 页。

此时应该对蒋介石做出让步。布勃诺夫在报告中还认为，苏联试图通过“绝不接受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这种做法遇到了严重的困难。①

在这种状况下，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政策，召回了蒋所厌恶的季山嘉，指示中共在组织上对国民党做出让步，限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这一决定，打击了汪精卫的积极性。三二〇事件后，汪就称病不再露面了，两个月后索性去了法国。驻广州的苏联顾问认为，对蒋介石的让步以及召回汪竭力想要保留的季山嘉，使汪感到委屈，感到受了侮辱。据说他曾对宋子文、谭延闿和朱培德等人说，他丢了脸，应该离开工作一段时间。这使苏联人感到，他们的决策出现了失误：“如果我们更加温和的预先让汪精卫对此做好准备，然后再向蒋介石让步，就可能把汪精卫留下来。”②

三二〇事件是国民党右派对左派斗争的一次胜利。它沉重打击了汪精卫的意志，分裂了汪蒋合作。蒋介石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随意动用武力，未经党政最高机关许可即下令戒严，损害了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权威。汪精卫所期待的以党纪约束武力的愿望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使汪感到灰心，于是在1926年4月退出政治，赴法养疴。

二　从巴黎到武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广东政治形势发生明显变化。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北伐成了重中之重。群众运动受到压制，为筹集资金而强行征税，摊派军事债券，此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强了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和旧官吏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决定结合在北伐战争中崛起的反蒋派系，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汪复职”运动，同时支持扣护汪精卫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

---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9—10页。

②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78页。

以抑制蒋介石的势力。1926 年 8 月，在远东局联席会议上，罗秋白说："我们想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他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中央应当由左派来领导。……蒋介石已经名誉扫地，代表大会很容易把他清除。对于全国来说，汪精卫是更有声望的人物，他能够巧妙地应付各派。"①

1926 年 8 月 25 日，《广州民国日报》刊出一封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函，信中要求中央解除他一切职务，同时允许他回来从事党务工作。苏俄顾问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汪精卫"这位公认的左派领袖在被迫离开广州三个月以后提出了回到广州的问题"。②

1926 年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告，指出在北伐开始后，蒋介石"渐渐不能做政治中心"，恢复左派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的指导权"实有历史的必要"。在 10 月 1 日国民党召集中央扩大会议时，应实施下列具体办法：（1）各省市党部务必多派可靠的支持汪精卫的代表去参加，实在不得已，再派中共的同志参加；（2）应向左派宣传，必须汪蒋合作，使汪精卫能主持国民党；（3）迎汪绝不是要倒蒋，现在的内外形势下，倒蒋是很危险的，"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4）"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5）开会时各工农商学团体可做示威请愿运动，亦可发函电对国民党大会表示要求，以群众力量使大会左倾；（6）国民党左派党部在北伐军占领之处，应使人民团体所组成的市民会议、省民会议等参加政治，如此北伐的胜利才是"真正的民权的胜利"。③

这场"迎汪复职"运动，动员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部、各军党员代表大会、各界群众大会和湖北省总工会、武昌学生联合会等各种民众团体。1926 年 10 月 18 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各特别区及海外党部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6 年 8 月 19 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406—407 页。

② 《汪精卫先生复中央党部函》，《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8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 年 9 月 12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474 页。

③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1926 年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311—312 页。

联席会议，致电各级党部，一致决议请汪精卫销假复职，除电达汪精卫之外，并请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等人前往敦促。在《汉口民国日报》等国民党机关报上，“促汪销假”的通电铺天盖地。蒋介石迫于形势，也发出通电，以责任道义为言，恳切陈词，促汪返职，还请张静江、李石曾前往劝驾。

汪精卫留欧期间，也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动向。1926年9月6日，曾醒致电汪精卫，告知“前月九日，子文招我曰，汪君对文甚善，文亦甚爱汪君。此君已知。兹有急事，须告汪君，请以汪君住址匪示。……某军等要拥汪君出，文与蒋为好友，蒋能同意，甚善，否则，只有视大义所在为之”。电文中还说：“孟馀言，现党政务皆独裁，……请汪销假之声日高。蒋电称前敌军队情形复杂，殆将领有意见；又称闻有人反余拥汪，此余早料及，但汪与余不能合作，如汪能应付时局，余可乞休。……张云：如汪归，彼与介石必须隐退，或向赣闽发展。”[①] 汪在欧洲行踪保密，只有最亲信的几个人知道其住址。曾醒是汪在同盟会时期的暗杀小组成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寡嫂，在汪集团中称“三姊”，是汪最亲近的人之一。宋子文以有急事告汪，向曾醒询问汪的住址，但曾醒并未向宋子文透露。“如汪归，彼与介石必须隐退”之“张”，应为张静江。此时蒋致汪电多由张静江转曾醒再转汪，鲍罗廷与汪的联络则多通过宋子文。

1926年9月21日，鲍罗廷致电汪精卫，称现时广东“一切真革命分子”深感汪返粤工作之必要，“时机已到，……大局需要先生返粤，反对先生返的已区区不足道，蒋同志已公认先生返粤为必要”。[②] 1926年10月13日，曾醒又致电陈璧君，告知蒋介石电汪精卫称“得信至歉，党国事乞兄与弟共担负。兄早归。将托静江、石曾二兄迎驾”云云。[③] 10月15日，曾醒又致电汪精卫转呈蒋电，此电言辞“恳切”，蒋称“弟不学无状，致获咎戾，刻接手教抒抑诚挚指示，令人读之益增惶愧。本党使命，非兄与弟共同一胆，始终无间，难望有成。今兄放弃，……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弊〕履辱荣，口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耿耿至今，当

① 《曾醒电汪兆铭》（1926年9月6日），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40-033。
② 《鲍罗廷电汪兆铭》（1926年9月21日），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40-036。
③ 《曾醒电陈璧君》（1926年10月13日），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40-032。

能鉴弟愚忱而谅其无他也。兹转请静江、石曾二兄前来劝驾，代达弟意，并请与之偕来，……使弟有所导循，不致延误党国，是所至祷”云云。①

在各种促汪销假的电报中，有一封比较特别，值得分析。电称：“精卫先生，知近况，甚慰。纯粹左派已有组织与训练，可作基础，前未通候，因避嫌疑。长月苦战，此心可质天地，时机已到，请速回。○○叩。”② 发电人被刻意隐去，显然出于保密需要。电文中提到“纯粹左派已有组织与训练，可作基础”，说明汪精卫在联俄联共的同时，也在发展“纯粹”国民党左派组织，这是一支拥汪的政治势力，在黄埔军校有一定基础。目前尚无法确认发电者身份。

在汪精卫回国之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也曾派出代表与汪精卫进行一些秘密会谈，但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官方资料。可以补充的一点材料，是汪精卫与私人秘书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璧之间的往来书信。汪精卫在一封致曾仲鸣和方君璧的信中说：

> 日来已见东坡否？顷阿妹与兄商，若东坡见弟已满足，最好，盖兄赴巴黎，不便，而东坡来此，亦不便，且兄不愿并此处秘密亦失之也。若东坡必欲见兄，拟在 Evian 相晤。如此，兄往只隔一水。譬如，兄得快信云东坡必欲见兄，则兄回信约往 Evian，兄先往 Evian 贳旅馆，弟以电报示车到时刻，兄往接车，与东坡在旅馆著不期而遇者然，只须择一时间密谈已足，如此最好。但一恐 Evian 此时萧条，易为人注目，二恐东坡不欲长途旅行，此其自身有问题在也。如无此二恐，则在 Evian 最为相宜矣。请弟为我思之。若有此二恐，而弟审度其为重要，不可不令兄一见者，则兄决不惮来巴黎一行。……总之，（一）东坡能不见兄，最好，（甲）恐见彼后，被人注意跟踪，则他日归途不便；（乙）四兄病体实不宜于此时行，如必欲行，则此数月之休息又将收消失效。（二）如必欲见兄，请弟告以兄因病后怕冷，已南行，今当以快信问兄何处相晤为宜，得复始告彼。……

① 《曾醒电白弟》（1926 年 10 月 15 日），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53-039。
② 《某电汪兆铭》（1926 年 12 月 21 日），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40-037。

东坡即苏东坡，信中的“东坡”应指“苏联”。“阿姊”乃陈璧君，“兄”“四兄”均为汪精卫，“弟”为曾仲鸣。落款时间为十四日，应为1927年1月14日。汪精卫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称病辞职，6月中旬抵达法国，在糖尿病、肝病基础上，又患盲肠炎。9月中旬赴德国做盲肠切除手术，术后身体虚弱，在某地海滨疗治月余。原计划11月末返巴黎，后因身体原因，又拟先赴德国医治，同时观察国内政情，考虑回国时机。他在致曾仲鸣信中说：“我思至今朝，决定仍照原议，先赴德国，留二十日，如不必回即不回，如必须回即回。总在二十日后，方决定，不过移留法为留德耳。今朝已与阿姊商定，弟可不必同赴德，如兄不回，则二十日后往赴瑞士，再约期相见。”① 由此可推测，1926年末至1927年2月，汪精卫应在瑞士洛桑疗养。1927年汪写了一首诗《丽蒙湖上观落日》，中有两句“苍然暮色来须臾，洛桑灯火生模糊”。② 此地与法国小镇Evian隔莱芒湖（Lac Léman）相望，故汪信中说“兄往只隔一水”。曾仲鸣则住在法国，替汪精卫接待外间来访人士并传递消息。此时苏联方面派人来与汪精卫接洽，汪不愿亲自出面，也不想暴露行踪，因此派遣曾仲鸣与之接洽。

在1927年1月11日的信中，汪精卫特别叮嘱曾仲鸣，“勿以兄现住址告之。弟认为必要时，可以快信告兄，俾兄决定来巴，或约其来此，最关紧要，幸勿忘记”。又说“如晤彼时，彼之所陈，请弟注意牢记，笔记示我”。并告知曾仲鸣对苏联人的谈话范围，大约两点：一是告知汪自去年三月以来各种病症，称“病体不宜在冷地”，故由柏林折回巴黎后，“更由巴黎迁往南方疗养”；二是如来访者为“确曾在广州共事者”，可告知“离广州时，蒋有亲笔函，明是中了反间之计，今犹未知蒋等已彻底明了否。但此层弟可略说，留兄面详可也”。③ 在次日的信中，汪精卫再次嘱咐曾仲鸣，“见俄友时，请告以兄病后不能在严寒之地，故回巴黎，迁至南方，去访不易，兄来亦不易，如彼必欲见兄，则弟即以快信

---

① 《汪精卫致曾仲鸣函》。落款为“季、七”，无时间。“季”为汪精卫，“七”为陈璧君，她在汪精卫亲友中被称为“七姊”或“七妹”。根据信的内容推测，此信时间应为1926年11月末或1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本书所引汪精卫、曾仲鸣、方君璧来往信函藏所相同。

②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汪主席遗训编纂委员会”刊印，1945，第60—61页。

③ 《汪精卫致曾仲鸣、方君璧函》，落款时间为十一日夜，应为1927年1月11日。

告知”。①

由这一组信件可知，汪精卫取道苏联回国之前，曾通过曾仲鸣与苏联人秘密会谈，并确定了回国行程。但汪精卫对与“俄友”接洽十分谨慎，唯恐暴露自己的地址。彼乃从德国径赴瑞士，却谎称由巴黎迂至法国南方。欲与“东坡”约在 Evian 小镇会晤，扮作在旅馆不期而遇，又恐冬天 Evian 小镇游客稀少，“易为人注目”。在 1927 年 2 月 16 日信中，汪精卫让曾仲鸣告知“东坡”，他拟由德赴俄，因“不欲多至巴黎，虑人多易泄秘密故也”。②

可见，汪精卫虽然想借助苏联的力量重返权力中心，但又不想暴露与苏联的私下联络，给蒋介石或国民党右派留下口实。关于蒋对汪回国的真实态度如何，汪也不甚明了，对于蒋促汪返粤的电文，汪并不相信其诚意。他说“蒋有亲笔函，明是中了反间之计，今犹未知蒋等已彻底明了否”，可见仍担心蒋不愿意他回。“恐见彼后，被人注意跟踪，则他日归途不便”，应是担心他与苏联人的接触被蒋或国民党右派侦知，从而给他的归途造成不便。

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回到上海。4 月 5 日，在上海与陈独秀共同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号召两党同志“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③ 随后，汪精卫启程前往武汉。

在上海期间，汪与反共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怎样的谈话，我们不得而知。在这次国民党的分裂中，与汪曾有深厚交谊的无政府党人——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全都站在蒋介石阵营一边。据汪精卫说，此次与吴、李、蔡等人的会谈及分裂，让他深感痛苦。他在上海至武汉的船上，写信给李石曾说：“五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还说：“平生敬服

---

① 《汪精卫致曾仲鸣、方君璧函》，落款时间为十二日，应为 1927 年 1 月 12 日。

② 《汪精卫致曾仲鸣、方君璧函》（1927 年 2 月 16 日）。

③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1927），第 594 页。

之师友聚于一堂，感情道义，至少有十数年之胶结，其力量之伟大，过于万万机关枪炮；感情之痛苦，过于生命之摧毁。"①

既然如此，汪为何坚持前往武汉呢？据他自己解释：第一，他坚持国民党"改组"的精神和政策决不可牺牲，"联俄"的意义并非普通的国际关系，而在于接受苏联的革命方法；第二，既然有"党"，就必须有"党纪"，改组政策如欲更改，必须经由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不能由中监委和一班军人来操作；第三，汪精卫认为，民生主义是必须坚持的，而反共产的人则将民生主义也一同抛弃了。②

以上三点，都可以看作汪精卫支持联共的理由。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没有提及，这就是在取道苏联回国途中，他与莫斯科之间是否有什么相互的保证或约定？这一点至今没有发现直接的档案。但在1927年6月，武汉政府已陷于严重危机的时候，莫斯科仍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希望他支持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而武汉则对莫斯科提出贷款和物资援助要求，条件是他们将反对蒋介石。斯大林在6月24日致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提到武汉政府向莫斯科提出的贷款要求，并且说："我想现在就可以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万）—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他们）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③

莫斯科还直接电示汪精卫："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您的威望，国民党中央内的动摇是会减少的。"④ 这些材料都显示，汪精卫在回到中国之前，与莫斯科之间是有过

① 《四月六日寄李石曾书》，《汪精卫集》第4卷，光明书局，1930，第5页。

② 《四月六日寄李石曾书》，《汪精卫集》第4卷，第1—6页。

③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352页。

④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346页。

某些相互承诺的。

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曾仲鸣在与夫人方君璧的往来书信中，也未透露莫斯科与汪精卫的谈话内容，但详细记述了汪精卫由欧返国的路线和日程。据曾仲鸣记载，1927 年 3 月，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启程回国，星夜兼程。3 月 3 日夜离开瑞士边境，4 日晨 8 时抵柏林，5 日夜 11 时 52 分抵波兰边境，6 日夜 9 时 50 分抵俄国边境，7 日下午 3 时抵莫斯科，驻留五天。3 月 12 日夜 10 时离开莫斯科，18 日至贝加尔湖；24 日夜 9 时抵海参崴。4 月 1 日抵上海。①

1927 年 3 月 7 日，汪精卫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曾仲鸣写信告知方君璧："今日下午三时抵东坡处，除东坡外，无人知。途中安好。四兄亦不辛苦，殊堪告慰。东坡招待我等住旧时皇宫，甚拘束。……东坡处情形，不便相告。"② 可见汪精卫等人的行踪极为秘密。3 月 12 日，汪一行乘车离开莫斯科，途经西伯利亚雪原。曾仲鸣在给方君璧的信中说："我们日日在雪地飞过，薄暮向西边，望落日，红如火，反映积雪作粉色，徘徊久之。……我除与兄姊谈论国事外，多看红色书，增见识不浅。此行尚有东坡家人几位……"

4 月 1 日，汪等人即将抵达上海时，曾仲鸣又致信方君璧说："闻蒋已筹画党中职务，只管兵事，是否出于诚心，殊不可知。四兄回去，或有种种困难，我等或二三月后再作西行，亦是意中事。关于国事，不能详述，恐为人所拾得你来函，……汉口情形，闻党中左派得胜。此次车行十二日，沿途受东坡家秘密招待，物质上甚安适，故不辛苦。"③ 可见苏联人对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而汪在归国途中已经想到，回去之后要面临一些复杂、艰苦的斗争，并做好了失败后再度远行的准备。

汪精卫到武汉后，对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可能引起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对南京政权封锁造成的武汉经济危机以及军队中的反革命倾向，都深感焦虑。对于共产国际坚决与蒋介石决裂的主张，他也不赞同。汪精卫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表达了他的几点不满：第一，1927 年 1 月 3 日

①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 年 3 月 26 日）。
②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 年 3 月 7 日）。
③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 年 3 月 26 日）。

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结果；第二，“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共产党人在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左派对此一无所知；第三，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第四，苏联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做出残酷的自我牺牲，但他们自己却不积极参与斗争。①

陈独秀后来也说：“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知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馀、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② 在陈独秀和鲍罗廷看来，汪精卫从激进立场的回退，是受了武汉国民党人的影响；国民党右派则认为汪是“为人利用，作人工具”。实则汪是想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实现“纯粹”国民党左派的主张——既要扶助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工农运动“过火”引发阶级冲突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作为汪的信徒，曾仲鸣就对方君璧说：“实则四兄何至为人利用，作人工具。他回后，事事自己作主，从前诸多人所做下幼稚事情及过火举动，均加以裁制纠正。外面故造谣言，借以中伤，然革命党人哪怕许多诽谤……”③

曾仲鸣当时的思想也很左倾。1927年4月他随汪精卫回到上海后，对国民党革命精神的衰退非常忧虑，在致方君璧信中说：“在沪多日，所见所闻，悲怀抑郁。……国事纷乱异常，党中左右派有兵戎相见之势，……一般旧官僚聚集沪滨，……上海外兵遍街，触目伤心，一般人尚想与帝国主义者妥协，其可痛也。”④ 四一二政变后，曾仲鸣又连续致信方君璧，痛斥蒋介石的反动屠杀，说：“（蒋介石）一面购买流氓殴打九江、南昌、重庆的党部，一面唆使部下枪毙从事农工运动的同志。近日越做越凶，竟然派人到四川残杀民众，死者千余。在上海又强行缴收

---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于汉口），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上册，武汉出版社，2005，第292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354页。

③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7月4日）。

④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4月7日）。

工人纠察队之枪械，死伤数百。翌日市民为示威巡行，蒋又令兵开机关枪扫杀千余，真不相信我们革命军的枪炮，竟然用来杀戮为革命努力的民众。"① 又说："我们素所敬仰的吴、李、蔡，早已死了。你若看见他们的态度，或听见他们杀民众的主张，真会气死。"又说武汉的革命民众确实地得到利益，"正为可慰之事"。②

1927 年 5 月，汪精卫将他在武汉的演说词寄给身在巴黎的方君璧，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在致方君璧的信中说："在洛桑动身时，亦曾想及回国后将如何困难，将如何痛苦。及回国后，始知所遇之困难，非动身时所能措想万分之一，真令人痛心至于极也。……兄决不能徇故旧之意，而置主义于不顾，决心与反革命者决一死战。此后不能时时得晤与妹通信。望妹常阅《人道报》，当得较确之消息。三数月后，胜负已决，届时当再图相见也。"③《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特别关注中国的反帝运动，对蒋介石的"清党"屠杀、国共合作下的武汉政府和农工运动有大量报道，是方君璧了解中国时局的主要渠道。方君璧此时思想也很左倾，一天她请一个油漆工粉刷厨房，结果两人大谈革命，她在当天日记中说："今天油匠来油我的厨房，我们大谈革命，彼乃是个共产党，思想甚新，小小一个工人，其言论及精神尚高于我等，所谓为革命伟人者，诚可为我国叹也。"④

国民党左派既要发动工农运动，又要约束工农的"过火"行为，将运动控制在不偏不倚的轨道上，实难以实现。大规模政治运动一旦被动员起来，就有各种不可控因素。尤其在阶级矛盾长期积累、以往民众受压迫的地方，反抗怒火必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就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一切行为，都是"非常之需要的"，如此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力量"。"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国民党左派的观点，表面上和右派不同，实质则和右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

---

①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 年 4 月 17 日）。
②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 年 5 月 6 日）。
③ 《汪精卫致方君璧函》（1927 年 5 月 5 日）。
④ 《方君璧日记》手稿，1927 年 6 月 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

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①

1927年7月7日，武汉"分共"之际，曾仲鸣在给方君璧的信中，概述国共分裂后汪精卫集团的政治主张为以下三条："（1）分共，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2）联俄，仍与俄国联合，从事'反帝'及'反资'运动；（3）农工运动由国民党自行办理。"并分别解释："至于联俄，则在革命战线上，同为反帝国主义及反资本主义努力，故中央政治委员会将派人赴俄，商量联合办法。至于农工运动，则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不过须遵守国民党政策及主张而进行。至于对蒋，仍主讨伐。蒋存则党亡，故其恶势力不能不去。蒋之部下已有接洽，将来局势大概如下：（1）蒋之部下自动倒蒋；（2）蒋倒，南京党人仍加入此政府工作；（3）党国大事，由国民会议解决。"②

可见，武汉左派并非毫无政治主张，但他们不能真正站在工农立场上，为工农利益奋斗，恐惧剧烈的社会斗争，不敢触动原有阶级结构和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其激进革命口号只能流于宣传，不能落到实处。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党内民主"问题，也就是各派反蒋势力结合起来与蒋争权的问题。但左派缺乏坚决斗争的意志，不去扎实培养自己的军事实力，只用官僚政客拉拢分化的手段，就想瓦解蒋的武装，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投机侥幸心理。

三　军队政治工作

（一）党代表和政治部

有学者指出，汪精卫"在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政治原则和节操可言。其实他也有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那就是在他做出政治抉择时，一切视如何有利于夺取党权为转移"。③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汪精卫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汪受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出版社，1991，第17页。
②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7月7日）。
③ 金以林：《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75页。

孙中山之命，赴上海组织长江一带国民党党部，继而赴北京，组织北方党部。同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任黄埔军校教授，主讲三民主义、国民党政纲、国民党党史等课程。关于国民党改组，有两点是汪精卫认同的：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二是以党治军的原则。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国民革命军开始大力推行军事委员会、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展现出一种务使散漫于中国的武力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党治军的决心。军事委员会制度和党代表制度，非常符合汪精卫以党纪约束军队、以文人约束武人的理想。在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试图借助苏联顾问的力量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国民党中形成集体领导和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一举解决中国的军阀问题。因此汪精卫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25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统一改编国民革命军，设立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党代表和政治训练部，并将其作为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机关。国民革命军建立后，黄埔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制度，逐渐在军队中得到推广，各军先后建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度，军、师、团、营、连各级均有党部和党代表，军、师、旅设有政治部，团、营、连有政治工作人员。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党代表，政治部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工作。

1926 年 3 月 2 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同年 10 月颁布该条例修正案，指出："为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起三民主义教育，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和指挥官一样是所属军队的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的权力，当党代表认为指挥官的命令危害国民革命时，应报告上级党代表。但若发现指挥官有明显的变乱或叛党行为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①] 这些规定，几乎赋予了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

---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 291—293 页。

黄埔军校创建之初，孙中山曾委任廖仲恺担任军校党代表。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接替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4次会议上，被推荐为各军及各党立军校的党代表。[①] 1926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又通过陈公博的提案，改任汪精卫为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1926年4月，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称病离职，总党代表一职由汪的亲信陈公博代理。

党代表之外，另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机关是政治训练部。它上承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指导，下辖各军、独立师、海军局、航空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参谋团、军需局党代表。第一任政治训练部主任是陈公博。1926年6月筹备北伐时，政治训练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大量吸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总政治部下辖的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总务科中，担任领导工作的主要是共产党人，例如秘书长恽代英，秘书处长孙文炳，宣传科长朱代杰，曾任秘书处长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总务科长江董琴，先后任宣传科长、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革命军日报》总编、社长潘汉年、杨贤江等。1927年4月9日，蒋介石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为由，解散总政治部，布告中说“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份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②]

国民革命军的各军、师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也多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如第1军第1师党代表周恩来，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该军第4师党代表李六如、第5师党代表方维夏、第6师党代表萧劲光，第3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汉、张善铭、廖乾伍，第6军政治部主任兼副党代表林伯渠，第7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第8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彭泽湘，等等，师里的政治部下设的宣传科、党务科和团、营、连各级党代表，也多由中共党员担任。

---

① 1925年9月17日、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致函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军长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汪精卫为各军及党立军校的党代表。“汉口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数位档，汉2818.1、汉2818.3、汉2818.4、汉2818.5。

② 《蒋介石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124页。

当时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共党员，不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里不设支部，不发展党员，主要任务是做政治工作，改革部队的军阀制度。[①] 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争取做到，使共产党（中央、地区、省和地方）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命令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人员，在形式上按照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但是在事实上，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像苏联共产党在红军中所做的那样，在中国的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要小心谨慎而又坚定不移地使军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②]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这一制度对改造国民党旧式军队、革除军队中的恶习、统一军政军令、提高军队战斗力有很大作用。有学者指出，这一制度推行之初，党代表和军事指挥官之间有很多摩擦，部分原因是党代表多为年轻军官，“刚出校门，就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这使军事指挥官在感情上是一时难以接受的。不过，到了战时，军队党代表的威望大增，就连曾经反对实施党代表制的人也认为党代表制是大有益处的”。[③]

（二）北伐时期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北伐之前，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培训政治工作人员和对基层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5 年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设“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由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等七人组织理事会。学员有来自国民革命军第 2 军的 50 人、湖南省党部选送的 100 人，还有全国各地投奔广东政权的知识青年，共 382 人。1926 年春正式开学。主要课程有张太雷讲授的“世界经济状况”、邓中夏讲授的“职工运动”、郭沫若讲授的“革命文学”、蒋先云讲授的“军事运动”、萧楚女讲授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讲授的“农民运动”等。

---

① 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 79 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1925 年 8 月 2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658 页。

③ 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 73—74 页。

北伐出师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又将政治讲习班的一些骨干学员和广东大学部分学生集中起来，开办“特别训练班”。开设了“反吴之意义与政策”“党务”“政治工作方法”“各省军事政治报告”四个专题讲座。这个训练班，培养了北伐初期部分政工人员。训练结束后，一些学员被分派到各军中工作，一些学员回到湖南做地方政治工作。①

在对政工人员的培训中，演讲是一个重要科目。在各种军队政治训练大纲和教材中，对于如何演讲都有详尽的说明。例如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印行的《政治训练大纲》规定：政治演讲，每星期要举行三次，每次一小时；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按时到场演讲；各连军官在演讲时必须按时到场，无论何人，均不许缺席；团政治指导员每星期召集团内所有政工人员开会时，大家要讨论商定演讲的纲要。《政治训练大纲》还讲解了演讲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包括演讲要选择适合的地点，远离嘈杂喧嚣，空气光线适合，这样才能使士兵耐心听讲；要“透想与搜集兵士日常生活材料”；“讲话时不要太深奥，要时时参加笑话，亦不要太严肃，或太儿戏”；最好是和士兵之间有问答，“不要只让那聪明敏捷的人来答话”；如果士兵听不懂你的讲话，不要发怒，“应沉毅坚忍诚恳和平来解释”；那些士兵不喜欢听的话，如关于文学政治的深奥名词，“切不可用，要特别留意”；还要特别注意演讲的声调；等等。②

这些演讲技巧，在北伐开始后对民众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一定效用。虽然对新兵和俘虏的教育仍是重要工作，但作战演讲、喊口号和唱歌曲、贴传单、与民众召开茶话会游艺会等宣传工作，被赋予了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总政治部印行的《战时政治工作人员特别惩戒条例》中规定，凡是不向民间宣传本党主义、不遵守宣传大纲、每到一地停留一日以上而不开联欢会或其他游艺会宣传会、不及时向士兵夫役及俘虏做宣传、军队所过之处不贴标语的，都要处以撤差、降级、罚薪、记过等处分，甚至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③

---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118—120页。

② 《政治训练大纲》（第一号），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印行，1926，第19—21页。

③ 《战时政治工作须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行，1926，第52—53页。

漫画在当时也被当成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有学者指出，北伐时期，漫画相当流行，不仅国共两党及国民革命军广泛运用漫画进行民众宣传和动员，北洋军阀亦利用漫画进行反宣传。[①] 画家叶浅予也说："漫画这艺术，……不知怎么一下子被大人们看中啦！居然也配上了武装，替大人们冲锋杀敌，从南方出发，散布到全国，大大地出起风头来！"[②]

北伐时期的各军政治部，招收了大批文学青年和年轻画家、音乐家、摄影家。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很多优秀的画家曾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如黄文农、许幸之、叶浅予、关良、司徒乔、鲁少飞等。鲁少飞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他的《北游漫画》搜集了北伐途中所作的 39 幅速写，附有画家的戎装照片，题为《二十五岁的我》。[③]

漫画家黄文农在 1927 年北伐军进驻上海后，担任过淞沪警察厅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文农讽刺画集》是他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创作的漫画结集。书的序言中说："他用了讽刺画的艺术，如持着一种武器，在人生的战争中，纵横奋斗；他又用了讽刺画的艺术，任他自己以为可以改造国家的宣传品。数年来如此的作战和宣传的纪录，都结晶于这本画集内。从其中可以发现他对于人生社会的和国家存在的改造工作是何等的努力！对于任何只以武力高压而不讲公理的新旧帝国主义者，他反抗又是何等的坚决！"[④]

画家关良也受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请，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参加了北伐军。他在回忆录中说，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共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些是留学过的大学生，而且大都是些学有专长的人。此中有专搞绘画、电影摄影的，也有搞新闻照相的，有的能歌善舞，有的能编会导，加上我和几位擅于画画的，又喜欢操琴弄弦，真是巧合天成，充分显示出青年人的聪明才智和勇往直前的革命朝气"。[⑤]

---

① 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② 西丁主编《美术辞林·漫画艺术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第 654—655 页。

③ 鲁少飞：《北游漫画》（光华书局，1928），西丁主编《美术辞林·漫画艺术卷》，第 652—653 页。

④ 王敦庆：《文农讽刺画集·王序》，光华书局，1927，第 9—10 页。

⑤ 《关良回忆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第 49 页。

画家司徒乔是1927年2月经人介绍到武汉鲍罗廷办公室做美术宣传的。这些画家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政治宣传工作，投笔从戎的生涯转瞬即逝。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总政治部解散，青年画家各奔东西，有人甚至身陷囹圄。但是，这吉光片羽，却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涂上了一抹光彩，也成为这些画家生命中难忘的一页。司徒乔离开武汉之后说："好一场大江上的革命之梦！那梦里的死、伤、凶、肉，和伪善的憧憬，和那犹羊无牧、所谓革命的群众，我是永远不会在我的色板上忘遗的啊。"①

尽管北伐中的政治宣传工作被赋予重要地位，其成效却不能一概而论。关良在回忆录中说，艺术股的同志们不顾长途行军疲劳，每到一地，就忙于四处刷标语、画漫画、搭戏台。"讲演、相声、快板、花鼓等短小节目，把各个宣传阵地搞得热气沸腾。战士们得以在战斗的间隙中休整、调剂，振奋精神，提高士气，老百姓们也得以了解到战况，形势很好。"②

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工作人员朱其华却讲了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很多弊病。他说："在广州出发时，我们本来领到了几千元的临时宣传费，所以也印了不少的书报、画片、小册子、传单、宣传大纲，而且准备了许多宣传计划。可是实际上，自从出发以来，除了每到一个地方分送些宣传品，留声机般的作些讲演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而我们那种讲演，听的人未必就能懂。"自南安出发以后，对于宣传工作更是随随便便，很多人倒是在船上赌博起来。③ 朱其华还说，在国民党的军政部门中，"没有一个机关比总政治部更腐败、更堕落的"，"他们个个都打着雪亮的皮绑腿，……他们把整篓整包的宣传品，在田野间乱丢，这样，他们的工作报告上可以写'散传单几十万，散画报几十万，贴标语几十万'，……当我们在前方作战的时候，总政治部的同志躲在后方，在后方的民众面前做他的老爷。但是，当我们把敌人打退以后，总政治部的同志就来前方照相、演说、向我们训词了"。④

---

① 司徒乔：《司徒乔去国画展·自序》，上海艺术社，1928，第5—6页。
② 《关良回忆录》，第49页。
③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第48—49页。
④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11—212页

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之后，军队急速扩充，党的机关也从一省扩展到六七个省，政治工作愈加重要，而政治工作人员远远不够。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认为，目前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不仅要充分训练军事同志，使军队接受党的指挥，使军队能“与人民结合”，还要使人民能与军队接近，使落后的民众能了解“党军的意义”。他说：“革命的成功，不在于军事的胜利，而在于党的势力扩展，使人民了解党纲。”政治工作人员要负起责任，使民众了解党，使党的组织严密，使党受到民众的拥护和民众团体的帮助，巩固党的基础，“除了党的胜利之外，什么胜利都是空的。所以我们要加紧工作，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到农村里去打定农民运动的基础，使民众能以实力参加革命”。①

然而实际上，大量的政治工作并没有达到邓演达所要求的效果。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多是些热心政治而未经军事训练的青年学生，任用过程既随意又匆忙，又缺乏必要的训练和考验。原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陈公博说，政训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最初训练了120名政工人员，开学不到两个星期，就全数调赴东征前线。后来党内鉴于政工人员不足，将黄埔军校改为政治军事学校，特设政治班。可是不到毕业，又调赴北伐前线。自北伐开始后，政训工作范围愈广，经过训练的人员不够，就调拨军校未毕业的学生，军校未毕业的学生不够，就征召普通学校的学生。到了长江流域之后，甚至变成似乎是谁穿上军服，谁就可以做军队政治工作。②

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到了军队当中，与出身破产农民家庭的普通士兵之间，常常产生隔阂。他们刚走出校门，没有多少军事知识和社会阅历，突然被委以重任，又常引起军事长官的不满。某些政工人员的品行和作风，与军队的风气也格格不入。冯玉祥曾教育自己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当深入兵众中，与士卒共甘苦，切勿效法武汉之政治工作人员坐花车，吃大餐，身备五皮三金，男女拥抱跳舞，致令士卒生忌，宣传失效也。”③

---

① 邓演达：《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上之演说词》（1926年11月24日），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第27—28页。

② 《国民革命的危机与我们的错误》（1928年），《陈公博先生文集》，第339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413页。

到武汉政府解体的时候，军队政治工作状况进一步恶化，几乎变成了军事的附属品，有人说军队政工人员“不是各军装饰门面的机关，便是军事长官的留声机”，大多数军事长官对待政治工作人员“不是客客气气的虚与委蛇，便是表示鄙视的心理”。[①] 更流行的说法是，政治工作变成军事的“姨太太”。这种情形，让政工人员深感痛苦。朱其华说：“减少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牌与喝酒。”他把武昌所有的菜馆都吃遍了，“政治部拿来的饷，几乎全都化〔花〕在打牌与菜馆里了”。还说：“所有的朋友几乎全和我一样，……我们不约而同的渐渐堕落下去，……武汉政府也就是这样的一天天走向坟墓里去！”[②]

（三）政治工作的困境

政治工作承担着教育官兵、灌输意识形态和塑造忠诚的功能。要将全国武力统一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下，建立国民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国共分裂后，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防共、反共都成了国民党政治工作的首要目标。稍激进一点的青年，就被疑心是共产党。因为过去政治工作主要掌握在左派和共产党手中，“清党”屠杀了大批从事政治工作的青年，造成军队政治工作、党务和行政系统中的人才缺乏，以党治国的设想难以落实。这使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步履维艰。

武汉“分共”后，国民党左派反省北伐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指出：过去政工人员，多半是书生，缺乏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对于革命理论和政治知识又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造成许多“浪漫”和“幼稚”的弊端。以后的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严格的军队化和科学化，要做到行动劳动化、生活规律化，绝对依照军队的礼节和纪律行动，切实执行总政治部规定的惩戒和考勤条例，接受军事训练。对于总理的主义和本党的宣言、决议、训令等，要有切实的认识，对于工作对象、工作方法、社会情况等，要有真确的考察。除此之外，还要切实深入群众，深入士兵当中，“不应离开了群众，只和机关办事人员作无谓的周旋”。[③]

---

① 李碧梧：《政治工作的新纲领》，《中央副刊》第148号，1927年8月21日。
②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40—242页。
③ 李碧梧：《政治工作的新纲领》，《中央副刊》第148号，1927年8月21日。

1927年9月，拥护汪精卫的国民党军人张发奎、黄琪翔，借“清剿”南昌起义贺、叶余部之机，率军自江西南下，驱逐桂系军人黄绍竑，控制了广东。然后喊出“拥护汪主席”“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改善广东的政治”“扶助农工”等口号，电邀汪精卫回粤。

10月29日，汪精卫到达广州，约同何香凝、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在粤中央执监委员，召开联席会议，主张在广州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解决党务、政治、军事各项问题，恢复中央党部。又提出保护农工、惩治贪污和整理各级党部计划，开始推动新的军队政治工作。

1927年11月8日，在于广东省政府洋花厅举行的各级政治部联席会议上，陈公博以主席身份，回顾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和当时面临的困境。他说：

> 军队中之政治工作，自成立迄今，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开始在黄埔，彼时由总理派廖仲恺同志为党代表，惟当时只黄埔军官学校一所实施政治训练。前年五月中央党部通过一严重议决案，内容有四个要点：一、统一军政；二、统一民政；三、统一财政，四、各军队一律接受政治训练。自扑灭杨、刘，组织军事委员会，始设政治训练部，此为军队实施政治工作之第一期。当时的工作，训练军队约占十分之八，民众宣传约占十分之二。
>
> 前年第二次东征及收回南路后，中央始将战事区域内之党务、民政，委托政治部暂行权宜处理。故当时工作目标，十分之八贯注在民政及民众方面，十分之二在训练军队，此为政治部工作之第二期。
>
> 迄北伐期间第一、二、三、四、五、六各军，向长江流域发展，连断续的军队，扩充到八十军，彼时政治工作人员对于军事工作人员，多所迁就。及南京自立政府，陈群、杨虎等变本加厉，将政治部变成一侦探机关，汉宁合作以后，南京之政治部之范围愈行缩小，全军政治工作经费减至三千余元，唯一的任务只是贴标语，此为政治工作的第三时期。现政治工作弄至不能运用，无人接受。想设法

把军队变成革命化，吾人究当采用何种方式？[①]

陈公博认为，政治工作至今仍不能在军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才缺乏。但从会议记录来看，人才缺乏的问题并未被充分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统一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宣传案”“各级政治部应统一编制名称及确定经费案”“提高政治工作人员地位案”等一系列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停留在具体工作方法层面上，对于最根本的“人才缺乏”问题，并没有提出相应对策。

因为国民党内派系纠纷，党不能统一，政治工作也难免各自为政。陈公博在1926年已指出：“军事训练不一致，不过危害军队的基础；若政治训练不一致，便足以危害党的生存，不一致的宣传尤危险于无宣传。”[②] 政治部本来是要唤醒民众，发展党的势力，除去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隔膜。但1928年以后的军队政治部，变成了派别门户的工具，标语、口号、宣言、传单全不能统一，尤其在派系关系复杂的地区，党事纠纷，宣传冲突，政治工作人员系统不明，往往由上级机关的军事长官委派或推荐下来，差不多就是对各机关的军事长官负责，而不是对上级政治部负责，则政治部成为军阀的工具。稍聪明一点的士兵和民众，看了各种矛盾和相反的宣传，就无所适从。[③]

1928年以后，国民党依靠与各个地方实力派的妥协，形式上统一了全国。这些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借助各地政治分会，掌握着地方政权，相互疑忌，相互猜嫌，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势力。北伐出师时，国民革命军共有陆军8个军28个师9个旅111个团4个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少量海军、空军，共约15万人。至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收复北平、北伐结束时，全国已有90个军282个师202万人。[④] 这些迅速扩张的军队，未经政治训练，组织模式与习气仍是旧式的军阀部队。

---

① 《各级政治部联席会议第一日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编《政治训练周刊》（第1—3期合订），1927年11月。

② 陈公博：《党代表条例和政治训练部组织的解释》，《军事政治月刊》1926年第2期，转引自石源华《乱世能臣：陈公博》，团结出版社，2008，第74页。

③ 《本刊和统一政治训练的宣传》，《政治训练周刊》（第1—3期合订），1927年11月。

④ 刘凤翰：《北伐时期的军政建制与活动》，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1988，第106、112页。

1928—1929年，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汪精卫潜居法国，思考怎样使国民党从军人控制中解脱出来，反过来以党的力量控制军队。1929年元旦，他在给王懋功的信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要认识真切，便是以民众为基础。同时，还要注意于武力的养成。所和军阀不同的地方，便是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中国还少不了一次革命，这是无可疑的。如今的问题，便是以后革命，怎样的使用武力。如果利用各个军阀的利害关系冲突，拉拢挑拨、离间撮弄，使各个军阀的冲突，加倍速度而发作，并非不可能，但这个有什么用处？但和主张'相安一时'的有何分别？相安一时，无非酿成以后更大的冲突。而利用军阀间的冲突，无非使各军阀之新陈代谢频数些罢了。如果说从中下级军官着手，或从兵士着手，使社会影响到军队里去，使社会心理能从军队里表映出来，这是根本工作，但一则太慢，二则如今的军阀们已经比北洋军阀乖觉多些，一暴十寒，未免于事无济。"①

可见，汪精卫在以党治军、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上，高度认同孙中山、廖仲恺的主张，他认为军队应受党的控制，士兵应来自明了"主义"的民众，从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人手改造军队，才是革命的根本途径。但是，汪精卫没有决心、意志和能力从下层改造军队。他对王懋功说，这是根本工作，但是"太慢"。

同年6月，汪又在给王懋功的信中说："若要打倒军阀，先要以党治军。所谓党者，舍总理外，决无可以个人之意思，为党之意思，故至少限度，须用合议制，在此合议制中，武人、文人皆不当有所分别。……在合议制中，武人不能有丝毫挟持武力之行动，如其有之，即为叛逆，立当锄而去之。"② 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而言。

汪精卫试图诉诸民主集中制，依靠军事委员会制度，以"党纪"约

① 马长林选编《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第59—60页。"相安一时"是吴稚晖提出的主张。面对1928年后中国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局面，南京方面李石曾等人先提出"分治合作"主张。1928年，吴稚晖又在《中央半月刊》发表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谭延闿、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公开信，奉劝大家"相安一时"，俾使国民党中央能整理党务，巩固党权，筹划建设暨明政治。"一面增进无产阶级之生计，一面以暨明政治化导劣绅土豪于善良，更一面改良教育与实业，使青年有社会进步之希望"。吴稚晖：《劝大家相安一时》，《中央半月刊》1928年第15期，第1—2页。

② 马长林选编《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第62页。

束军人，达到“以党治军”的目的，而不再提出国民革命时期那种利用党代表和政治部约束军人、教育士兵的军队政治工作模式。这说明国共分裂后的汪精卫，虽然以回到1924年改组精神相号召，又以国民党左派自居，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从下层人手改造国民党及其军队——放弃了孙中山的改组精神。

第三章　唤起民众：国民政府的群众政治

1925—1926年，广东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几个领袖人物的密谋和一些军事派系的争斗，而是走向大街小巷，群众运动进入了政治过程。苏联顾问达林在回忆录中说，1925—1926年的广州，处在一个群众革命的时代，那里的政治生活朝气蓬勃，“街道上的行人总是比肩接踵：时而是罢工工人的示威；时而是庆祝国民革命军胜利的游行；时而是商人的游行；时而是街头集会。国民党的蓝旗、中华民国的红旗和白色的标语口号汇在一起，这一切，象〔像〕排山倒海的洪流，滚滚向前。当时，广州政权就是处于街头巷尾这种革命气氛的影响之下。某些问题有时不是用法令，而是通过斗争的各方在街头的争论来解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变成了某种仲裁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门口总是聚集着工人、商人，当然，常常是工人居多”。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国民党提供了一种打击帝国主义的方法，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为国民党宣传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树立国民党的权威创造了条件。国民政府还利用沙基惨案激起的愤怒情绪为广东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服务，动员香港罢工工人回来为政府服务。但是，群众运动并不能始终沿着国民革命的轨道开展。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群众很快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大革命进入两湖后，迅速演化为暴风骤雨的阶级革命。国民党左派在急剧爆发的革命面前束手无策，最终逃离了群众。

一　情感动员

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工

① 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俄均初等译，李玉贞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81页。

人学生和农民运动以动摇旧社会统治基础的国民革命思想。主导广东政权的国民党左派扶持群众运动。从全国各地涌向广东各级党部的革命青年，也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不过，将群众动员的“潜能”转化为真正的集体行动，还需要一些更直接的动力。

引发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焦点，往往是“造成满腹怒火和坚定意志的义愤”。[①] 广东群众运动，也是被怒火和义愤点燃的。1925年6月23日上午，广州、香港工人，四郊农民，黄埔军校师生及军警，商界、学界和其他各界团体约10万人，在广州市东校场召开市民大会，宣传五卅惨案。会后，数万民众开始在广州市区有秩序地游行。当走到与沙面租界尚有一水之隔的沙基地方时，突然有英国士兵用机关枪向人群扫射，停泊在白鹅潭和沙基口的英法兵舰也纷纷开炮助击，沙基路面上顿时血流成河，死伤在百人以上。[②]

沙基惨案激起广东人民的强烈义愤。广州市民纷纷自发组织演讲团，分赴各处演说英国人的罪恶。广东大学宣传队每晚七点到九点都选派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东边的大榕树下对民众演讲。据《广州民国日报》载，某日，一市民演讲团在一家凉品店旁演讲，起初听者仅数百人。后有香港罢工失业回粤工人，登台宣讲华人受英人虐待惨状，听众复聚至上千人。又有路过的盲人学校教授及盲人学生加入演讲，神色激昂，痛快淋漓。又有市民带病登台演讲，“声嘶力竭，病体渐觉不支，几至晕倒”。[③] 甚至有女中学生“以国弱遭人蹂躏，而人心又复麻醉如死，知非一死以励国人，实无从以挽救中国”而纵身投入白鹅潭中。[④]

但这种民间自发的愤怒，还不是国民革命所要唤起的民族国家意

---

①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149页。

② 钱叔璋编《沙基痛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第9页。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④ 据说该生系坤维女子中学高二学生，热心社会事业，“自闻英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同胞之消息后，愤激异常，连日在校鼓励各同学作救国运动，极之辛劳，各同学皆大为感动。惟该校之办事人，素深资本色彩，对于该生之爱国行为颇为不悦。及至廿三日沙基惨案发生，该校亦有学生数人受伤，故各办事人遂归咎于区某（该生）之号召，同时又受家人谴责”，她遂乘艇往白鹅潭投潭，后被救起。其绝命书中有“痛论国家之危，及社会、学校、家庭之黑暗，谓愿以一死为国民之刺激剂，并祝同学努力”等语。见《爱国女志士愤激投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日。

识。《广州民国日报》曾发表社论说，沙基惨案暴露了广东的“民智”之“浅薄”：“同五百年前一样”，仍然称外国人为“夷”，有些人叫嚷着“宁为玉碎”，人民只知有“帝国”，不知有“主义”。[①] 这种自发的愤怒，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激起反抗情绪，却不足以维持大规模的持久斗争。要将愤怒转化为发动和维持群众运动的持续力量，必须对愤怒进行引导和“再创造”。革命政党的作用就在于“将存在于群众中无形的、零散的、彼此缺少联系的和地方化的愤怒变成有目的、有方向和有组织的力量”。[②]

沙基惨案的发生，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进行情感动员的契机。1925年7月9日、10日，国民政府为沙基死难烈士举行了连续两天的公祭仪式。7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发出国民政府《公祭沙基死难烈士之通告》。《通告》中写道：“在沙基被帝国主义者惨杀的诸烈士，已经为争我们中华民族之生存自由独立而牺牲了，我们在这帝国主义者毒弹横飞里逃走出来的后死者，和我们正在被帝国主义者无形中宰制着、压迫着的后死者，不胜其悲愤，不胜其哀痛。我们为要继续死难诸烈士未竟的壮志，我们为要贯彻死难诸烈士革命的精神，所以要举行这个公祭大会。”公祭大会的标语口号，除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外，更多的是“精神不死”“虽死犹生”“以牺牲博自由”“不流血必不能生存”“以赤血洗国耻”“自由之花是以鲜血洒出来的”“以鲜血实现国民革命”等口号。[③]

革命者的葬礼，既是对死者价值的肯定，又是对革命理想的歌颂，也是对生命意义的重塑。以沙基惨案悼亡仪式为代表的情感动员，展现出一种毁灭与新生的辩证法。在这里，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开始。鲜血证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唤醒奋勇牺牲的热忱。沙基惨案提供的巨大情感能量，连蒋介石也感慨道：“沙面案于凄惨中觉有一种光明印象，生者固悲愤，而死者则得所也。”[④]

---

① 曙风：《我们怎样去补救这般浅薄的民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日。

② 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胡搏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06页。

③ 《公祭沙基死难烈士之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3日。

④ 蒋介石1925年7月1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开学仪式上的演讲，《蒋介石年谱》，第380页。

广东群众运动的情感动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来实现的，包括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演讲大会、示威巡行、游艺大会等。在广州政府时期，无论是沙基烈士纪念周、纪念月，还是总理逝世纪念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五卅惨案纪念日，只要是节假日，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群众集会、演说和巡行举行。几乎所有群众大会都遵照同一种程序模式——奏乐；肃立；向国旗、党旗及中山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宣读总理遗嘱；主席宣布开会理由；演说；大会提案及通电；高呼口号；唱国民革命歌曲；奏乐；巡行（以升旗为号，各界按序列队出发）。这些纪念和庆典仪式，往往聚集很多参与者和围观者，具有一定宣传效果。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在劳工运动中，示威行动的原始目的纯粹是其实际上的效用——向他们的对手展示工人群体的力量。并以此鼓舞他们的支持者，后来却变成了显示团结的典礼。对于许多的参与者而言，在其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万众一心'的经验，其价值绝不稍逊于任何它所欲达成的实际目标。于是乎，一套仪式性的装备可能随之兴起：标语、旗帜、大合唱……尤其在一些仪式的自动发展比较不受到理性主义所拘束的组织中，创造仪式的动力可能会像热带灌木一样茂盛无比……"①

广东政府的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仪式庆典和演说的作用，希望以此撼动人们的心灵，鼓舞人们的热情，宣传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在广州第一公园音乐亭举行成立典礼，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1人和各军将领、各机关长官到场，各界群众围观者有上万人。② 政府常务委员不在高堂大厦之衙署就职，而在市民休憩游玩之公园就职，这是经过一番考虑而特意安排的——"惟其如此，始足表现国民政府与官僚军阀政府有别；亦惟其如此，始足表现其光明磊落，乃真能对国家人民负公仆之责，非如官僚军阀私相授受、狼狈为奸"。③

---

① 艾瑞克·霍布斯邦：《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版，1999，第248—249页。

② 《国民政府成立典礼盛况》，《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③ 孚木：《国民与政府合而为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在大会上，汪精卫发表慷慨演说，号召到场群众“切莫持参观典礼态度，应取监督国民政府态度。须知诸君都是国民一分子，立在主人的地位，国民政府之委员，是你们之伙计，希望大家以主人之资格，时常监督伙计，国民政府各委员有不忠厥职、违背民意者，应予以严重之惩处”。汪还缅怀了孙中山的遗志，深情地说道，先大元帅“肉体生命虽死，而精神人格长留人间，……吾人更勿以为大元帅已死，吾人当以大元帅尚生，如在我之前后，如在我之左右，合力肩此重任，以期国民革命之成功，则大元帅真不死也，大元帅真不死也”。在场民众也随声高呼“孙大元帅不死”“国民政府万岁”。①

1926年元旦，广东各地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中国传统重视旧历春节，不重视阳历新年，但广州1926年元旦与往时不同。各处机关门口都高悬国旗、彩灯，装扮得五光十色，在东校场举行了两万人的大阅兵和三十万人参加的大巡行。巡行队伍由军乐队领导，当先者为总指挥官朱培德，其次为各师旅长，皆乘骏马，工农商学各界群众手持标语旗帜随行，沿途大呼“拥护总理农工政策”“拥护联俄政策”“国民党万岁”等口号。② 广州各机关职员纷纷穿礼服制服前往国民政府团拜。马路上服熙攘攘，各戏院都是通宵演戏，省河兵舰无论大小，都悬挂旗帜，红绿掩映，随风飘扬，飞机在头顶盘旋轰鸣，与地上的鞭炮声交相呼应。③似乎是一个新的历史开端。

这一天，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汪精卫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第一次大会时，先总理还在大会指导我们，现在总理死了。但是他虽然死了，而其主义已深入中国民众，其精神常在我们左右，……总理虽死，总理的主义不死，我们继续总理的主义，便是继续总理的生命。……我们第一步是先求中国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求世界革命的成功。”他还说，中国革命“联俄”之后，就和世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既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就不要反对共产，要是说反对共产，就不能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从今以后，只有认定帝国主义是我们仇敌，大多数穷苦民众是我们的朋友！”据说，这番“极沉痛极坚决”的

① 《国民政府成立典礼盛况》，《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日。
② 铜鼓：《十五年元旦之广州》，《申报》1926年1月10日。
③ 《各界庆祝元旦之热闹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讲话，“每一语毕，座中掌声如雷，一阵革命的空气，充塞弥漫于会堂。同志中且有不能自禁，而高呼各种口号者。二大之光明前途，即此开幕一夕，已令吾人抱无限之乐观矣”。①

1926年3月，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国民党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从12日中午12时到18日，一连七天，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各界人民演讲大会，举行游艺大会。广东各区党部和特别党部一连三天开演讲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演讲队，在广州的各个通衢大道上，举行一连七天的露天演讲。各个演讲会场遍贴标语，旗帜飘扬，口号响彻。苏联顾问达林说，五年前广州的游行主要还是特有的传统民间娱乐，“舞狮、舞大大小小的怪兽，敲击辟邪的大鼓。现在，这一切已经被乐队和旗帜所取代了。……我亲眼看到，下层人民在最近几年已经发动起来了，人民群众开始主宰历史，我亲眼看到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了，社会问题常常是在街道上解决的”。②

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热情澎湃的运动风潮，让身处运动中的人受到强烈感染。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位学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本所开纪念五卅大会，……十一时半出发东校场开会，约一时半即列队大示威巡行，群众达十万以上。出发一时半即大雨滂沱，但仍高呼各种口号并唱革命歌，精神益振奋。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十分钟，……各重要人物演说后并有一十四五龄之女郎登坛讲演，慷慨激昂，淋漓痛快，群众无不感动。是日分两台，一为农工，一为其他各界，的确是星旗蔽空，气冲中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③ 、

群众政治不仅营造出光明乐观的革命氛围，也使身处群众洪流中的个体，体会到一种归属感与崇高感。有学者指出，大型群众运动都会展现出一种巨大的、超越个人的集体力量，让个体在全体中自觉渺小，这种类似宗教感的“群众心灵”（mind of the crowd）体验，带来个体与群体、与历史合而为一的归属感，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是现代群众运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② 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88页。
③ 《第六届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某学生日记》（1926年5月30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264页。

动震撼人心的力量源泉之一。[①] 国民革命的群众运动也表现出这种精神感召力。亲历大革命的作家白薇这样描绘武汉的群众大会："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有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的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破胥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呀，原来革命的精神是这样的！"凝视着这些赳赳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让人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是一个人……直像一粒沙石比泰山"。[②]

广东群众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情感动员机制，使1926年的广州洋溢着激情乐观的革命空气，但运动不仅要把人们集合到战场上，还要形成联盟，对抗敌手，并确保其在动员高潮的兴奋状态消退后仍有前景。[③] 在情感消退后仍有前景，需要依靠组织的力量，而"组织性"却是广州群众运动所缺乏的。为显示团结并灌输国民意识而设计的"仪式"也渐渐流于空洞和表演化。1927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机关报《国民新闻》的副刊《新时代》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广州的群众大会》的文章。作者从上海来到广东，想要看一看这"专门产生革命领袖"的地方，然而，他"看在眼里的只有旗帜，听在耳里的只有军乐"。作者说：

> 我把这两句奉赠给广州的群众大会，我是怎样的心痛呵！也许满场都是热血填膺的到会者吧，但可惜漫天匝地的旗帜遮断了我的视线，也许满台都是激昂慷慨的演说吧，但又可惜帝帝大大的军乐声，早已镇〔震〕聋了我的听觉。
>
> ……群众大会主要的意义，应该是在检阅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是什么？——是团结，是统一。请你看看广州的会场上的群众吧！
>
> 五颜六色的旗帜，第一就表示出七分八裂的团体，一种旗帜代表一种团体，好像到会的旗帜比到会的人数还要多。

---

①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0, p. 11.

② 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79—80页。

③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第165页。

第二是，有军乐也吧〔罢〕了，而还要东边的一队吹打起来，西边的一队等一等，也跟着吹响了，不相同的节拍搅在一起，好像在竞争着谁的旗帜高而大以外，还在竞争谁的军乐吹打得响而持久。

第三呢，出发游行的时候是奔的、抢的、争先恐后的，大约是广州的民众已得到“自由”了，所以用不着指挥，已得到“平等”，所以谁也不让谁去做领导。

第四是马路上的游行队往往是中央一队，左右各一队，择机打军乐，追逐，竞走，三路并进，这个大约是夸耀着广州市的市政好……①

国民党领导人希望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导向团结一致的行动和对国民党政权的拥护，在群众动员初期确实收到了这种效果，但是维系运动中各个阶层和团体之间有机联系的机制还没有制造出来，族群、行会等传统认同和人际联系纽带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民”和“阶级”团结的持久动力还没有被发现。很快，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就陷入分裂、混乱和各自为政的局面，甚至引发了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

二　群众的分裂

沙基惨案后，香港等地已经发动的罢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国民党则试图引导被爱国热情激发的群众与罢工运动相结合，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建设，促进广州政权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② 1925年7月23日，广东工团各界在广东大学操场上召开沙基烈士遇难一个月纪念大会，两千余人参加。汪精卫发表演说，将“继续沙基烈士生命的工作”定义为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和争取国民政府经济独立。他说，6月23日以后，继续奋斗的最大工作，就是罢工，要各界联合起来，一起支持罢工工友们，能使

① 惨人：《广州的群众大会》，《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1927年3月31日。

② 《宣传部制定沙基惨案宣传大纲》，《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7日。陈公博在沙基惨案后发表《国民革命中之国民意识训练》一文，批评中国人国民意识不明确，“国民没有国家的感觉”。他说：“国民革命第一基本的要件，就是国民意识的训练。……我国对外，不患没有军舰、军械、交通器具和种种设备，而患在国民意识不明确不确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日。

罢工坚持到底。因为罢工不仅带给香港直接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广州政府所谋求的经济独立、交通独立，需要充足的人力。得到人力，才能自己造船、建船厂，才能建筑货仓和码头，进而谋求打破英国的经济封锁。近来已经没有人肯再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觉悟了，而“觉悟的便能够流血”。他号召广州人民跟随国民党，“枪来枪去，炮来炮去”，“流出红血来证明他的觉悟”。[①] 蒋介石也考虑到罢工工人若长期没有收入来源，斗争恐难维持，而提出利用罢工工人为政府修筑道路的办法。“或虑罢工工人操业不同，习惯各异，未必尽人愿为路工，然值此爱国热度正高，疏导必非无术……果能妥筹办法，何难利用扩充。”[②]

省港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之久，这和广州国民政府主要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说：“若不是在6月12日以后，也就是在战胜滇军和桂军以后，政府落到较左倾人士手中，并且该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支持罢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主要是反对香港英国人的斗争决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③]

罢工也有力支持了国民政府巩固广州的斗争。关于这一点，鲍罗廷曾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若是没有香港罢工和沙面罢工，我不认为，所有这些行动会这样成功，局势会像现在这样稳定。……罢工斗争为我们在广东建立真正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成千上万的工人造成了对香港的真正封锁，从而也造成了可以使反革命窒息的局面。……在广东没有帝国主义，在广东没有不平等条约，在广东，港沪银团即控制着广东的著名（汇丰）银行没有起作用，香港工人实行了出色的封锁，他们用封锁终止了不平等条约，创造了使广东彻底摆脱任何帝国主义影响的环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镇压反革命，实行某些改革。”[④]

---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5日。

② 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蒋介石年谱》，第390—391页。

③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10页。

④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17页。

两年半以前，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是1天1万元或1月30万元，现在是1月500万元。……因为全省统一了，消除了影响财政统一、不把财政交到政府手里的军阀。……但全国唯一的省份广东能把财政建立在如果说不是牢固的也是广泛的基础之上，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香港和沙面的罢工工人封锁了帝国主义者的全部财力。……在广东不存在不平等条约，可以把任何一个英国人投入监狱，给他带上镣铐，当我们从政治角度看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把他放了。……为什么？因为10万工人实际上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①

罢工不仅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援了广东财政，还间接帮助了广东的军事斗争，并使国民政府可以把更多阶层团结在它的周围。鲍罗廷说："广州政府现在筹集的500万元已有400万拨给了军队。这并不可怕，因为政府的资金毫无疑问很快就会增加。……现在的政府在铺路，维持秩序，最近几个月，尽管有这么多失业者，几万失业者，但仅发生30起小的抢劫事件。……我们已经把尽可能多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了。当广州一家银行由于它的资本与上海和香港有联系而陷入困境不得不关门时，我们的国民党中央银行装了几卡车白银存入广州这家银行，到这家银行提取存款的居民看到由中央银行向那里运送白银，简直都惊呆了。"②

省港罢工产生了伟大力量和非凡的政治意义，罢工工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事实上，鲍罗廷在1926年2月已提出了罢工应当停止的问题，但罢工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鲍罗廷说："当其他居民阶层离开工人时，就应该停止罢工。……我意识到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是在继续进行罢工，并且有意识公开地给工人领袖们提出了问题：'你们应该继续为国民革命运动作出牺牲，你们应该继续进行罢工，因为如果你们

①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44页。

②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45—146页。

今天停止罢工，那就意味着我们同内部反革命进行的整个斗争和在前线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实际上工人是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当弄清楚应该停止罢工时，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要利用罢工一劳永逸地为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基础。现在工人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足以说明问题的是，现在每月至少死去 20 到 30 名工人。……得各种疾病死的，饿死的。确实，他们每天从政府那里得到 1 万元钱。在广东本地有工人约 4 万，以前工人还从国外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国际援助，而现在得不到了。……随着运动的日益高涨，国外援助规模越来越小，研究一下工人是如何在这场斗争中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①

自国民党实行保护农工政策以后，特别是国民党二大之后，广东工人地位空前提高，"能得到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工人运动亦因此而有长足进步"。② 但大量的工人运动并没有表现出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先进性"，除了省港大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之外，大多数工人斗争是为改良自身经济条件而发动的。罢工随意而频繁。在 1925—1926 年，广东各工会之间的门户斗争非常激烈。1926 年以后连月间发生手车夫工人、茶居工人、建筑工人、花梨木行工人、油业工人、菜栏工人、制牙刷工人等之间相互斗杀案。每次斗杀动辄上百人。工人各持棍棒铁器，"每次必伤毙数人或数十人，其始不过同一行会内之工人自斗，继乃各联气味相投之工会，互相助斗"，"市面无日不起此种械斗之恐慌"。③ 苏联顾问达林回忆说："从 1925 年 7 月到 1926 年 6 月共发生五十四起激战，或者说，平均每周不少于一次，多数情况下都打死了人。我在广州逗留期间，即 1926 年下半年，殴斗更加频繁。"④

1926 年目睹广东工人运动的张荫麟也在《回粤见闻记》中说："吾初抵广州境之半日所见工会示威游行，及庆祝加薪胜利之事凡四次。盖今日广东之罢工，苟非有政府之劝阻，未有不操必胜之券者也。此辈有组织之农工人不独雇主不敢欺，乡市中豪家绅宦苟有攖犯之者，则'打倒土豪

---

①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 15 日和 17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117—119 页。

② 张秋人：《国民政府下的工人运动》，《政治周报》第 10 期，1926 年 5 月 3 日。

③ 《粤省最近之工人纠纷问题》，《申报》1926 年 8 月 16 日。

④ 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 196 页。

劣绅’之口号，立喧于其门庭。县吏区官，苟有侵凌之者，则‘打倒贪官污吏’之旗帜，立集于其署廨。而由港罢工回粤之工人势力为尤大。自设法庭，自编纠察军队，自立衙署，卫卒鹄守，盖俨然一政府焉。”①

1926年1月3日，汕头建筑总工会竹业工人，因要求加薪，宣布罢工，同时向东征军总指挥部请求援助，并议决凡同业工人，在罢工期间一律不许工作，违者严惩。1月7日晚8时，竹业工会纠察队巡逻时，在某竹器店发现正在工作的工人郑安国等三人，立即拘捕，准备送至警署关押。但纠察队员在途中殴打郑安国等人时，被站岗警察看到，并上前制止，导致两人逃走，只送到警署一名。11日上午，罢工工人五十余人列队到警署门前，要求提郑安国等三人游街，得知只关押了其中一人之后，群情哗然，认定警长受贿，在警署门前不肯离去，到中午时，已聚集三百余人。

下午警署换班时，署内警察出勤，与门外工人发生冲突，第三区警署被工人捣毁，十余名警察受伤，另外有两名站岗警察被工人推入海中，生死不明。公安局立刻派出游击队前往镇压，途中恰好遇到大队工人押着两名警察游街示众，于是又起冲突。此事引起全市警察不平，相继罢岗，并集中数百名警察至建筑工会，袭击竹业工人。而工会亦早有准备，一番战斗之后，双方各有损伤，最后被驻扎在附近的军队以武力解围。

这次工警冲突事件，令双方都感到激愤。广州《革命周刊》特发出号外，痛斥警察压迫工人，破坏政府罢工政策。全国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召集全市工会百余团体，开工人大会，列队向总指挥部政治部请愿，加入巡行者四千余人。而全市警察则齐集教练所，提出枪毙工人、解散工会、医治伤者和请商会负责担保等四项要求，否则不会复岗。② 1月14日，汕头海员因检查客栈工人下船，发生争执，引起大规模械斗，警察不敢干涉，海员支会及罢工办事处被客栈工人捣毁，双方各伤十多人，均向政治部请求派兵保护。

据1926年3—11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郁达夫观察：“广东的农工阶级，表面上似乎很热闹，各行有各行的工会，各乡有各乡的农

---

① 张蔚麟：《新广东之新精神》，李洪岩编选《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第63—64页。按，此文为《回粤见闻记》之一部分。

② 《汕头竹工与警察大械斗》，《申报》1926年1月23日。

会，此外还有农工商学界的大联合会，然而实际，他们的约束力很弱。几个农工运动的小头目，又都是小政客出身，对于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监督促成的决心，有时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运动，甘心作几个人的爪牙，来摧残同类的。因之一行中的工会和他行的工会冲突者有之，或竟在同一工会之内，分出两派来争闹者也有之。"[①] 国民党一直自我标榜为代表全民利益的党，所有的罢工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反对罢工的人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最终是国民党的权威受到损耗。

1926 年 7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派出五名代表，调查广东政治形势在三二〇事件和北伐出师之后的变化。他们发现，群众运动沉寂下来了，政治生活丧失了它的社会性。"在东江，以前在蒋介石军团的保护下农民运动广泛开展，现在在农民当中强制分摊债券。谁不购买，就说他是反革命，说他反对北伐。"官吏不服从国民党，还枪杀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也变坏了，说"工人的斗争妨碍后方"。军人也反对农民运动，因为农会妨碍他们征收各种不正当和不能承受的税款。东江区行政委员周恩来离开后，那里又公开贩卖鸦片和赌博。广东发生了"大倒退"，而北伐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使社会和政治反动的倾向神圣化了并得到了加强"。[②]

这种局面说明，过去热闹非凡的群众运动并没有触动广东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运动缺乏坚实的社会根基，稳固的群众组织并没有得到发展，革命政府与群众之间日常性的联系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在反帝口号下被发动起来，依靠政府保护和自上而下的鼓动方式，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景象。但革命政权的真正基础仍掌握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手中。

远东局和中共代表的调查报告也指出，在巩固广东的斗争中，政府采取了迎合农民的步骤，颁布了成立农民组织的法令，革命军队在农民与民团的斗争中不止一次地站出来保护农民，帮助武装农民队伍。但是，"这些初步革命成果毕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强烈不满和忿恨，从而产生了

---

① 《风雨茅庐——邹鲁头回忆录》，华夏出版社，2008，第 140 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 年 9 月 1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3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436—440 页。

反革命的策源地"。报告还指出，广东的革命"带有反帝色彩的普遍激进情绪，社会团体易于激动同时又极其软弱，上层和下层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系，缺乏任何稳定的干部。……军队和以军队为靠山的政府是促进广东省革命发展的基本因素"。对革命而言，军事因素比社会政治因素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在漫天飞舞的革命标语、口号之下，广东社会、政治、教育的实际状况与中国其他各省并无实质区别。郁达夫就对广州政府官员的腐败印象深刻，他说政府中部长、厅长一级的官员，"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思想旧一点的人，家里或许有几位太太要养。……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也要用几个和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的人，要支撑他们的门面，……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边人言啧啧"。至于秘书、科长这一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其他若征收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进步不了许多"。② 广州大街上也是赌场、烟馆林立。苏联顾问达林也说过："广州的高级饭店本身就是赌场、妓院和大烟馆。饭店没有公共大厅，一律是小单间，每个单间里设有吸鸦片用的硬板床。鸦片从城市蔓延到乡村，而且农村越穷，越吸鸦片。男人、女人，甚至连小孩子也吸。"③

郁达夫跟随郭沫若、王独清一起来到广州，本想在这里"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④

与郁达夫同样对广州政府感到幻灭的，还有1927年1月来到广州、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43页。

② 《广州事情》，《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第137—138页。

③ 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220页。

④ 《〈鸡肋集〉题辞》，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第172页。

2月10日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他说："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鲁迅被安排在"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大钟楼上，夜间老鼠横行，清晨，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而每日生活，如同在旋涡中，忙乱不堪。忙什么呢？与别的一切学校相同——"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①

这样的开会、辩论生涯，能否称得上是在"革命"？这样要求优待的青年，能否称得上是"革命青年"？鲁迅说："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事实上，"广东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② 这些敏锐、犀利的观察说明，此时的国民革命主要还停留在政治领域，还没有深入社会层面和人民的精神、主体层面。

三　左派阵营的瓦解

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在围城四十天之后，攻入武昌城。城破之时，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上，正在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国庆纪

① 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31页。
② 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第27—35页。

念大会，团体旗、党旗、国旗飞扬，国际歌、革命歌、口号、演讲、各种乐队的演奏，汇成一片歌声和旗帜的海洋。消息传来，民众的狂热达到了高潮，摇旗、鼓掌、高呼之声，掀起“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演说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于是开始轰轰烈烈的游行。[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时代，就在这场盛大的庆祝仪式中拉开了序幕。

10月11日，国民革命军武汉卫戍司令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分别成立，由第11军军长陈铭枢兼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兼主任委员。湖北总工会已经在10月10日成立，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从广州迁到武汉。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批人员孙科、徐谦、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和政治顾问鲍罗廷陆续来到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1927年1月1日，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四部开始行使职权。

1927年3月，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外交统一案”“统一革命势力案”等决议案，[②] 进行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部门重要负责人的改选。还在欧洲正准备返国的汪精卫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与陈独秀联名发表《联合宣言》，号召两党密切合作，随后，汪精卫来到武汉。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则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清党”。

1926年12月至1927年7月的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了新的分化组合，中国社会一切新旧矛盾在这里集中爆发，激进革命意识在这里生长。用邓演达的话说，武汉是“中国新时代的量尺，历史的量尺：要明白中国现在的社会要变到怎么样，或者已

---

① 郭沫若：《北伐途次》，《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05—106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第15—23页；第79辑《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第59页。

变到怎么样，那只要把武汉社会的整个‘表现’、整个‘内容’弄清楚了就够了，或差不多了”。①

（一）暴风骤雨

武汉时期的革命形势，既是国民革命的发展和深化，又出现很多新的因素，尤其是群众运动，与广东时期有着根本差别。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运动，一直处在反对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策略是壮大国民党左派，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军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革命的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在国民革命理论指导下，“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一切社会矛盾都被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罪恶，而不是国内的阶级压迫。②

与广东时期的群众运动相比，两湖农工运动不但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超过前者，而且在民众的自发性上，也远远超出国共两党的控制能力。大革命进入两湖流域之后，便迅速超越了国民革命的目标，呈现出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状态。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工人与厂主之间的矛盾、店员与店东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长久积压的各种矛盾都激烈地爆发出来。

1926 年 7—8 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大规模的工农运动在两湖地区发动起来。湖南农民自发参加北伐战争，组织农民协会，反对苛捐杂税、预征钱粮，要求减租减息。到 1926 年 11 月，湖南全省 75 个县（两个特别区）中，有 29 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19 个县成立了农协筹备处，区农协有 462 个，乡农协有 6867 个，会员达到 136.7 万人，1927 年 1 月激增到 200 万人。③ 1927 年 6 月、7 月间，会员增加到 600 万—700 万人，开始提出没收地主土地、解除乡绅武装的要求，并发生农会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阳新县处死的 45 名绅士，有一部分是在农民的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还有一部分是农民自己处死的。在湖北中部和东

---

① 《新艺术的诞生——致〈中央日报〉副刊》，《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 133 页。

② 《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3，第 278—279 页。

③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第 771 页。

部的一些县里，村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农民协会手中。①

与广东时期革命政府主导的群众运动不同，两湖工农运动自下而上爆发，远远走在国共两党的农工政策前面。革命军进入武汉后，工人运动也猛烈开展起来，罢工席卷了整个武汉。工人为改善经济社会地位，自发举行罢工，有十六七万的大工厂工人参加。家族式的商店被罢工浪潮冲击得最厉害。底层群众不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就自行组织工会，大部分罢工是在无计划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共两党对这种罢工形势既没有清醒的估计，也没有长远计划。②

据湖北总工会1926年12月初步统计，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以后，湖北工人罢工有150—160起，几乎每月罢工50起。大部分发生在半手工业式的小企业里，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20万。武汉工人建立了300多个各自为政的工会，湖北总工会不起什么作用。群众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独立采取行动。③ 在1927年的头两个月里，劳资冲突达到132起。武汉工商联席会议报告说："发生罢工的原因有三个：（1）初期的工会组织没有经验，往往把小事闹大；（2）厂主店东对工人的要求不予理会，没有意识到对工人的态度非改不可，以致双方隔阂很深，酿成罢工；（3）有时是工会组织里混入了不良分子。"④

剧烈爆发的社会革命，使一些国民党左派感到恐惧，让一些知识分子忧心忡忡。陈公博说，武汉的市面很萧条，工人终日游行请愿，民众大会一个星期要开好几次，店员、洋车夫都要参加。"工人大都不先谈判而先罢工，……同时还逮捕雇主和占据工厂。"有一次，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工人包围工厂，把三个美国人关在厂内，断绝粮食接济。美国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 Lockhart）来找陈公博交涉。陈公博说："我至工厂

---

①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6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326、328页。

②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4—6页。

③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28页。

④ 《劳资关系问题——工商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2月于武汉），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188页。

时，那情形真像我们包围武昌城，工厂路口放满工人的步哨，……握着棍棒也显得像身临前敌的战场。"①

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家书中写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全部失业。"② 1927年1月18日、25日，梁启超又在家书中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将来真不知何法收拾。"③ 事实上，武汉的经济崩溃，有各方面的原因，军事行动，长江上游、下游的封锁，武汉政府的金融政策等，都是更根本的原因。但武汉国民党和中国的士绅阶级知识分子，都乐于将错误归结为农工运动的"过火"。

两湖工农运动，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中，一些人也只看到处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消息，认为农民运动"过激"。事实上农民和农运工作人员被残杀、被迫害的现象更加触目惊心。1927年5月马日事变之前，据不全面调查，湖南省被民团、劣绅直接残杀的农民已有一百多人，重伤者三百多人。战斗中牺牲者，如安化则匪死八十九人，平江战斗死数百人等，均未算在内。宜章团防队长率领团兵枪杀农民四十余人，伤六十余人，并有将尸体截成数块者。还有捣毁农协、焚烧农舍、毒打农民致残种种，均未统计。④

两湖农民运动冲击了国民革命军中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利益，他们多来自两湖地区中小地主家庭，这种冲突给革命带来了恐怖的灾难。苏联顾问巴库林在1927年5月的日记中说，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李品仙的姐姐向李品仙控诉农会。李品仙部下某团某营长的弟弟，家有七十亩地，因交不上罚款，又害怕戴高帽子游乡，毒死孩子之后投河自尽。"李品仙担心军队会丧失斗志。他说，他本人及其高级军官都同意无偿地交出自

① 陈公博：《军中琐记》（四），《民族》第5卷第4期，1937年，第780—782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07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10页。
④ 《湖南农民被土豪劣绅残杀人数》（载1927年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2页。

己的全部土地，但是军队里还有大量下级军官，他们还得靠土地为生。此外，军官们都有地主亲戚，并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库林写道：“在‘忠于’武汉的部队中，有五个主力军（第二军、第八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几个独立师和旅，按籍贯都是湘军。湖南的形势直接影响到这几个军的军长的情绪，因为这些军长都是湖南的地主。”①

1927年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联合杨森、刘佐龙等部进攻武汉。据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7年6月的报告，“于（学忠）、张（连升）、杨（森）、夏（斗寅）相继叛变，鄂北、鄂西、鄂南、鄂东摧残殆遍。党部被捣毁者十分之八九，党员被杀、被捕，流离失所者，尚无确实统计，至少逾一千人”。②

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派兵包围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机关，杀死三十余人，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地主，捣毁了省特别法庭。之后，整个湖南陷入了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事变后的两个星期之内，被杀戮的党部工作人员、工友、农友、青年学生，总计不下一万人。杀戮的方法亦极端残酷。③

在激烈爆发的阶级斗争面前，国民党左派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稳定局势被当成首要目标。1927年6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政会在汉口中央党部召开第28次会议，讨论对湖南问题的处置办法。国民革命军第36军副军长周斓和湖南军事厅长张翼鹏报告，说农民协会反对政府，请求派兵剿灭。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请求中央命令讨伐并枪毙许克祥，恢复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大会主席汪精卫对反动军队和农民运动各打五十大板，说：“廿一晚所发生的事，是军队的错误居多，但同时农民协会也有错误。……我们知道有反动派在造农工的谣言，

---

① 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164—165页。

② 《最近半年之湘北党务》（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上册，第51页。

③ 《湖南请愿代表团关于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第一次报告纲要》（1927年6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第9页。

但同时农工自己也须承认在过去的行为中多少有些错误。如果农工以为自己毫无不是之处，那就不得了。”又说，农工利益必须保障，过火行为必须制裁。“悲愤之余，还是要用慎重的手段。”①

这种看似公允的态度，实际上是站在了反动军队一边。由于军队对农民的绝对优势，妥协折中相当于纵容地主武装对农民的反扑。事实上，武汉政府并没有能力制止军队的自由行动，而湖南省党部也没有能力约束农民的行动，民众起来的速度远远超过党的发展速度，党对民众没有全部领导的能力。无论是革命势力还是反革命势力，都超出了国民党和政府的约束。

农民协会和基层党部中混入土豪劣绅投机分子，也是造成血腥恐怖的直接原因。而关于土豪劣绅的审判又没有标准，有时候真正的土豪劣绅伪装成“左派”，不是土豪劣绅的却被错抓错杀。湖北省 1927 年 6 月的党务报告中说，民众开始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之后，彼不能立足，“有的逃至武汉入党，有的匿迹销声，谋混入党内”。或勾引会匪，利用民团及杂色军队，以实施屠杀。“五月到现在，漏网土豪劣绅，逃往反动军队中去，……夏、杨叛军所至，皆若辈为先驱，屠杀党员以为快。”革命进程突飞猛进，党员人数猛烈扩充，也给土豪劣绅可乘之机。报告说：“本省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仅三万一千八百七十五人，现已达十余万人。……土豪劣绅或投机分子混入党部者甚多，且有土豪劣绅已攫得县执行委员者。”在发展最速之县，极短时间内增加党员三四千人，“分子复杂，可以想见，现已达不可收拾之程度”。②

1927 年 5 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武汉东征军进入河南，军队与基层党部和农民运动的矛盾在河南爆发。有报告说，河南省的县党部里尽是投机分子，省党部压不住县党部，县党部自由逮捕、惩罚人，对所逮捕之人有刑囚现象。在中政会第 25 次会议上，顾孟馀说：“总政治部到河南去的宣传列车，还没出发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谁知到了那边，没有一件事受人民欢迎，列车被毁了，东西也被抢光了，他们所带去的标语，也完全不适用。”顾孟馀十分担心河南军队也发生如“马日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 6 月 13 日），《马日事变资料》，第 278—282 页。

② 《最近半年之湖北党务》（1927 年 6 月），《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上册，第 51 页。

事变”的情况，他说：“我们的直辖军队多少还能了解一点主义，其他杂色的军队，则程度相差太远，而且军费又完全靠地方供给。假定河南出一点乱子，杂色军队定要一致来反对我们。……我们不能打破他们的饭碗，若是激动了他们的公愤，一定是怨恨整个的中央，怨恨整个的政府。”最后，中政会通过决议，河南省各县党部、各农民协会、各妇女协会，立即全部停止活动。①

（二）小资产阶级问题

武汉政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受冲击最大的是小资产阶级——家庭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小地主等。苏联顾问巴库林观察：“武汉工商界即中小资产阶级，对于从广州来的人有所不满。他们对新政府的税收政策议论纷纷。”这是说，武汉政府只取消对他们本身没什么影响的捐税，却增加了一系列新的捐税。如水电税增收20%，“这显然不会直接影响工人和手工业者，因为他们既不用电，也不用自来水，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此极为不满”。还有，“所有房客要预交一个月房租，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征的公债”。当然还有鸦片税，过去鸦片税是成交价的20%，现在增加到35%。“所有旅馆一次应纳税一万元。在公共场所和饭店里举行宴会、打牌、打麻将，要纳高额税。对电话、货物过境（厘金）、单据结算、开设戏院和客栈等等，一概增税。”② 这些税收都打击了小资产阶级。

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实行现金集中政策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大量字号停顿，商铺倒闭。国民党中央商民部1927年的报告说，倒闭的商铺，“钱业居十分之九，典当业十分之六，木业十分之五。至于倒闭原因，钱业由于金融封锁，无法向外借款，而外欠亦不能收回。典当业已往营业多赖各方存款，现在存款已被提去，而又不能再向各方借款。木业则一方因无从借款活动，一方受军事影响，交通断绝，土匪蜂起，不能由黔、湘等地运货至下游一带。匹头业则以店员之故，失却营业曾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6年5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24页。

②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7页。

理权及经济权。米业则以既无米源，米价又高”，且最近军队购米多用国库券，而无论湘、赣，武汉的国库券均难行使。至于未倒闭的店铺，则“店员不允倒闭，……尚有又要求加薪者”。①

另一份报告说：“钱业为市面中小商人周转之根本，钱业一家倒闭，受影响者则不只一家。至于债权者亦深知倒闭原因真相，故双方起诉者绝少，且店中纵有款项，店员亦不允还债，缘店员以为还债以后店中便无力再作也。”1927 年 3 月，武汉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实行现金集中政策之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将倒闭者殆有百分之八十”。②

早期中共领导人认为，小资产阶级受其经济地位的决定，在革命面前必然犹豫、动摇，没有独立的政策。但恰恰因为其动摇性，可能反对革命，也可能靠近革命，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无论是在动员全体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中，还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小资产阶级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整个过程中，中共都试图通过支持国民党左派来联合小资产阶级，扩大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他们希望借助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将广大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在革命阵营当中，同时保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北伐军到达两湖之前，这一思想主导着国共合作——尽管国民党左派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廖仲恺、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手工业主、小商人们，也从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并认同自己是小资产阶级。

两湖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展现出底层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要求革命领导层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力量，确立革命进一步前进的策略和方向。一些国民党左派和军事将领对农工运动感到恐慌，要求停止革命。大部分国民党左派倾向于调和阶级矛盾。共产国际内部的激进派别则试图抛开小资产阶级，将革命进一步推向深入。

1927 年 2 月，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纳索诺夫致信青年共产国际，

---

① 《中央商民部报告：向武昌总商会调查》（1927 年 月 24 日），《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 381 页。按，原书即缺月份，下同。

② 《中央商民部报告：向汉口市总商会调查》（1927 年 月 23 日），《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 380 页。

认为目前“对小资产阶级的明确政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信中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历史性妥协的结果，……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中心人物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对小资产阶级作出评价”，改变从前依靠小资产阶级的方针。[①] 因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的方针，即意味着改变对国民党左派的方针。

共产国际认为，1927年4月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中国革命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武装的要求。[②]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武汉，带来共产国际要求将中国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的最新指示，反对国共合作之初鲍罗廷曾推行的分化、联合国民党领导人及军事将领，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策略。罗易认为，对国民党左派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同北方军阀作战的情况下，武汉的“小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在军官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会“转身逃跑而抛弃群众”。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若没有中共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活不到明天”。他坚决主张立即从下层开展土地革命，设想在两湖武装农民，建立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自下争取士兵，使他们转身反抗军官。[③]

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则反对这种观点，主张约束工农运动，维护国共合作。张太雷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太左了，这种极左的土地革命纲领，“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而瓦解”。他批评罗易的教条主义，说他提出了“一个完全机械的公式”。[④] 蔡和森在《党的机

---

① 《纳索诺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08页。

②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80页。

③ 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王淇、杨云若、朱菊傅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第9—10页。

④ 罗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192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386—387页。

会主义史》中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独秀说："现在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非常动摇，怨恨国民政府，中心问题是店员要求的过火。"在另一次会议上，两位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同志报告了汉口店员和童子团的一些"过火"行为，"国民党中央闻悉大怒，汪、孙、谭等顿足痛骂，……独秀闻此，亦大为惊怒"。①

在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说："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的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人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的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关于土地问题，陈独秀认为，对于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应该没收，但是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没收的，因为"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②

1927年5月12—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汉口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如何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国民党左派建立关系。陈独秀提出六条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意见供会议讨论：（1）小地主和军官的土地不没收；（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纠纷的仲裁委员会；（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5）邀请国民党参加工农组织；（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捐税，条件是不剥削贫困居民阶层。③

---

① 萨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519页。

②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271—272页。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于汉口），《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293页。

根据讨论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5月13日通过了“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案，指出目前的策略仍是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同盟，并提出了调整国共关系的五条办法。（1）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2）劳工部颁布劳动法，包括规定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恤金、保险、劳动条例、店员工作条例。（3）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由总工会代表、劳工部、商民协会、店员总会组织委员会考察店员提出的条件，并按照物价比例规定合理的限制。（4）现时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扰。（5）除发现有反革命的活动，或有反革命的嫌疑者，商民得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①

这份决议，在农工运动形势已超出国共两党控制能力、中国社会已发生激烈冲突与分裂的情况下，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共合作。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上，罗易提出“关于小资产阶级国民党诸问题决议案”，实际上认同了回避土地革命和对国民党左派“总退让”的政策。自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幻想，把他当作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蔡和森说：“这样，汪精卫就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② 这一路线一直维持到罗易为了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而擅自将斯大林的“六一电报”③ 副本交给汪精卫，导致汪精卫立即以此为借

①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1927年5月13日中央政治局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16—118页。

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0页，转引自罗伯特·诺恩、津尼亚·尤丁《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资料》（1963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580页。

③ “六一电报”内容大致包括：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持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但是，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名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等等。

口“分共”。

武汉政府时期这些急剧爆发的社会冲突，引发了国民党的恐慌，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中“革命”观念的扩展和“阶级”意识的深化，使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小资产阶级问题真正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经过两湖工农运动，在政治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同“资产阶级”决裂，直接进入“土地革命”。在思想上，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开始在中国文化和思想意识中扎下根来。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建设独立的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意识的要求。伴随着激烈的工农运动引发的农村问题与小资产阶级问题，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革命道路的讨论开始浮出水面，成为1928—1929年革命知识分子论争的主要问题。

第四章　左右之间：改组派的理论与实践

1928 年 6 月，国民革命军接收京津地区，北伐宣告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大业”正式完成。10 月，国民党中央根据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制定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党国体制初步确立。《训政纲领》赋予国民党领导国家的地位，宣布在训政期间，一切权力皆由国民党集中，政令由国民党发施。“政府由本党负其保姆之责，故由党指导，由党拥护。在人民未经政治训练及未完全了解实行三民主义以前，唯有党能代表全国人民负建国之大任。”①

然而，1928 年的国民党，却走到一个困顿的十字路口。伴随统治区域与政权的急速扩张，国民党迅速腐化了。美国学者易劳逸指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革命已经失败了。1926 年至 1929 年间，国民党党员从 15 万人急剧增加至 63 万人，党的领袖无力控制党员成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纷纷钻进国民党的队伍中来，旧军阀和旧官吏也被举荐到党和政府中去做官。党的精神一天天衰落下去，以至于那些理想主义者、那些对革命抱有热情和真正有能力的人，根本就不想加入国民党。②

这样一个腐化充斥、脱离群众、组织涣散、丧失青年信仰的国民党，如何来实施“训政”？这是令国民党高层和党内的下层革命青年都感到焦虑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改组派应运而生。1928 年 1 月，陈公博来到上海，蛰居贝勒路公寓中，思考如何东山再起。不久，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人都来到上海，商议“改组国民党”。陈公博说，当时很多关心国民党前途的青年向他提出办一个刊物的要求，于是 1928 年 5 月，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6 月，顾孟馀创办《前进》月刊。他们鉴于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动荡、国民党意识形态混乱的局面，提出

---

① 《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 3 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第 416 页。

②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 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第 11—42 页。

“恢复民国十三年的改组精神”的口号。

1928 年 11 月 28 日，陈公博等人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通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随后，在江苏、安徽、河北、山东、河南、浙江、江西、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南京、北平、上海等省市和亚洲、美洲、欧洲等地的华侨社会中，都成立了改组同志会的基层组织，全盛时期有 1 万多人，[①] 成为国民党内最具规模和影响深远的一个具有自身意识形态的政治派系。汪精卫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虽然他一直没有正式加入这一组织。

在国民党诸多派系和复杂的派系斗争中，改组派是最具理论建树和意识斗争色彩的派系。他们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批判南京国民党腐败涣散，提出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恢复民众运动、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实现国民党的青年化和民主化等政治目标，以及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方案。这些言论抓住了国民党“分共”后组织涣散、脱离群众、土豪劣绅纷至沓来的问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广大知识青年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改组派还策动拥护汪精卫的军人和各地方实力派，组织了一系列反蒋军事斗争和政治活动。发动“护党救国军事运动”，策应中原大战，发起北平扩大会议，召开广州“非常会议”；[②] 同时尽力扩充改组派的地方党部，在工人、农民、学生团体中活动，发动民众运动，与南京政权争夺基层组织，名噪一时。1929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致电陈果夫：“平津党部完全为改组派之党部……未知当日为何有如此圈选，诚是可疑，务希即日改组……如稍延缓，必误北方党务。”[③] 同年 10 月 15 日，蒋介石又致电张群：“沪上反动派如是之多，改组派如此猖獗，乃竟未获一

① 参见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 36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5，第 143 页；张顺良《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海外党务组织争夺战初探（1928—1930）》，《花莲教育大学学报》第 23 期，2006 年。

② 关于扩大会议、“非常会议”和 1929 年至 1931 年间的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第 85—137 页。

③ 《蒋中正电陈果夫》（1929 年 6 月 26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200-00006-069。

人，未知何故。"[①] 可见改组派在京、津、沪之活跃。

一 国共合作的"叙事"

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抓住张发奎"驱黄""迎汪"造成广州城内兵力空虚的时机，发动广州起义，彻底粉碎了汪精卫的"护党救国运动"，改变了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之后李济深回粤，在泰康路天字码头立起一座石碑，将事变经过和"祸首"名字刻于石碑之上。所谓"祸首"，不是叶挺、张太雷，而是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顾孟馀。[②]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严厉声讨，1927年底，汪精卫再次退出政治，赴法隐居。

1929年初，退居法国的汪精卫在给王懋功的一封信中说，"我近在巴黎，用意仍在多预备些左派的革命理论和方案"，"想合多数革命同志共同研究"，形成左派的"共同主张"。[③] 打造"共同主张"的方式之一，是重建国共合作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既是一种自我辩护，也是一种政策路线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左派"的国共合作叙事，主要体现在两个文本中。一是1929年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同时兼任汪精卫政治助理和英文秘书的汤良礼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内幕》。[④] 该书记述了从同盟会时期直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后，国民党的政治发展和内部派系斗争，披露了不少在当时不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包括巩固广州革命大本营过程中国民党左、右派的激烈斗争，以及中山舰事件的来龙去脉等，体现出鲜明的国民党左派立场和反蒋主张，是国民党左派的对外宣传之作。

关于汤良礼的生平和《中国革命内幕》一书的具体内容，以及汤良礼的其他英文著述有专门研究，此处不赘。汤良礼本人生长于海外，并

---

① 《蒋中正电张群》（1929年10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200-00011-046。

② 王唯廉：《汪精卫与广州暴动》，《现代史料》第一集，海天出版社，1935年再版，第12页。

③ 马长林选编《汪精卫致王懋功密函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第60页。

④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30.

未参加从晚清到1920年代末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何以能知晓如此多的“内幕”呢？汤良礼在该书自序中称：“由于他有机会接触缔造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甚至担任过他们的私人秘书，因此得以了解国民党诸多决策的内幕。”李珊认为，汤良礼撰写此书的资料很可能来自汪精卫或其亲信。[①] 这便引出了我们要介绍的另一个文本——原收藏在曾仲鸣、方君璧后人家中，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的一份《汪精卫“自传”草稿》（以下简称《草稿》）。

《草稿》以第一人称“我”或“汪”撰写，共65700余字，是未完成稿，也可能有所散失。该文献记录了汪精卫从少年时代起，至1927年12月2日国民党第四次中央会议预备会议在上海开幕之间的政治生涯，描绘了一幅从汪的视野出发，立足于国民党左派立场所建构的历史图景。文字未经过修饰，字迹亦十分潦草，文中时常夹杂一些法文单词，段落章节均无标题，但年代标注清楚，时间线索分明。原稿未注明写作时间，根据内容判断，很可能是1928—1929年作于法国，作者不详。[②]

《草稿》记述汪精卫的个人经历、政治抉择与内心世界，其中大量信息可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和其他各类史料相互印证。同时，《草稿》从汪的立场与视角出发，论述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斗争史及国民党自身成长、分裂、蜕变的历史。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反清时期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民国初年南北议和的过程、国民党联共与改组、中山舰事件等，都从亲历者的角度展开论述，是一篇汪精卫执政路线的自我辩护与政策阐释。

经过仔细对比《草稿》内容与汤良礼所著《中国革命内幕》，会发

① 李珊：《面向西方的书写：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第180—200页。

② 据何孟恒、汪文惺后人何重嘉女士介绍，《草稿》原由同盟会早期会员、汪精卫、陈璧君的密友曾醒女士收藏，后交给曾仲鸣、方君璧的后人保管。何孟恒在曾仲鸣后人家中看到这份未完成的钢笔手稿原件，曾带走复制并誊录一份。何孟恒曾以《草稿》为基本史料，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撰写了《汪精卫与现代中国》一书，该书未正式出版。Worldcat数据库收有书名目录，但误将汪精卫列为作者。又据曾仲鸣、方君璧的后人曾仲鲁先生介绍，他的姑母曾醒收藏一箱文献，保留在他的长兄曾孟济家中，何孟恒先生曾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文件影印复制，后归还，其中就有这份《草稿》。曾仲鲁先生认为部分《草稿》的笔迹乃曾仲鸣的，可能是1928—1929年汪精卫借曾仲鸣在法国闲居时，由汪口述，曾仲鸣笔录之作。在此谨向何重嘉女士、李蕾女士，以及向中国历史研究院捐赠史料并授权学者使用的曾仲鲁先生致以诚挚谢忱。

现两个文本有大量内容重合，很多段落看起来是直接翻译。很可能《草稿》就是《中国革命内幕》一书的部分中文底稿。[①] 它们都体现出汪精卫在国民党右派的“灰色共产党”指控下，建构国民党左派自我叙述与革命路线的意图。《草稿》中贯彻了中国之乱源内为军阀、外为帝国主义，若要国民革命成功，对内须打倒军阀，对外须铲除帝国主义的思想。

① 例如《草稿》记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行动，有如下文字：“自九月十七以后，形势一变，因袁世凯出来，北洋军队皆决定听命于袁，其领向南方之势亦因而一变。袁未到北京以前，预定计划先收罗北方军队，然后对付南方革命党，当时袁未出，前统兵将军为蒋昌。自袁出后，蒋昌已失指挥之能力，北洋大臣如段祺瑞、冯国璋，皆听命于袁世凯，只有吴禄贞、张绍曾尚领向南方革命党，袁即决心除此两人。加之此两人最为满人所忌，其时满洲宗室面据兵权者为良弼，有勇而多能，无心去此二人，乃于九月十七日使人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车站，并升张绍曾官职而夺其兵权。”（《草稿》，第13页，辛亥九月十七日为1911年11月7日）汤良礼书中 Yuan Shih-K'ai's Move 一节写道：On November 7, however, there was a sudden change. Yuan Shih-K'ai had accepted his command, and the army generals, such as Feng Kuo-Chang and Tuan Ch'i-Jui, who were reluctant to obey the Manchu Yin Ch'ang, were glad to receive orders from him, who was their old teacher. Yuan's first step was to get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the Northern Army before dealing with the revolutionaries in the South. He decided to get rid of Wu Lu-Chen and Chang Chao-Cheng. Thus on November 7 he sent two assassins to Wu Lu-Chen, who was murdered at the railway station at Shih-Chia-Chuang. He then promoted Chang Chao-Cheng to a higher sinecure rank so as to make him harmless（pp. 81–82）。

《草稿》又记述汪精卫的行动：“我于九月十六日出狱，正遇时局转变之时，我于九月十七日往山西，在到石家庄前一站，车不通行，打探得吴被暗杀之消息，我即回北京，……张绍曾已去职，我又回北京、天津，组合同志，立同盟会京津分会以为革命党在北京之机关。当时分会之党员仅有百余人，举我为会长，我即决定以下各种计划：1）推动运动北洋军队倾向革命，此层因袁出来，北洋军队皆听命于袁，效果甚少。只是吴禄贞残部克复山西、陕西两省，如今山西之阎锡山即吴部下之一人，张绍曾去后，其大部分之军队归于袁世凯，其小部分之军队曾起义一次而失败，死者有白——”（引者注：原文如此，此处应指滦州起义。“白——”可能指牺牲的滦州革命军参谋长白雅雨。《草稿》，第13页）汤良礼书中 Wang Ching-Wei's Counter Move 一节写道：To counteract Yuan's move in the North, Wang Ching-Wei, just released from prison, organised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branch of the League, of which he became the Chairman. It was decided to continue the propaganda in the Northern Army. Before Yuan Shih-K'ai took charge of affairs,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North was quite favourable to the revolutionaries, who could count on the support of two army divisions. With the assassination of Wu Lu-Chen and the fresh promotion of Chang Chao-Chang, the revolutionaries were left with practically no armed forces. Part of the troops who were formerly under Wu Lu-Chen went westwards, and took the provinces of Shansi and Shensi on behalf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greater part of Chang Chao-Cheng's forces decided to obey Yuan, and only a small part went revolutionary and revolted; these were crushingly defeated.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it was imperative to enlarge the revolutionary nuclei in the Northern Army by propaganda（p. 82）。

以下再摘引几段《草稿》中的文字与《中国革命内幕》一书对照。

2）组织暗杀队，打击满洲之名人及敌人之最力者。当时在京津间之党人愿意牺牲者甚多，但缺乏炸弹。时上海已克复，那时炸弹及炸药皆由上海兵工厂制成，运至天津，由天津运至北京。当时担任秘密运送者为由广州来京之陈璧君等。因制造运送皆极艰难，故至十二月始得齐全，直至1912（年）正月始有彭家珍炸死良弼之事。自良弼死后，满洲人中有抵抗革命之决心及能力之人已尽，彭家珍即漂州军官之一。因张绍曾失败后，专在京津同盟会服务。彭家珍之炸良弼与满洲皇室之退位，及民国之成立大有关系。随后又有四烈士炸袁世凯事，此次只伤袁之车之马及卫兵，袁未中而此四烈士则被袁世凯所捕杀，此次事虽未成，但使袁明白革命党在京之势力不弱，促成其赞成共和之心（《草稿》，第13—14页）。With a view to impress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North, a terrorist group was organised for the purpose of doing away with the key supporters of the Manchu Dynasty. This group consisted of numerous party members, but for some time they were condemned to inactivity as they could not get hold of any explosives until after the capture of the Shanghai Arsenal. The first consignment of bombs under Miss Ch'en Pi-Chün did not arrive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Liang Pi, the most powerful Manchu in the Army and the only Manchu whom the Republicans really feared, was assassinated by Pan Chü-Ying, a former officer under Chang Chao-Cheng, acting under orders of the League. On the 16th January, 1912, four other comrades made an attempt on Yuan Shih-K'ai himself, but they failed, only hurting Yuan's horse and wounding his bodyguards. They were arrested and executed, but although the attempt was unsuccessful, it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Yuan, who at last realised the strength of the League in the North, inducing him to make the compromise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shortly (pp. 82-83).

3）君主立宪党人皆趋向于赞成共和。因当时有中国人不可自杀同胞，不宜帮助满洲人之口号，君主立宪人已受影响，因此我即找立宪党首领等，主张用和平之方法，如国民会议，用全国总投票方法，或共和，或君主，公决于人民之公意。当时有一部分人反对我此种之办法，我以为此种反对绝无理由。因京津尚在满政府势力之下，运动军队暗杀皆暗中秘密行动，此不过是普通宣传行为，满政府不能禁止，正可助革命党之声势。而且当时大势已定，如投票必多数赞成共和，无人赞成君主，所以赞成总投票之主张，即如赞成共和一样。以上所主张之总投票并未实现，其所得之结果，则北方各省发起许多赞成共和之运动。如当时省议会、学校、报馆，因在满州〔洲〕势力之下，不敢公然赞成共和，但皆主张总投票以表示赞成共和（《草稿》，第14页）。It was also decided to solicit the suppo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 who were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League's slogan, "Don't help the Manchus to kill the Chinese." Wang discussed the matter with their leaders at Peking and proposed to them two points, the calling of an armistice and the convocation of a popularly elected National Assembly to decide on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 This policy was objected to by several party members, but Wang made them realise that Peking and Tientsin were sti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anchus. As long as this was the case, propaganda for the Republic could only be done in secret, and this by the method of assassination. Whereas in the elections for the National Assembly, which would have the

强调国民党改组之前党的组织涣散、军阀政治的黑暗与孙中山的沉痛、挫败。认为国民党改组具有内在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并不只是为了争取苏联物质援助，或如蒋介石的历史叙述——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统一，尽可能地将共产党纳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

例如，《草稿》中记述，1921年孙中山打败陆荣廷、收复广西之后，“禁赌禁烟，整理财政，清肃各处之土匪，并试行县知事民选制。当时人民安定，工商业亦渐渐发达，海关表收入加三倍”。不只广东人民觉得有希望，各省人民亦觉得广东有希望。然而，在一片光明的形势之下，革命组织内部却潜伏着黑暗，“黑暗方面之至大原因，系为当时党之组织未好。……党之力量，不到政治方面，尤其不到军人方面”。军队中“党之训练甚疏，所招士兵与别的军士亦无甚分别”。几次胜利下来，粤军迅速扩充，而新扩充的将领、士兵对党全无认识。仍是旧式私人军队，而非党的军队，如陈炯明的部下便有脱离孙中山的趋向。①

后来孙、陈在打倒北洋政府还是维持广东自治的问题上出现裂痕，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掌握广东军政全权，终至背叛孙中山。这充分显示出，在旧式军阀体制下军队依靠私人关系结合而非依靠“党”结合的弊端。

又如，《草稿》记述1923年孙中山在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的协助下，打败陈炯明，“杨、刘对于党之认识，尚不及陈炯明。其拥戴孙先生之目的，乃在蚕食广东。……广东省之财政被军队割据，极为零零碎碎，

---

sanction of the Manchus, propaganda could be carried on in the open. Moreover, he was sure of getting a popular majority in favour of the Republic. In view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ituation, this plan was not carried out, although it was widely discussed in the Press and in the Provincial Assemblies. An alternative plan was found in entering into negotiations with Yuan Shih-K'ai with a view to inducing him to make a compromise with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the South and to join the Republican movement himself. This policy seemed contradictory with the terrorist policy previously adopted. It was realised, however, that Yuan was essentially a tool of the Manchus. So the League also wanted to use him as their instrument, for should he declare himself, even if nominally, in favour of the Republic, the question of the Dynasty would be ipso facto settled. In the light of subsequent events this tactic was a grave mistake. But it seemed to be unavoidable, for the policy of the League at that time was to concentrate o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Manchu, to restore national sovereignty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nyone who was against the Manchu was considered to work for the same aim (pp. 83-84).

①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27—28页。

其兵额则拼命扩充，军饷不足则就地筹饷，广东人民恨之刺骨，广东政治之腐败无过于此时”。当时孙中山想裁制杨、刘，但自己没有军队。不仅不能打败北洋军阀，连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亦不能消灭；不但不能消灭陈炯明的势力，连自己身边的杨、刘军队亦不能降服，“其抑闷愤恨，为孙生平所未曾遇见者”。①

广东之外，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一向自称南方革命党的省份，“军人互相争夺残杀，其腐败纷扰，更甚于北洋军阀”。国民党内部“腐败扰乱，几乎可说与中华民国一样”。虽号称为“国民党同志”，但彼此间无一致信仰，亦无统一行动。因此，孙中山“乃日夜筹思如何整顿中国国民党，然后用以整顿中华民国”。②

可见，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寻找新的革命势力，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是一个真诚的革命党人在这一历史关节点上的必然选择。《草稿》高度肯定了国民党改组的成就，认为：“自从改组以后，国民党之组织比以前严密，宣传亦比前猛烈，国民党之声势亦比前大得好多。尤其是国民党中加入好多民众团体，尤其是农工商学团体加入后，其中有无数青年，皆极勇敢而肯牺牲。党员工作能律〔力?〕，比从前大增加。”③ 但是，《草稿》对于改组工作重心与成果的阐发，却刻意回避了汪精卫支持联俄、联共的层面，回避了他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关系，而是试图说明，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策中，蒋介石比汪精卫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按照蒋介石本人的说法，导致他对“联俄”态度转变的关键事件，是1923年9—10月蒋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

①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32页。
②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33—34页。
③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42页。

动，更是危险。”[①] 有学者认为，蒋此次出访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甚至从此产生了“仇苏情绪”。[②]

也有学者认为，蒋在访苏期间，对于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军事训练、严密的党组织运作、党对教育的统筹指导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和苏联的先进武器，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虽然蒋对苏联也留下许多负面印象，并成为他日后反共的理由，例如苏联对国民党在中国革命领导权上的挑战和不信任，以及欲将外蒙古分离出中国等，但是，他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立场出发，仍希望加强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并欲仿效苏联的政治军事制度以及强化党与国家关系的社会主义模式。蒋并没有在访苏之后立即形成如国共分裂时期的坚决反共立场。[③]

汪派的叙述，支持第二种观点。《草稿》中说：“蒋为孙当时之第一军事参谋，而孙先生派之至俄，其使命之重要可想而知。蒋介石详述俄国党之严密及军队组织之严密，乃是促进孙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之原因。关于联俄事，是廖仲恺、蒋介石，尤其是蒋介石帮助孙先生决定之，我及胡汉民未与闻此事。”为了证实自己的记述，《草稿》还特别引述了1926年秋蒋介石在北伐时发表的一封孙中山致蒋函，其中提到，“胡汪两人皆不会赞成俄国之革命方法，……精卫非俄派之学者，故不会赞成俄式之革命”。[④]

---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第31页。

② 李玉贞：《蒋介石访苏为何败兴而归——俄罗斯档案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之五》，《世纪》2012年11月。

③ 楮国风：《山田辰雄主讲“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访问”纪实》，（台北“国史馆”）《“国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6期。

④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36—37页。《孙中山致蒋中正函》原文如下：“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人，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人，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人，反多扞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偏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澈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瓦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败指也。”《国父全集》第5册，第540页。

既然不赞成俄国革命方法，汪为何又“极端赞成”国民党一大章程草案，并积极拥护改组？汪派的叙述是，国民党过去最大的问题是涣散和独裁，汪反对独裁，他赞成此次改组提出的以党治军、民主集权制和发动民众的精神。[①]

面对国民党右派对汪精卫甘为第三国际工具和共产党傀儡的指控，汪派的叙述着力强调了国民党左派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独立地位和主导作用。其试图表明自 1925 年 7 月广东国民政府改组、汪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 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爆发、汪被迫离职，此期间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的政策整体左倾，将广东政权引上了以党统政、以党治军、民主集中制和民众动员的“正轨”。军政、民政、财政于最短时间内得到统一，军队接受了政治训练。特别是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使军事行动悉听命于党，军事财政完全分开，过去总司令专权和军队分割财政权的弊病被一扫净尽。农工运动蓬勃兴起。这些都是国民党改组的成就。

然而，党势的扩张、工农的兴起，使资本家和富人感到恐慌，失意军人、党内反对改组的“老同志”，都在“反赤”的口号下结合起来，反对新兴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内的主要斗争，是左派所代表的“新势力”与旧军阀和右派所代表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共力量虽迅猛扩张，却始终被约束在国民党的框架之内。“所有共产党人皆加入新势力以助其奋斗”，因“新势力如被旧势力打倒，则共产党本身亦不能存在”。而新势力也需要共产党的帮助。[②]

1928 年以后的国民党“左派”，自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夹攻”中奋斗，曾办了一个刊物就叫《夹攻》。《草稿》对 1926 年三二〇事件的叙述，也试图传达这种观点。说：自国民党改组以来，右派对廖、蒋、汪极为不满，先杀廖，又想杀汪、蒋。共产党因时时受到汪蒋的限制，与汪蒋也有矛盾。但汪、蒋性格不同，“汪率直，受共产党之不平愿望，不甚注意；蒋甚深心，对此点甚为注意”。张静江等右派遂利用此机

①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 37 页。
②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 64 页。

会，散布一种共产党要“联汪倒蒋”的气氛，“此空气满布于蒋之左右，而汪尚不知蒋为此空气所摇动”。①

《草稿》认为，三二〇事件的导火索，是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委员会、虎门要塞司令员陈肇英以绑私船贩运私盐，被人发觉，汪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停其职务，并由军事委员会免其司令一职，令蒋就近查办。陈肇英与蒋介石关系亲密，蒋身边许多人请求宽办陈肇英，汪不允，因此对汪怀恨在心。② 这些矛盾，都促成了三二〇事件的爆发。

基于“纯粹国民党左派”的立场，《草稿》试图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三二〇事件，所谓蒋欲抛弃联共政策而与汪冲突的说法，并非事实。汪走后，苏联顾问与蒋共事依旧，而“对汪去毫无所言”，可见“共产党并无所谓助汪”。③

第二，汪精卫在广东主持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时，虽然国共合作，但大权仍在国民党手中。及汪走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无人领导，蒋介石要了独裁之名，党务政治全握在手，而实不能兼顾”。④ 特别是北伐开始之后，蒋专注于军事，党务、政治便落入苏联顾问与中共之手。共产党的势力随北伐而迅速扩展，到1927年3月武汉召开的第二届三中全会上达到顶峰。此时，中共认为自身实力已发展到可以抛弃国民党，但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打出了“迎汪倒蒋”的口号。

第三，自汪精卫出走后，他所领导的“纯粹国民党左派”受到来自右派与中共两方面的夹击。于是，1927年4月汪精卫回国的使命，便是领导此“纯粹国民党左派”在夹攻中奋斗。他们一面要求“分共”，一面反对土豪劣绅等社会腐恶势力，反对蒋介石的破坏党纪、军事独裁和暴力“清党”，要求恢复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精神，探索一条独立的建党、建国与非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⑤

---

①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72页。
②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72—73页。
③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75页。
④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76页。
⑤ 《汪精卫“自传”草稿》，第77页。

二　改组派的理论

改组派最重要的理论阵地是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主要撰稿人有陈公博、马濬、刘侃元、施存统、萧淑宇、许德珩等。该刊于1928年5月7日创刊，同年9月3日停刊，一共只出版了18期，却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香港《南华早报》曾发表文章，称陈公博为“暴风雨中的海燕”（Stormy Petrel）。文章说：“《革命评论》在三个月中，发行量超过60000份，这意味着它在中国至少有30万的读者。学生、工人、失去领导的前共产党员、国民党的工作者、不堪忍受混乱局面的政府官吏——所有这些阶层都转向陈公博先生，以他为领袖。”文章认为，“如果汪精卫和陈公博可以在全国每个城市发表演说，他们将能依靠纯粹的演讲控制国民党，这就是南京方面最为恐惧的”。①

在1928—1929年，全国自称国民党左派或改组派的杂志有七十种以上。② 1930年，江苏评论社编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国民党左派ABC》的小册子，名称仿照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内容包括这一时期国民党左派对国内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军事外交、民众运动等各种问题的立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观点，对党务的反思，以及左派的历史观等，分析了知识分子“向左转”的必然性。改组派的重要负责人之一王乐平在该书序言中说，以往人们一提到左派，“就会无条件的和共产党连贯在一起”，因此编纂这个小册子的目标，一是要表明国民党左派的理论、政策与共产党的不同之处，二是要指出左派理论政策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重要意义。③ 在这些言论中，关于以党治国的讨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这些紧贴历史状况的思考虽然还算不上系统、成熟，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助于了解当时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政治思考。

---

① George E. Sokolsky, “Kuomintang Differences: The Popular Animus Against the Nanking Governm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1, 1928.

②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的《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1983）中有一份《改组派出版的报刊一览表》，记录了71种改组派刊物。

③ 江苏评论社编印《中国国民党左派ABC》，1930，第2页。

（一）小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的理论是以国民党左派来代表和领导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但国民党左派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充满疑虑。例如在1927年5月的国民党中政会第22次会议上，审议陈公博拟定的解决店员与店东间、工人与厂主间各种冲突之训令及六条办法，汪精卫率先对“小资产阶级”概念的使用提出异议：

> 汪精卫：“小资产阶级”有没有适当的名词，可以换一个。
>
> 詹大悲：中产阶级。
>
> 汪精卫：有人还是不懂，有人又不屑于自认是中产阶级。
>
> 孙科：小资产阶级这个名词也很通行了。
>
> 于树德：小资产阶级应当要如何解释？
>
> 汪精卫：《建国方略》中曾说过除了大规模的工业由国家经营之外，其他由私人经营而成绩较佳者，仍由私人经营，这一条可引来解释小资产阶级的意义。
>
> 张肇元：陈部长说“小资产阶级”这个名词有三不妥：（1）是由外国名词翻译过来的；（2）工厂、银行等不是小资产阶级所能举办的事；（3）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没有一定的区别，不如还是用“商”字来代替的好。“商”是职业上的区别，并不含资产阶级的意味。
>
> 汪精卫：工厂算不算是商呢？
>
> 张肇元：当然是的。
>
> 于树德：小地主呢？
>
> 汪精卫：还有房主呢？
>
> 张肇元：陈部长的意思，要将小资产阶级解释一下。
>
> 董用威：就请汪先生作一篇文章解释。
>
> 孙科：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就是以同帝国主义者有无关系为标准。

于树德：那就是所谓“华裔”。

汪精卫：所谓小资产阶级，系指不隶属于帝国主义之工商业者，及乡村间之小地主而言。

主席（徐谦——引者）：就是不为帝国主义者当工具的。

王法勤：小地主这一个名词，也要加以解释。

孙科：不用“小地主”，用“自由职业者”也可以。

汪精卫：不必说明大地主或小地主，用“依法享有”四字来代替。……所谓小资产阶级，系指买办阶级以外之依法享有土地及自由职业者。

陈公博：“买办”两字就够了，不必再用“阶级”。

陈友仁：当此经济严重的时期，说话须要谨慎，不然会发生不好的影响。我们要解释小资产阶级的意义，只消说小资产阶级就是指的商人、工厂主、银行家等，不必说明买办不在小资产阶级之内，免得人心惶惶，商业不能恢复，……现在对买办施以攻击，于外交上也是有妨害的。

于树德：不用总名，将小资产阶级一一列举出来如何？

汪精卫：就用农民、工人、工商业者好不好？

陈公博：地主又算那一种？

汪精卫：自耕的地主当然就是农民，不自耕的地主非工即商。

孙科：不受外人支配的工商业者。

陈公博：本来小资产阶级这个字的原意（Bourgeois）工商业者都包括在内。

汪精卫：决意用“工商业者”四字。[①]

会议讨论显示，国民党左派对“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分标准，是看他们同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是否参与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孙科提出“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汪精卫也认为，所谓小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77—1179页。

资产阶级，指不隶属于帝国主义的工商业者和乡村小地主。

国共分裂之后，革命潮流低落，在社会中，阶级观念反而高涨起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蓬勃兴起，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蔚然成风。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说："革命运动使得阶级冲突在中国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命运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①

无论是革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受到1926—1927年大革命的激发，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希望能在明确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找到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他们认为："现在已不是单纯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式的农民暴动可以夺取统治权的时代，同时现在也不是焚书坑儒、独夫专暴式的统治可以镇压革命的时代。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的新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②

许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并非要论证共产革命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许多大力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反对共产革命的。他们是要用自以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去反驳、批判共产主义，去发现一条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道路。一批在政治上追随汪精卫的自称国民党左派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到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论战之中。

国民党左派的中国社会性质分析，以陶希圣的理论为主要代表。陶希圣（1899—1988）在国民革命期间，曾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武汉政府垮台后，受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萧淑宇、刘侃元的邀请，由汉口至南昌主办党务学

①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18页。

②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版卷头言，《读书》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2，第1—2页。

校。1928 年又受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邀，出任该校政治教官，并与周合编《新生命》月刊，在此期间，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史与社会性质的研究。1928 年 12 月加入改组派。

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①] 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超阶级”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它不直接代表任何一个生产阶级，而是处于各生产阶级之上，受他们的“供奉”，具有“超阶级”的压迫性和剥削性。自战国末年起，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就很活跃，但一直游离于生产之外，并与土地资本交相为用，依靠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获得收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近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入侵，使中国上层社会在兼具地主与资本家身份的残余士大夫阶层之外，又产生了依附帝国主义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各大都市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见端倪。又因资本主义工业不发达，新式知识阶级无法被现有社会结构吸纳，失业问题严峻。在全国乡村中，耕地大半属于地主，农民缺乏土地的问题严重，乡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游民充塞。

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贫弱，一方面，他们的财产部分投资到土地上，与地主阶级密切融合；另一方面，他们屈服于外国资本而内部分裂。对无产阶级的反抗，他们会祈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保护。在外国资本的压抑之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不过是少数资产阶级得食其利，“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小市民——都陷于痛苦的深渊”。[②] 因此，中国革命不能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即在都市建立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农村建立大土地经营。中国一定要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此，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工和小市民阶层才能求得解放。

陶希圣也将是否依附于帝国主义作为区分大、小资产阶级的标准。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这种寄生关系，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的基础，必须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风雨飘摇中的农民、手工业者，濒于崩溃的士大夫

---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 150 页。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 144 页。

阶层，新式知识分子，破落的游民无产者，都是革命的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则应是代表农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统一的革命的国民党。

大革命后的国民党左派，接过了中共关于国民党左派是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说法。在大革命失败后退出共产党、发愿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左派的施存统说："也许有人（我想是一定的）要骂我替自己底阶级说话，不过我可以很坦白地回答。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决不敢冒称'无产阶级'的美名。"① 在自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他们阐发了一套以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依靠和扩大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阐发，是国民党左派试图打造自身理论和政治立场的尝试，也反映了大革命后知识分子对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中国式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

1927年武汉"分共"时，陈公博写了一篇长文，分析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题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1928年印成单行本发行，轰动一时。陈曾自我夸耀说，凡"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册"。② 在文中陈公博提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解决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概括为三个：第一，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命运；第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能力；第三，小资产阶级在建设国家资本中的力量。这三个问题解答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有答案了。③

陈公博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十分广泛，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农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甚至"除了无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以操纵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的私人或公司，都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陈公博认为，从现在到很远的将来，小资产阶级都不会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被大资本消灭而变为无产阶级。不但不会被消灭，而且还要依靠它，"开民生主义实现的道路"。小资产阶级人群的扩充，可以稳固新的社会结构，增加生产，累积社会资本，避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因此，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很强的能力，"实在居一

---

① 施存统：《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306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第122页。

③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48—249页。

个重要位置”。①

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反映出国民党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否定社会主义，而在于是否准备运用政治力量，去维护和扩展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避免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一文中，陈公博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国民革命”，“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在国民革命中完成社会革命，以党的力量——以党治国——消灭资本主义，而建设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②

陈公博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和正当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大资本不断吸收小资本，一方面财富日益集中到小部分人手中，另一方面不断有人被抛入赤贫状态，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引发阶级斗争。陈公博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有阶级分化，但阶级对立形势不严重，有可能向共产党需要的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和平的“救平”阶级方向发展。中国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缺乏有效组织，阶级斗争理论的传播，不过造成“多数阶级混斗”，社会撕裂，人与人相互仇视，既不能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亦不能实现民权主义、保护人民权利，且容易将小资产阶级逼出革命阵线，减少社会资本，降低社会生产力。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纵使没有阶级，也要创造阶级”。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则是创造一个庞大数量的“中等阶级”，防止人民因为资本集中和贫富分化而沦为无产阶级。国民党应整合社会，团结民众，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对内避免阶级斗争的悲剧发生。③

陈公博从筹集国民经济建设资本的角度评价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其目标在于建立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陈公博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大量的资本。当时中国民穷财尽，内资集不起，用外资又恐受制于人。只有用两个办法：第一，将一切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收归国有，建设国家资本；第二，尽量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本，无关经济命脉的产业，如电话、电灯、电车、自

①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48—251页。
②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陈公博先生文集》，第184页。
③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67页。

来水等，都可让私人经营。

在农业方面，陈公博的设想是，第一，建立合作化的生产组织，以村为单位，以农民协会为中心，凡属会员当拿他们的土地、工具、劳力，作为耕作的资本，成立生产合作社；第二，每省设立一种国营公司，利用新型机器与科学技术，凡人民有土地而无暇耕种或缺乏资本而无以购置机械，即可委托此公司经营。同时，国家筹办大规模国有电气和水利事业，以促进生产。[①] 这个建设国家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的过程，可以调和阶级矛盾。国家资本的扩充，可吸收大量工人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工人。在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中，厂主需要负责工人的健康和教育，工人则应对厂主让步，不可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因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阶级矛盾，必须调和阶级关系，建设国民经济体系，以抵抗外国资本的侵略。

1932年汪蒋合作后，陈公博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有学者在研究陈1932—1935年的“实业计划”后，将其经济政策特点概括为统制经济、自足政策和国家社团组织。所谓“社团组织”，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工业或经济团体（工人、商人或者农民）只存在一个代表组织，这些全国性的组织被政府所认可和授权，他们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关系。政府委托这些社团组织执行和推动国家政策的实施。国家政权以最高仲裁人或各个社团调停人的角色，尽可能组织和协调各个社团之间的关系。这种社团模式是克服阶级斗争和团结所有经济团体追求统一国家目标的方式。为了实现他的建立一体化国家经济和促进阶级合作的目标，陈公博设计了六个社团性质的统制委员会，来扮演监管政府和动员生产商的角色，它们分别是农业统制委员会、工业统制委员会、商业统制委员会、运输统制委员会、银行统制委员会和劳工统制委员会。每个统制委员会都被设计为全国范围内某个特殊部门的唯一协会，希望借此把包括农民、工人、实业家、银行家、商人、专家等所有团体结合在一起。[②] 这种设计暗含阶级合作和大众动员的观点，与陈公博在国共分裂后提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及建设国家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有

---

① 参见陈公博《目前怎样建设国家资本》，《革命评论》1928年第7、8、10、12期连载。

② 鲁玛莉：《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65—166页。

相通之处。

（二）“党治”与“民治”

“以党治国”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一个重要的政治理想。在这一理想中，国民党被赋予在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解体之后重组国家社会关系、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动员民众、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任务。汪精卫认为，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完全抛弃了孙中山的改组精神。他说：“凡党员中之稍欲保存改组之精神、注重于组织与纪律者，皆被吴、张、蔡、李辈目为共产党、准共产党、共产党工具，假手李白李黄辈以捕杀之，惟恐不尽。其结果将使一般武人皆努力于跋扈，一般文人皆努力于无耻，以求免共产嫌疑。于是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①

蒋介石也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深感焦虑。1928年6月16日，蒋介石与邵力子谈论军务政治，认为“惟党为最无办法”，说“目前以党训政，党本身无办法，如何能训政，诚令人焦虑之至也。……吾将先改正军队缓驰之恶习，以为党员表率也”。② 然而军队恶习又当如何改造？蒋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吴子有言：‘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是耻之一字，实足为我国家复兴之机枢。然必自余之行己有耻，立其基础。乃决定雪耻之条，曰不随人，曰不灰心。”③ 6月28日，蒋为整理海军之事极度忧虑郁闷，诵读《中庸》后，心气“徐徐宁静”，在日记中写道：“余必以《大学》《中庸》造成风气，中国其庶有救乎。”④

这仍是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强调从个人心性修养出发，表率群伦，辅以军事化社会组织，兴教育、讲卫生、强身体、学技艺、戒私斗、尚亲爱，团结一致，奉公去私，改变社会风俗。蒋认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根本途径，在于激浊扬清、移风易俗，使全国

---

① 《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先生文集》第二编，上海中山书店，1936，第122—123页。

②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卷，台北：“国史馆”，2003，第525—526页。

③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卷，第528页。

④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卷，第557—558页。

民众皆能知耻奋发。而改良风俗，尤须以军队为表率，首先要培养和激发军人的廉耻、节约之心和奉公忘私、为国为民之志。①

1929年4月，蒋介石发表《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惟一之要素》一文，提出解决当时国民党、政府、社会组织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军队化”。军队化意味着精神振作、纪律严明、思虑周详、任务明确、功过分明。蒋认为，当日行政机关最大困难在于，不用旧官吏，则新青年不熟悉办事程序，影响行政效率；而一任用旧官吏，官场腐败习气就随之而来，很快传染所有新进人员。若能使行政机关军队化，以军队的严密组织组成行政机关，以军队的严肃纪律约束行政机关，必能使“腐败之穴窟，不能存在，即用旧式人员，亦不至于有输入旧习之患矣”。蒋还认为，“今日社会风俗之薄甚矣，人人思不劳而获，于是投机求悻，欺骗攘夺之风日盛一日，遇事生风、于中取利者，不一其道，富者日纵于奢淫，而无暇及于正事，贫者日陷于无赖，又不安于正业，……故今日而欲改革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不可不先使社会军队化，以军队之精神纪律、计划任务，输入民众之中，使社会之上不敢以强凌弱、以巧陷愚、以奸诈欺诚实”。军队化意味着使保甲、团练等军事组织深入社会，寓兵于农，寓兵于工，既组织社会，又维持秩序，复以军事作风为表率，带动社会风气的改变。必待人心风俗改变，“而三民主义，自亦深入人心矣”。②

改组派则认为，恢复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号召力，才是稳固政权及改造中国政治、社会的根本途径。当前一切任务，仍在于打造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革命的、群众的国民党，以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国民党，这是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作者群着重论述的问题。陈公博在《贡献》旬刊上发表的《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在《革命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党的改组方法和时期》《目前怎样建设国家资本》等文章，从党的阶级成分、组织与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几方面重新阐释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在《革命评论》中，讨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批判国民党现状和呼吁改组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卷，第405、420—423页。

② 蒋中正：《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惟一之要素》，《党声》1929年第5期，第10—11页。

国民党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

改组派认为，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的危机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党支离破碎，中央分裂，下层组织更无纪律与活动可言，上下级党部隔离不通，党与党员隔离不通。第二，党缺乏人才，既缺少党员的训练和培养，又没有招收人才的合理机制，全靠关系推荐，酿成奔竞依附之风，只见有人，不见有党，党成了派系集团。第三，党政关系不协调，党和政府之间政策不统一，党部常常站在民众立场上，向政府唱过高的调子，政府觉得党部是同议会一样讨厌的东西。第四，民主集权制的精神丧失，只见集权，不见民主，官僚主义横行，听不见群众的声音。党部职员只有委派，没有选举，普通党员的发言权、表决权、请愿权都被剥夺了。第五，党依附于军队，丧失了民众基础。①

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之一，是吸收有理想、有血气的青年加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激进青年都被驱逐出国民党。如何重振国民党的精神，改组派提出了党的“青年化”和“民主化”主张。所谓青年化，是要将那些真正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吸收到国民党政权中来，解决国民党革命精神衰退和政治人才不足的问题。所谓民主化，就是恢复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他们认为，青年化与民主化是恢复国民党革命性的必要条件。

施存统在《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一文中说，国民党“之所以弄到这样的糟，根本是因为党内没有的民主精神，因之党员对于党便没有责任心”，党员的眼睛只看上面的领袖，不看下面的群众，只有机械的服从，不许有自己的意见，党员没有责任感，才造成今日这种垂死的状态。②

在《党底民主化与群众化》一文中，施存统更激烈地指出，将民主集权制的精神丢失得干干净净，这是国民党腐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到处所能听见的只是‘服从中央’，……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要‘服从党员’，……党成了一种‘拜物教’，仿佛党员只有机械服从的义务”。“登记登记又登记，整理整理又整理”，而党的腐化依然如旧，就因为党员对

---

① 吴保鼎：《改组国民党与国民革命之前途》，《革命评论》1928年第18期，第41—45页；一彪：《党的整理和对日外交》，《革命评论》1928年第6期，第44页；董蒙圣：《封建的现势与本党的前途》，《革命评论》1928年第9期，第46—48页。

② 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1928年第3期，第17页。

党中一切都不能过问，“只能莫名其妙地跟着‘摇旗呐喊’，不愿意‘摇旗呐喊’的，便无形地脱党”。他说，要想肃清腐化的现象，只有依靠下层革命党员的力量。一切国民党的机关都要恢复选举制，机关必须尊重党员的意见，上级党部必须尊重下级党部的意见。必须做到一切党委都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来，使党员能够监督党部的行动，下级党部能够监督上级党部的行动，任何党部都必须服从党员的公议。①

在《理想中的以党治国》一文中，施存统阐述了他理想中的“党治”：党是民众的代表，党权的基础在民权，党治的目的在民治。建立在民权、民治基础上的以党治国，才是真正的以党治国。为达到这一理想，在制度上，政府应由民间选举产生，一村有村民会议，产生村政府；一县有县民会议，产生县政府；全国有国民会议，产生国民政府。直接指导监督各级政府的，是各级人民会议，政府受人民会议的监督，而非受党的监督。国民党在各级政府和人民会议中组织党团，以党团的形式对政府和人民实施间接指导。党的命令直接下达给党团，由党团去运作，以实现党的主张。施存统认为，这套方案在形式上是以民治国，在实质上是以党治国，它将党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选的代议制政府结合起来，既能体现人民的意愿，又能使党深入群众，使党的政策合于群众的需要，以此实现党对群众的领导与动员。②

关于如何打造一个强固的国民党，施存统提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严密党的纪律、建立党内民主、重视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加强党员的组织训练等几个问题。在组织方面，党的各级机关应有密切的联络，“党应该成为整个的有机的组织。中央党部与省党部，省党部与县党<县>部，县党部与区党部，区党部与区分部，都应该像一部机器一样，活泼敏捷的转动。中央下一个命令，全个党便会有系统的活动起来，由一个中心机关将所有的力量分布出去，深入于一般群众中”。③ 关于党员的组织训练，他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要使每个党员都能服从党的纪律，能为党的主张而奋斗，……铲除虚荣心、自大性与自私自利的念头，消

① 存统：《党能民主化与群众化》，《革命评论》1928年第12期，第16页。
② 存统：《理想中的以党治国》，《革命评论》1928年第16期，第7—10页。
③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第77页。

灭个人的浪漫行动与私人的感情结合。”①

国民党左派也意识到“组织”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讨论过怎样清除“形形色色个人主义”，建立“集团主义”的方法，还提出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与民众同甘共苦、接受民众的监督教育等主张。要求党员时常做深彻的反省，以革命的主义“毫不顾惜”地批判自己的思想行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万事都要从自己做起，能够自己批判，才能谈到其他”。同志之间坦诚地相互批评；虚怀若谷，接受同志的批评；深入下层，“与大众结合，而受大众的批判”。② 党员之间“看见同志的错误，不客气地批评，自己对于党有什么意见，积极地尽情地发表，明知危险而不避，受人攻击而不馁”。③

国民党左派的党治理论带有一些列宁主义的色彩。它强调党组织的严密性和党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在对党员人格品质和纪律性的要求方面，也具备列宁主义政党的理想。《革命评论》的作者群，是国民党内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团体。它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家陈公博、施存统，都是早期中共党员。《革命评论》的年轻作者都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论来分析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这是他们和国民党右派不同，甚至和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更年长的一些国民党左派的党治理论不同的地方。

施存统认为，“党是一种为实现阶级利益的组织”，“党是用政治的手段（即取得并运用政权）来达到实现阶级利益的目的”，“党是阶级的最觉悟分子之政治的组织”。④ 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将国民党定义为一个“全民党”，这是迷信或利用“全民”的名义，忘记了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利益。无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阶级不平等，实际上拥护了少数上层阶级的特权与利益。他们提出，国民党应该是被压迫人民的党，以“被压迫民众”为基础，代表他们的利益，解除他们的痛苦。陈公博曾经提出，若是国民党决心走民生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员的阶级百分比应

---

① 施存统：《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1926，第37页。
② 万民一：《论个人主义》，《南华评论》第4卷第1期，1933年，第36—37页。
③ 施存统：《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第31页。
④ 施存统：《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第2—3页。

为农民占百分之五十，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小资产阶级占百分之二十。①

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胡汉民强调党的精英性质和对人民的抚育、训导。他说："党同人民的关系，正像商朝伊尹和太甲的关系，党是伊尹，国民便是太甲，因为太甲不能处理国事，所以由伊尹去代理。"② 所谓以党治国，换言之就是以教为政，由先知先觉的党员来以身作则，致力于启迪和训导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民众。③ 民众理解并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自觉接受了国民党的领导。

改组派的党治理论则翻转了这种关系，它要求国民党成为一个"代表人民"的党，而非"训导人民"的党。它要求国民党党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组织，了解群众的生活与要求，将群众的实际情形报告于党，使党的指导合于群众生活的实际，这样群众才能接受国民党的指导。它还要求国民党党员在实际工作和群众运动中，训练自己的组织和工作能力，在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学习革命方法，从群众中吸收革命分子。改组派认为，只有党能够深入民众、动员民众，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对内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实现地方自治，促进廉洁政治。只有这样的党治，才能使广大民众不再追随共产党，而是回归到国民党的领导下来。

改组派在与南京政府的政治斗争和与共产党的理论交锋中，重新阐发国民党的党治理论。这些理论阐发，反映了国民党的一种自我反思。但是，他们的理论与行动是脱节的，缺乏参与实际斗争的能力。《革命评论》对南京政府的批判是犀利的，但它只是一种"评论"而已。《革命评论》上刊登过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我很希望先生只要继续《革命评论》的精神，评论下去，比之做实际政治好的多了。"陈公博回复说："我敢断然的答覆先生，我就这样评论下去，两年以内决不参加任何实际的政治工作。"④

跟陈公博一起办《革命评论》的许德珩、施存统、刘侃元等人，也都是些不愿从事实际政治的知识分子。陈公博说："他们还有一种古怪的脾气，每天都要找我长谈，很像革命之成功在于'谈'，如果我没有工

---

①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1928年第10期，第3页。
② 《党治的政府》，《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卷，第400页。
③ 《自责即自救，自救即救国》，《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卷，第569—570页。
④ 《答疑的之陈公博与实际政治（附来函）》，《陈公博先生文集》，第431，435页。

夫和他谈，或谈得很短，他们便怫然杜门不出，非行那三顾草庐，不肯轻出隆中的样子。”陈还说，使他始终不明白的是，许德珩、施存统两人都不肯做共产党，“同时死也不敢反对共产党”。某次陈公博召集大陆大学学生训话，批评共产党，“施先生死也不肯上台演讲”，及至陈大骂共产党时，施则“变色先跑了”。[①] 这些细节，说明《革命评论》同人只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并且内部也有思想分歧。

评论政治、针砭时弊，虽然能得到热血青年的拥护，却不足以形成扎实的政治力量。改组派希望通过吸收进步青年，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国民党的腐化问题，但事实常常是青年的加入没有为党输入新鲜血液，而青年自己也迅速“融化”在腐化风气当中。而无论是选举手段还是深入群众，都不能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改组派的党治理论，设想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民党在基层发动民众、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改良运动的政治图景。这一民众动员路线的基本条件是拥有一大批服从组织与纪律，又能深入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国民党党员。能够充当这一角色的，只有那些有理想有热血的革命青年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因此，改组派对于大革命后的知识青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对于青年学生如何深入群众、如何组织社会团体、青年本身的主体状态等问题，却缺乏思考和论述。

事实上，正是那些不愿走农工道路、不喜欢严密组织纪律的许多自我认同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最容易响应改组派的号召。《革命评论》在理论上认为国民党员应具备组织与纪律观念，但这只是一种“评论”。至于在实际斗争中，怎样将青年的革命热情与组织性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改造，这些问题都停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本人也适应不了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生活。《革命评论》确实激发了青年高谈党事和大骂当局的热情，却无力将这种热情转变成组织形态，使它变成国民党基层建设或“左派”反对运动可以依靠的现实力量。结果，《革命评论》只出了十八期，就惹怒了蒋介石，被迫停刊。售卖《革命评论》的书摊被捣毁，报贩和书贩被殴伤，被扣留的《革命评论》被抬到市党部给厨子用来烧火煮饭，陈公

① 陈公博：《苦笑录》，第130—131页。

博接受宋子文赠送的旅费出国游历，声噪一时的《革命评论》就这样偃旗息鼓了。[①]

三 民权和民生实践

改组派成立后，领导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9年3月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的斗争。改组派指控国民党三全大会366名代表中，选举产生的仅87人，占十分之二；圈定指派的有279人，占十分之八。[②] 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何香凝等13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不承认三全大会。各省市亲近改组派的党部纷纷通电响应，一时反对三全大会的呼声高涨。陈公博解释反对三全大会的理由说：

> 我以为要把中国弄得好，先须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的党，国民党的忧乐须变为全国国民的忧乐，国民党的休戚，也须使它变为全国民的休戚。我们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须使有志和有识之士都加入了国民党，共同奋斗。如果代表是指派的，则南京所欢喜的人才有被派的资格，南京所不喜欢的人，当然会被排斥。这所谓凭一己之好恶以用人，而人亦只有阿其所好，……有志和有识之士怎肯参加，所以这次大会光是指派代表，实是软性和慢性亡党一个方法……
>
> 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指派，那各地党部当然更是指派了。各地党部的作用，是跑入民众的核心，指导人民，辅翼政府，如果党部是选举的，则负党的责任的，第一要顾到民众的利益，否则地方的感情和人望失坠，他必不能当选。第二要顾到党员的意见，必定他自己比其他党员努力，比其他党员活动，才有当选的希望。倘若指派，则负党部责任的只顾到中央个人的好恶，不复顾虑到党员，至于人民利益，更非他们所屑措意了。由此类推，中央委员只顾揣摩蒋先

① 陈公博：《苦笑录》，第128页。

②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00页。

生的好恶，不必需要对党对国的忠诚，而地方党部又只顾揣摩和逢迎蒋先生和他亲信的意旨，不必浪费时间来体察人民的利益！这所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整个党的前途，还决意反对这个非法的三全大会。①

反对三全大会的结果，只是在大会上，以“汪兆铭等九委员，迹近纵祖弄兵，酿成广州共变”为由，“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馀党籍三年，汪精卫由大会给予书面警告处分。以汪为首的“粤方委员”被排除出国民党领导集团。② 反对三全大会运动之后，改组派又策动桂系和张发奎、唐生智、何键、石友三、冯玉祥等人，组织“护党救国军”，发动反蒋战争，但“救国军”内部矛盾重重，很快就被各个击破。1930 年 2 月 18 日，改组派领导人之一的王乐平又遭到暗杀，改组派受到重大打击。

这一连串失败，让陈公博深感痛苦，“失眠了十几夜”。他说，最令他痛心的并非军事失败，而是他看到改组派和南京国民党一样得不到民众拥护：“张桂军由动员以至进攻，我们绝不见民众起来，所有农、工和小资产阶级，都袖手旁观，绝不参加一些运动。他们并不是不帮助我们而去帮助了南京，他们对于南京和我们两方面都一样的冷淡。可见那时的国民党已脱离了民众们，至于党的违法与否都是党内的事，与他们绝不相干，这样对于国民党的本身，我们应该重新检讨一下，绝不能单靠几条空虚纲领就可以号召天下。”③

这些反省出自 1939 年陈公博在香港撰写的《苦笑录》。当时汪精卫已发表“艳电”，对日求和，正在上海筹组伪政府，力挽陈公博赴沪合作。陈不赞成汪的主张与行动，又不能摆脱旧式伦理道德与昔日情感，以母病危笃不能远行为由，滞留香港。蒋则派人力劝陈返渝或出国。④ 陈进退两难。终于在 1940 年“高陶事件”发生、汪精卫腹背受敌之际，

---

① 陈公博：《苦笑录》，第 135—136 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 684—685 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第 147 页。

④ 《蒋中正电（香港）宋子文》（1939 年 5 月 18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03-020。

抱着与汪同跳火坑的心情，参加了伪政权。[①] 陈在此时回忆1925—1936年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历史，一方面固有自我开脱之意，固云《苦笑录》亦可唤作“洗冤录”；[②] 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看出陈公博对国民党积弊的反省与对国民党前途的忧虑。他始终认为，能否得到民众拥护，是一个政党能否成功的根本条件。改组派是国民党内最重视唤起民众的势力，他们在国共分裂后，号召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也实在进行过一些扶助农工的工作，但未收到预期效果。脱离民众的国民党，如同根基已经朽烂的大树，禁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

（一）恢复民众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民众运动成为一股重要革命力量，帮助国共两党实现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目标。但是，被广泛发动起来的民众并不能始终统一在国民革命的目标下，不同阶层、行业之间的工人内部发生许多冲突。湖南农民运动更冲击到两湖中下级军官的利益，造成军队与农民的矛盾。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在1928年的二届四中全会上决议，在没有确定的整理办法之前，一切民众运动暂行停止。[③] 改组派则要求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要求青年到下层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改组派认为，民众运动并非如国民党右派所说——是“共产党的方法”，它还是国民党的“改组精神之所寄托”。无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还是孙中山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演讲，抑或孙中山的遗著，都显示了这一点。帝国主义最害怕的就是中国民众力量的高涨、民族意识的觉醒。国民党右派以反共为名，禁止民众运动，无异于“站在国际的反共战线上与帝国主义携手”，是公然对帝国主义的“悔过”和“敬礼”。[④]

---

① 陈公博在1940年2月7日致汪精卫的电中说：“弟坦白告公，弟对条件确不满意。彼方控制中国之心，至今未衰。然公既决然牺牲，弟尚有何足惜。弟必来，请公放心。”《陈公博电汪兆铭》（1940年2月7日），汪兆铭史料，118-010100-0052-023。

② 陈公博：《苦笑录》，第2页。

③ 《二届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7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12—513页。

④ 余数：《反共与民众运动》，《前进》第1卷第4期，1928年，第1—3页。

在国民党当局下令停止民众运动后，从前在工农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土豪劣绅，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农民报复。各地成立的“善后委员会”，成分是清一色的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杀迫害不绝于书。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就等于扶植反动，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将丧失工农群众的拥护。[①] 国民党的政权基础应建立在广大工农群众之上，因他们的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的愿望最强烈。中国革命的发展应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国民党应成为他们的代表。[②] 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空虚，上层组织破碎，要将支离破碎的国民党打造成一个健全的党，也必须依靠群众的支持。改组派理论家施存统说：“现在还不是领袖领导群众的时代，还只是群众推动领袖的时代。”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党，唯一希望“就是广大的下层革命群众”，他们是革命“最大的动力，而且是根本的动力”。[③]

改组派拥护国民党的地方自治纲领，认为欲实现民权主义，打倒封建势力，建设廉洁政治，实现人民的自主管理，都非依靠县自治不可。而若无民众运动，“民众不能组织起来，表现自己的意见、要求及力量，那么纵令中央颁有自治条例”，也是一纸具文。中国基层政治的问题就是民众没有力量，基层权力都被土豪劣绅、封建族长把持。要把这个局面翻过来，一是革命政府要有力量，二是民众要有实际力量。只有将民众组织起来，并以民众力量为党的后盾，才能将党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改革地方政治的流弊。[④]

最后，改组派要求恢复民众运动，也是出于与中共竞争的需要。他们看到，在全国许多地区，国民革命过程中建立起的农工组织依然存在，工农群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自发斗争，也在各地此起彼伏。如国民党不设法领导这些工农，他们就将成为中共和其他反对国民党势力的群众基础。只有把这些工农组织都收归国民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是与中共竞争的“根本的唯一方法”。[⑤]

---

① 建平：《停止民众运动》，《革命评论》1928年第15期，第40—44页。
② 施存统：《如何保障三民主义》，《革命评论》1928年第11期，第4—5页。
③ 施存统：《怎样造成健全的党》，《民众先锋》1929年第4期，第23页。
④ 周谷城：《发展县自治与恢复民众运动》，《革命评论》1928年第6期，第15—20页。
⑤ 毅若：《我们现在要怎样努力》，《革命评论》1928年第7期，第49—53页。

改组派成立后，即开始与各地工会、农会、学联及其他民众团体建立联系。1929年2月印制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提出了“分共”后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原则和组织方案，包括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运动决议案。对于农村和土地问题，进行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提出耕地政策决议案。对于工人运动，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保护工人措施，包括：健全工会的组织；制定劳工法、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置法；制定劳工保护法、劳工保险法；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取消包工制；设定最低工资额；在不妨害国民革命的范围中，工人有罢工自由权；赞助工人生产消费合作事业；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及俱乐部，增进工人技能及精神修养；改良工厂设备，提高工人待遇；保证有薪休假日；援助华工在居留地的政治经济斗争；等等。①

陈公博认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青年运动的一大错误，就是“完全狭义的学生运动”。学生既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又不能深入群众，“在社会中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行动纯粹靠一时的热情，热情既过，各人便各自寻出路”。② 因此，改组派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到农村去，到工厂里去，到下级党部去”的号召。陈公博说：“我以为青年只有一条出路，即是‘往下去而不是往上跑’，……必得到下层民众（中）去才是革命工作。”③

改组派很重视城市工人运动，其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上海、南京和北方各省的黄色工会中势力很大。改组派在上海工人中的主要基础是纱厂和码头工人，在南京是邮务工人。组织多以传统帮会、地域关系为纽带，纱厂工人分“安徽帮”和“奉地帮”，以吴淞永安纱厂为主力。码头工人则苏北人较多。1928—1929年，中共处于“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下，在城市中损失严重，社会基础比较薄弱，这为改组派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山东、河南、河北及平津等国民党统治比较薄

①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出版信息不详。1929年6月13日，国民政府发布第1940号训令，要求内政部通令各级党部，对该书“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塞乱源”。参见《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57号训令，第15页。

②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陈公博先生文集》，第330—331页。

③ 《答黄仪翔之三个问答》（1928年5月26日），《陈公博先生文集》，第430页。

弱的地区，由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纵容，改组派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

1929 年 6 月，蒋介石致电陈果夫："平津党部完全为改组派之党部，……务希即日改组，……如稍延缓，必误北方党务。"① 中共顺直省委 1930 年 4 月的会议记录也显示，改组派在北方各地"活动很厉害"，阎锡山为了在战争中打出"开明"旗帜而利用改组派。在唐山煤矿、天津纱厂、北平总工会、北宁路联合办事处、北平人力车夫中，都有改组派的势力。② 中共顺直省委认为，鉴于改组派在工人中的广泛影响和阎锡山在政治上对它的利用，反对改组派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是"目前主要的工作"。③

冯玉祥在河南也大力支持改组派发展，并推行了一些改良主义措施，如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建立消费合作社、办理工人澡堂、修建工人宿舍等，并重建了河南省、市总工会和基层工会。当时河南省总工会、开封市总工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改组派。④ 1929 年中共关于豫北地区的一份报告中说，豫北几个重要地方的党部和工会，完全为改组派把持，并起着领导作用。他们"虽还未获得群众的信仰与拥护，但他在群众中的欺骗，多少已发生影响了"。改组派宣称："党部和工会绝不为老蒋改组，必须打入工人群众。"该文件还说，豫北改组派最有力量的地方是磁县。该县改组派领袖都是叛变的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就领导该县民众运动，当地豪绅都退让几分。他们凭借国共合作时期的民众组织和民运基础，很快发展起势力，领导着磁县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磁县以西的西佐工会——峰峰煤矿工会，太子斋煤矿工会，彭城的矿业工会、车夫工会，以及磁县麻油工会，先后组织起来，参加工会的群众，不下五千人。"1929 年"五一"纪念日，

① 《蒋中正电陈果夫》（1929 年 6 月 26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200-00006-069。

② 《顺直省委会议记录——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和"五一"工作的布置》（1930 年 4 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五册，1992，第 253—257 页。

③ 《顺直省委会议记录——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和"五一"工作的布置》（1930 年 4 月），《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五册，第 262 页。

④ 开封市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开封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 112—113 页。

改组派号召四五千名工人到磁县示威。①

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在1929年3月的《山东通讯》中说，改组派充斥了山东各地党部，在胶济路及其他各地工人群众中都有改良主义的活动，并组织了四方总厂、鲁丰纱厂、津浦总厂几个黄色工会。工农群众“自发的大大小小的斗争，继续不断的在工厂、铁路、矿山及农村中发生”，而在这些地区，“共产党、共产青年团的领导力较弱”，群众的政治认识很模糊，尤其是铁路工人，“对于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而黄色工会的组织和活动，也部分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例如四方机厂的黄色工会会员，“时常开会研究机器与科学问题”。“鲁丰纱厂的黄色工会一开始，就为细纱摇纱上的童工争得了一块钱。”②

改组派推动工人运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夺取各地县市党部，以党部力量鼓动罢工或组织反日运动。1928年12月，天津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苗培成向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改组派“密谋接收平津党部，并鼓动工潮，已由军警严密防范”。③ 二是改组派成员直接加入工会或民众团体之中开展工作。改组派成员姜豪说，1928年7月至1929年4月，他在上海负责反日会调查工作，看到调查员中有几位“年轻正直、不受利诱、不畏强暴”的人，就吸收他们加入了改组派，而这几个人都和工会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后来他们就一起开展工会工作。④ 1928—1931年，许多改组派知识青年加入了工会，或在改组派党部办的工友夜校教课。改组派创办的大陆大学中，有学生跟上海码头工人有联系，曾试图发动码头工人罢工。大学部政治经济系的学生许汉文，认识杨树浦电力厂工人，曾在浦东的工人中活动。⑤ 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的

---

① 《豫北政治、经济、军事及党团组织状况的报告》（1929年），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市委、特委、县委文件（1927—1934）》，1986，第480—481页。

② 作霖：《山东目前经济政治与青年状况》（1929年3月1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5册（1929年1—6月），1957，第231—233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7次常务会议纪录》（1928年12月16日），“会议纪录”，会3.3/79.4。

④ 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37页。

⑤ 许汉文：《大陆大学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114页。

改组派青年杨玉清，则在工友夜校担任教师。[①]

与国共合作时期工人运动注重对工人的政治宣传和民族意识启蒙不同，改组派的工人运动，虽然在反蒋军事斗争时期也有一定政治宣传，如改组派上海工运指导机关——工运委员会曾不定期出版《革命工人》小报，刊登反蒋消息，于马路上张贴或在工人中发放，[②] 但总体而言，改组派领导的工人运动，不是以政治斗争而是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目标。他们不强调国民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改组派的工运指导思想更近于无政府主义。改组派上海工运委员会主任姜豪说，他的前任主任王亚樵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发展的工人组织不叫“工会”而叫“工团”。他手下工运骨干分子中有一个叫程德源的，是原中共沪东区工运负责人，与码头、纱厂工人关系较深。还有一个叫张铁君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开口就谈克鲁泡特金。改组派工运委员会成员的社会来源也比较复杂，有上海兵工厂的总务科长，有商务印书馆工会负责人，有广东帮工会负责人，有渡船工会书记，还有店员工会成员、国民党市区委委员、法政学院学生等。[③] 他们彼此间既无“阶级情感”，亦无统一的政治思想，也无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十分松散。

据改组派上海工运负责人姜豪回忆，改组派的工运策略，是从帮助工人提高工资待遇、争取各种权益入手，发动罢工，进而诉诸强迫仲裁或合法斗争方式。这种策略的效果具有一定偶然性。例如，在一次永安纱厂的罢工中，资方收买国民党市党部主管工会的执行委员和干事，要他们胁迫工人复工。而资方行贿证据被改组派领导的厂工会掌握，厂工会便起诉到法院，市党部受贿委员和干事都被撤职，资方最终被迫同意了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有时资方和政府官僚勾结紧密，罢工就会失败，工会负责人也会被资方开除。[④]

在改组派最活跃的两年中，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甚至对一些中

---

①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第38页。

② 姜豪：《“和快密使”回想录》，第38—39页。

③ 姜豪：《“和快密使”回想录》，第37页。

④ 姜豪：《“和快密使”回想录》，第38—39页。

共党员的思想也产生了干扰。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说，汪精卫、陈公博等“自命的国民党左翼”，要恢复国民党党部所属的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和其他各部，要恢复工会、学生联合会，还主张召开由这些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就这样，“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抬头了，某些同志在党组织里通过了这样的决定：要用‘恢复群众运动’的口号来代替‘争取自由的群众斗争’，要用‘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的口号来代替苏维埃。这实际就是尾巴主义”。① 1929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给崇明县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改组派在反蒋运动常常喊出较左的口号，以欺骗群众，利用群众”，一些支部工人同志对改组派还存在幻想，崇明县委应努力肃清群众中的这些幻想。② 1930年4月，中共顺直省委也指出，目前党的主要危机是“党内的黄色倾向与富农路线”，改组派的活动在中共党内得到反映。③

瞿秋白特别注意改组派的影响，他说：“黄色工会的运动、乡村自治的运动、青年军官的运动里，都可以看见改组派的影响。”以为“群众天生是在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除共产党外，“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反动派”，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这将引导共产党忽视反对改组派的斗争，“忽视争取群众的任务”，进而放任改组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群众中产生相当的影响。④

改组派的发展，利用了1928—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冲突所提供的空间。但这个时机是短暂的。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战败退出河南，在冯保护下的改组派土崩瓦解，所有支部委员和省民众团体的重要负责人都被通缉。省党部负责人邓飞黄、刘潇然、李武侨、张居平、王槐堂、曹焕章、韩秩五、张汉英等逃到了北平，没来得及逃走的青年，很多被捕。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改组派重新掌握河南省党部。冯、阎

---

① 《论中国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8—19页。

② 《江苏省委给崇明县委的指示信，省字第二十三号，崇字第四号——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指示》（1929年12月28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11—12月）》，1986，第371页。

③ 《顺直省委会议记录——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和“五一”工作的布置》（1930年4月），《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五册，第257页。

④ 《中国革命新高潮和国民党改组派》（1929年10月5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625，628页。

失败后，改组派又受到沉重打击，并急剧分化，有的投降了 CC 系，有的加入了军统，还有的投奔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亦有许多改组派成员进入南京政府。[①]

改组派在地方农民运动中的影响力，则主要来自国共合作时期民众运动的组织基础，以及各种地方自发革命势力对左翼政党的认同。例如国民党河南省密县县党部负责人樊百全，在国共合作时期是河南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国共分裂后加入了改组派。根据樊百全自述，他 1896 年出生在密县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厌恶大家庭中的虚伪习气与剥削行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革命风潮感染下，1920 年代初即开始在家乡创办平民教育，开展社会改良活动，如禁止烟毒，放足，建设电话、公路，组织训练农工青年，创办合作社等。国共合作期间，他与同乡进步青年张书印等人一起，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在密县发动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搞得轰轰烈烈，很有成绩。[②]

国共分裂后，樊百全仍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支持农民的减租抗税斗争。1927 年秋，他在郑州“豫陕甘农村组织训练处”受训，参加了国民党。1929 年当选国民党密县县委委员，为对抗陈立夫派，由农村训练处同学介绍，加入了改组派。1928 年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即改组派最活跃的几年中，樊百全领导着密县的激进农民运动，主要活动包括：“（1）派飞机捐，坚决主张派三至五大户出，其他户不出；（2）鼓动团队包围县府，拟将贪官缴解郑州；（3）率领学生和人民请愿驱逐县保安团队长丁中一，后利用各种关系把丁中一枪毙；（4）荒年发动饥民数千百人向富户借粮，富户武装暴动；（5）领导全县小摊贩向大商人反抗，争取捐税的合理摊派。”[③]

在白色恐怖时期，樊百全还保护了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隐蔽在密县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张之朴、谷效颜、李子贞、王如冰等许多人，跟他都有密切联系。他曾对地下党杨春芙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啥的，

---

① 冈锋：《冯玉祥与河南的国民党》，政协开封市委员会编《冯玉祥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 152 页。

② 田建勋：《一战时期的密县农民运动》，王旭彤主编，田建勋、苏建中等编辑《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 2 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第 7 页。

③ 《樊百全自传》，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政治卷》卷 2，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第 888—890 页。

如果有困难，我可尽力帮助。”他还主动向他们介绍密县国民党军政人员情况，让他们“心里有个数”。[①] 这使中共密县地下党组织在恐怖时期仍得到发展。

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而具有革命思想的地方精英，樊百全主动地、策略性地运用各种国家政治资源来改造地方社会，这显示出革命的动力并非完全来自上层的发动，也来自民间新兴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愿望与下层民众生存斗争的相互结合。因为樊百全一类地方精英的努力，加之国共合作时期的组织基础及冯玉祥的支持，河南农民运动中的改组派势力比其他任何派别的势力都要大。当时中共河南工委会的报告说：“新郑、密县、许昌等七县，有国民党改组派农会的组织，他们有群众四万余农民参加，……密县一县，就有四五千农民参加，他们也说是反豪绅反捐税的，……他们在群众中还有相当的信仰，并且这个组织，很少富农参加。其他像西华、陕〔郏〕县、禹县……等县，多有改组派的活动。”[②]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迅速与原有社会腐恶势力妥协，中共则走上工农武装割据与土地革命道路。而社会中还存在大量既不满于国民党腐化堕落又不认同中共激进主张的知识青年，广大城市乡村还遍布着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工农组织，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在各地此起彼伏。改组派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主张，帮助工人发动罢工、争取权益，帮助农民进行抗租抗税斗争，有些工作暂时起到了改善工农境遇的作用，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现存社会结构。他们在理论上声称坚持反帝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在实践上，或将工农运动作为反蒋斗争的手段，主要进行反蒋宣传，而非国民政治教育；或仅关注工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不关心工农阶级的政治认同。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种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人民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工农运动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

① 杨春英：《忆樊百全先生对共产党人的帮助》，《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第156—158页。

② 《河南工委会关于城乡群众斗争及党组织领导问题的报告》，《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第21页。

（二）左翼的工农政策

1930年冬天，改组派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各路军阀发动的反蒋中原大战失败。1931年元旦，汪精卫公开发表宣言，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复电赞成，改组派名义上解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内宁、粤、沪三方在民族危机面前达成合作，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陈公博、顾孟馀分任实业部、铁道部部长，甘乃光出任内政部副部长[①]，原改组派成员纷纷进入上述各部工作。改组派还掌握了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改组派的组织虽然解散，事实上的派系关系还在延续。一些与汪精卫、陈公博有渊源的人仍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左派”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仍有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但作为执政者，更多要面对现实问题，而非空谈理想。正如E.H.卡尔指出，右派常常苦于理论匮乏，缺少思想，左派最大的弱点则是难以将理论付诸实践。“任何地方的历史都表明，左派政党和政治家在执政后会越来越关注现实，于是也就越来越放弃他们‘教条式’的乌托邦主义，并向右派靠拢。但在同时，他们往往依旧保持着自己左派的标签。结果就使左派、右派这些政治术语的意义变得混乱不清了。”[②]

有学者认为，国民党高层政争，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这里或许有意识形态分歧，但更多的是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国民党由广东一隅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③] 这一时期的汪蒋分歧也更多是为权力而斗争，而非政治理念与政治路线斗争。也有学者比较强调汪蒋斗争中所包含的政治理念分歧，认为汪精卫主政时期的方针带有一定的国民党左翼政治路线特征。例如美国学者曾玛莉认为，1932年以后，汪蒋经过协商达成“安内攘外”主张，强调以国家统一和经济建设作为抵抗日本侵略

---

① 内政部部长从1932年1月30日至1934年11月7日分别由汪精卫、冯玉祥、彭学沛、黄绍竑担任；甘乃光于1932年5月28日至1935年2月27日任次长。见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38页。

②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19页。

③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第8页。

的前提条件，这是国民党“左派”解决民族危机方法的直接表述，标志着汪精卫对蒋介石暂时的政治上的胜利。因为蒋介石主张在有损政治统一和经济建设的情况下，首先消灭江西的共产党；而汪精卫则认为只有进行经济建设、增强国家实力，才能根本解决外敌入侵和内部的共产党问题。

曾玛莉还指出，陈公博在担任实业部部长期间提出的“实业计划”，旨在“将社会主义式的动员和激进防卫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设想创造一个社团国家，能够把中国所有的生产商团结在一起来建设国民经济”。这一国家经济建设计划所需要的政权“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能够将它的干预延伸到草根阶层，并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动员”。汪精卫在1930年提出的“经济金融政策提案”，带有明显的陈公博式的经济合作特征。提案认为，国家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所有团体和政府的共同努力。①

执政后的改组派，政治主张比在野时趋于保守，但仍有一些比较支持民众运动、比较维护工人利益的主张。施政方针仍倾向于关注民生问题。例如汪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主持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体现出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视，并呼应了一些知识分子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1933年热河事变后，华北俨然成为日本势力范围，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蒋仍将重心放在“围剿”工农红军上，并提出扩充军备、加拨军饷的要求。汪反对蒋扩充军事的呼吁，提出救亡图存必须充实国力的原则，拟定了遏制官吏贪污、严申军事纪律、全力进行农工商业建设的方针。但左派的主张比较软弱，对于实际社会矛盾的应对比较无力。

1931年12月，国民党宁、沪、粤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在分裂数年后，开始谋求统一并重新分配权力。在会上，西山会议派代表提出一个“树立党的中监干部以建筑党的重心案”，要求国民党区分部一律取消，民众团体不再受党部指导，而改为置于政府监督之下。② 与之相对，改组派代表提出一个“关于党务改革之

---

① 曾玛莉：《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46—182页。

② 覃振、梁寒操、傅汝霖：《树立党的中监干部以建筑党的重心案》，“会议纪录”，会4.2/4.4。

提案”，坚持“党之根本基础在下级党部”。该提案要求：（1）取消中央训练部，成立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2）将县市以下各级党部一律改为秘密组织，以深入民众，与共产党争夺民众；（3）党内实行民主集权制，各级党部领导由党员选举产生。①

改组派还提出一个“确定民众运动方案案”，指出：政党的基础在民众，“不可不在民众中树立深厚之根柢”。今后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不能仅依靠高高在上的党部来指导，而要以“党团”的方式深入民众之中，切实扩大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在民众中的影响。该方案还提出，要准许各类民众团体成立从上到下的全国性组织，国民党则利用“党团”，在民众团体中活动，进而取得对民众团体的领导权。如此，既能使民众意愿得到充分实现，又能使国民党取得民众之真正拥护。②

这次会议决议，是几派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其中关于党务问题的决议，大多实现了改组派的主张。会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取消，成立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调查各地的民运情况，搜集民运资料，为国民党物色优秀的民运人才。民运会除由西山会议派的张知本、马超俊分别担任过三个月的正、副主任外，主任长期由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担任，副主任王陆一亦与改组派亲近，在1929年改组派领导的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运动中，曾站在反蒋阵营一边。民运会240余名职员中，约半数为前训练部留任人员，新入职者多由陈公博、王陆一的关系介绍而来。下面的科长、总干事，亦多为改组派成员，秘书萧忠贞是改组派要员。因而南京特务机关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民运会是改组派“借党营私，期诸全国民众团体归其掌握、指挥裕如”的工具，该派尽量安插人员，“攫取党权之积极真令人可怕”。③

中央民运会成立后，表现出立场鲜明的支持民众运动的态度，与亲

---

① 顾孟馀、王法勤、陈璧君、陈公博、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曾仲鸣、邓飞黄、谷正纲、范予遂、王懋功、唐生智、萧忠贞：《关于党务改革之提案》，“会议纪录”，会4.2/4.5。

② 陈公博、王法勤、王懋功、潘云超、顾孟馀、朱霁青、陈璧君、曾仲鸣、范予遂、萧忠贞、谷正纲、郭春涛、邓飞黄、唐生智：《确定民众运动方案案》，“会议纪录”，会4.2/4.7。

③ 《特种调查报告》（1932年），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大溪档案·党务类”，大党056/025。

蒋诸派系形成对比。1932年5月，中央民运会函请行政院，“明令省市府暨军警保护民众爱国运动”。[①] 而1932年10月，南京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致电蒋介石，称“中央民运会近拟修改各民众团体法规，恢复总工会制度”，并拟“将店主与店员组成对抗团体”，因遭到立法院反对，正准备向中央政治会议提请通过。邵元冲说“此等办法，无异恢复武汉时期之状态”，与蒋介石“安定社会之意见”完全相反，不但会引起劳资之间“无穷纠纷”，且会导致严重的党政冲突，希望蒋致电“在京各负责同志，共同注意”。蒋介石则回复邵元冲“吾兄所虑极是，此事关系甚大”，并致电中政会，请其注意。[②]

南京特务机关在1932—1933年给蒋介石的情报中说，改组派下层干部发动工运极为努力，中央民运会秘书萧忠贞等亲自到南京、上海等地指挥农民、青年运动，占领党政机关，拉拢干部，吸收群众。[③] 还说：“陈公博近派中央民运会工人科干事程中一赴平汉、陇海、平津、平绥、青济、津浦各路，改组各工会，名为监选，实则暗中活动。”[④] 南京、上海稍业工会、码头工人、邮务工会中均有改组派的势力，南京邮务工人“甚信仰陈公博”。[⑤] “陈公博甚注意工运，曾约总工会分子密谈工会组织，拟在沪组中国劳动协会上海支会，陈津贴经费。”[⑥] 上海码头工人风潮为改组派所发动，以废除“二八制”、打破“包工制”为号召。[⑦]

---

① 《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查办奸商学痞左翼齐等以维救国运动》（1932年5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54550-00003-000。

② 《邵元冲电蒋中正（及蒋复电）》（1932年10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059-131。

③ 《改组派之活动情形（1932年）》，“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300-00055-001。

④ 《这一周情报》（1932年4月25日），大溪档案·党务类，大党057/002。

⑤ 《1932年5月29日情报表》，大溪档案·党务类，大党056/008。

⑥ 《1932年6月4日情报表》，“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300-00056-014。

⑦ 《各党派近况（于上海）》，“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300-00055-003。上海浦东码头，搬运货物向由公司承包给包工头，包工头雇用工人工作，公司所出工资，包工头自取八成，仅分二成给工人，工人受压迫甚深，时有改善待遇之要求。中央民训会1928年调解上海码头总工会整理委员会与轮船码头业务工会纠纷时，曾定出六条原则，其中包括“包工制仍准暂行存在，但包工头所扣包工根额，至多不得超过金额十分之三，工人应得十分之七。出口入口贴水，概暂照二八比例分摊”，以及革除包工头做寿生子嫁娶工人须送礼之陋习，工人受工伤或残废、死亡时，资方所给医药费、抚恤费，包工头须如数发放等规定。但并未获得实施。1929年6月，工人复起反抗，被包工头打伤若干，激起罢工风潮（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第212—213页）。

中央民运会对于工人的支持，在1930年代初上海码头风潮案、邮务工人罢工案和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中都有所反映。王奇生曾揭示“三友案”处理过程中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中央民运会对资本家的强硬态度：“1928年以来，国民党中央对资本家阶级如此大张挞伐，尚属首次，而上海资本家以一个阶级的集团阵营与国民党中央形成如此严重激烈的对峙，亦属前所未有。”书中还指出，“三友案”发生时，上海市党部为CC系所掌控，市长吴铁城属政学系，他们的态度均倾向于保守。①

“三友案”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改组派为维护劳工利益而与资本家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斗争。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中央民运会副主任王陆一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都不时向在南昌行营“剿共”的蒋介石汇报情况。虞洽卿等江浙资本家，亦以“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支持。从台北“国史馆”藏有关“三友案”的几方往来函电中，可清楚看到中央民运会站在工人一方而上海市党政机关袒护资本家的格局。

1932年9月，王陆一在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该社沪厂停工八月，工人千余，生计无托，致成纠纷。工人屡来请愿，本会派员调查。该社沪厂因战事损失不过万元，而杭厂正招新工，沪厂歇工，理无可解。且不接受市党政机关正当调处。工人之延累不堪，相继绝食，事极凄惨。党政失调解之效能，事端有扩大之危险。本会自当奉行民生主义之原则，准情酌理，致电沪市党政机关，促令迅速开工，以维民命而息事端。”又说资本家“只求片面利润之增累，不顾千数苦工之死生”，民运会自难恝置。②

在另一封致蒋的电报中，王陆一更沉痛地指出：三友厂方不顾工人生死，码头包头无厌诛求。中国工商业虽方在萌芽，“然已模具资本主义晚期之罪恶”。关于上海码头工人风潮，王陆一指出，码头工人所挣收入，“工人得二，包头得八，比例悬绝，骇人听闻”，包工头又行贿党政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5页、第145页注释1。

② 《王陆一电蒋中正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协同上海市党政机关处理民众团体纷争情形》（1932年9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054-010。

官僚，使下情不能上达，工人“翘首泣望中央”，此正有待“中央之毅然措置”，“宁使百数十包工头与少数不肖员警忿怒不满，勿失中央爱护人民之心”。①

然而，这三起重大劳资纠纷案，只有邮务工人罢工案由陈公博亲自赴沪与当地党政机关协商，获得妥善处理。“三友案”则以杜月笙出面调解、工人妥协退让收场。码头工人反对包工头的运动，更是延续数年而无成效。从中央民运会与国民党上海党政机关及蒋介石的互动可以看出，1932年汪蒋合作后，国民党内仍有左、右派之分。左派更重视底层民众利益，右派则宁愿牺牲民众，不愿触动既得利益阶层，而左派与右派的力量对比，左派明显居于弱势。中央民运会虽有保护工人的态度，却无实权。“三友案”中资方的胜利、上海码头包工头对工人的长期迫害，都体现出南京当局以压迫弱势换取强势群体支持以维护社会安定的政策，及国民党官僚对于底层民众生存的极度冷漠。它们也反映出1932年后的改组派，只能实行一些软弱的改良主义措施，对于根本改善工人处境，所起作用是很微弱的。

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期间，还推行了几项恢复民生的措施，其中一项是在1933年5月组织成立了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4月11日，汪精卫在行政院第96次会议上提出“救济农村案”，拟组织委员会，筹议救济农村办法。后经过与陈公博（时任实业部部长）、甘乃光（时任内政部次长）、彭学沛（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等几位原改组派大员商议，决定成立农村救济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委员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为“当然委员”，主要职务为农村救济之方案设计。另由院长聘请工商界若干人士为委员。计划筹备的事项主要有四项：农业金融、农业技术、粮食调剂和水利。经行政院第97次会议商讨，农村救济委员会更名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目标确定为减轻农民痛苦，调剂农村金融，增加农业生产，早日实现农村复兴。

1933年4月25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名义发出通电，邀请各委员来京召开农村复兴委员会会议。电称：“我国农村凋敝，产物衰微，……

---

① 《王陆一电蒋中正上海工人及各地民众团体情形》（1932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055-009。

兹拟于行政院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集中朝野力量，筹集巨款，分途救济。充实金融，改良技术，发展交通，调剂粮食。"① 5月5日，农村复兴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者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陶希圣、甘乃光、彭学沛、曾仲鸣、陈树人、褚民谊、唐有壬、郭春涛、李四光、陶孟和、谭熙鸿、张伯苓、荣宗敬、罗家伦等49人。分为经济组、技术组、组织组，讨论了农村金融、农产品价格调剂、农业技术补助、农村自治计划等各方面的问题。

农村复兴委员会一直维持到1936年，在它主持之下进行的各项农村调查，例如长江流域粮食调查，全国米麦丝茶运销售状况调查，全国各地苛捐杂税调查，农村金融制度、水利问题调查等，为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汪精卫本人非常重视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工作，据杨玉清说，他去欧洲留学之前，向汪精卫辞行，汪亲手送给他一本"很厚、很大、印得很精致的书，就是所谓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报告"。② 但是，农村复兴委员会只是一个咨政机关，而非执政机关，没有执行权，所有计划建议只能供当局者参考，对于改善农村衰败的状况并未发挥多少实际作用。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合影时遇刺受伤。次年2月赴欧洲疗养。5月，汪在德国温泉小镇巴特瑙海姆收到方君璧自南京来信，告知南京花事正好。汪在回信中说："南京花好，夙所知之。但我所神游目想者，却是德国农家归女，以强健的身体，穿着红红绿绿的衫裙，手把锄犁，在繁华如锦绿草如茵之中，做他的田家工作，这是'耕者有其田'所应得之幸福。我在十五、六、七年间，曾经拼着狗命，想替中国人打出这一条生路，可是二十年以后，为了救亡，连卑无（甚）高论的农民问题，也不能从事实现。唉，不必说。"③ 信中的"十五、六、七年间，曾经拼着狗命，想替中国人打出这一条生路"指1926—1928年汪的左倾；"二十年以后"指1931年以后。汪认为国民

---

① 《汪院长邀请各委员来京开会电》，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卷第1期，1933年，第3页。

② 杨玉清：《我与汪精卫》，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385页。

③ 《汪精卫致方君璧函》（1936年5月15日）。

党左派的政治主张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替中国人“打出一条生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为团结御侮，不得不与国民党右派合作，而放弃左派的政治路线。这样一封私人信件流露的或许是比较真实的思想情感。

第五章　投身洪流：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

自晚清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以来，全国的教育中心迅速从乡村向各级城市转移。这个过程，造成全国的知识青年，开始从农村渐次向县城、省城和各大都会流动，渐渐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知识青年群体。他们最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感染。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全国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投奔广东革命政权，成为国共两党组织军队和发动群众运动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成为各地基层党部和各军政治部的主要组成人员。这个庞大的新知识青年群体，向往革命、呼唤革命，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点燃了革命，用生命的代价成就了革命，他们内心激烈的情感和生活中令人窒息的苦闷，促成了革命的需要，革命也让他们青春的激情得到了最大的释放。

以往学术界对国民革命的研究，多关注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涉及青年问题时，亦多从“运动”的角度入手，关注国共两党动员、组织乃至争夺青年的过程，以及与青年运动相关的各种组织与制度实践。很少有人从革命青年的主体状态，从青年的理想、价值观念与生存境遇等角度，去观察这场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去探讨一个时代的青年大规模激进化的思想与社会根源，去追问青年在革命中的表现及其生存境遇。本章将研究经由清末新式学堂培养、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染的一代新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原因及其在革命中的主体状态，探讨新知识青年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在国家、政党、国共斗争的叙述模式之外，开拓一个青年主体的视角，来观察国民革命的兴起和衰落，理解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投身国民革命的一代新知识青年的群体命运。

一　知识青年的激进化

（一）从新文化到新青年

国民革命时代年龄在 19—30 岁的青年，大多出生在 1895—1905 年。

他们的幼年时期，适逢清末教育改革的历史巨变。1901年，清廷开始推行“新政”，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次年所有乡试、会试停止，新式学堂普遍设立，新式教育开始推广。与辛亥革命党人相比，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接受了完整的新式小学和中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习染和修养较少。在他们的精神成长中，影响最深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要用思想召唤一种力量，用新文化——包括新的语言形式、新的思想，产生出新的主体、新的认同，促成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新文化运动以反抗虚伪礼教、造就一个“真我”为前提，打造新的政治、新的社会，通过个性发展达到社会发展，深刻影响了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自我”的觉醒，“解放”的诉求，将一代青年从家族桎梏中解放出来，促使他们参加国民革命，成为变革中国政治的新生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在高举新文化大旗时，首先“敬告青年”，解放自我，摆脱一切经济、政治、社会压迫，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脱离“奴隶之羁绊”，“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要自求解放，亦尊重他人的解放，既不受他人奴役，亦不可奴役他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①

在“自我”觉醒之外，新文化运动还召唤一种情感，这就是对青春的信仰、对青年的推崇。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热烈地赞颂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②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李大钊，不但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寄托在青年身上，更从宇宙大化之周流运转、生生不息、更立不定、无始无终的哲学层面，将“青春”比喻为一种慷慨悲壮、日新又新的精神，写道：“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① 李大钊热情地讴歌青年，称青年为“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不但将创造历史的使命托付于青年，还从宇宙进化的角度，论证青年反抗老年的正当性，赋予青年绝对的历史地位：

> 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伟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亦当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觉、其生命。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以遏其迈往之气、豪放之才者，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苟老辈有不知苏生，不知蜕化，而犹逆宇宙之进运，投青年于虚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②

这种对青年的推崇、对青春的歌颂，赋予青年对老年的绝对优势。青年便天然象征着“进步”，象征着“革命”。这种不遗余力讴歌青年、青春的新文化，为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提供了无比高昂的自信心和使命感。从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流行的政治口号——“打倒昏庸老

---

① 李大钊：《青春》，张枏严编选《新潮——民初时论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46页。

②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70页。

朽”中也可以看出，以“昏庸老朽”作为“反动”的代名词，这背后蕴含着对青年的信赖和青年天然比老年“进步”的政治文化。这句口号深得革命青年的拥护。当时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工作人员朱其华在回忆录中说，他来到武汉之后，看到“反对个人独裁”“反对以军治党”“打倒昏庸老朽”这三个口号，感到“总算是替我出了一口闷气。尤其是打倒老朽昏庸这一句，……更觉得有说不出的妙用”。①

（二）新青年的困境

虽然新文化赋予了新知识青年高昂的解放理想，但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的生活却常常陷入困境之中。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叶永蓁，曾以其个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革命“结束”这十年来的经历，写成一部轰动一时的自传体小说——《小小十年》。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现在社会对我只有残酷！我是生在这时代的，而这时代不能好好地供给我的需要。我需要智识，而这时代不能供给我智识；我需要工作，而这时代不能供给我工作；我需要爱人，而这时代又不能供给我的爱人。……我拼命地想求得自己应得的智识了，而智识早被着少数人用金钱买去，又使我感到失望！我拼命地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寻觅工作了，但工作又在哪里？现在社会对我竟这样的残酷，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有些些满足我。……我现在的义务，是推翻残酷的对我的社会！”②

这一段悲愤的告白，展现出作者作为1920年代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叶永蓁，1908年生，原名叶会西，浙江乐清人。少年时先后就读于盘谷小学、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小、温州第十中学等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后因恋爱受挫，愤然离家，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浙江警备师少尉排长，浙江省防军第一路军连长、营长、参谋等职。国民革命失败后，叶永蓁脱离军队，从武汉来到上海，进行文学创作。1934年冬，再次投笔从戎，后做到国民党陆军第9军第116师少将师长。

《小小十年》描写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世界，也展现出1920年

①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86页。

② 叶永蓁：《小小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252—253页。

代知识青年在生活中普遍感受的压抑、愤懑，与对个体解放的诉求。这种压抑、愤懑和对解放诉求的交织，是其革命热情的最初动力。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家庭包办婚姻，不能与自己的恋人“茵茵”结合，而感到人生的痛苦，感到世界的冷酷！感到：

> 除了茵茵之外，仿佛“人”都是我的仇敌。社会是“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制度是由组成社会的“人”所创制；社会的制度害了我一生的幸福，这简直是“人”都在共同欢笑着来埋葬我。在夜阑人静时，我想起来真是异常愤怒！血波都涨满在血管里，的确想砍死几个人给自己来出气。祖父同母亲都是很爱我的人，也来害我，则我对于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自己留恋呢？万恶的社会制度！虚伪的人！①

怀抱着这样仇恨社会的心情，主人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霖。霖只有十四岁，懂诗文和金石。他也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说：“在现在的社会，教育是什么东西？法律是什么东西？”这一切都是对人的束缚。“只有破坏是我们应尽的工作，”他说，“在现在的社会上，简直没有秩序之可守，管他什么狗东西的体节呢！”②

霖这种姿态，受到主人公由衷的喜爱。不久，他们又遇到另一个反抗社会的青年——今立。这是一个不甘屈服而又喜欢作诗的青年，常想自己做一个英雄，用他的手腕，改变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纠正社会进化的歧途。当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自己吟起来，在不知不觉间念道“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攫取国民魂”时，便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说，如果他自己能练好枪，“就愿意去做‘土匪’或‘海盗’来‘干’一下，人是总须死的，死在床板上是最倒霉的事。像金圣叹一般的一面喝酒，一面给人家杀头，这就来得痛快了！”③ 当然，这是在他情绪积极的时候。当他消极的时候，就想要逍遥世外，最好在雁荡山或天台山上盖一座茅屋，仰天长啸，聊以终老。

---

① 叶永蓁：《小小十年》，第27页。
② 叶永蓁：《小小十年》，第36—37页。
③ 叶永蓁：《小小十年》，第45页。

后来，他们一起去了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在《小小十年》完成时，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枫叶》，并在卷首写了一首小诗："从今后，我愿作一片血红的枫叶，脱离了枝头，随着世界革命的潮流，流到那里，红到那里。"①

世界革命是那一时代的口号，也是青年最高远的理想。而这一高远理想的现实根源，却是日常生活中的贫困、压抑、烦闷和恋爱的失败。另一位革命青年、作家顾仲起的经历，也反映了新知识青年的生存困境。顾仲起是茅盾书写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幻灭》中"强连长"的原型。他1903年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一个没落的中等家庭，幼年就读于如皋县立小学，1917年考入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因继母的虐待、学校生活的拮据，他感受到经济的压迫；又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新思想，他被守旧的学校开除。回乡后，不堪忍受亲情的淡薄与周边势利小人的奚落，他愤然离家，流落上海，从此与家庭断绝关系。

在流浪生活中，顾仲起当过黄包车夫、码头工人，也当过乞丐，尝尽人间悲苦。从这时起他开始文学创作，用小说记录自己的血泪生活，并很快得到当时已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和革命者茅盾、郑振铎等人的赏识。1924年初，顾仲起投笔从戎，来到革命策源地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据说他作战非常勇猛，因为作战勇猛，几仗下来，就从班长升为排长、连长。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顾仲起多处负伤，仍然持枪冲杀，直到几成血人、力不能支而倒下。②

当顾仲起在东江参加攻打陈炯明的战役时，茅盾正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顾仲起曾对茅盾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的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

---

① 张福丹：《叶永蓁和他的〈小小十年〉》，许宗斌主编《萧台情音》，线装书局，2001，第447—448页。

② 有关顾仲起的生平事迹，可参见顾启《茅盾与顾仲超》，《江海纵横》2006年第4期；巴彦《顾仲起的生活道路及创作简况》，《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张家胜、王磊《刘文岛与革命作家顾仲超的情谊》，《文史春秋》2005年第7期；胡从经《顾仲起的悲剧》，《缘花集——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录》，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道，所以对于时局如何，不曾想过。"[①] 这些话让茅盾深受震动，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幻灭》中"强连长"的形象。在小说中，茅盾借"静女士"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少年大概也是伤心人，对于一切都感不满，都觉得失望，而又不甘寂寞，所以到战场上来寻求强烈的刺激以自快罢。他的未来主义，何尝不是消极悲观到极点后的反动？如果觉得世间尚有一事足恋留恋，他该不会这般古怪冷酷罢。"[②]

顾仲起曾在他的作品《残骸》中"写过几句可怜的话"："《残骸》是一个大失败的作品，不过数年来的奔波、劳碌、饥饿、乞丐、做工、卖报、当兵、革命、恋爱，而终于失败又回到家乡来的一段事迹，也值得我们一读的。"[③] 这求学、革命、恋爱、失败的四部曲，正是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共同经历，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对新知识青年的考验。他的反叛和流浪、悲愤和绝望，也是很多知识青年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那个时代，农村的私塾体系已经解体，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多设置在县城、省城或更发达的大城市中，这迫使青年们不得不自幼背井离乡，在城市中过奋斗的生活，使他们普遍体验着一种孤独感和漂泊感。农村经济破败和城市工业衰微，又使这些学成毕业的新式青年，无法被现有社会结构吸纳，他们一从学校中走出，便感受到生活困苦、世态炎凉，感受到社会的黑暗。顾仲起说："在现代矛盾的社会中穷困的我们，好似深夜中莽原中的孤旅者，生活上都含着血的痕迹。"[④]

自晚清兴办学堂以后，"学生问题"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李大钊在1917年就写道："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中国之学生，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人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387页。
② 《幻灭》，《茅盾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84—85页。
③ 顾仲起：《残骸》，中华新教育社，1928，第2页。
④ 顾仲起：《生活的血迹》，现代书局，1928，第4页。

而着学生之冠服，即无异于自杀。社会而日日培养学生使蹈于自杀之途，以趋于自绝之运，即无异于杀人，其结果亦为社会之自杀。"①

李大钊认为，如不能妥善解决学生问题，日后必将酿成社会革命。因为，学生的头脑最容易为现代思潮所感染。而学生的遭遇，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他们努力奋斗，却得不到伸展的机会，一腔慷慨激昂的热情，不能稍有裨益于社会政治进步，于是，必将"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② 十年之后，正如李大钊所言，社会中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成了参与国民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

1926年11月的一期《国闻周报》上，一位署名"前溪"的作者，也讨论了新知识阶层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文中说：

>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
> 试问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于以相当之知识，迫以及身之饥寒，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对于现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计所迫。近年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③

① 《学生问题》，《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21页。
② 《学生问题》，《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22页。
③ 前溪：《智识阶级与革命》，《国闻周报》第3卷第44期，1926年，第1—2页。

作者认为，知识阶级的生计问题若不能解决，则“每年加增数万智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智识阶级之革命者”。1926 年以后，知识阶级因生计问题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人以上，“今后数目再与年剧增，今后势力再与年俱长”。且由于连年的战争，非知识阶级的失业人数也在逐年猛增，“智识阶级者利用于上，无智识阶级者奔走于下，大势所趋，无论当局压迫之武力如何强固，现在社会之组织，必有根本破坏之一日”。①

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新知识青年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出路，在思想情感上感受着共通的压抑和烦闷，酝酿着激烈的反抗情绪。革命是为自己的生存求发展，为社会的问题寻答案，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谋出路。革命不但让他们在精神上找到了归依，炽热的情感、郁积的苦闷，有抒发的场所，革命组织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现实生存问题。

在国民革命中，国共两党所进行的唤醒民众，指导农工运动，发动群众集会，组织宣传演讲，组建下层党部，加强各军政治工作及民众、党员的政治训练，从事市郊平民教育等工作，需要吸收大量知识青年。革命过程中设立的各种机关、宣传部、政治部，也为那些在城市中漂泊的青年男女找到了工作的机会。革命不但解决了青年的生计问题，也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要。正如邓演达所说，青年们在旧时代枷锁里，锁了很久很久，受了旧时代的重压，而又得不着生活出路，“性的欲求，知识的欲求，一切幻想生活要求实现的欲求，都在燃烧着，火焰般红热着。他们一定是嫉恨旧时代的一切，要借这些东西去发泄他们和旧时代作战的决心，去发泄他们新时代的幻想”。②

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也促使知识青年纷纷南下，投奔广东革命政府。就如孙伏园所说：“政治上的恶势力，驱策着许多教员学生和智识阶级往新华门前去，到了那里却又用刀枪轰开他们。招来，挥去，招来，挥去，于是而分头进行之智识运动的工作全废，而一部分国民党员所鼓吹的学生干政却大告成功了。……而干政的流弊，则是先将

① 前锋：《智识阶级与革命》，《国闻周报》第 3 卷第 44 期，1926 年，第 2 页。

② 《新艺术的诞生——致〈中央日报〉副刊》，《邓演达文集新编》，第 134 页。

那些少年诗人骂倒了，骂到不敢再做诗了，然后用一套军服替他们穿上，叫他们做政治工作去。于是而北伐进展了，政治工作人员加多了，天下少年引领而望广东的胜利了。这时候全国学生脑筋中只有政治，政治，政治。"①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抗议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除天津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当请愿队伍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遭到预先埋伏在此的军警武力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这一枪杀徒手请愿学生的政治暴行，带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极大刺激，激发了他们投身现实政治的热情。鲁迅在当天写道："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是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关？"②

正在北大读书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也说："它用了四十七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数以百计的人所流的鲜血，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③

1926年4月，北京为奉系军阀占领，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扼杀群众运动，这更刺激了北京学生从知识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变。他们纷纷告别北京，投奔南方革命政权。三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说，南方的革命斗争"像野火般蔓延"，"整个南中国的天际被烧的通红。我们从阴暗的北国遥望南天，越发见得这景色迷人，壮

---

① 伏园：《我们的一九二八》，《贡献》第4期，1928年1月5日，第3页。

②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87—89页。

③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第19—20页。

丽无比，……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①

二　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

青年需要革命，革命也需要青年。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基层党部主要由新知识青年构成。1927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之外的发展相当有限。根据中共 1926 年 10 月、11 月《中央局报告》中对各地党部状况的分析，除了湘区、粤区这两个中共最有社会基础的区之外，其余各地党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在江西，“党员尽是中等学校青年学生”。北方区“完全在反赤势力高压之下”，北京的党员大多数是学生，后来党组织渐渐打入中小学教员之中。在河南，党只在学生群众中有一些影响。山东和河南一样弱。在安徽，“组织十分幼稚，分子多系中学校学生”。福建、厦门两地总共不过 46 人，“多系青年学生，抱英雄主义、恐怖主义观点，地方观念极重，且感情丰富，社会影响没什么，相互间冲突却极厉害”。②

国民党早期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海外华侨和清末留学生群体。1924 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其势力蓬勃发展，知识青年纷纷加入。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招收第一批学员，在有年龄记录的黄埔一期 695 名学员中，出生于 1889—1895 年即入学时年龄超过 30 岁的，只有 31 人。出生在 1898—1905 年的有 616 人，占学员总数的 89%。他们入学时年龄在 19—26 岁。年龄最小的出生在 1908 年，当时只有 16 岁。③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农民部、商民部、妇女部等革命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主要是新知识青年。在 1925 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 11

①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 20 页。关于 1926 年北京新文化言论界再盛革命和知识青年迅速左倾的现象，参见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 127 页。书中引用 1927 年《中共北京地委国民运动工作报告》指出，在北京的“反赤”空气中，革命党组织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得到发展，中共由三百余人发展到千余人，国民党市党部由 2200 人发展到 4300 余人。

② 《中央局报告》（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1926），第 504—512 页。

③ 陈予欢：《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背景情况一览表》，《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人年龄超过30岁，其余均在21—29岁。[①] 从1926年7月革命军出师北伐，至1927年7月武汉“分共”，特别是在两湖的农工运动高潮中，中央农民部、工人部职员迅速扩充。在1927年4—6月，有30名新青年加入中央农民部工作。在全部38名职员中，只有金肃凯、刘冠英两人是1924年即在部工作的“老职员”。有26人年龄在20—30岁，7人年龄在17—19岁。部长陈克文时年30岁。[②]

在中央工人部（附劳工通讯社）的29名职员中，除部长陈公博、秘书薛修之外，全部是29岁以下的青年。[③] 商民部的16人中，除部长王法勤、代理部长经亨颐、秘书鲁佛民、编辑干事王子弦之外，也多为19—30岁的青年。[④]

在湖南各县农运特派员有年龄可查的98人中，30岁以上的有34人，17—29岁的有64人，其中25岁以下的有50人。他们大部分是省立中学、师范、甲种农校或农讲所毕业的学生，还有小学教员，工农有10人。[⑤]

当时国民党也很重视吸收青年。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在广州召集全市青年，举行青年运动大会，吸引青年入党及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还派人到各学校演讲青年运动的意义和计划。1926年3月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青年们举行了连续四天的大规模演讲会和游艺会，每天派演讲队三百余队，散布到全市演讲，夜间举行野火会。

从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后，到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离粤北迁之时，广东学生运动已全面被纳入国民党的领导。据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每逢节假日、纪念日和地方各种群众集会，国民党青年无不积极参加组织演讲队，配合文字宣传。还组织“宣传训练委员会”，举办暑期宣传训练班，开展“市郊平教运动”，设立平民夜校，组

---

① 《中央农民部职员表（1925年）》，广州，五部档案，部11956。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职员一览表（1927年7月）》，武汉，五部档案，部11960。

③ 《中央工人部职员一览表（1927年7月）》，武汉，五部档案，部11862。

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职员姓名住址表（1927年）》，武汉，五部档案，部11889。

⑤ 《湖南各县农运特派员调查录》（载《湖南清乡总报告书》，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1928年11月刊行），《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31—436页。

织北伐青年工作团、党童子军等。[①]

在广东以外的省份，“一切民众示威运动，多半在青年学生指导之下”。国民党二大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中说：“青年运动成绩较好的要算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四川等处。惟共通的毛病就是仅仅限于学生青年运动。”[②] 郭春涛在大会上做北京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时也说，在1925年孙中山北上之前，北京的种种运动，“参加者仅学生群众，其余各阶级之人可谓绝无仅有”。两年来有了很大进展，但国民党的活动与势力，仍“仅限于城市，尚未及乡村，……仅及于青年学生及少数市民，尚未及于农工群众”。[③]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的甘乃光，在1926年2—5月编辑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群众运动，在过去事实上就是青年运动，“更可以说就是青年学生运动”。近年来，工农运动渐渐兴起，且有蔚为国民革命主力之势，“然而此种工人运动，目下尚不过上海、广州、天津等有新兴工业及最大国家产业的地方；农民运动亦不过广东及河南、湖南、直隶三特别区之一部；其余中国各大都市及各省区，仍然只有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仍然为群众运动之主体。即在工农运动较为进步的地方，于青年学生仍尚未失却其地位之重要，盖教育工农、组织工农、领导工农，仍需助于青年学生”。[④]

在这份工作报告中，甘乃光总结了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全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和进行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五卅惨案发生这两个月间，国民党青年党员的人数剧增，以学生为最多。五卅运动及省港罢工之后，广东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工人忽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于是各大都市学生，特别是在国民党指导下的学生，纷纷投身于工农运动中，以从事工农运动作为他们在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工作，学生运动的重心也发生转移。五四运动

---

① 《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1926年12月25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秘书处文献科编《广东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日刊汇编》（1926—1927）。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45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49、252页。

④ 《中央青年部青年运动报告录要》（1926年2月1日至5月15日），《青年运动须知》，无出版信息，第70—71页。

以后，学生运动的重心一直在北京，到五卅运动之后，转移到上海。广东沙基惨案发生后，又现出重心向广东转移的迹象。

从各地知识青年参与运动的具体情况来看。北京是学生运动最多、力量最大的地方，北京的国民党青年部组织学生运动委员会，在各学校和社会团体中吸收同志。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到5月五卅惨案发生，北京的国民党员从2000人增加到3000余人，90%是青年学生。1925年10月反奉战争开始后，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国民党领导下，举行“驱段”国民大会数次，以期实现“首都革命”。此后党员中就有了“学生革命敢死队”“新军社”等团体组织。在追悼郭松龄大会、反对日本出兵中国东北大会、讨张反日大会及各种巡行示威中，青年学生都积极参与宣传，散布各种传单、小册子、画片数十万件。

在直隶和天津，因为北洋军阀势力太大，群众运动比较沉闷，主要是青年运动。国民军克复天津之后，开始有学生运动讲习班设立。学术演讲会、青年社、学生协会、人权主义大同盟等组织一时比较活跃。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时，国民党举行五日大宣传，由青年学生组织讲演队，散布全市讲演，公开征求党员，结果入党者一千五六百人，中学生与小商人占30%—40%，甚至还有占1%的小学生。

在两湖地区，北伐之前，群众运动大多是学生运动。武昌学生联合会是湖北民众运动的指挥机关，每到各种纪念日，都组织群众进行讲演，散发传单。湖南的群众运动也是以学生为中坚。湘南、湘西、平口、浏阳、湘潭等地，都有严密的学生组织，省青年部对于下级党部和青年团体，指挥自如。在湖南“驱赵运动”中，国民党以青年学生为中心，号召民众开“人民代表会议”，议决赵恒惕走、唐生智来的种种条件，“且以直接行动之形式，迫赵出走”。可见当时湖南学生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力量。①

有学者指出，到1927年，国民党约100万名党员中，学生占26%，军人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

① 《中央青年部青年运动报告录要（一）》（1926年2月1日至5月15日），《青年运动须知》，第78页。

3%，其他占 16%。[①] 国民党主要基础仍是青年知识分子。在各种群众运动——工人、农民、商民、妇女运动及国民革命军中，青年都是中坚力量，起着发动机一样的作用。

正是那些新知识青年，不远千里从全国各地来到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政治部。是他们拼杀在东征和北伐的战场上，让国民革命的火焰燃烧了半个中国；是他们在宣传革命，组织工会、农会，发动农工运动，将“革命”的意识传入广大的中国社会。没有这个激进的知识青年阶层，就不会有这场国民革命的发生。

在国民革命中，新知识青年对政治怀有极大热忱，革命政权也扩展了青年参加政治的通道。但是，革命者并未在革命中找到归宿。学生带着新的思想观念进入社会，还未能宣传动员民众，就先与原有社会势力发生抵触，不但遭到权势阶层反对，普通乡村民众也不认可学生的行为。例如在广东农村，最忌讳反对拜神礼佛，反感打破男尊女卑界限，以及改革婚丧嫁娶礼仪和提倡女子剪发。在广州各县都发生不少学生焚毁神像遭到农民反感，以致武装殴打学生、包围学校的事件。[②]

“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常常让“革命者”痛觉群众“浅薄”“落后”，而对“群众运动”深感失望。在沙基惨案之后的群众动员中，就有革命党人提出：“我们干的必须是‘进步的群众运动’。……现在国际的文明，已成了一条共通的水平线，中国闭关几千年，慢说思想科学、工业、艺术不如人，就社会的组织也不如人，……我们要做进步的群众运动，一定要能跟得上世界文明水平线的群众运动。”[③] 在接受五四新文化教育的青年中，怀抱这种思想的不在少数。他们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动辄以“几千年闭关锁国”描述中国，对群众的“落后”深感失望和不满，向往达到“世界文明水平线”标准。

这些青年远离家族桎梏、礼教束缚，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又投身于打倒一切的革命事业，思想解放，行为浪漫，带着浓厚的“波西米亚”气息。随着革命潮流的起落，青年群体也产生了各种分化，有人在革命中锻造了自己，有人因无法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苦闷彷徨，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 4 页。
② 《怎样去做青年农民运动》，《广东青年》1926 年第 1 期，第 8 页。
③ 曙风：《我们怎样去补救这般浅薄的民智》，《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7 月 3 日。

有人在斗争中伤痕累累、意志消沉，还有一些人则在政治和道德一片混乱的时代中走向堕落。他们的生命在革命洪流中翻腾而过，他们的身影刻画了这场革命的面貌。

三　革命的高潮与幻灭

> 革命未到的时候是多少渴望，将到的时候是如何的兴奋，仿佛明天就是黄金世界，可是明天来了，并且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祟，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①

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武汉，青年们迎来了一段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他们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精神鸦片”——基督教的运动。他们参加了革命的军队和学校，工人农民都被动员起来。武汉最流行的口号——“打倒昏庸老朽”“反对个人独裁”“以党治军”，应和着革命青年的情绪。反叛旧式家族、伦理和婚姻制度的青年男女们，在这里追求到了他们所渴望的解放。

这是一个世界革命的时代。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中，印度的巡捕也与中国的群众接近起来，他们握着手高呼“中印联合万岁！”“打倒英帝国主义！”国际工人代表团也到了武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工人代表，在雄壮的军乐声后，向武汉的青年进行演说。在红色的演讲台背后，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遗像，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和镰刀锤子旗。人们一起高唱着“国际歌”，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声震动大地。②

这也是一个性别革命的时代。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妇女离开家庭上学或做工仍是少数现象，并不被社会广泛接受。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却从上千名女知识青年中选拔了200名，编成女兵队。女兵身穿

---

① 《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82页。

② 叶永蓁：《小小十年》，第122页。

灰色学兵服，跟男兵一样训练。她们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大街上，唱革命歌曲，喊反帝、反封建、反蒋口号，刷标语，散传单，做演讲，演话剧，进工厂宣传。新鲜的经历，带来精神上的无比振奋。多年之后，她们中的成员仍自豪地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根本不理睬社会上对我们的非议。"①

这些女生还发动过一个"打倒封建墙"的运动。因为武汉军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的驻地在原育杰中学旧址，中间隔着一道墙，女生们便说这是封建墙，要打倒，并开始动手拆除隔墙。校方解释说，隔墙只是隔队，男生队彼此间也有隔墙，不是封建、男女有别，并非男女不平等，并答应在被推倒的墙缺处开一个小门，白天派一个卫兵，晚上再锁。但是过了些时候，卫兵也没有了，干脆是门虽设而常开。②

当时在武汉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和武昌中山大学工作的黄白薇，曾经饱含深情地写道："那个可追忆的黄金时代哟！每个青年的热血在沸腾，青年的血充实在伟大的中国的命脉里，活泼、生动、发光……欢喜的灵魂在跳跃，国魂也在跳跃。整个武汉的民气都疯狂了，醉着澎湃热烈的革命高潮。"武汉城里的革命青年男女手牵着手，走在长江河畔，迎着夏夜的微风，一起唱着情歌。他们热烈地谈着国家的未来，他们开怀大笑，他们相互取笑，他们正在恋爱。"人人都知道这是革命，革命啊，革命的赐福，革命的享受呵！"③

然而，这种幸福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在打倒一切、热火朝天的革命潮流下，政治中潜藏的丑恶、高层的争权夺利渐渐浮现出来。青年自身的腐化堕落，也随着剧变的政治形势而日益清晰并让人失望起来。当革命工作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时候，也让人感到疲倦而烦闷。革命青年的激情就在这种困惑和疲倦的时光中，日复一日地溜走了。

鲁迅在广州时曾担忧"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

---

① 彭漪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武汉妇运史资料》第5辑《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专辑》，1982，第3页。

② 符其实：《打倒封建隔墙》，武汉文史研究馆编《江汉风采》，萧乾主编《新文史笔记丛书》第三辑（33），中华书局，2005，第35—36页。

③ 转引自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21—122页。

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① 在武汉，"革命"已成了最时髦的招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② 向来"反赤"的报纸，也变为"拥赤"。许多"胡分八字、面如圆月、马褂长衫"的先生，接二连三地跑到汉口南洋大楼③来，递进名片，拱手躬腰，庄严而骄傲地自陈道"兄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兄弟于民国某年就在党了"。④

有人说，武汉的一切都革命化了。服装革命化——在大街上不再见到戴瓜皮小帽、穿对花马褂的人，穿军装、挂皮带、缠绑腿的新青年成为一个景观。还有一种女扮男装的时尚，女士们"穿西装或军装，足踏革履，健步如飞"。⑤ 称呼也革命化，青年男女互称"革命的哥哥""革命的妹妹"。走路也革命化，你追我赶，蹦蹦跳跳。结婚也革命化，报纸上的结婚广告，"有的是因为集中革命力量而结婚，有的是因为拥护革命利益而结婚，有的是因为双方便于互相督促着革命而结婚"，有人说"结婚就是实行民族主义"。⑥

茅盾曾经说当时武汉有"三多"：政府多、官多、钞票多。汉口、武昌两地有三个政府：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每个政府下面又有各种部、处、科以及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从长江下游和广州跑来的不少四一二政变的幸存者，也得安排一官半职。这样官就更多。钞票多是因为滥发纸币。由于农村动乱，与上海方面又断了经济联系，政府收入主要靠武汉三镇，收入少，开支大，就只有靠发钞票来维持。物价天天上涨，大有早晚市价不同之势。⑦

---

① 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31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第490—491页。

③ 南洋大楼原是南洋华侨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所在地，1926年12月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此召开。

④ 衡笠：《"革命"问题》，《中央副刊》第96号，1927年6月30日。

⑤ 覃星垣：《武汉问题》，《中央副刊》第89号，1927年6月23日。

⑥ 衡笠：《"革命"问题》，《中央副刊》第96号，1927年6月30日。

⑦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370页。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武汉的要人们有三忙："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坐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会。他们于酒足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娱，缺乏实际内容。"①

1927年5月，一位从前方退到武汉当书记的青年，在汉口住了一夜，发现武汉革命青年的生活，竟然为三样东西所占据——打牌、招妓、鸦片烟。他说："堂堂党部工作人员，革命的领导者，……为着一元两元，争得面红耳赤。"招妓甚至成为"必修课，每日的通常工作"。鸦片馆——特别的雅室里，竟然有些"西服、学生服的美少年，每当烟云吞吐之余，谈的尽是党国大计"。②

茅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后来，他以每天收到的报道作为主要素材，创作了描述大革命的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他说："《幻灭》和《动摇》中间并没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观的描写。"在武汉，"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③《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在政治部工作。她发现那些政治部的同学们的全副本领只是熟读标语和口号。"外边人讽刺政治工作人员为'卖膏药'，……能够颠倒运用现成的标语和口号，便可以当一名政治工作人员。"④一边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边日常工作中却又充满疲倦和烦闷。恋爱成了流行病，各种新式男女在烦丧中，疯狂地追寻感官的刺激、肉欲的享乐。静女士觉得，这种生活，不是她理想中的热烈的新生活。

---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01页。
② 子恩：《汉口一夕见闻》，《中央副刊》第62号，1927年5月25日。
③ 《从结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第180、176—177页。
④ 《幻灭》，《茅盾全集》第1卷，第69—70页。

这样的革命青年，在国民党党务报告中也处处可见。有报告说："负责同志意气太盛，……以至怨不可解，各走极端，纠纷丛生，党务废弛。"有报告说："负责同志浪漫不努力，……各县负责同志努力工作者固多，而以革命为副业者实在不少，如圻〔蕲〕水县党部，时常无人办公，或出外吃酒打牌，或进行恋爱。还有县党部职员，多在外谋个人活动，许多同志去接洽党务不得一会。"还有"不能执行通告忽视命令"，"不能执行纪律，……各级党部都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一般同志多自由行动，及其他种种轨外情事发生，毫无顾忌"。①

武汉政治中表现出的各种矛盾，也让青年们感到怀疑和困惑。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来武汉，国民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组织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到处都是"国民革命军领袖蒋总司令万岁"的标语。②而三个月后，"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就喊了出来。武汉军事学校女兵队的胡兰畦说，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都在欢迎蒋校长，现在就要打倒？前几天是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今天就是新军阀、反革命？"③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动"清党"，开始了对左翼青年的残酷迫害。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曾仲鸣在致方君璧的信中说："蒋一面购买流氓殴打九江、南昌、重庆的党部，一面唆使部下枪毙从事农工运动的同志，近日越做越凶，竟然派人到四川残杀民众，死者千余。在上海又强行缴收工人纠察队之枪械，死伤数百。翌日市民为示威巡行，蒋又令兵开机关枪扫杀千余。真不相信，我们革命军的枪炮，竟然用来杀戮为革命努力的民众。……你真想不到，他们现在整十整百的杀人，张作霖、吴佩孚所不为的，他竟为之。段祺瑞去年三月十八日杀了几十人，全国骚然，难道蒋介石就能残杀千万民众么？"④

此时青年们才明白，原来革命的命运，都操纵在军阀政客的手中。白薇小说《炸弹与征鸟》的主人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的"玥

① 《最近半年之湖北党务》（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上册，第54页。

② 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52页。

③ 《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第147页。

④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4月17日、30日）。

女士”，目睹这一历史变局，感到“我活泼的革命情感，陡象被恶鸟啄丧了似的。同时我明白了我底幻想到了幻灭的悲哀；也觉悟了我从前的妄想狂简直是愚稚的幻梦！……革命，有了他们几个伟人包办尽够了，还用我们这种天真的野孩子去推波助澜么?！唉，看破了一幕黑幕就使人不爽悦！何处能收容我们这真红的狂热?”① 白薇 1984 年生于湖南资兴，曾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习，因反对校长被学校除名。后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习。毕业后，为逃脱悲惨的婚姻生活，只身出走，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过理科及历史学、心理学。武汉“分共”后，白薇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离开革命队伍，辗转来到上海，以帮工、帮人洗衣为生，以薄粥糊口，并进行文学创作。② 《炸弹与征鸟》是她对武汉时期革命生涯的一段记录。

经过 1927 年 5 月的杨森、夏斗寅叛乱和长沙的“马日事变”，武汉政府已陷入粤、桂、川、黔和东南蒋介石的包围之中，四面楚歌。加之武汉政府自实行现金集中以后，经济已经崩溃。而宜昌、沙、荆各大税源，又为杨军收去。孝感刘家庙及大智门各处会集三万名伤兵，无米为炊。呻吟痛楚，怨气充塞。稍能行动，便到处抢劫。③ 武汉政府为打开局面，军事上派张发奎、唐生智率军入河南，与奉军相抗于京汉线，政治上则尽力拉拢西北的冯玉祥，想要争取冯对武汉的支持。

1927 年 6 月 10 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孙科、于右任、谭延闿等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会议约定唐生智、张发奎部回鄂，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靳云鹗统率的河南保卫军和一些临时改编的军队都归冯玉祥指挥。但武汉政府联冯反蒋的目的并未达到。冯随即又开始联蒋反共的步骤。6 月 16 日，冯玉祥在致阎锡山的电中说：“此次在郑晤及由武汉来此各同志，痛言吾党革命势力不可为人挑拨而分离，介石功在党国，万不可没。以后救中国、救民众，惟有遵先总理遗教，与吾兄忠实前进，协力北伐。……目前军事责任，自属于我弟兄与介石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团结为一，以灭卖国军阀。……至于左倾幼稚派，必须尽力制裁，以杜渐萌，免危我党国。……贵部分兵两路，务请迅速发动，预计

① 《炸弹与征鸟》，《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 120 页。
② 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第 80 页。
③ 《武汉溃日暮途穷》，《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7 月 7 日。

介石沿津浦，兄以一部助之，兄沿京汉，弟出京绥，并出一部助兄，则奉逆不难平矣。我辈会师幽燕之日，所有党务政治问题，当依大多数之主张解决一切，以泯纠纷，我弟意见如何？"①

6月20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会晤于徐州，商谈反共之事。6月25日他致电阎锡山，略谓湘鄂之事，决定矫正，鲍罗廷应送其回国，国民党及政府必须统一，"汪精卫、谭组庵、孙哲生、宋庆龄、何香凝各同志，须合而为一，实行职务，其余出洋休息"。共产党员须报明何时加入共产党，或先宣布退出共产党再加入国民党，方能准其活动，"否则均送其出境"。各级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已照决议办法施行。② 6月27日，阎锡山的代表赵丕廉电阎："焕章真善变，诚恳表示反共，与蒋合作，联电服从三民主义，完成北伐，蒋助冯款百万，冯并马电警告武汉，促谭（延闿）、孙（科）赴宁与廉出省。"③

此时，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分裂已箭在弦上。当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斯大林的"六一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立时给汪提供了"分共"的借口。汪说，如今，"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若要将革命带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只有消灭国民党；若要将革命带到三民主义的路上去，只有消灭共产党。④ 武汉政府在国共分裂中走向末路，叶永蓁"小小十年"的革命生涯，就这样惨淡收尾了。

1927年8月，武汉《中央副刊》刊出一首小诗，作者署名"无法"："我每想我一切的过去，漂泊烦恼的生活，逃不出哀求的空虚！我心头满藏无限的冲突，我心里堆积无限的伤痕。因此我两膝疲乏如困犬，温和的阳光不能复活我破碎的希望！"⑤ 诗中表达的愤懑、悲哀、困顿、无奈，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青年的境况。

国共分裂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各种革命组织纷纷解体，从全国

---

① 《开封冯总司令成密铣电》（6月16日，7月5日到），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微缩4/1648-1649。

② 《开封冯总司令成密有电》（6月25日，7月9日到），阎锡山史料，微缩4/1657-1658。

③ 《上海赵芷青里密廿七日电》（6月27日，7月1日到），阎锡山史料，微缩4/1661-1662。

④ 《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的演讲），《汪精卫集》第3卷，第222、231、232页。

⑤ 无法：《请你接受我的祈祷吧》，《中央副刊》第135号，1927年8月8日。

会聚到革命队伍中的革命青年，都成了失林之鸟。这些青年，大多是旧礼教的反抗者，是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的人，于是只得四处流亡。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邓文仪在回忆录中说，国共分裂后，仅黄埔军校第六、第七期学生，逃到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就有近千人。[①] 这些青年在大城市中无事可做，革命理想遭遇幻灭，生活得不到安顿，一时又找不到继续革命的出路，窘迫而消沉。有人描述当时的青年："开起口来总是一个'唉'字，动起笔来总是'呜呼'二个字。"[②]

在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许多曾经的革命青年用纵情声色来打发时光。邓文仪说，1927 年 12 月下旬，他从广州来到上海，初尝流浪生活，很快就遇到同期的几位同学，他们都一样是在上海流浪。于是几个人"没有事常到长三堂子里去打麻雀牌，或者用条子叫了姑娘到旅馆内陪着打牌"，过了几个月真正的"花天酒地，非嫖即赌"的荒唐生活。[③]

绝望带来空虚的堕落，也带来悲愤的自戕。1927—1928 年，在革命的暴动和反革命的屠杀中侥幸逃生的青年，创造了自清末和五四时代之后，民国史上又一个"自杀时代"。在 1927—1928 年，到底有多少人自杀，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各种报纸对于自杀的报道，日不绝书，尤其是在上海，一些失意知识青年投黄浦江自尽，因而被上海新闻记者戏称为"黄浦同志"。[④] 青年作家顾仲起，不幸也成了"黄浦同志"中的一员。

1928 年 1 月 12 日，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悲愤和苦闷的矛盾，写下一篇《严霜下的梦》。梦境的开始是步哨，风雨的操场，整齐的制服，说着各种方言、聚在一起的喜气洋洋的男女。接着，又听到悲壮的歌声、激昂的军乐、狂欢的呼喊、春雷似的鼓掌、沉痛的演说。一切都是如此美妙而庄严。进而，梦境变为红的、热的、动的一片，上面显出字迹来，作者努力地辨认，看出前面的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后面写的是"世界革命三大柱石"，可是中段，却是模糊的。忽然，"轰！屋梁平

① 邓文仪：《冒死犯难记》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73，第 109 页。
② 张振之：《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民智书局，1929，第 83 页。
③ 邓文仪：《冒死犯难记》上册，第 107 页。
④ 张振之：《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第 83、100—101 页。

空掉下来”。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已经消灭了。[①] 这种中段模糊的意象，隐喻了大革命社会基础的虚弱。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经说：“胡适之先生说得好，‘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义〕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然而智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这是旧的智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智识阶级。”[②]

如果晚清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顺利，社会发展正常，这些青年，本应在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图谋发展。然而，整个民国时期，国家的分裂，政治的动荡，战争的破坏，农村经济的破败和城市工业的衰微，都使这些新式知识青年无法被现有的社会结构所吸纳。从“五四”到“五卅”，全国各大城市中便聚集着大批这样的新知识青年，他们被瞿秋白称为“薄海民”阶层，意指“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③]

这个“薄海民”阶层，脱离了家庭，脱离了久已处于倾颓瓦解中的宗族社会结构，在城市中流浪漂泊。瞿秋白说，“薄海民”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和流浪者，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叛徒”，是一些城市里的“波西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④] 然而，不仅瞿秋白自己是城市中“波西美亚”的一员，1920年代这场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些“波西美亚”的革命者。

国民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性情浪漫而未脱个人主义色彩，也未能做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文艺气息，许多人本身就是文学青年。他们从乡村来到都市，亲身体验着现代城市生活的放纵、空虚和内心的孤独，因面对革命的组织和团体生活有着热切的向往。但是，他们思想中个人解放、民族解放、

---

① 茅盾：《严霜下的梦》（1928年1月12日，最初发表于1928年2月5日《文学周报》第6卷第2期），收入《茅盾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54—58页。

② 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③ 《鲁迅杂感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113页。

④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2页。

阶级解放的诉求，混乱地纠缠在一起。要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解决个人的生存困境，这本身就显示出这场革命的内在断裂。正如鲁迅为叶永蓁《小小十年》所作的“小引”所说：

>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
>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类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①

当北伐军来到两湖后，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激进化，知识青年迅速被农工群众抛在身后。瞿秋白说，在“五卅”以前，“学生子”这三个字在工人以及农民之中，差不多就等于“革命党”，工农是欢迎他们的，往往请他们去领导，而在武汉政权走向反动的前后，不光国民党的青年，甚至共产党的一些“学生子”也在群众中丧失了信仰，农民群众遇着这些过去的“领导者”，甚至要枪毙他们，工人也拿着菜刀追杀他们。② 随着国民革命的激进化和国共分裂、革命失败，原来的大革命青年面临新

---

①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0页。

②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1928年4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3—354页。

的分化和抉择。许多人退出了革命的潮流。对于那些继续选择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如何将自身的不满和革命诉求，与广大的中国社会最深处的、中国底层民众中所蕴含的矛盾和力量结合起来，真正成为民众的先锋，这将是他们在此后漫长人生中将要完成的一个艰难的历程。

第六章　“娜拉”走后：前进中的革命女性

1920 年代，数以万计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女性为寻求自我解放，投身国民革命。革命政权向新女性敞开职业大门，为“娜拉”走后摆脱“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困局、实现自我发展，打开了社会空间。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自觉突破“五四”个人解放话语，由争取女性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走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变革社会政治的同时，提出了变革主体自身的要求。新知识女性从追求个人幸福、自我解放，到甘愿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我，为与工农相结合形成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而不惮于批判自我、改造自我，背后是更广大的新知识青年群体革命化的过程，反映出“五四”新青年对于新生活、新社会、新人格的不懈求索。研究这个过程，有助于从知识女性和青年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革命动力的产生、革命队伍的形成和革命主体的成长。

关于新青年的革命化，以下三种论述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一是诞生于反思“文革”和 1980 年代新启蒙思潮中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启蒙实现社会进步，但其目标所指仍是国家政治，最终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疾苦面前，政治救亡主题全面压倒了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启蒙主题。个体的我在革命中是渺小的，它消失了。[①] 二是有关 1920 年代青年“烦闷”议题的探讨。有学者指出，“烦闷的本质”是传统秩序解体时代青年对于“意义”的苦闷，“主义”提供了一套意义系统和解释框架，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合二为一，在政治中解决了人生问题。“主义”不仅关乎救亡，还重构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意义感和世界理解，解决“烦闷”问题的同时，造成了“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现象。[②] 三是 1980 年代在中国兴起的

---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第 1—46 页。

② 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许纪霖、刘擎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 13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 263—304 页。

女性主义论述。一些研究指出192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有一个从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到终为民族解放和国家政治目标所覆盖的历史走向。[①] 一个“从风起云涌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簸弄的历史变化过程”，一个从“女性解放”渐渐“走进国家”并“异化”的过程。[②]

以上几种论述侧重的方面不同，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国族/政治对于个体权利/欲望，乃至价值和创造力的“压抑”，并提出了关于后革命时代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及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国族/政治关系的思考。[③] 本章将继续讨论这一关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重要问题，以1920年代新知识女性从追求自我解放到投身民族解放、阶级革命的转向为中心，探讨新青年革命化或“左转”的历史逻辑，重视历史语境与个体的身心经验，关注她们在实践中的困境、磨砺和主体成长。

新知识女性的生命实践表明，在中国革命历史时期，救亡和启蒙、政治和个人、国族和女性等范畴，并非当代个人主义话语理解下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五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打造一个真诚勇毅、尊重个体、有感通能力、能自度度人的“新青年”群体作为改造中国的历史主体，同时开启建立中国现代个体和现代国家的议题。新知识女性自觉投身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革命运动，经受磨砺、考验，实现自我成长，代表了一种面向

---

① 王政、高彦颐、刘禾认为，20世纪早期中国的女权运动“确曾触及挑战社会性别权力等级关系议题”，可惜“这类议题很快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党派政治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笼罩下被边缘化了”［王政、高彦颐、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代序）》，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4—26页］。

② 柯惠玲：《她来了：后五四新文化女权观，激越时代的妇女革命，1920—1930》，台北：商务印书馆，2018，第13页。

③ 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入讨论。贺照田指出，这一论述的核心用意是在通过“启蒙”的边缘化来说明为何“原本现代的革命，逐步为前现代所侵染、侵夺”，以及为何“新启蒙”成为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任务，“而不会去追问、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等级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贺照田：《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第13—24页）。刘禾指出，李泽厚和维拉·施茨尔兹“似乎都把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叙事当作一个固定的、毋庸置疑的意义所在，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中国启蒙的程度及成败的根据，而不是把中国启蒙当作一个可以产生它自身意义及解释术语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三章“个人主义悖语”，三联书店，2014，第90—108页）。

政治和现实开放、不断吸纳外部经验以形成更大“自我”的主体实践。研究她们的生命实践，有助于超越个人主义和身份/性别政治，基于中国实际经验，思考个体和国族/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去想象和践行一种抱诚守真、刚健不挠、有反思能力、能不断突破自我本位的经验和认识、向广阔人类世界开放的现代“自我”。

一　解放自我

1920年代参加国民革命的知识女性，多接受过中等程度的新式教育。她们离家出走的动机，大多是逃避包办婚姻。北伐时期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黄慕兰（1907—2017），出生于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父亲是谭嗣同的同窗好友。黄慕兰没有缠足，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单日读经，双日读史，兼习英文、算术，可与父亲平等讨论问题。她说：“如果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决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而且又适逢其会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大半是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的封建压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①

以《从军日记》闻名的女作家谢冰莹（1906—2000），也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决心投身革命。怂恿她当兵的二哥对她说：“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婚姻问题和你未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她说：“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军服，拿着枪杆，思想又不同了，那时谁不以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富强的中国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②

逃避包办婚姻，不能等同于追求自由恋爱或创造基于情感体验的幸福生活。受“五四”个人解放思想影响离家出走的女性，确有一些因追求自由恋爱而进入小家庭生活的。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1924）、《伤逝》（1925），丁玲的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1930）都讨论了

① 《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第34页。

② 《女兵自传》，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60页。

新女性在小家庭生活中的问题。但还有一些女性想要冲破家庭生活的狭窄空间，在更开阔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质。虽然爱情对于年轻女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并且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纽带的重要方式，但她们不许自己沉溺于爱情之中，反而极力克制自己的欲念。国民革命为这些女性提供了机遇。

谢冰莹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一个异性的影子”闯进脑海，盘旋不去，这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带给她强烈的痛苦。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牺牲我的前途，我不能毁灭我的生命，努力挣扎吧！从苦海中救出自己！……不要忘记了你是个非凡的女性，不要忘记为求学而自杀的苦心。继续奋斗呵，你应该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①] 谢冰莹努力拒斥的是基于两性互动的新式家庭，在她还不具备独立经济能力的时候，逃离大家庭的束缚，仍然是失掉独立的社会生活和前途。

正在她苦闷挣扎的时候，北伐战争的号角声传到湖南。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广州黄埔军校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迁来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校招收了二百余名女生，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谢冰莹得到军校招生的消息，与二百多名青年男女一起，踏上长沙开往武昌的列车。包办婚姻和爱情苦闷一齐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她描述投考军校途中的情景：五十多个女同学挤在一节货运车厢里，齐声唱起歌，男同学听到，也接着唱起来，歌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像疯了似的在狂笑，在高歌，在跳跃……”[②] 一位女生在反对军校复试的运动中说：“我们脱离了家庭来献身革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民众和痛苦的自己；……政府既然把男女一律看待，使我们也有效命国家民族的机会，那是我们妇女的幸福、人类的光明。”[③]

女性飞出樊笼，是为了成为充分发展的、于社会有用的人。这条长路的起点是经济自主，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国民革命解决了女性独立最要紧的经济问题。左翼作家师陀（1910—1988）在1934年创作的小说《鸟》中，这样描述新女性投身革命的时代潮流：“大事变之来，往往由不得自己，风势向着什么地方吹，人就往什么地方滚。大家都这样，

① 《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56—57页。
② 《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61页。
③ 《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68页。

便铸成一种勇气和力。……那时代不同后来，只要伸出两手往上爬，只要胆壮一些，是不愁皮带披不到肩上的。于是同学们都小鸟一般尽量往外飞。……‘冲啊，时代是我们的!’……那时代张大着嘴，只贪婪的需要人：什么县城里，什么后方医院里，军队中的什么部里，处处都向那大的都市招手，永不会餍足。”[①]《鸟》的主人公易瑾，一个小杂货商的娇养女儿，此时也和同学们一起离校，到一个小县城做“委员”去了。

易瑾的形象塑造有其现实依据。1926 年 9 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湖北省各县开始组织党部，两湖女子师范的女生即纷纷离校，回县城参加革命。至 1927 年初，各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及各行业工会、妇女协会相继成立。县党部、青年团、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工会、农会中都有女生任职。[②]一个叫陈家瀛的女生，考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妇女党务培训班，1927 年被中央妇女部介绍到武汉军事裁判所工作。[③]有一位叫吴静贞的女青年，曾给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写信，讲述自己丈夫病故后遗产悉被夫兄剥夺、母女二人生活无着的苦痛，请求参加革命，为党工作。[④] 她也参加了妇女培训班，后被介绍到武汉军事裁判所工作。

1924—1927 年到底有多少女性参加了革命，很难得到准确的数字。例如，成立于 1925 年 5 月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在 1926 年 6 月拥有多少会员？广东省党部妇女部报告有 5000 余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报告有 1500 余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三届执委报告有 3000 余人。[⑤] 这种误差

---

① 《鸟》，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 1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 287 页。

② 李桂林：《孝感女青年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孝感市委员会编印《孝感市文史资料》第 6 辑，1989，第 123—124 页。

③ 《中央妇女部致军事裁判所函》（1927 年 7 月 9 日），五部档案，部 13913。

④ 《吴静贞上中央妇女部何香凝函》（1927 年 3 月），五部档案，部 13888；《中央妇女部致军事裁判所函》（1927 年 8 月 4 日），五部档案，部 13920。

⑤ 广东省党部妇女部 1926 年 5 月的工作报告称：“半年中成立二十个分会，会员达五千人。”［《广东省党部妇女部一九二六年四、五月份工作报告》（1926 年 5 月），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91，第 271 页］中央妇女部 1926 年 6 月报告称：“现有分会十四个，合计会员一千五百余人。”［《中央妇女部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五月工作报告》（1926 年 6 月），《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 281 页］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三届执委 1926 年 6 月报告则称：“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注：1926 年 5 月）以前，计有二十个分会，十四个支部，人数均三千余。”［区梦觉：《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三届执委接任后之会务报告》（1926 年 6 月 21 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第 676 页］

现象比较普遍。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不健全，上级党部无法准确掌握基层党部工作情况和党员吸收情况。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说，省党部妇女部曾派人到各地宣传党义，组织妇女团体，制定工作状况调查表并分发各县妇女部进行调查，还要求各县每两个月将工作情况报给省党部，可是在很多地方都遭遇“屡发通告函件均置诸不理”的情况。①

但可以确定，随着革命政权的扩大，国民党人数迅速增加，各地女党员人数和妇女团体数也显著增加（见表6-1、表6-2）。尽管从男女比例来看，女性仍是少数。根据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1924年国民党在全国共有女党员2000余人，到1927年3月超过13000余人。② 还有研究表明，1924年12月广州市国民党党员共15835人，女党员381人，占总数的2.4%；女党员中有244人来自学界，占女党员的64%。③ 到1927年初，国民党号称全国党员超过100万人，女党员占1.3%。④

表6-1 1924年至1926年4月国共合作组织的妇女团体

组织时间	名称	地点	会员	分会情况
1924年	妇女解放协会	广州	一千人以上	海丰、顺德、韶关、新会、梅县、琼崖、惠州等处已成立
1925年	女界联合会	厦门		未详
1924年	妇女联合会	梧州	数百人	未详
1925年	各界妇女联合会	上海	五百人以上	南市分会已成立，其他尚在筹备中

① 《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1926年12月），《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326页。关于国民党基层组织情况，可参考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分别见于何香凝《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之妇女工作》《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55、100页。

③ 吕芳上：《娜拉出走以后——五四到北伐青年妇女的活动》，台北《近代中国》第92期，1992年12月，第113页。

④ 根据王奇生的研究，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人以上。据同时期广东、江苏、上海、长沙等几省市党员人数增长率推测，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势极大扩张。到1927年4月，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党员总数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算，全国党员总数100万余人当非虚夸。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9—41页。

续表

组织时间	名称	地点	会员	分会情况
1925 年 11 月	妇女运动演讲会	上海		
1925 年	湖北妇女协会	武昌	八百人以上	
1925 年 12 月	广西女权运动 同盟会	广西		
1923 年	北京各界妇女联合会	北京		
1925 年	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	北京		
1926 年 11 月	女界联合会	河南	一百余人	
1925 年	女界联合会	衡阳	三百人以上	衡阳、常德分会已成立，其他尚在进行中
1925 年	青年妇女学艺社	湖南	二百人以上	
1925 年	安庆妇女联合会	安庆		
1926 年 7 月	各界妇女联合会	宁波	一百人以上	
1926 年	各界妇女联合会	天津	二百人以上	
1925 年	女青年社	江西		
1925 年	妇女协会	唐山		
1925 年	女界联合会	青岛	七八十人	
1925 年	妇女学术界〔协〕进会	山东	一百人以上	
1925 年	女权运动大同盟	山东		
1924 年	青岛电话局女子 进德会	青岛	五十人以上	
1925 年	妇女运动社	南通	数十人	
1926 年 5 月	各界妇女联合会	南京	数十人	
1926 年 6 月	妇女联合会	苏州		
1926 年 5 月	妇女联合会	吴江		
1926 年 5 月	女界联合会	温州	一百人左右	

资料来源：杨之华《中国妇女运动之过去与现在及其将来》（1926 年 4 月），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 1 册（1918—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第 148—149 页。

表 6-2 1926年5月至1927年3月国共合作组织的妇女团体

地点	名称	分会	人数
广东	广东各界妇女解放联合会	由六十余个女团体组成，包括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广东解放女工会等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四千余人 广东解放女工会万余人
湖北	湖北妇女协会	二百三十六个	八万七千余人[a]
湖南	湖南女界联合会	二十四个	二千余人
四川	成都妇女劳动会		六百余人
	四川各界妇女联合会总会	二处	约千人
广西	广西妇女联合会	五处	约六百余人
福建	福建省妇女解放协会		二百余人
	厦门女界联合会		八十余人
浙江	温州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四十余人
奉天	妇女协进会、青年会妇女部		不详
河南	青年社妇女部		五十余人
江西	各县妇女协会二十五处，但未成立总会	分会最多为南昌市及赣县	各有会员四百余人
北京	北京市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之友社		不详
山东	济南、临淄、诸城等有妇女学术协进会、山东女权运动同盟会、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女界联合会等		不详

a. 数字过高，疑误。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载，截至1927年3月，湖北省共有妇女协会236个；到1927年4月，省妇协下属49个县市成立妇女协会；5月，由于革命形势逆转，湖北省妇女组织遭到破坏，10多个县级妇女组织被迫解体（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554页）。另据《武汉市志》载，1927年3月18日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后，湖北省40多个县建立了妇女协会组织，会员达1万余人；到1927年7月，有61个县建立了妇女协会，34800余名妇女成为妇协会员（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第230页）。综合各种资料，1927年3月湖北妇女协会有分会236个，有人数1万余人，比较合理。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1926年5月至1927年3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卷》（上），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第100—101页。

革命政权为新女性敞开职业大门，更明确支持女性摆脱旧式纲常伦理束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倡导激进的妇女解放。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女子有遗产承继权、男女

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等主张。[①]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女子有财产继承权，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原则制定《婚姻法》，开放行政机关容纳女子入职等主张。[②] 武汉军校女生队宿舍门前大幅对联写着“斧钺纲常”，斩钉截铁地表示了向旧礼教宣战的决心。[③]“斧钺纲常”的副产品，是“浪漫女性”成为大革命的一道风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的朱其华，就曾在回忆录中记述一位同时与三个男性恋爱的女秘书的故事，并认为“这决不是‘党国之耻’，而是‘党国之光’！我们应该自豪：我们有了比潘金莲、潘巧云辈更伟大的英雄，这是表示了我们至少已经相当的战胜了封建意识”。[④]

向警予（1895—1928）曾将 1920 年代的知识女性分为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并认为“五四”新女性多属浪漫派，她们对现社会一点一滴都不满意，却不负破坏或建设的责任。她们无偶像，无信仰，睥睨一切，唯“我”独尊，几乎成为“空想的玄虚的感情狂”。她们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一举一动纯任自然，“做人”与“向上”都被斥为“虚伪上”，在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口号下过着游荡飘忽的生活，并以为“这就是妇女解放！”她们“从未与社会接近，也从未受过意志的锻炼”，所以一接触现实，遇到打击，就灰心丧气，偃旗息鼓。[⑤]

但是，向警予不仅看到浪漫女性身上的弱点，也看到她们觉醒的“自我”意识和对真挚人格的要求，以及由不满走向革命的可能，因而真诚盼望她们能从知识、意志、人格等方方面面改造自己。她说“浪子的心是颗宝”，她们一旦觉悟，“努力改变浪漫的性质，把伊们自己的言论实际应用到事实上去，而且注重意志的锻炼和知识的培养，伊们也许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1923 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1921—1925），第 155 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1926 年 1 月 16 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卷》（上），第 78 页。

③ 谭勤先：《中国女兵的感情世界——我党领导下第一代女兵的述说》，《国防》1995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④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能回忆》，第 39 页。

⑤ 《中国知识妇女的三课》（原载《妇女周报》第 15 号，1923 年 11 月 28 日），戴胡蓉、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第 151—153 页。

可做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前锋"。[①]

国民革命吸收了很多"浪漫女性"，她们在妇女部、政治部等革命机关里任职，然而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者。1927年在武汉的白薇在她写大革命青年的小说《炸弹与征鸟》中说："有些人，在会场时总是大吹特吹革命，革命！一离了会场呢，她们底生活，不特是丝毫没有感染革命的精神，而且不是发挥勃卢乔亚的极致，便是戴革命为招牌，行妖妇底勾当。"[②] 茅盾早期的小说也塑造了一批革命队伍里的浪漫女性形象，她们彻底打破了贞操观念，在性的方面热烈开放，令那些贤淑女子相形失色。有学者认为，她们既是欲望主体，也是人格主体，颠覆了性别权力关系，反映出茅盾的女性主义立场。[③]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之一是控制自己的感官享受，由男性欲望的客体一反而为欲望的主体。正如美国性别研究学者阿莉森·贾格尔指出："激进女权主义政治最紧迫的目标就是为女性重新获得她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④]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后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程度高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实践，前者提出了女性的自我发展、身体自主等议题，肯定了自然人性和欲望的正当性，后者则在强调男女平等的同时，压抑了女性话语和女性意识，以国家、社会等整体性目标遮蔽了女性的个体和身体诉求。

然而，以西方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中国革命，不能忽视其产生的战后西方历史语境与中国革命历史语境之间的距离，以及富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诉求与后五四时代新知识女性的解放斗争在身心经验、行为逻辑和政治目标上的差异。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回到历史情境当中，把握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以打破从当下观念和话语系统出发建构的历史想象，从而将历史实践转化为历史认知，真正变成我们的历史经验。国民革命中激进的妇女政策和"斧钺纲常"的伦理实践是否构筑了两性平等，欲望自主的摩登女性是否体验着真正的身心"解放"，革命

① 《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向警予文集》，第151—153页。

② 《炸弹与征鸟》，《白薇作品选》，第152页。

③ 杨联芬：《茅盾早期创作与女性主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④ 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399页。

潮流中的“娜拉”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很多国民革命的亲历者都留下了他们的观察与反思。

二 冲出重围

（一）“真诚”的创伤

茅盾1927—1928年创作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都用大量篇幅描写了革命队伍中摩登女性的欲望体验。文学形象是基于特定话语系统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建构，不能直接还原为客观实存的历史真实。但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书写却有着相当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历史认识价值。作为早期中共党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武汉中山大学讲师和《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茅盾亲历大革命的开展和失败，试图通过描写他最熟悉的群体，反思那个变动的时代。他的创作活动本身即是一种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

关于《蚀》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茅盾说，1926年他在上海，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这幻想便让她们参加了革命。也有人在生活上碰了钉子，便愤愤然要革命，“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这样思想意识的女性也在武汉被发现，并且性格更加鲜明。大革命失败，他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于是《幻灭》便以三个女性做主角，她们代表许多人，是三种典型。不过茅盾也说，他“没有写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①

茅盾对于新女性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笔下那些既像天使又像魔鬼的浪漫女性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现实？曾有学者指出，《动摇》中孙舞阳一类的女性形象具有抽象性，缺乏现实依据。她们特立独行，不受社会关系羁绊，“仿佛生活在激情的历史里，逸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既带有苏联革命胜利初期“杯水主义”的

① 《几句旧话》，《茅盾全集》第19卷，第438—442页。

色彩，又有英法“颓废”文学中的“尤物”的影子。她们既富于主见又莫名其妙地含着“媚怨”，既惯于情场又不失少女的纯真活泼，既玩弄男子于股掌之中又没有恶意，让男子又爱又怕，却未尝不符合他们的心意。[①] 放置在大革命血腥残暴、光怪陆离的背景中，这样的女性形象既给都市小资产阶级读者带来刺激，也“折射出一个男性作家的革命想象与疑虑、苦闷与希望”。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脱党，靠卖文为生，其创作不得不臣服于印刷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并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预想读者。[②] 那些欲望主体的塑造或许和这种处境相关。

但正是这种带有想象性的将女性的能动性与开放性推至高峰的文学形象塑造，反过来显示出以欲望觉醒、身体自主为表征的妇女解放话语的迷思。《追求》中的章秋柳是“浪漫女性”的极致，她是放浪人间、热烈爽朗的唯我主义者，身体解放也很彻底。她不愿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也不很能抛开肉体欲望和物质享乐、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然而当大革命失败，理想中的热烈生活仅剩下纵欲无度时，她反观自己“在污泥中挣扎似的生活”，难免心中“充满了寂寞和荒凉”，分不清究竟是快意还是无聊，最终不得不承认，“所谓快意者，到过后思量仍不过是悲凉而已”。[③] 她想用爱情的热力把怀疑遁世的史循改造过来，最终是自己可能染上了梅毒。

茅盾笔下的浪漫女性是可爱的人，也是受伤的人。她们身体健康，充满激情，有向善的焦灼，却往往所遇非人。她们目睹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不愿投降魍魉世界，又不能投身工农革命。她们解放了身体，但绷紧了神经，精神极度苦闷，毅然决然而无处施力，出路与绝路形影相随。与其说茅盾推崇女性主义，不如说他看到女性作为欲望的投射物，在社会动乱中承受着可怕的暴力。反身成为欲望主体并不能改变女性的真实处境，欲望的追逐不是妇女解放的标志而是迷途。

更重要的是，透过“浪漫女性”的挣扎和迷茫，茅盾写出了个人解放的历史困境，反映出作者对“五四”话语的深刻反思。与向警予一

---

①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20页。

②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第8—9页。

③ 《追求》，《茅盾全集》第1卷，第369页。

样，茅盾在“浪漫女性”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欲望觉醒和身体解放，更是一种觉醒的内在“自我”和真诚、反抗的人格，以及这种真诚的“自我”在现实中无路可走的扭曲和畸形发展。《幻灭》中慧女士的“浪漫”，起于男性对她的伤害。她说：“像我，在外这两年，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但是我倒因此悟得处世的方法。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呵！”① 慧女士是刚强狷傲的人，当她第一次被男性欺骗后，就打定了报复的决心。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没有爱，对于过去只是愤怒，没有悔恨。她跳出了道德的圈套，无视旁人的讥笑。然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一种有出路的反抗。事实上她在内心深处仍然渴望着男性的真心对待和一个以婚姻为保障的“终身归宿”。她的“浪漫”不过是抚慰受伤心灵的无奈之举，失落的伤痛更多于解放的愉悦。

“真诚-创伤”的逻辑在《一个女性》中得到再现。琼华以诚挚光明待人，得到的是欺骗，她藏起“真我”，用私心鄙弃的“假我”对付人，“这假我，却帮助她在社会上高高升上去”。她由憎恨现实而为现实所同化，变成一位社交“女王”，最终“想不出一条路给自己勇敢的活着，没有勇气在这罪恶的世间孤身奋斗了”。② 扼杀她的不再是旧礼教，而是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结成的社会，它复制了旧社会的虚伪、残酷，仍是覆灭“真我”的泥潭。

“五四”知识分子痛感传统礼教秩序僵化，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渴望去伪存真，建立一个尊重人性、人人平等、具有感通力的新文化和新青年主体。叶圣陶说他写小说是想暗示“人与人的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有一天“大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以心，不是相见以貌”。③ 茅盾则以天真洁白的女性被男性摧伤的命运，喻示了真诚的“自我”在腐恶社会现实面前遭受的伤害，写出了“五四”个人解

① 《幻灭》，《茅盾全集》第1卷，第9—10页。

② 《一个女性》（最初发表于1928年11月《小说月报》第19卷第11号），《茅盾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52—84页。

③ 顾颉刚：《〈隔膜〉序》（1921年），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102页。

放话语的局限，呈现了一个动荡、匮乏的半殖民地社会里新女性的挣扎和无所适从。她们“是被觉醒了，是被叫出来了，是在往前走了，却不是到光明，而是到黑暗！呐喊着叫醒青年的志士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光明幸福的社会来容纳那些逃亡客！”①

大革命失败后，关注与思考新知识女性的命运和出路并付诸文学实践的，不仅是茅盾，还有许多作家。师陀的《鸟》写了一个投身革命的女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经历。自从一个可怕的风雨夜里，“同志”邱委员潜入她的房间之后，命运就一年坏过一年。她也计划过复仇，可是总没有机会，也想到过自杀，又怜惜自己的生命。转眼六七个年头过去，她由白褂青裙而军服，由军服而短袍，又改穿长袍。她的未婚夫在国共分裂时“失踪”了，她怀过三个孩子，都不曾出世，她自己的路也越走越狭。原想做一番事业，后来就只望一个惬意的丈夫，再后来只望别人不要将她随随便便抛弃。最后是“裁员减费”，连一个可以马虎下去的职位也失掉。小说在这里终止，师陀没有为她的主人公想到一条出路。②

师陀1910年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大革命时期在开封读中学，大革命失败后，他见到很多同学被捕，后来写过几篇大革命后青年寻路的小说。1931年他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同年以“芦焚”为笔名，投稿给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丁玲来信鼓励，问他是否愿和“左蓮”女士交朋友，即是否愿意加入“左联”，他拒绝了。③ 与茅盾的视角不同，师陀无意塑造自主的攀登女性，他准确把握大时代面前人们随流沉浮的现象，写了一个思想较盲目、性格较软弱的女性。易瑾投身革命有追随潮流的性质，但与身边各种龌龊的男性和放浪的女性相比，她仍是真诚善良而有守有持的人。师陀揭示了革命队伍中的女性不仅受到来自敌人的威胁，还遭受身边的男性伤害的真实处境，以及除非再起革命、根本改造社会，否则她们仍是无路可走的现实。

（二）“浪漫女性”的求索

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贫穷、动荡，大多数妇女还局限在家庭生活中

---

① 《虹》，《茅盾全集》第2卷，第114页。

② 《鸟》，《师陀全集》第1卷，第283—298页。

③ 《我的创作道路》，刘增杰、解志熙编校《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365，369页。

时，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往往容易陷入各种恋爱关系，而被视为“浪漫”。谢冰莹就是时人眼中一个浪漫的女性。她晚年说：“两个人一定要有爱情，……要合不来的呢，不要勉强，就离婚，分开。我的思想是很新的。……所以后来很多很有名的人都骂我说谢冰莹是浪漫主义，吹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吹了，真是浪漫得不得了。”①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军校女生队解散，谢冰莹无奈回到家中，又落入包办婚姻，出逃四次才成功，来到上海挣扎求生。

没有了革命组织的庇护，职业、生计、前途重新成为问题。在四处弥漫的恐怖、颓靡和失望情绪中，很多人堕落下去。谢冰莹目睹身边的女性，有的做了军官的姨太太，有的成了大都市中的色情“商品”。曾经为反抗封建婚姻不惜自杀的女孩，却逃不脱奢靡享乐生活的引诱，多少善良的青年在物质的诱惑下走上歧途，让她不禁感慨“上海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②

谢冰莹想求学，想“寻找自由，求自我独立，不倚赖别人”。她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以一个单身女子能够自始至终不向金钱物质投降，宁愿忍受三天三夜的饥饿，喝自来水当饭吃，……我没有像那几位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小姐一样，走上交际花、明星之路，过着灯红酒绿糜烂浪漫的生活。”③

谢冰莹在上海亭子间里忍饥挨饿地写作，与几位同是旧社会“逃亡者”的朋友相互扶持。有钱时，分给穷朋友用，或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吃一顿饱饭，至少可以挨饿三天”。穷困时，“一个跑去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她描述饥饿的滋味，“比死还难受，……好像有一条巨蛇，要从你的腹内咬破了皮肉钻出来一般”。有时饿得头晕眼花，坐起来又倒下；“有时一口口的酸水，从肚子里翻上来”，想呕吐，却又吐不出半点东西；“有时饿得实在不能忍受了，想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下一块肉来吞下去”，这时才相信“易子而食”是真有其事的。虽然穷到这个地步，她也不愿意“向有钱

① 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第106页。
② 《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227—228页。
③ 《关于〈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5页。

人低头”，“更反对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①

1931年，谢冰莹拿着自己赚到的650元“巨额”稿费，赴日留学。刚踏上日本国土，就得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留学生的防范，侦探遍布，中国学生不但被严密监视，还经常受到侮辱。有日本教员在课堂上公开说，日本占领东北是中国人的幸福，中国政府没有能力管理人民。谢冰莹还遇到几个七八岁的日本小孩一边叫着“支那人”，一边向她丢石子。她说：“我们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每天下课回来，大家互相诉说着被侮辱的情形。”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每个人都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②

1931年10月，中华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秘密筹备，在东京召开了追悼东北死难同胞集会，大会上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为东北同胞复仇”的口号，遭到日本军警镇压，很多人被捕，谢冰莹也被驱逐回国。这次短暂的日本之行，让她深刻体会到贫弱国家国民的屈辱。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谢冰莹本着“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信念，在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淞沪抗战前线。她说“北伐后妇女的活动被‘到厨房去’的口号封锁过”，今后妇女“要从家庭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这便要看妇女们是否能到前线去。③

谢冰莹的好友、女作家白薇（1894？—1987），也是传说中的一个“浪漫女性”，据说和很多作家有过恋爱关系。她15岁做童养媳，受到婆婆和丈夫残酷虐待，死里逃生，辗转来到日本，靠当女佣谋生，自修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白薇在武汉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工作，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④ 谢冰莹说，白薇是中国所有作家中“最穷困、最凄苦，也是最孤独的一个”，而她是个倔强不屈的女性，有反抗精神，有正义感。⑤ 白薇在日本时，与左翼诗人杨骚由相爱而同居，由

---

① 《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190页。

② 《女兵自传》，《谢冰莹文集》上册，第234—236页。

③ 佚名：《谢冰莹会见记》，《抗战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7年，第30—32页。

④ 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第9—23页；白薇：《我的生长和发蒙》，柳亚子等编《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第一辑，光华书局，1933，第27—39页。

⑤ 《贺白薇》，《谢冰莹文集》中册，第204页。

同居而分手。她在自传小说《悲剧生涯》中写了自己的经历。在东京分手时，“展”对“苇”说：“信我，我是最爱你的，但我要经验过一百个女人之后，然后疲惫残伤，憔悴得像一株从病室里搬出的杨柳，永远倒在你怀中！你等着，三年后我一定来找你。”三年后，“苇”来到武汉，“展”果然来找她了，“经验过各种各色的女人，消瘦疲倦，带着一身的病回来”。①

杨骚把性病传染给白薇，使她半生受着病痛折磨。白薇说，《悲剧生涯》写了一个出走的“娜拉”的挣扎，“她的想向上，想冲出一切的重围，想争取自己和大众的解放、自由，不幸她又是陷到甚么世界，被残酷的魔手是怎样毁了她一切”。那些不近人情的仿佛是虚构的悲惨故事，“都是百分百的事实！”② 白薇和各种男作家的恋爱传闻是不是真的？她的领悟是：“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全由社会、环境、男人、奖誉、毁谤或谣传去决定她们！”然而一个出走的又在前进中的娜拉，不在意世人的评价，“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热烈的向上的心，……只顾生活，生活，真挚地去生活，受难地去生活。生活就是她底整个”。③

白薇有着清醒的女性自觉，终身书写着妇女的苦难、不幸和反抗，她认识到，“男人的社会总是替男人说话的，女子没有正当的出路和给女子的公理”，但这不是两性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被压迫的妇女是所有被压迫大众的一部分。她在给谢冰莹的信中说，中国妇女的地位对于整个中国的进化，就像对行驶的火车撒煤毁锅炉，“我们为甚么活着？……就是要对万众的耳朵呐喊：不准对行驶的火车撒煤毁锅炉！……妇女们应该联合起来，为祖国的前进而奋斗！”④ 1933 年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成立，白薇是发起人之一。她们说：“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只要是一个被压迫的大众，他就有起来为着自己、为着整个被压迫大众而战斗的使命。……我们要把一切被压迫的妇女们团结在一条战线上，一面为着整个被压迫大众的解放而斗争，一面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⑤

---

① 白薇：《悲剧生涯》，文学出版社，1936，第 273 页。

② 白薇：《悲剧生涯·序》，第 1 页。

③ 白薇：《悲剧生涯·序》，第 5—6 页。

④ 黄白薇：《地之养子：寄冰莹》，《妇女月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第 48、52 页。

⑤ 欧查、白薇、李兰：《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缘起》，《正路》第 1 卷第 1—2 期，1933 年，第 339—340 页。

三 走向大众

（一）实践中的觉悟和反思

投身革命运动、接触广大民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让底层民众的痛苦进入妇运工作者的视野，阶级话语进入妇女解放实践，新知识女性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到，女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与风俗人心的深刻变革，妇女解放是这一整体性变革的组成部分。只有彻底变革中国社会，妇女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解散，原妇女部干事陆晶清（1907—1993）回到北平，继续求学，同时担任了《河北民国日报副刊》主编，想借这一刊物“阐扬革命理论”，“实行革命的文艺政策”。[①] 她反省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思考今后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陆晶清是1920年代文坛活跃的女诗人，出版过《低诉》《素笺》《流浪集》等多部诗歌、散文集。她出生于昆明一个小古董商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时曾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以及《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与鲁迅有较多交往。[②] 陆晶清和刘和珍、许广平都是女师大（高师）的学生运动骨干，全程参加了女师大学潮，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后经李大钊、陈廷攸介绍加入国民党，进入中央妇女部工作。

陆晶清从妇女解放的实践和具体问题出发，而非从激进革命理论出发，将目光投向革命中“旧式”妇女的遭遇。她看到，自国共两党提出“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口号后，到妇女协会求援的大量是被丈夫抛弃或离婚后不能生活的妇女。她们在家庭中没有经济地位，在社会上没有谋生技能，一

---

① 晶清：《致辞》，《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期，1928年12月1日，第1页。

② 卓光平：《白族作家陆晶清、陆万美姐弟与鲁迅的交往考》，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第218—227页。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高师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陆晶清是台下受震动的二百多名学生中的一员。鲁迅认为，女性在一个由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如无独立的经济能力，“娜拉”走后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或者堕落，或者回来。陆晶清说：“从此，同学们常互问‘娜拉走后怎样？’答复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到广东去！’”（《鲁迅先生在女师大》，潘颂德、王筱祖编《陆晶清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233页）

旦被遗弃，立时失去生活保障。孤苦无依而沦落者有之，濒于绝境而自杀者有之。虽然国民党明令经济上男女一律平等，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事实上很少能实行；按政策规定，离婚男子应付给妻子赡养费，事实上也很少能履行。陆晶清认为，妇女协会不能空喊妇女解放口号，要能在实际上为女性解除痛苦，在提倡婚姻自由的同时，必须切实解决离婚女性的生存问题，如设立临时收容所、筹办妇女职业学校、培训女子职业技能等。①

《河北民国日报副刊》曾刊出《旧女子应该入地狱吗?》一文，指出革命后一般新人物“第一个想的就是得一个时髦的太太”，重做新郎，又是蜜月旅行，又是新婚摄影，对于乡下那个无知无识、“做过机械式的太太，生过不期面遇的小孩”的旧女子，自然因其“不革命”而抛弃。“新女子解放了，旧女子应该入地狱吗?”② 陆晶清更进一步指出，时下号称“革命”的青年，岂只是否认家庭代办的妻子，就连自由恋爱的妻子也随时抛弃。她并不是反对男女自由结合、自由离异，乃是认为今日“女子还经不住这样的践踏”。③

女子既受旧道德压迫，又遭“新青年”践踏，说明在大多数女性尚无独立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而需要男性养活、保障婚姻的历史条件下，片面强调自由和欲望的合理性，并不能给大多数女性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平等，反而掩饰了旧的礼教秩序瓦解后、新的伦理规范确立前，许多“新青年”的道德虚无状态和女性实际承受的伤害。

陆晶清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受损害处境，却未将讨论局限于两性关系，而是提出了男女青年共同面对的经济压迫问题。她看到革命队伍中穷苦的男青年同样处于被剥夺的地位，丧失了人的尊严。她的小说《妻的像》，写一个在某军部任职的青年，在1927年夏武汉政府的风雨飘摇中，因军部欠饷，无力解决家中生计，妻子被迫沦为舞女的故事。主人公是革命军中一个普通青年，他的才力不算宏博，也无晋身之道，不像那些达官贵人一样有成千上万的进款可资挥霍。他地位低微，永远穷

① 晶清：《离婚绝对自由以后》，《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4期，1928年12月4日，第1—2页。

② 《旧女子应该入地狱吗？——做匪女士来信》，《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5期，1928年12月6日，第6—7页。

③ 晶清：《答信》，《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5期，1928年12月6日，第7—8页。

困，承受着社会的欺凌。[①] 小说的写作技法虽不高超，内容却是大革命青年窘况的真实写照，揭露了革命队伍中的阶级矛盾。

大革命中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使工农群众的痛苦和革命要求进入妇女解放的视野。谢冰莹说，“五四”以后的妇女运动只看到“封建”的痛苦，忘记了女工是更苦的人，今后妇女运动要帮助女工实现“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优待童工及孕妇……种种最低限度要求”，为她们争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②] 陆晶清更认识到，过去妇女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未能深入下层群众，忽略了领导农工妇女共同革命，不但失去妇女运动的基础力量，且不切合“妇女解放”的真义。此外，国民党各县市党部妇女运动的负责人能力薄弱，行动幼稚，不能深入底层贫苦妇女，了解她们的诉求，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如今革命势力崩溃，妇女运动随之消沉，欲重振妇女运动，必须先挽救革命。[③]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是最早到女工中做工作的，她较早认识到女工的生活最痛苦，女工要求解放最迫切，最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是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④] 大革命后，女工工作的重要性成为国共两党妇运工作者的共识。1928年，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刘蘅静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她认为中国的妇女运动已“过了女权运动的时期而入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时期”。然而“妇女”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妇女”中有农妇，有女工，有学生，有其他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她们的经济地位不同，找不出共同的利害、共同的需要。参政权为知识女性所重视，农工妇女看得并不重要；结婚离婚自由，女学生视为重要，靠丈夫养活的妇女则最反对，她们更关心的是蓄妾问题。女学生“智识能力在一般妇女之上，领导妇女运动本该由她们负责”，而上海的女学生大多“思想落后，行为腐化，重虚荣，轻人格”。而上海女工在全国最多，她们受苦最深，要求解放最迫切，“是妇女运动的基本部

---

① 晶清：《要的像》，《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7期，1928年12月20日，第5—6页。

② 冰莹：《几句贡献给做妇运工作同志的话》，《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135期，1929年6月10日，第4—5页。

③ 晶清：《从“三八节”说到中国妇女运动》，《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第71期，1929年3月8日，第1—3页。

④ 《妇女运动的基础》（原载《妇女周报》第81号，1925年4月13日），《向警予文集》，第221页。

队”，这是当时急需注意的工作。[①]

这些实践中获得的觉悟与反思，说明经过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中国的妇女运动已经突破“五四”个人解放和女权话语，成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底层的痛苦与力量，并不意味着能立即投身于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政治实践。能否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革命者，乃至坚强的、有觉悟的革命主体，还要经历很多艰难的求索和痛苦的锻造。

（二）在革命中锻造自我

1927年武汉“分共”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下设组织全部改组。“宁汉合流”后，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刘蘅静去了南京。原妇女部干事胡兰畦（1901—1994）不愿去南京，仍留在武汉国民党左派阵营中，接任了汉口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兼任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和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她看到国民党中有很多青年对时局不满，立志要改造社会，认为国民党还有革命的可能。于是与另一名妇女部职员[②]一起，团结一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原武汉军校女生队同学，继续奉行中山先生的农工政策。她们每天下工厂与女工建立联络，还将推粪车、倒马桶的女工组织起来，成立了有两千多会员的肥料工会。还发动群众，在1927年“双十节”召开了庆祝“国庆”的群众大会，动员上千名工人参加。[③]

1928年，桂系军阀控制了武汉，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胡兰畦、陆晶清等国民党左派逃出武汉，来到上海。在上海，胡兰畦接到正在江西的老友穆济波的来信和武汉女生队教官陶希圣的来电，他们

---

① 刘蘅静：《上海妇女运动概况》，《青年妇女》国庆增刊，1928年10月10日。

② 另一人胡兰畦回忆是陆君娜（陆晶清），档案记录为刘天素（1908—1990）。胡兰畦说：“我和陆君娜（陆晶清）不愿去南京，就决定派我接替刘蘅静的两个职务，……陆君娜原是刘蘅静的秘书，职务不变。”［《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第181页］据国民党“五部档案”中《妇女部致中央工人部函》（1927年8月26日）：“中央迁宁后，本部留职员胡兰畦、刘天素两同志，在汉指导妇女运动。此后女工运动进行，须得与贵部驻汉工作人员商榷一切，尚希随时与以襄助，特此奉达。”五部档案，部3478。

③ 《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第182—187页。

都约她去江西工作。当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比较能容纳左派，其麾下第九军军长金汉鼎对宋庆龄、何香凝极为尊重。金汉鼎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周官和与穆济波是同乡，请穆出任第9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培德还罗致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如原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许德珩任第5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江西省改组委员会副主任，刘侃元任省党部宣传部部长。还有一批武汉流落出来的左派都被安插到省党部工作。

临行前，陈公博给胡兰畦饯行，说他已约了许德珩、施存统等朋友，一起办个杂志，再筹办一所大学。这就是后来的《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1928年2月，胡兰畦到南昌时，许德珩、刘侃元等都已离开江西去了上海。她来到党务学校工作，当时一些她熟悉的左派如张光人（胡风）、军校政治教官黄克谦（黄松龄）等都在党务学校。陶希圣离开江西后，黄克谦代理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他是共产党员，不久就被捕了。①

胡兰畦等左派分子想在朱培德的势力范围内干一番事业。他们拥护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主张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事独裁，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创造生产的、劳动的文化。胡兰畦担任了革命行动委员会江西省委委员及南昌市委组织部部长。革命行动委员会在工人和学生中都有骨干，在政治和宣传上都有影响。1929年4月，陈果夫致电蒋介石，称胡兰畦等十一人寄生江西省政府内，阴谋破坏国民党，请电令拘捕，"处以严办"。② 朱培德为他们提供了保护。③ 但在随后反蒋派系发动的"护党救国运动"中，朱培德与蒋合作，国民党左派"联朱反蒋"的计划就落空了。

经过多年的闯荡和求索，胡兰畦的思想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寻求

---

① 《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第193—198页。

② 《陈果夫电蒋中正》（1929年4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300-00017-013。

③ 1929年5月1日，蒋介石电朱培德："拘捕反动言论之最著者，胡兰畦、刘侃清、汤仁溥等如不严惩，则江西党务绝无办法。"［《事略稿本》（1929年4—5月），"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00018-031］朱培德复电蒋介石称："属省党务自南昌市总工会选举纠纷以后，互相利用新闻宣传，置尤以互指为第三党为唯一攻击资料。胡兰畦等见事不明，不免有所偏袒，顾实际决非第三党。至《南昌新闻日报》，正以其登载消息，形涉偏激，早经属府饬令改组。属府宣传股因经费困难，早经缩小范围，该胡兰畦等已非在职人员。"有关党务纠纷，"请另派委员莅赣调查，真相自明"云云。［《朱培德电蒋中正》（1929年5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7-004］

个人和妇女解放出路、参与发起四川省女界联合会、办女子商店和女子工业社，谋求女性经济独立，不参与政治，发展到接受反帝反军阀、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思想，加入了国民党左派。[①] 她又在一次次反蒋斗争的失败中，看清了国民党左派的弱点——他们总想避免剧烈的阶级斗争，从对立的两极中找到妥协折中之道，但他们“既无得力干部，又脱离广大工农群众”，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缺乏力量，担负不起改造中国的重任。[②]

1930 年，胡兰畦在柏林经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端。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她带来空前广阔的视野和前所未有的精神成长。1932 年 12 月，胡兰畦在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大会上演说，得到德共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蔡特金（1857—1933）的鼓励。

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即制造国会纵火案，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胡兰畦也被投入监狱。这段与欧洲革命妇女一同被关押的经历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们的热情、勇敢、忠诚、对同志的友爱和在狱中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她深受震撼。她说，她时常产生一种人终有一死、万事皆空的虚无、消极情绪，比起她们，这是何等的颓废。“她们是英勇的创世者，……像冒着霜雪正向春天生长的花木，……在她们这一群光辉灿烂活泼泼的人当前，我只有惭愧，我只有警惕，我只有发愤，……鼓起新鲜的勇气，来踏上艰难的路程。”[③]

由于宋庆龄、鲁迅在上海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胡兰畦获得释放。她说：“其实我很不愿出去，……走到外面一看，我并不觉得比牢内光明好多，……在那道上走着的人们的脸上，并没有一丝的笑容，他们好像很愁苦地在奔驰。”[④] 在狱中，她看到了人的精神高度。后来她写成《在德国女牢中》一书，告诉所有“被压迫的姊妹们”，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上，“要得到真正的同情与爱抚，只有

---

① 胡兰畦的丈夫陈梦云的族亲陈书农在四川实力派邓锡侯部下任师长，1926 年陈梦云携带陈书农及其部下旅长林翼如的信件，赴广州与国民政府进行联络。《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 年）》，第 83、89、102、104—106 页。

② 《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 年）》，第 226—227 页。

③ 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生活书店，1939，第 92 页。

④ 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第 291 页。

在革命的队伍里!"①

只有在革命的队伍里奋斗，才能实现妇女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理想，这是黄慕兰较早就明白的道理，但在革命队伍里还要经历很多的困难和考验。黄慕兰天资聪颖，受过良好家庭教育，既能写文章，又能做群众动员组织工作，在武汉"是红极一时的人物"。② 1927年武汉"分共"前夜，已是中共预备党员的黄慕兰和丈夫宛希俨③一起，秘密转入地下，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陈潭秋（1896—1943）领导的中共江西省委担任秘书和机要交通员。

1928年4月，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时被国民党杀害。良师益友和亲密伴侣的牺牲，让黄慕兰陷入巨大的悲痛。她在晚年回忆说："希俨牺牲时刚满二十六岁，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的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他未竟的事业。"④

同年12月，黄慕兰接到党中央调令转往上海，她让母亲把不满周岁的婴儿接到宛希俨老家抚养，就投入了新的工作。在上海，她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直属领导是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一次，她在工作中受到委屈，又不慎丢失了中央会议记录簿，犯了重大错误。悔恨之余，想起牺牲的宛希俨，忽然对自己的命运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觉得自己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无颜面对领导。这样一闪念间，就纵身跳入黄浦江中。幸好被警察发现，搭救上来。

获救后，黄慕兰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他对黄慕兰说："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有缺点错误，都会受到党的严厉批评，……如果你挨批评或是受了点'委屈'就要去跳黄浦江，那你有几条性命啊？我们既已

---

① 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第1页。

② 《黄慕兰自传》，第34—35页。

③ 宛希俨（1903—1928），湖北黄梅人，1923年在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曾参与创建湖北黄梅的中共党组织，大革命期间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

④ 《黄慕兰自传》，第62页。

把生命献给了党，那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决不能稍不如意就轻生自杀。……自杀轻生，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冲动，虽只是一闪念间的糊涂思想，却是严重的错误行为。”他还说：“同志间产生些误会，对方的批评过于严厉，话说重了些，只要是善意的，就应当虚心地自我反省；即使与事实有出入，也应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你既已献身革命，就要一切从革命大局出发，而不应斤斤计较个人之间的恩怨。你是熟读古书的人，就应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①

这番严肃深长的教诲，将共产党人的行为要求和古圣先贤的人格理想贯通起来，在崇高的信念、大局观和历史责任感下，召唤主体超越个人局限，实现人格的升华。黄慕兰晚年在自传中说：“我心中豁然开朗，永志不忘。从此以后，我在革命征程上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曲折，受到多么严重的挫折、打击和误解，我都能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之。”②

1920 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自我”到“革命”的转向。妇女解放从冲破强制性社会制度与习俗束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发展到要求与男性共同承担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的重任，革命者自身也要改变，在自觉承担历史责任、重新落实伦理价值的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新人”。这个转向的过程并非国族/政治对女性主体的“压抑”，而是新知识女性自觉的认识和选择。以成为政治主体和历史主体的方式形成女性主体，体现出一种突破“自我”获得成长、超越个体成为主体、从性别自觉到突破性别规范的现代中国女性意识。

1980 年代后，以女性视角反思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研究逐渐成为妇女研究主流。“女性主义伦理的目标在于提供行动指南和对道德本质的理论理解，使任何女性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不得公开或隐秘地屈从于任何他人或集体的利益。”③ 它提供了一种批判视角，让我们去发现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实践中潜在的压抑机制，以及被国家、社会等整体性目标遮蔽

---

① 《黄慕兰自传》，第 70—71 页。

② 《黄慕兰自传》，第 72 页。

③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Ethics: Some Issues for the Nineties,”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March 1989, Vol. 20, Issue 1-2, pp. 91-107.

的个体和身体诉求。[①] 然而，在这一伦理目标和研究视角下，中国革命女性那些不能为女性主义所整合的生命经验和主体实践，却常常处于失语状态。

王中忱在1980年日本女作家田畑佐和子与丁玲的相遇中敏锐地把握到这种“解释的焦虑”。他说，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启发而参加女性解放运动、曾从丁玲作品中获得激励的田畑，在会见丁玲后，坦言自己的失望。她发现丁玲对她兴致勃勃谈论的西方女性解放运动不感兴趣，且对女性话题有意排拒。“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纳入自己所设定的‘女性主义’脉络，但被视为‘先驱者’的丁玲却固执地不肯‘就范’，……其实是丁玲丰富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写作实践，让田畑和她的同人们的‘新女性主义’论述遭遇到了挑战和考验。”[②]

本章研究192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转向的历史过程，试图把握新知识女性从“自我”走向革命的历史语境、生活实践、价值观念和主体意识，理解这一转向的历史逻辑。如果说西方女权运动是在一个完整的国家结构和政治秩序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女性通过个体联合形成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抗议，去改变性别歧视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观念，那么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则是在国家分崩、列强环伺的局面下，与革

---

① 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27—38页。

② 王中忱：《女性视线：跨越时空的交错》，台北《人间思想》第16期，2017年秋季号，第127—128页。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以女性主义理论解释中国革命经验的局限性。裴方指出，越来越多的性别史研究者开始立足中国女性真实经验，反思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张力，反对使性别优先于国族、阶层、地域、代际等其他分析框架，因而将历史主体简化为性别主体的做法，而是越来越关注中国学者能否在深入理解自身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有阐释力的性别理论。有学者明确揭出反对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实践，而是要反过来总结中国妇女解放之经验，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妇女解放提供借鉴（裴方：《在历史与性别之间——大陆地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知识史路径》，《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6期）。宋少鹏指出，19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理论传入中国，正应和了后革命时代对于革命的解构思潮和呼吁（个体）主体性的市场时代的意识形态需求。研究者一方面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实践是“被解放”，妇女没有主体性；另一方面对国家秩序下各类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进行重视，从前后两个时段同步挤压，参与到对革命及其压迫-解放话语的解构中。这反映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革命效能的女性主义批判话语，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反而可能出现的认识偏差和去革命化效果（宋少鹏：《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

命运动同步展开。

中国女性从清末起就以“国民”的自觉意识投身政治运动。中共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是先已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靦颜以求女权，岂非天下大愚！”[①] 在她们看来，“解放”意味着有资格去承担责任，女性只有成为政治主体，才能成为女性主体。

性别差异和性别的自我限定性也是中国革命女性力求突破的。红军女战士曾志（1911—1998）作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生，说：“男女平等，男的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男的做得更好，……我克服了生理上的种种不便和不利，要咬紧牙关战胜困难，……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女性。”[②] 这种精神气质在极度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特殊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强化。1944 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他写道：“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边一位 C 女士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她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这种执拗的答语，竟使我无辞可驳。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③]

1920 年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女性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内在“自我”，因而能起身反抗压迫、限制女性自我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又对社会公正和普遍的人类幸福怀有热望，认为女性从事自我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应当“朝个较高的较进步的理想走”，“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④] 正是对民族国家和更广阔人类命运的连带责任感，一种“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觉悟，让她们走向革命和社会主义，历经挫折磨难而不失掉在历史中实现人类解放的信念。丁玲在晚年说：

---

① 《中国妇女运动杂评（从六月到八月）》（1923 年 12 月 1 日），《向警予文集》，第 155 页。

②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 24 页。

③ 赵超构：《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第 86 页。

④ 向警予：《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2 册，1985，第 204—205 页。

"人生啊，实在是太曲折了，也太痛苦了。我们要革命，要做工作。可是，我们不容易取得很好的条件和环境，发挥自己的能量。有时我们得在很重的压力底下，倔强地往上生长。"① 她们的历史实践和身心经验，应可为今日女性的自我理解、精神解放和人格成长提供丰富的启发，也有助于我们立足中国经验，切实有效地思考现代中国的个体性问题和意义、价值建设问题。

① 《我与雪峰的交往》（1983年5月30日），张炯主编《丁玲全集》（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273页。

第七章　再上征途：小资产阶级哪里走

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否走通共产主义革命道路，以及，如果走共产主义革命道路，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如果不能走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又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道路。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概念的含义和应用亦十分复杂。它既是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思想批判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改造主观世界、去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功能。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判断，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国民党改组派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一些既反对国民党“清党”屠杀、腐化堕落，又不想走中共工农武装革命道路的青年，受到改组派理论吸引，希望跟随国民党继续革命。一些自我认同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向文艺的道路走去，希望以文学艺术润泽人的心灵，

① 以往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分析和文学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论述，如支克坚《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郑坚《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溯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郑坚《延安文学以来的“新人”形象塑造与小资产阶级问题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王小京《试论毛泽东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观》，《理论月刊》2007年第6期；郭若平《20世纪20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张广海《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尹传兰、刘锋杰《阶级对文化与审美的僭越——中国现代文论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考查与认识》，《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4期；等等。

祛除时代的弊病。中国共产党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由此开启了中国革命主体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历史进程。

一 追随国民党左派

（一）寻路的左派青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青年惨遭杀戮，劫后余生者亦流离失所，陷于彷徨苦闷之中。虽然“训政”体制下的国民党竭力压制激进思想与民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人们对形形色色左翼思想的探求，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许多留在国民党左派阵营中的知识青年，既反对“分共”后的国民党，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武装革命道路，同时又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要求改革腐败政治，渴望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出路，渴望新的革命理论与行动。

1927年12月，戴季陶在中山大学做了题为“青年之路”的系列演讲，后编为《青年之路》在上海出版。他从人生观、世界观到现实政策阐发，系统解释了国民党的青年政策。他要求青年“虚心平气”回到学校，从学问中寻找自己和国家的出路。他说：“只要青年们的言行沉静着，现在社会上固然少了若干纷纠，同时在将来社会便多了许多生气。”他希望那些搞政治的人，不要再发那“错误而又自私自利的民众狂”——把青年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他要求青年有爱人、爱国、爱民的心胸，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恢复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纠正新文化运动提倡个人主义所导致的革命青年虚无、放纵的弊病。[①] 1928年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命令禁止青年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要求青年回到学校，“教之以正当之学问，导之以正当之道途”。[②]

---

① 戴季陶：《〈青年之路〉序》（1927年12月于上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1983，第105页。

② 《二届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7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12—513页。

戴季陶对青年问题的理解，体现了一些国民党人重建中国社会伦理秩序与文明传统的责任感，但他们试图压制而非召唤青年的政治热情，无视青年的主体状态，无视青年是有着独立思想与情感的“人”，而非政客的“工具”。青年的激进化，并非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而是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和青年对国家、对社会的热忱。正因为国民党缺乏对青年“主体性”的理解，所以尽管他们希望以传统道德纠正现代个人主义的弊病，但是关于传统道德如何能真正落实到个人身心当中、使主体自觉地扩大、成长，体认到个体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联系，学会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理解生命的意义，这些复杂的问题，南京政府的理论家都缺少深入的思考与制度设计。他们所提倡的传统道德悬在半空中，成为一套空洞的意识形态，无法吸收青年心中真红的热情，也不会得到热血青年的真心拥护。

1928 年 8 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丁惟汾提出的“革命青年之培植及救济案”。提案中说：“青年同志，牺牲一切，从事革命救国，自所乐从。兹者全国统一，彼辈亦功在社会，若不急谋出路，当然抑郁不平。且本身学业，以革命牺牲，而才术技艺又不能应社会之要求，谋生无路，经济压迫，因激于解放社会之大义，反使自身陷于绝境，世界最悲痛之事，孰有过于此者乎。”补救要义，在补充青年的学识、技能，将之纳入社会正轨。提案拟请国民党中央派遣革命青年中“卓有成绩，学业稍深者”赴各国留学，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研究高深学问，“以为建设新中国人才之准备”。对于“努力工作而程度过低，不能留学者”，各党政训练机关应尽力扩充，分别收容，注重社会教育，养成实际工作能力。有“欲研究专门学科者，可豁免学费，优予补助，使就专门学校，刻苦补习”。上述学生毕业后，应“尽先录用，从事建设工作”。①

这个提案实施后，得到国民政府资助出国留学的，首先是军政要人推荐的青年。如西北党务指导委员黄少谷和郭春涛，都是冯玉祥推荐的；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张丕介、葛覃，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李青辰、黄如

① 丁惟汾：《革命青年之培植及救济案》，《国民政府五中会议》，民国法政学会，1928，第 42—44 页。

金，天津市党务指导委员韩振声，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于振瀛，天津交通局主任王仲裕，哈尔滨市党务特派员龚介民等，都是“丁家党”成员。在该提案下出国留学的国民党青年先后有数百人。但相对大革命后流离失所的青年，只是很小一部分。大多数相对下层的穷苦青年，则没有得到资助的机会。

在党争中失败的国民党左派，也把握住青年的苦闷和热情，号召青年继续“革命”。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声称既不依附反动军人，亦不与旧官僚妥协，宣布下野。曾仲鸣在致方君璧信中说：“国事愈变愈奇，四兄暂不出来任事。现在表面上是汉、宁、沪合作，各方依然不能谅解，且南京方面有腐化之虞，旧官僚及政客大活动，非肯为革命尽力者。……四兄此次下野，最大原因是不愿与一般无聊及腐化份子同污合流。此去甚宜，因不去，则许多革命青年都以为要据要津，与反革命、不革命者妥协也。”①

1927年10—11月，汪精卫与一些反对南京特委会的国民党中执委委员群集广东，喊出“左派团结起来”的口号。曾仲鸣对方君璧说：“四兄等已于本月二十八日到港，二十九日进省城，是左派势力大有可为。”② 广州特别市党部机关刊物《党声》出版“迎汪专号”，发表宣言，号召国民党左派青年继续革命。宣言说，自国共分裂后，少数革命的国民党青年在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挣扎，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流浪的流浪，“匹马单人，孤军奋斗，领导无人。痛念革命前途，血泪为之齐下”。如今汪回粤的意义，就是要领导国民党左派，重振革命的大本营。③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粉碎了汪的计划。起义失败后，大批激进青年遭到屠杀。1927年底到1928年春天，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各地。国民党左派青年既无组织庇护，又无革命理论以理解革命的挫折并展望未来，暴露于赤裸裸的空虚、绝望与恐惧之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左派青年杨玉清在日记中写道：

---

①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10月1日）。

②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10月30日）。

③ 广州市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宣传部印《党声·迎汪专号》（国内不详，应出版于1927年10—11月），第7、9、10、30页。

恐怖时代，光降了我们的面前，沿街都可以看得见武装兵士的鹄立。……就是说又要捉共产党，某处某处，已捉得有几百人关起来了。（1927年12月16日）

很悲惨的消息传来，使我食不下咽。……未必革命终是骗我们的吗？……我此后的生活委实难办，我瞻念我的前途，无任惶悚！（1927年12月18日）

报载何羽道被枪决，追回往昔，斯心不胜黯然。以前与共产党为伍，不惜处以极刑，为公乎？为私乎？……林可彝同时被枪决。据我所知，林也不是共产党。……杀人的人，口口声声是要杀尽共产党，而处处死的都不是共产党，国民党的前途将奈何！……自堕信用，自伤元气，究竟何为而出此？（1928年1月7日）

看亡友的遗墨，最是令人生感；我看至伤心处，更不禁欲大哭一场……唉！很好的人都死去了，现在只留下些庸庸碌碌的东西，在社会上混闹，……天不欲乎治天下，果其然欤？（1928年2月27日）

今天是孙总理逝世三周纪念，……可惜不能给我们总理在天之灵一点好的安慰。……我们的总理，简直成了野心家谋私利的一座偶像，……革命同志……被反革命者施以残酷的手段而抑郁、而逃、而死了！反革命者又摆起革命的架子，带上革命的花冠。（1928年3月12日）

这两天很忧愤，直若重病煎扰我、摧残我一般，我的全身，起了万丈的波涛，把我搅乱的不堪。我做了许多梦，白昼间和黑夜间，茫茫大地，寻不出我的出路来。我好比走到悬崖绝壁，一片峰峦横亘在我的前面。……无路可走和（？）走荆棘之路的痛苦更加十倍，这种的痛苦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局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1928年3月29日）[①]

在当时社会上和国民党中，都有许多想要继续革命的“左派”青

①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7，12—16页。

年，但找不到自己认同的理论与组织，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杨玉清在日记中写道："据我晓得的，在京闲住的革命青年不在少数。广州不能容，武汉杀得一塌糊涂，各地都呈现着恐怖和高压的现象。名义是革命的区域，实际上依然是反动势力布满了整个中国。新青年没有出路自然是不消说的，就是稍有气节的旧人，也只有仰屋兴嗟！革命的领袖人们、政府的当局，不注意这些地方，每天只是坐在屋子里面高谈滥调有什么益处呢？"①

忧愤至极的杨玉清，仍留在国民党中，决心"尽匹夫之责"，以改造国民党。他痛感政治的黑暗、国民党的支离破碎、党员的普遍懈怠堕落，但似乎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心力，"仍欲于党务有所尽力"。他在日记中写道："烦恼是无用，忧愤是无用，……不能消极的死，还只有积极的干！虽然是黑暗包围了四周，自己仍然要将一线之光明保持着，照耀着自己，照耀着人家，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遍黑暗。结局还是总理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② 1928年5月，杨玉清由范予遂推荐，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训会训育科工作，两年中为国民党起草了《训育人员须知》《青年运动方案大纲》《三民主义要略》《中国革命史略》等一些条例和文献。

散文家孙福熙曾在《贡献》杂志上介绍一位名叫陈春然的国民党左派青年。陈是鞋店学徒出身，自学考入上海公学大学部。爱好文学，常在《南华文艺》《艺风》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诗集。因读孙中山著作受到感动而加入国民党。"清党"后，他悲哀地感到国民党"已经成为死尸"，但它的主义和政纲政策还是中国所需要的，因此决心成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孙福熙笔下的陈春然，是一位笔挺、英俊、"思想浓厚"而行为严峻的、"近来不可多得的青年"。在一个思考成了最缺乏的德性、失望成了最时髦的衣衫面诚实的人格外吃亏的年代，他虽感到悲哀，却未染上"失望的流行病"。他主张民主政治，相信群众利益至上，信仰三民主义。③ 这些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基本品格"。

---

①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48页。

②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17页。

③ 孙福熙：《政治与艺匠》，《南华评论》第4卷第7期，1933年，第22—23页。

当时思想左倾而仍留在国民党中的青年很多。汪精卫的外甥陈春圃于1925年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也是一位“左倾”的青年。曾仲鸣在给方君璧的信中抱怨说：“春极亲共，而又挂着国民党招牌，太不老实。我以为既觉得共产理论对，而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红色恐怖，不如老老实实的说‘我加入共产党了’。而现今一般人偏不如是，暗为共产党尽力，明仍冒国民党名义……”①

（二）对改组派的失望

这些“左倾”青年的存在，成了国民党改组派的来源。成立于1928年冬、以陈公博等“粤方委员”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要求在“分共”的同时，延续国民革命，恢复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精神。在1928—1931年，他们短暂地收容了国民党内革命青年“真红的狂热”，成为后者重新踏上征途的一座脆弱的桥梁。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治光谱中，改组派位于南京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左边、中共和第三党的右边，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他们肯定革命、反帝、民主的口号，关注社会平等，支持民众运动，但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承认中国有阶级，但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党的作用在于调和而非激化阶级矛盾。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自己便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要替小资产阶级说话。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也能够革命，中国革命应该通过维持、巩固、扩大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消灭它，来完成“建国”的任务。②

改组派主张以党治国，但不要求党员有“党性”，不要“组织”压抑“个性”。他们将中国政治革命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自我更新，不颠覆现存社会结构，因而对关注社会正义又恐惧暴力革命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改组派主张恢复被南京政府停止的民众运动，重视青年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痛苦。在学生要求开学、反对增加学费的运动，择师运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反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经常可以看到改组派的身影。改组派曾被称为国民党中“最左

---

①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10月20日）。

② 施存统：《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主革命》，《革命评论》1928年第9期，第14—15页。

倾的革命集团”，陈公博曾被誉为“革命时代第一流的政论家”。一些左派青年说，读了陈氏政论文章，“像暑天里喝了一杯酸梅汤”。①

1928年秋，改组派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设大学、专门两部，有社会学系、法律系、政治经济系，聘请了许多左翼学者任教，如许德珩、李达、邓初民、施存统、刘侃元、张申府、陈启修等，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不小的作用。大陆大学的学生说：“学校的政治气氛比较浓厚。不少教授在讲课和讲演中接触现实政治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学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仅关心这些问题，而且有政治活动。”②

时人观察，大陆大学的学生，“论数量，虽仅有二百余人，论质量，实出人意料之外。……已在国内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曾任省县党部的委员也有，甚至连国外留学生慕名而来的亦有，一时风起云涌，凡是具有革命性的青年们，莫不争先恐后地跨进了大陆之门”。又说大陆大学教职员都是改组派，“非‘改’不用，几成了一家的天下”。至于课程，“早也是革命理论，晚也是革命行动，‘革命’！‘革命’！几成了大陆师生们的口头禅。那时大陆的精神，的确与以往的上大可先后比美了”。③

1928年5月，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南京当局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在各大城市青年中激起反日民族主义浪潮。1928年5月5日，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开会，议决成立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中国学生总会通电全国学校，一律罢课3日，组织救国学生军，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武汉、天津、长沙等地都组织了外交后援会，要求国民党严正交涉、对日经济绝交。浙江、徐州、厦门、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罢课，上街宣传反日运动，追悼死者，举办募捐慰问活动。5月9日，上海市学联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会，有400多所学校的10万多名学生参加。④

青年自发的反日运动，引起了各个党派的注意。1928年5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说：济南惨案的严重性较“五卅”实甚十倍，但

---

① 浪花：《陈公博进京与今后改组派的出路》，《上海报》剪报，吴雅辉档案，雅05186。

② 许仕文：《大陆大学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108页。

③ 章章：《上海大学与大陆大学之回忆》，《上海周报》第1卷第6期，1933年，第108、109页。

④ 雒作敏、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1996，第175—176页。

中共党团在此次争斗中所表现的力量“异常之弱”，对群众的公开宣言发得太迟，反日政纲未能快速散布到群众中去，各级干部不能运用群众的战线打入国民党主导的团体、工会中，反日运动大体上是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为了夺取群众，中共必须利用国民党左派提出的恢复民众运动及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口号，将反帝斗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一切国民党左派的民众团体，“必须打入进去”。①

改组派则迅速把握到反日民众运动中所蕴含的热烈民气，喊出“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将反日运动与反蒋运动结合起来，扩大了改组派在青年当中的影响。山东省各地的国民党基层党部中一时充斥着改组派，他们领导着反日、抵制日货运动。②

1928 年 7 月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份报告说，“学生群众在济南事件发生后，更显明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在短时期中确实很热烈的鼓起反帝的热情”。学生“分化甚烈”，“大部分都左倾，大多数都不满于国民党。但终因我党没有很好的领导学生运动，所以在最近许多摇动的分子徘徊于陈公博派、谭平山等的第三党等等歧路之间，而陈公博派和第三党对智识分子之宣传品如雨后春笋，充满了上海各种书店”。改组派喊出“恢复民众运动”口号，虽然“是一时欺骗民众的掩眼法”，“但这些口号，确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东西，确成了现时广大群众行动的共同目标。这种现象不但是上海，即南京、苏州以及各县的学生群众亦莫不皆然！”③

改组派的政治路线重视青年知识分子，以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心任务。针对那些青年被共产党煽动、沦为政客工具的论调，陈公博写了《革命青年有后台老板吗?》一文，批评这是“心理上的反革命”。他说：“五四运动的当中，北京段政府也这样说，学生背后有后台

---

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政治通告——转录中央通告沪字第三十七号》，《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4 册，第 114—117 页。

② 作霖：《山东目前经济政治与青年状况》（1929 年 3 月 15 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5 册，第 231 页。

③ 《江苏省委华字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党的总策略》（1928 年 7 月 8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 年 9 月至 1934 年 8 月）》，1987，第 14 页。

老板，政府的命令真是三令五申，不是告诫学生要沉静读书，就是告诫学生不要受人利用。不料当日段政府的揣测，又不祥的搬到京沪来。”陈公博经历过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实在找不出什么后台老板”，若硬要找出的话，那么“爱国心的驱使就是后台老板”。他也看到了站在青年当中、跃跃欲试的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说“青年的革命性是不能压抑的，青年的爱国心更不能压抑的”，国民党如果不能勇敢地站起来，领导青年，那么，“这群青年而有力的革命兵士”就要跑到国民党的对方去了，“党就要覆败了！”①

全盛时期的改组派，在全国各省市和海外支部中共有一万多人，成员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② 南京的改组派组织成立不到一年，就发展了五六百人，主要成员是大学生和机关职员。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军事学校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中，都有改组派的秘密组织。上海的改组派有七八百人，在各大学都有分部和小组。③

改组派在基层发展组织的方法，主要是依靠人际关系。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在上海市学联的首席代表吴其钰是改组派，当他当选上海市学联主席后，就开始在市学联发展改组派组织，以至于上海市学联的各个学校代表多加入了改组派，“整个上海学联都被‘改组派’把持了”。后来吴其钰又以上海市学联首席代表的身份，当选全国学联主席，就联合其他各省改组派成员，控制了全国学联。④

在一些省份，改组派还夺取了当地教育机关的控制权，从上到下地发展组织。1928—1930年，山东省教育界的改组派势力很大。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曾致电蒋介石说，改组派控制了山东省教育厅，“厅内职员有重大嫌疑者数人”，最高干部均为改组派，他们计划“夺取山东整个教育”，“正窥附省各教育机关，以危害本党”。山东省济南一师的训育主任刘子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徐鞅千等人，均受改组派成员朱骅

---

① 《革命青年有后台老板吗？》，《陈公博先生文集》，第145—149页。

②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册，总第35—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97页。

③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册，总第17辑，第166—184页。

④ 娄豪：《“和谈密使”回想录》，第30—32页。

青指挥；日照县立中学校长尹树生“亦为改组派中坚分子”；“前山东指委会所办之训练班，有二分之一倾向改组派”。①

改组派对一些国民党下层军官也产生过影响。一位曾参加改组派的军校学生牟龙光回忆说：中央军校里有个叫罗翅秀的战术教官，“肯与学生接近”，颇得“学生的信仰”。有天罗教官约他和另一些学生去家中，拿出《革命评论》给他们看，问他们觉得怎样。他们说：“改组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独裁，我们是赞成的。”当天几个人都填了表，履行了参加改组派的手续。这是中央军校的第一批改组派成员，之后又陆续在中央军校第六、第七期和军官研究班、要塞炮兵班中发展了一些成员。②

1931年宁粤对立时，有报纸评论说，“粤政府之情状如是，而汪精卫氏尚不示消极，专心致志一若希望无穷者。……汪之所以不事政治上地位之争衡，盖正注力于下层工作，自汪氏回粤后迄今青年党徒之归来者，不下千余人。虽不能尽得工作，均因汪氏关系辗转介绍，分布于各党部、各军队之中，于原有之潜势力外，又新添多数之力量，……汪之地位，表面虽莫展一筹，实际已有无形之进步。如粤政府在目下之情状，尚能维持半年，则汪氏必有新发展，是殊为可轻视也”。③

但是，改组派从未贯注全力于夯实下层组织与军事基础。改组派声称要巩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但改组派的基层亦无组织纪律可言，党员各自为政，争权夺利。曾在武汉政府中担任青年部秘书的胡耐安说，改组派“同志们聚在一起相互鼓舞”，不外宣扬两点：第一，自己所掌握的同志数目；第二，陈公博所发给的经费数目。这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人多钱多，人少钱少，结果竟发生“抢同志”的闹剧。“甲省同志给乙省抢去，国内同志归于海外同志之列，各有各的同志花名册，却无法按照名册点名证实。”陈公博“对此心里有数，又不便明言追究”，渐渐感到心灰意冷。真正的左派面对这一幕，不免“摇头叹息，冷眼相向”，

① 《陈调元等电蒋中正》（1929年7月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300-00017-020。

② 牟龙光：《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第1卷《民国时期政治篇》（下），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8，第131页。

③ 一民：《汪精卫之下层工作　基础未可轻视》，吴稚晖档案，档05517。

稍洁身自好的人，都不愿同流合污。[①]

改组派也不能建立革命武装，只能诉诸利用军阀发动对蒋战争的“快速”夺权手段。这使一场原本包含着国民党自我革新诉求的改组运动，最终退化为一系列的军阀战争与派系竞逐。这是“改组国民党”理想的堕落，也是改组派最终被真正的革命青年抛弃的原因。

陈公博对此心知肚明，曾对胡耐安说：“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其始也是‘利用’桂系和唐生智，继而‘利用’冯玉祥和阎锡山，终而和原来是死对头、活冤家的西山会议派合作起来。……只求军事的达到目的，还有什么‘党’可谈，谁有枪就是我们的‘同志’。”[②] 这是“改组国民党”理想的堕落。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说，经历宁汉分裂，至1929—1930年护党救国军失败，他对国民党的前途就已十分灰心失望了。他说：“自从党的一分一合，已使许多人们冷淡和灰心，尤其拥着国民党籍的军人，他们只知道私人利害，而不恤党的法统，其新入党的固然很容易露出原形，即富有历史的也渐渐归还本性。……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中国恐怕长期陷入于地方军阀政治罢！这样，国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尽废了。”又说：“党不党在中国人民恐怕没有什么兴趣，大约人心厌乱，中国应该来一个比较长治久安之局罢。但要长治久安，必得与帝国主义者和旧势力妥洽，这个看法徘徊于我脑中，实在无法解决，因此遂患着失眠。以后虽然上了北平，参加了扩大会议，但已鼓不起兴味，亦只有聊尽人事，以待天命而已。”[③]

1931年底，国民党实现“宁粤合流”，组成新的中央政府，改组派大员纷纷入阁。1932年元旦，新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在参加国民政府新年典礼后，写下“髀肉重生战马疲，征袍脱去换朝衣。酒杯浇尽牢愁在，也自随班习朝仪”。[④] 颓唐之情跃然纸上。时人评论，汪蒋

① 胡耐安：《谈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第77页。

② 胡耐安：《谈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第76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第147—149页。

④ 陈干编辑《陈公博诗集》增订本，香港，2015，第42页。

合作，左派大员都得高官显爵，“党贩教授”仍多落魄风尘。至于满腔热血的学生，除少数以特殊关系获得所谓“革命报酬”外，其余“凡是找到了他们所谓革命的领袖，初一个‘没办法’，继一个‘没办法’，终于还是一个‘没办法’，真是目击心伤，欲哭无泪！……要知伟大人物的地位，是牺牲我们无数青年的血泪所造成”。①

上层政客的投机与消沉，让下层的革命青年深感失望，再次感到革命理想的幻灭。追随改组派的青年军官牟龙光便觉悟到，“看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口号也不过是麻痹人民的，他们当了大官，就合作了，‘革命’不过是为了个人当官罢了，……真令人恼极了。我从此到部队去，……改组派的事，从此我也不再过问”。② 据时人观察，1932 年以后，不仅社会上过问改组派的人不多了，“即其干部中人，好像亦远不如从前之起劲”，一些大学中的改组派活动分子，被共产党“拉去”。③ 中共山东省委在 1932 年 6 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山东省博兴县“整个国民党县党部完全加入了 C. P.”，其中有两个常委是中共党员，一个常委是互济会的，其余是民众教育馆的职员，“区长也加入了 C. P.”。④

二　学术和文艺道路

（一）在读书中寻找出路

原改组派河南省党部负责人邓飞黄，1932 年后在顾孟馀执掌的铁道部中担任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办职工教育。他认为：“劳动者是群众生存的维持者，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中国的劳动者）是民族复兴的主力军。”但因为生产力低下，教育不能普及，劳动者目不识丁，技能简单，以这样的劳动阶级为“建国”的基础，“民生何由而不凋敝，国家何由而不衰弱，民族地位何由而不低下”。邓飞黄主持铁路职工教育

---

① 章章：《上海大学与大陆大学之回忆》，《上海周报》第 1 卷第 6 期，1933 年，第 109 页。

② 牟龙光：《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精编》第 1 卷《民国时期政治篇》（下），第 131 页。

③ 陈翔女：《改组派过去在北平》，《社会新闻》第 2 卷第 13 期，1933 年，第 168 页。

④ 《中共山东省委工作报告》（1932 年 6 月 2 日），《山东革命历史文件（1931—1932）》，第 318 页。

工作三年，在津浦、北宁、平汉、正太、京沪、沪杭等主要路段设立铁路职工学校约45所，开设识字、写字、三民主义、国语、算术、绘画、生产技能、公民常识等课程。他还刊行《铁路职工周报》，编印工人识字课本、工人小丛书，“纯为工人读物，意在激发工人求学兴趣”。①

在兴办职工教育的同时，邓飞黄的思想发生转变，渐渐对党务工作失去热情，兴趣转向读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组织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经济月刊》和丛书，撰写论文，还翻译了一本社会经济学的著作。②这种从党务工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反映出邓飞黄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和厌倦，以及想从学术研究中为中国政治寻找出路的心愿。1935年12月，邓飞黄受到CC系的打压排挤。铁道部部长顾孟馀同情他的遭遇，决定派他赴欧考察，增长见识。这使他“多年来想到欧美去留学的希望得以实现了”。③ 1936年2月，邓飞黄启程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在经历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污浊之后，重新回到学校，从读书和学术研究中探求社会构成之理和中国救亡之道，成了许多有理想、有思考能力的国民党左派青年的选择。1929年元旦那天，南京中央党部的杨玉清在自己的宿舍中，写下一首小诗：

将送着十七年的旧友过去！
复会着十八年新生命的到来！
在悲难之下呻吟过渡的我啊！
依然是，依然是有形容不出的悲哀！
主人们正在那里酣笑！
奴隶们正在那里号啕！
人生的现实之官堂！
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除了牛马与豺狼！
……

① 邓飞黄：《三年来之中国劳工教育》，《革命文献》第55辑《抗战前教育概况与检讨》，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第269—288页。
② 《邓飞黄自传》，岳麓书社，2012，第42页。
③ 《邓飞黄自传》，第45页。

时代驱遣我们努力！历史吩咐我们向前！

我们怎忍啊！

我们怎忍醉生梦死！梦死醉生！

黑暗终会退避光明！

谬妄终会屈服真理！

只要我们的血泪未枯！

我们还要滴到最后的一滴！①

一年来在苦恼中的求索，下决心为“被压迫的穷苦兄弟努力”，却看不到现实政治有一点起色。② 从1928—1929年的日记看来，这两年中杨玉清读了很多书，内容涵盖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文艺等领域，如《总理遗著》、《三民主义之认识》、《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经济地理与国际问题》、《中国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史》、《人生哲学》、《资本论解说》、《联俄讨论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茅盾的《幻灭》、蒋光慈的《光慈诗选》、瞿秋白的《新俄游记》，等等。“为的是要在读书当中找着我的出路。”③

他读了郭沫若的《水平线下》，“深深感觉他对于社会现象有深刻的观察和批评，他这种的文字，的确是凭他的心血写来的”。他读了《畸零人日记》，感到“很高兴。许多记述，都是和我的性情相近的”。他上午读《新土耳其》，下午读《露丝》等文学书，晚上又读《新生命》杂志，觉得“内面的文章，关于中国社会的观察，我总以为不大正确，我必得加以纠正，才可以了我的责任”。他将一本《新土耳其》读完后，在日记中写道：“的确，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仿。近东的病夫，与远东的病夫，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都是最有希望的国家。我遥祝他们将来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④

可以看出，杨玉清此时思想还比较散乱。他在日记中说：“我这几天来，无日不被革命理论萦绕脑海。……本来，我只有零碎的知识，没有

---

①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46页。
②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36页。
③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54页。
④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38、33、34、36页。

系统的学问，我把一切太实际化了。我不愿意仅从书本子上找证明，我要就社会的事实，去衡量理论。因为是这样，所以老是矛盾的。"① 在矛盾忧虑中，一些良师益友，引导他走上了更广阔的求学之路，如大革命期间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邓初民。邓是著名左派和社会学者，大革命后曾与许德珩一起发起革命团体"本社"，与李达一起办《双十》月刊。他告诫年轻的杨玉清："公余之暇，务须从事细心研究，头脑放静，心肝常热。社会科学，须起码的读完几套书，否则零絮知道一点，无论知道得何等多，仍是无根之草，潮流一来，只有随风漂泊，极为危险。"杨玉清感到，这些话确实道破了他的"病症"，"急应切实履行"。②

对国民党失望之后，杨玉清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他喜欢文艺，认为"时代的青年，对于文艺，应该有相当的修养"，因为文艺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不为现实所拘束"，可以养成高尚的思想和人格。③ 他还有些从事文艺的好友，如张光人（胡风）。他很佩服张光人，对其人格"极其敬仰"，"并且觉得他的文学的修养，实为普通谈文艺者所弗及"。④

1929年1月，杨玉清来到上海。他很羡慕上海的左翼青年"居亭子间"的生活："无论什么书，可以自由地看；无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会着的人哩，更是种种色色，一言一动，都可以供自己的参考。假定我不为生活打搅，我情愿跑到上海来，借着这个环境，来锻炼自己。尽量地读书，尽量地作文，尽量地接纳好的同志，我相信不久的时间，一定能得着很大的进步。"

去上海，住在亭子间里，"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死命地读书，死命地作文，作的文字向报纸发卖，借以维持日常的生活"，这种想法在他脑海中盘旋了好几个月。而另一方面，他又很想继续读书，出国深造。过去，他对"学者的生活"很不以为然，以为一为"学者"，便"和社会不相干的"。经过几年政治波涛中的挣扎，备尝痛苦失望、歧路彷徨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学术生活的意义，以为"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一切

---

①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第38—39页。
②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第27页。
③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第40页。
④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第67页。

的人要大，尤其切实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他于是“很有一点当学者的野心了”。①

1929年底，杨玉清向中央党部提交了辞呈，开启了赴日留学的生涯。艰苦的留日生活，甚至时有断炊之虞，但亦有志同道合的同乡、朋友。在杨玉清留日期间的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名字仍是张光人，此外还有胡业崇（胡秋原）、高叔康、徐佛观（徐复观）等，他们都是穷困而倾心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1930年2月，杨玉清与徐佛观同游上野公园，“谈了许多话”。徐说他“此后打算根据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分析一番”。杨认为“这是极正确而且必要的努力”。② 杨玉清还与胡秋原一起结识了王礼锡，他正在办《读书杂志》，约他们投稿。接下来几天的日记中，杨玉清写道“草文，约三千字，一气呵成”；“草文，约五千字，心情如明镜”；“我要能多读些书，多有些著作……那时我才真是快乐了”。③

九一八事变后，杨玉清因在毕业论文中抨击日本的法西斯政策，遭到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国外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中国。1934年，他被国民政府派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馆的秘书，工作之余勤奋苦读，最终拿到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与邓飞黄一样，在后来漫长的国共斗争中，都帮助和设法营救过一些受难的共产党员。虽然早年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密切，但在1938年底汪精卫脱离重庆之后，他们都毅然断绝了与汪的关系。在1949年后，他们都留在了大陆，为一生的革命生涯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二）向文艺的道路走去

国共分裂之后，白色恐怖在中国蔓延，数以万计的青年遭到杀戮。中国共产党迅速走上工农武装革命道路。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对决，深深震撼着试图置身决斗之外的人，尤其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1928年3月，朱自清写下轰动一时的文章《那里走？》，表达了一个自觉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在轰鸣而至的革命车轮面前的自省

①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49—50、58页。
②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74页。
③ 《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钞（1927—1949）》，第89页。

和选择。他看到，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没有春波秋月，没有鸟语花香。革命的巨浪，让置身其中的人和旁观者都感受到它的威力，感受到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大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她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她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① 朱自清描写阶级斗争短兵相接时的情形——共产党“像出柙的猛虎”，“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然而，这只是“我们”的“阶级意识”，而这，正是“他们”所要打倒的。“我们”的怨毒和恐惧，只是“我们”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②

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一切权力属于“党”。个人——自我——是渺小的，不加训练的情感是没有用的。今日的“教义”，是在理智的权威领导之下开展强韧而有组织的工作，是个人的无条件的牺牲。在这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如同风雨中坍塌的古老建筑一样，正从昔日的繁荣走向衰颓、走向灭亡。

哪里走？跟上这时代的大潮，革自己的命，还是甘做时代的落伍者？朱自清写道：

> 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闯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 Petty Bourgeoisie 里。……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 Petty Bourgeoisie 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 Petty Bourgeoisie 的。离开了 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 Petty Bourgeoisie 里的，竟一变到 Proletariat 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③

① 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3月号，1928年，第368页。
② 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3月号，1928年，第373页。
③ 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3月号，1928年，第374—375页。

朱自清提出了一个真实而迫切的问题。不愿也无法转变成 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 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并非少数。这些人怎样面对时代的挑战？往哪条路上走？朱自清指出一条道路——文艺。他说，既不能革命又不能反革命的人，如何解决这惶惶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磨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如果不是自我麻醉或去享乐，便将向着文艺的道路走去。①

虽然自称是歧路彷徨，但可以看出，朱自清走向文艺道路，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所谓“暂时逃避”，只是离开政治活动，而将文艺作为一种实践，并非要逃入所谓与社会、政治隔绝的“文艺之宫”。国共分裂之后，一些信奉、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怀着困惑与失望的心情，走上了文艺救国的道路。1927 年 8 月 30 日，武汉《中央副刊》刊登了早期中共党员施存统的《悲痛中的自白》。他说：“经过一个多月中慎重的考虑，我终于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② 1928 年 9 月，施存统与陈望道、汪馥泉、冯三昧等人合资创办了“大江书铺”，出版进步文艺书刊。10 月，又创办《大江月刊》。曹聚仁说：

> 在当时，我们这一群人，……一般朋友都称之为左倾的文人；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连陈先生在内，都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有战斗的气氛而缺乏战斗的勇气的人。参加了渔阳里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瞿秋白、陈独秀先生往还甚密，……结果依然不是共产主义战士。
>
> ……对于社会革命，我们都曾讴歌过、宣传过，……我们的思想，多少受过这一革命潮流的影响。社会革命这一列车向我们正面驶来，终于到了我们眼前，在我们身边驶过，我们的感受如何呢？③

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施存统，发誓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站在

① 自清：《那里走》，《一般》第 4 卷 3 月号，1928 年，第 377 页。
② 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 157 号，1927 年 8 月 30 日。
③ 曹聚仁：《文坛三忆》，三联书店，1999，第 32—33 页。

"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为国民党的革命的存在而奋斗"。这个"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是要联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实现一种"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非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社会"，坚决地向非资本主义的路上走。[①] 随后，施存统加入改组派，在《革命评论》等刊物上，阐发了一系列国民党"左派"的革命理论。

走向文艺道路反映了那些恐惧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在革命理想遭遇幻灭，对政治感到束手无策时，许多青年或已成名的学者，选择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求学，著书立说。兴办杂志、开设书局，一时成为知识界的潮流。1927年11—12月，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曾仲鸣在致妻子方君璧的家书中说：

> 我虽甚忙，但求学之心无一时或忘。近日看美尔博短篇戏剧集，我甚想读其传，请妹妹替我找一本。Melson书局出有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计两册，请妹代我购两本。……国中实在缺少人才，教育不振，数年之后，更不得了，思之心跳。
>
> 我闲时多看法文书，但惜时间不多耳。你能专心为学，甚慰。中国教育日益衰颓，念之可叹。我真想出一文艺书刊，终因居无定所，不敢着手筹备。若国中时局稍定，便可如愿以偿也。
>
> 中国情形，实在无办法，以四兄之政治的历史、治事的才能，尚束手无术，我等更何足论。我以为我等只有努力求学问，为中国文化稍稍争气罢了。……伏园、春荪时时见及，现在拟办一旬刊，下月一号出版。
>
> 近与孙氏兄弟谋设一书局，先从小资本入手，将来再招股、谋发展。我等他日只好靠卖文为生。书交他书局既多麻烦，又不易收回版税，自己有一书局则方便之至。你非商人，不谙此等事，故不赘述。所可告妹者，我等愿望，书局扩充，生意兴隆，凡少年贫困之作者，多多提拔，为各人争口气耳。[②]

---

① 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号，1927年8月30日。

② 《曾仲鸣致方君璧函》（1927年11月11日，13日，22日，12月13日）。

曾仲鸣信中提到的“孙氏兄弟”，即孙伏园、孙福熙。曾仲鸣与孙氏兄弟都是留法学生，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中，他们先后创办了《贡献》、《南华文艺》、《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等刊物，宣传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抒发文艺救国理念。信中提到的“现在拟办一旬刊”，便是《贡献》旬刊。曾仲鸣信中表达了两种理想，一是“为中国文化稍稍争气”，二是“凡少年贫困之作者，多多提拔，为各人争口气耳”，这又不仅是为文艺，也是为革命退潮后的知识青年，提供一种个人出路。

《贡献》旬刊以刊登中外文艺作品为主，连载了曾仲鸣翻译的美尔博短篇戏剧，同时发表国民党左派的政论文章。陈公博名噪一时的《国民革命的危机与我们的错误》、汪精卫的《武汉分共之经过》等，都在《贡献》上刊出。《贡献》倡导一种清明、理性、自由的政治态度。孙伏园在“发刊词”中说，他们所要力争的，是言论和文艺创作的自由，他们所要反对的，是钳制自由的人。在国民革命后“杀尽浮薄少年”和“打倒昏庸老朽”两种激进口号中，他们“要代表年长者的阶级，向全国的少年请求，我们的意见即使稳健些，但决不愿自侪〔跻〕于昏庸之列的，你们须给我们言论的自由；也要代表少年者的阶级，向全国的前辈请求，我们的意见即使激烈些，但决不愿自沦于荒唐之列的，你们须给我们言论的自由”。《贡献》主理人和作者相信，如果言论不能自由，“政治永远不会清明，学术文艺永远没有发达的日子，而惨酷的残杀也永远没有尽期了”。①

1928年1月，《贡献》旬刊上发表了林风眠的《致全国艺术界书》。这是一篇“艺术救国”宣言，表达了这些留法知识分子以艺术解救时代困境的愿望。林风眠认为，在中国社会情形如此紊乱、人民正陷入互相倾轧，而同情心已近乎消亡的时候，需要的正是艺术和艺术家，以艺术的美，唤起同胞的同情心。作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林风眠的理想是领导全国艺术运动，走向中国的“文艺复兴”，“美化我们这个可怜的社会”。②《贡献》高度认同林风眠的理想。孙福熙在《以西湖奉献林风眠

① 孙伏园：《〈贡献〉发刊词》，《贡献》第1卷第1期，1927年12月5日。

② 林风眠：《致全国艺术界书》，《贡献》第1卷第5期，1928年1月15日，第2—16页。

先生》一文中说，科学给我们知识，哲学给我们思想，而艺术给我们伟大勇猛的力量。“青年们是迷茫，是颓丧”，林先生，“请你，给他们艺术的陶炼，使他们有求知的信仰，使他们有努力实行的胆量”，用艺术，陶冶出他们“沉毅严重的精神”和“灵敏热烈的性情”![1]

《贡献》群体以艺术的眼光反观政治，以人类的视角反观国家，感到前者是普遍的、永恒的，后者是局部的、暂时的。他们以为：“一国的兴亡，在世界全部的历史上看起来，真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也不过像一群虫豸互相争雄厮杀的陈迹而已。关于这一类互争雄长的胜利或失败的纪念日，恐怕还不及看月亮或登高山的节日的更富于美的趣味与永恒的价值吧。人生最大的目的，便是使生活趋向于‘真’‘善’‘美’！一切事业的创造、生命的挣扎、社会的改进、政治的运用，归根到底的说起来，也无非想使生活达到上述的三个条件而已。一切都是手段，只有‘真’‘善’‘美’才是最高的目的。”[2]

因政治变革遭遇挫折，转而探求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原因及改造方案，这并非国民革命后独有的现象。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实验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7年7月，当胡适从海外归来，船到横滨，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感到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 投身国民革命的一代知识青年，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由新文化打造的新的政治主体。大革命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由学术、教育、文学、艺术人手改造社会的愿望，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主动性和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他们相信文化对于政治具有某种塑造能力，这一信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

然而，《贡献》群体那种超越国家政治的价值立场，反映了某些欧化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他们长时间在欧洲生活，钦仰德、法等“先进国”的文化、制度、生活乃至“精神”“性情”。他们推崇法国浪漫主义

---

① 孙福熙：《以西湖奉献林风眠先生》，《贡献》第2卷第3期，1928年3月25日，第47—48页。

② 白丁：《时节》，《贡献》第1卷第4期，1928年1月5日，第10页。

③ 《我的歧路》，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63页。

文学“主情”的精神，尊重个体的思想与情感，忠实于自我的解放。他们崇尚幽雅、高贵、自由、忠诚的人格，厌恶那些没有艺术情感、只知道物质生活的“俗子庸夫”。[①] 他们在中国，处处看到政治的残暴、专横和人民的穷困、愚弱，感到中国人所过的简直是“非人的生活”。这种将西方作为理想蓝图和文明标准来批判中国的做法，并不能增进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社会改造方案的深入思考，而且与广大中国底层民众有着遥远的距离。

那些国民党左派，以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都是一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恐惧暴力革命，幻想以非暴力革命手段和较少的流血牺牲，达到中国的政治革新、社会进步。这是他们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目睹青年的鲜血浇灌大地之后，寻求个人出路，探索国家、社会前途的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他们缺乏政治经济视野，回避政治斗争，因而不具备改造现实的能力，最终仍不免依附于政治，为权力所左右。

大革命失败后，以小资产阶级为文学创作主题，以文学方式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典型作家是茅盾。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 年生于浙江乌镇，是早期中共党员。1925 年 12 月曾担任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1926 年 1 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7 年 1 月，国民政府迁汉，茅盾来到武汉，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4 月担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当时武汉有两份大型报纸，一是《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部长顾孟馀，主笔是陈启修；二是《汉口民国日报》，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控制在共产党手中。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毛泽民，主编原是宛希俨，宛后来调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由高语罕、茅盾（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自称“总主笔”）相继接任。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脱离党组织，开始以茅盾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

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 6 月，茅盾蛰伏上海寓所之中，陆续写出《幻灭》《动摇》《追求》（《蚀》三部曲）。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目睹了这个时代

---

① 曹伸鸣：《法国的浪漫主义》，开明书店，1929，第 18—19 页。

的各种矛盾，内心也充满矛盾。茅盾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洪流中的兴奋与幻灭、动摇与追求，试图通过描写这个他最熟悉的群体，反思那个变动的时代。

《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是一位恋爱场中的失败者。她从乡下来到大都市上海，与一位少年几度春风。事后才发现，此人不但是一位轻薄的女性猎逐者，而且是个正在受着什么“帅座”津贴的暗探。革命军攻占武汉后，静女士来到武汉，想在革命中找到内心的安慰。然而，武汉政权下的所见所闻，处处体现着矛盾，反封建口号喊得震天响，亲戚故旧却纷纷凭关系来混饭吃。静不由得困惑起来，感到“矛盾哪，普遍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中革命就前进了吗?”① 《幻灭》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思想的不断幻灭。茅盾说：“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② 她的恋人“强连长”的部分题材，取自革命作家顾仲起的人生经历。他也是个幻灭的人，不但对革命幻灭，对生命也幻灭了。《幻灭》试图反映的，是革命中处于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心境。

《动摇》是一个更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隐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就是动摇。茅盾试图借助《动摇》，呈现革命剧烈爆发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动摇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③ 这部小说的素材取自茅盾服务于《汉口民国日报》时的见闻，借写武汉政府下潮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小说如实描写了国民革命中各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茅盾说，1927年6月，编辑部天天收到和听到各县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捣毁党部、残杀党员和农民的消息。“他们杀人如芟草，又挖眼拔舌、剖肠割首、活埋火焚，甚至以绳穿女同志乳房，驱之游街。”这些小县城中发生的惨剧、阴谋、残忍、不幸，“深深地印入我

① 《幻灭》，《茅盾全集》第1卷，第72页。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385页。
③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391页。

的脑海。后来我写《动摇》时，就取材于这些事件”。①

小说主人公方罗兰，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形象。他作为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认不清时代的性质，思想迷惘乃至错乱，却充当着党部要人。方罗兰在政治上的动摇发生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当一起土豪劣绅策划的三十多人的流氓暴动被革命纠察队打散、斗争双方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方罗兰只是苦着脸摇头，心里异常地空乱。他似乎在从根本上考察问题，他心里升起了一个声音，这声音虽说是低微的，然而是坚强的：

> 正月来的帐，要打总的算一算呢！你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掀动了人间的仇恨。现在正是自食其报呀！你们逼得人家走投无路，不得不下死劲来反抗你们，你们忘记了困兽犹斗么？你们把土豪劣绅四个字造成了无数新的敌人；你们赶走了旧式的土豪，却代以新式的搞革命旗的地痞；你们要自由，结果仍得了专制。所谓更严厉的镇压，即使成功，亦不过你自己造成你所不能驾驭的另一方面的专制。告诉你罢，要宽大，要中和！惟有宽大和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仇杀。现在枪毙了五六个人，中什么用呢？这反是引到更严厉的仇杀的桥梁呢？②

方罗兰这番话以及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既表达了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可能也反映了茅盾在当时的思想困惑。《追求》描写的也是青年知识分子，茅盾说他想写一个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的故事，最后却写出了一个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的故事。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写作的过程，正是“左”倾盲动错误领导全党的时候。在革命正发展到一个新高潮的理论下，中共到处发动暴动，损失惨重，许多党员被捕、牺牲。作者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陷入深深的悲观。他陈述写作《追求》时的心情：“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③“亲爱者的乖张”——作者在晚年

---

①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304页。
② 《动摇》，《茅盾全集》第1卷，第246页。
③ 《从幼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第185页。

的回忆录中说——是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内“左”倾盲动错误。茅盾对那种宣称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的理论不能理解，试图通过文艺创作，探讨一条更加现实的革命道路。他说：

>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①

茅盾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中国要进行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的国民革命，不能不动员小资产阶级，要进行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也不能不团结小资产阶级。他说：“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么？他们不被压迫么？……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②

茅盾提出，文艺的第一要务，是要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描写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亦即小商人、小市民、破落的书香人家以及中下层的农民，要抒发他们的痛苦，在小资产阶级中站稳了脚跟。“他们应当包括在革命队伍之中，而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走

---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383页。

② 《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第190页。

上革命的道路。"[①] 从这些论述中都可以看到改组派理论的回声。

三　从"波西米亚"到民众先锋

国共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反省过去的错误，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政治领域和文艺领域，都展开了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打造无产阶级意识，来强化自身的无产阶级性质。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在其后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深化。"小资产阶级"这一针对外部世界的社会分析概念，逐步被转化为一个针对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同时，20 世纪中国革命"主体再造"的历史进程也被开启。

1928 年 6—7 月，中共代表聚集莫斯科郊外"银色别墅"庄园，召开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批评了新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军事冒险和恐怖主义。会议认为，"盲动主义"是加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兵的意识和行动表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还指出，党内存在的其他一些危险倾向——例如"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均产主义、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表现，是极危险的，必须要反对。[②]

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的通告，总结中共早期的知识分子性质及其历史错误，指出"五卅"以前，党的成分最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像研究团体，整个组织带有家长制作风。"五卅"以后，工农数量虽然增多，但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拥入党内，"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这些活动分子，都是职业革命家，脱离了社会职业，事实上没有阶级基础。"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判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

---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 406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1928），第 316—319 页。

育和训练。"①

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组织上的任务，是应当积极发展党内讨论，将工农分子引进各级指导机关。现在党的指导机关中仍保留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而极少有工人参加。党员没有职业，靠党吃饭，与群众隔离；因不能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基础，在对付白色恐怖时，就只能依靠个人的英雄主义蛮干——"站在群众的面前，强迫命令群众，甚至把赤色恐怖当作发动群众的主要路线"。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党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前途应当是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②

怎样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第一，是要"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份上"，"是要获得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要夺取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众"，要从工人中选取、培养党的干部，坚决地从群众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第二，要造成党的"职业化""产业化"。过去党的活动分子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生产地位，身处群众之外，"以身许党，别无生路"。今后，"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去"。③

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必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打造无产阶级的意识。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告全体同志书》，总结"六大"关于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深入群众、争取群众、促成革命新高潮的政治路线，重申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列举以下十种表现。

第一，极端民主化倾向，不经党的许可就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

第二，反对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不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

---

① 《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639—640页。

② 《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641—642页。

③ 《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642—646页。

肃清机会主义，而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

第三，意气之争，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批评，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

第四，小组织倾向，利用私人感情相结合，甚至利用这些结合而攻击他人。

第五，工学界限，事实上是混淆了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但有些同志“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

第六，怀疑党的改造路线，不坚决地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从工人中引进新的积极分子，不相信从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同志，造成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没有生机。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相信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又陷于形式主义错误，只机械地引进工人分子而不加以积极教育，或机械规定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是由旧人——知识分子包办。

第八，雇佣革命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

第九，把党看成救济会，失业之后，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

第十，消极怠工，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就心灰意懒，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①

这一时期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显示了早期中共——这一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革命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决心。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目的在于打造无产阶级意识，在于建立集中化、组织化、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于创造中共的无产阶级基础。这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历程，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历程。它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自觉承担国族历史命运的知识分子，由追求个体自由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705—707页。

转向投身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的转变，既是中共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客观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一种主动的、内在的自我反思。

国共分裂后，中共不但在政治领域提出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文艺领域也出现了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吁求。1927年冬，留学日本的创造社年青一代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一氓等人先后回国，与早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联合另一个激进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共同发起了一场革命文学论争。在文艺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主力军，便是创造社、太阳社的这批自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鲁迅祭旗，向讲“趣味”的、“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意识开战。除鲁迅外，同时卷入论争的还有茅盾、郁达夫，以及宣扬普遍人性的《新月》派文人梁实秋、徐志摩等。

1928年1月，《创造月刊》发表了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一文。英雄树即木棉花。它在春天会开出“莲花一样赤色的花朵”，绚丽夺目，木棉成林处，是“一片赤化的世界”。然而，因为它生长过快，木质疏松，大而无用，特别是花落之后，白絮纷飞，“赤化的世界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郭沫若以木棉花比喻大革命的壮丽和空虚，号召青年改造自我，抛弃个人英雄主义，去倾听大地深处发出的雷鸣，当一个留声机，“无我”地去放送工农群众的声音。①

同年2月，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宣告创造社在新的时代，将摒弃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为了肩起革命的重任，“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他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莫要落在后面，要“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它将给你以正当的指导，示你以必胜的战术。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②

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两个核心意涵。一是批判个人主义；二是

① 麦克昂：《英雄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57—59页。

②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99—102页。

眼光向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早期创造社宣扬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如郭沫若所说："我只想当一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像留音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① 然而，不愿当留声机，在1928年的郭沫若看来，已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他开始忏悔了。他说，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没有一个是出身无产阶级的，他们的意识，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意识是什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他告诫青年"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有产者意识），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罢"，"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去接近工农群众、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这当然很难，必须要经历一个战斗的过程，然而，唯其如此，才能负起时代的责任，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②

鲁迅是革命文学抨击的首要对象。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天堂，找不到将来的黄金世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他的作品中只有过去，没有将来，"他感到的前途，只有坟墓"，"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始终的在呐喊，始终的在彷徨，始终的如一束丛生的野草不能变成一棵乔木！"革命文学家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让他有光明的路而不愿意走。更进一步，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③ 革命文学要求不是怀疑，是相信。"民众信仰革命的成功，就如他们信仰阳春的必到。他们不像小资产阶级那样多疑，那样不定。"④

鲁迅有着倔强的个性，相信不屈不挠的韧性的战斗，这在革命文学者眼中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

---

① 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1923年，第2页。

② 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虚取的态度的考察》，《"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59—160页。

③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37—138页。

④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58页。

劣根性”。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虽然鲁迅并不反对劳动阶级革命，“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他个人的反抗”，“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忘不了阶级背景及其特性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者”。①

这些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人，其实是清一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1901年出生在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祖父冯紫珊，在横滨开印刷所，经营商行；伯祖冯镜如，是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族叔冯自由，是早期国民党人。冯乃超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日本接受教育。1920年他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几个同期同学，就是后期创造社的成员朱镜我、李初梨和彭康。后来他们都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或东京帝国大学。这时日本高校里流行福本和夫的著作，其影响在1926年达到高峰。后期创造社成员都受到福本和夫理论的影响。冯乃超等人认为，四一二政变暴露了早期中共“缺乏理论指导”，有赶紧向中国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于是，他未毕业就提前回国，要用批判理论为新的革命文学清扫战场。

革命文学家认为，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有了本质变化，革命有了长足发展，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却远远落在革命运动后面，不能反映革命民众的生活和趋向。必须对文艺的田土来一次翻耕，扫除旧的表现形式，以批判的理论，“指出一种文艺的必然的发展与必然的没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认识它的必然性”。②

他们认为，大革命时代的农民已不再是辛亥时代的农民，农民的智识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不像阿Q那样幼稚，他们大多有了严密的组织，对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因此，“《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现在的时代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能表现出的时代！只有“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③

---

① 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329、331页。

②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64—169页。

③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34—143页。

但鲁迅眼中的革命图景、民众图景，和革命文学诸君不同。他希望革命文学家能正视现实的沉重和革命的艰巨。面对统治者的“血的游戏”和底层深重的苦难与麻木，鲁迅没有看到哪一种现成的理论和现成的阶级能够改造中国。革命文学家认为，“革命人”是现成的，只要掌握了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就是革命者。但对鲁迅来说，革命者首先要有一个“真诚”的自我，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把自己包裹在“主义”当中。

成仿吾号召革命知识分子：“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ideology——引者注）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一个战士。”①

鲁迅的问题是：“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这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否正视了黑暗的现实、正视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得不到“最后的胜利”的可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还是做戏的虚无党？他们是否明白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也是现实的，包含各种卑贱、麻烦的工作？即使真诚地为民请命，革命成功后的劳工大众，也不会特别来优待知识分子，也许革命之后的日子还会更糟？到那时，他们会不会对革命失望？会不会从左翼一变而转为右翼呢？②

茅盾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也受到革命文学的攻击，他的《从牯岭到东京》被称为“悲痛中的自白”。钱杏邨批评茅盾：“他发现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重心，……他同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者鲁迅的虚无的哲学，……他创作以小资产阶级做主人翁的小说，他说明了他自己的意识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③ 他观察的唯一的东西便是那“凡

---

①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99—102页。

②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733—734页。

③ 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黄人影编《茅盾论》，光华书局，1933，第120页。

俗的市民的存在的‘污泥’之中生出那‘小小的思想’或‘小小的激情’”。他所表现的确实也是一种“现实”，但那是幻灭下沉的世界，他没有看到“一个生长着的世界”。而无产阶级的意识则恰恰相反，他们讴歌斗争、勇气、力、向上的精神。①

在这些自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眼中，文艺不应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与抱负的手段，而应成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文艺要成为普罗大众的文艺，并不是因为它描写工农，为工农诉苦，而是因为“它反映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农工的解放、为工农谋利益的意识形态，这形态使群众一天天地明了统治阶级底罪恶，一天天组织化、革命化”。② 换句话说，文艺从属于意识斗争，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不是“为艺术的艺术”，“艺术是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③

但是，这些倡导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应该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吗？不是无产阶级的人，怎么能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呢？这是郁达夫的疑问。④ 对于这个问题，李初梨回答说，阶级出身和阶级意识是两个问题，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反而不能自然地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一套世界观，它不是自然生长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只是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对于国家过程、意识过程的奥秘无从窥测。其朴素的反抗意识，可能发展出工团主义，却不能发展出阶级意识。只有了解历史运动的知识分子走入劳动者当中进行灌输，他们才能获得阶级意识。所谓无产阶级意识，“必须待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而且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⑤

在国共分裂的历史分水岭上，这些认同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选择成为一个革命者，为工农群众代言。他们希望改造自我，去

---

① 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678、682、685页。

② 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559页。

③ 李初梨：《普洛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383页。

④ 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21页。

⑤ 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473、476—480页。

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接受党的组织和训练。郭沫若要求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达到“无我”的境界，客观反映工农大众的意识。李初梨则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既然阶级意识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来灌输，那么知识分子仍然是先锋，是革命的领导者。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从下层看世界的眼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资源。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中，也包含着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关系。郭沫若在1925年时就说过：

>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
>
> ……
>
> 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生活自由。
>
> 但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①

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接触的经验，促进了他们对抽象个性、自由、普遍人性的反省，开始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反对用抽象的自由、人性等观念，掩盖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差别。在这种反省之中，隐含着知识分子在强权暴力面前深深的无力感和某种负罪感，促使他们更积极地渴望投身于工农大众的群体当中，接受他们的道德和思想意识，从而获得改造社会和自身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以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为名的思想分化，也是一次发生在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自我改造。

中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动能，产生了深远

---

①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第1卷第7号，1925年（1926年1月1日再版），第197—198页。

的历史影响。它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过程，在政治中包含了主体再造的内容，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它造就了党员对党组织的忠诚，将无数小资产阶级“自我”改造成“无我”的战士。在很长时间里，中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不断以“小资产阶级”概念自我检讨、自我批判，以求在人格上将自己造就为“无产阶级”，真正成为民众的先锋。这个过程对打造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和历史主体，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结　语

1917年，李大钊在《甲寅》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心势力创造论》的文章，指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而当时中国所有现成的政治势力——北洋军阀、清末立宪党人、旧的革命党人，皆已分崩离析，“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必须“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①

晚清以后，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整体溃败，传统的士绅阶级已不再能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承担起澄清世运、挽救危亡的责任。中国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无法仅仅依靠上层政治变革来实现，需要召唤民间新兴社会力量，从社会制度、纲纪人心、伦理风俗等各个方面力挽狂澜，组织民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后来中国出现的现代群众型政党，正是这样一个从民间成长起来的新兴政治主体，承担了在传统士绅社会解体之后重新组织社会、再造国家的功能，形成了新的中心势力。本书研究的，是这个重要历史过程的开端。

一

1923年，李大钊就中国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问题与《北京周报》记者谈话，指出，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必须有中心不可，“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当前中国的改造，就是要“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使它更大，更有力量，除此之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但这个团体“有容纳我

① 《中心势力创造论》（1917年4月23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174—175页。

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孙中山本人“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可以对它的不适当之处加以改良，从而使国民党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①

为何要以国民党为中心势力，全力扶持、壮大国民党？因为共产国际判断，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和力量都很弱小，在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即国民革命，不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1924年国民党改组，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了国民党内的新兴势力。他们比较有民众意识和民主思想，决心借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将国民党改造为一个有广泛阶级基础的、维护工农利益的党，发动国民革命，夺取全国政权。

在1924年至1927年武汉“分共”前，这个通过扶持国民党左派将国民党打造为“中心势力”的策略，收到很大成效。全国知识青年纷纷投向国民党，工农运动被广泛发动起来，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北伐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行动。但国民党左派要求将革命控制在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范围内，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目标是民生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当大革命迅猛开展、两湖农工运动呈现出剧烈的阶级革命形势、共产国际要求中国革命由国民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时，他们就断绝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武汉“分共”后，国民党左派发生剧烈分化。以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坚决站在工农立场上，反对汪蒋的反共政策。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去往苏联。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邓从欧洲回国后正式成立。周恩来评价邓演达说：“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②

宋庆龄坚决反对武汉“分共”。1927年7月14日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谴责“分共”违背孙中山的理想，指出工农阶级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采取任何削弱支持工农

---

① 《就中国实际改进的中心势力问题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1923年5月17日），《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21—22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67页。

的政策，“便动摇了党的基础”。[①] 1927 年 12 月，宋庆龄在苏联《真理报》上接连发表致蒋介石电，严厉谴责国民党“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她说：“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②]

何香凝在武汉“分共”后，作为“粤方委员”之一，参加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但 1928 年冬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立时，何香凝即表示不愿参加，并拒绝担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1929 年 11 月，在赴法游历途中所作的一首“感怀”诗中，她写道：“三民主义今非昔，污吏贪官民怨极。帝国侵凌祸怎消，频年借债如山积。金钱变作炮弹灰，到处肥田生荆棘。可怜十室九家空，民穷财尽饥寒迫。”这些诗句，表达了何香凝内心对国民党的强烈谴责。[③]

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在“分共”后仍自称国民党左派，是左派中的保守派。在 1928—1931 年，他们围绕如何巩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阐发。改组派自比 1903—1912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说他们“做一个孟雪维克，尽他历史的作用又有何妨！”[④] 这既是就其作为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地位而言，也是就其革命理论而言。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组织集中、纪律严明的政党，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联合农民进行革命。孟什维克则主张建立一个比较广泛、松散的党，并与自由派结成联盟。孟什维克派不支持资本主义，但认为俄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目前只能进行民主革命，设想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觉悟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提高，为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改组派也做过一些发动农工的工作，其领导的黄色工会在上海、南

---

①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第 529—530 页。

② 《宋庆龄致蒋介石（电报）》（1927 年 12 月 23 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 11—12 页。

③ 何香凝：《往法国途中》，《双清文集》下卷，第 109 页。

④ 施存统：《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萧萐父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 3 卷，第 306 页。

京和北方一些城市中有一定影响，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生活。他们还策动地方军阀，发动了一系列反蒋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汪蒋重新达成合作。原改组派大员纷纷进入国民政府，取消了反蒋和民众运动立场，只在执政中体现出一些软弱的农工政策，将农工问题转化为增加生产与社会救济的问题。至此，国民党高层的左派与右派合流，曾经对改组派抱有幻想的青年再次分化。

二

对于汪蒋合流，汪精卫1936年在德国给国内某部门的信中这样解释："我们自九一八以后，与九一八以前态度似乎矛盾，实则一贯。九一八以前，我们抱有一定之政策，并握有一种之力量。我们自信，我们的政策如果实施，至少在内政方面解决农民问题，……在外交方面可期得到与国，不致孤立。所以用我们的力量，以期实行我们的政策。力量虽然屡次不幸而失败，但仍不绝的酝酿，及不绝的创造，并不因此灰心。九一八以后，便不同了。当前的问题只是救亡，政策之得失异同，相形之下渺乎其小。而救亡必须力量，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力量，只要他能作救亡之用，便与之合作，为之助力（助力不是奴隶），而且其他小节概不与较，此为数年以来我们所取之态度，与九一八前看似矛盾，实则一贯。"①

---

① 此信落款为"季"，时间为"五，十三"，未注明年份，笔者判断为汪精卫写于1936年，即因1935年11月遇刺赴欧疗养期间。信中继续说："此种态度至于今日仍须一贯，因此我们要有几点注意的所在。（一）我们将来不出三途。（甲）合作，这或者有人说道我们不够股东资格，因为我们没有本钱。（乙）帮忙，最悲观的可以解作助虐（有人如此说），至于奴隶则决乎不是（看了上文便可明白）。（丙）友谊，既无股东资格又不愿做帮忙，那就只有如此。（二）无论老史、老莫、老希，他们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例如老希，他的局面自然有一小部分是勉强，但大部分是（1）战后国民全体之悲愤情绪；（2）是看破了英法之异趣，乘此破绽，努力猛进，七千万人难道都是傻子要服从一个人，何况这七千万人是何等自负的国民呢。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三）我对于一种人最不满意，就是自己在南京一切皆好，自己不在一切皆坏。我希望我的同志不要如此。（四）国内对抗之形势实际似无大害，但对于救亡不可不合作，否则为借刀杀人之计，总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自然中国到非做阿比斯尼亚不可的时候，只得去做，但要合作，不能叫人单独牺牲。（五）我的服务有益于国呢？抑无益呢？我以为有益。因为我冷静的检察，我一生对国家没有大过，因为我是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数十年如一日的。"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钢笔原件，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240/79。

汪在信中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他自认为，1931 年之前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第二，之所以放弃反蒋和民众运动立场，是因为抗日救亡、团结御侮的需要。为了应对民族矛盾，只好牺牲左派的政治主张。这种看法既夸大了左派纲领的有效性，又推卸了自身的责任，充满了自我辩护的意味。

对比中国共产党在 1935—1936 年的政策调整，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会发现，抗日救亡与争取底层民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并不构成矛盾。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6 年 9 月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就指出，必须纠正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因为“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上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①

1939 年，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又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事实上规定了中共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政策，包括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善工农生活；建立“三三制”政权（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 1/3），团结抗日各阶级；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晋察冀边区 1940 年秋还在全边区进行普选，基层政权由直接选举产生。这些施政纲领，在民族战争的客观条件下，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结合起来。

由此可知，团结御侮，并非必须以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代价，关键在于汪陈左派有没有决心、力量和方法，去实行他们所宣称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政治主张。1923—1927 年在华的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说：“‘左派’的不幸在于，没有一个国民革命思想的真诚拥

①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193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97 页。

护者作为他们富有经验的、坚强的领袖。"① 比起底层民众利益，汪精卫最关心的还是"民主"问题，实质上是国民党内的权力分配问题。有学者认为，1929年汪精卫在陈公博与顾孟馀的争论中，站在顾孟馀一边，将改组派的核心政治诉求从走非资本主义的民生道路调整为争取政治民主，更多利用"民主"而非"民生"口号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和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左派运动"这时就已经终结了。②

以往研究改组派的学者，多关注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为代表的群体，因其制造革命理论声势颇高，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而近年来有学者指出，真正影响汪精卫政治决策的是顾孟馀，顾、汪关系远比我们以往所知的更为密切。③ 顾与汪最大的共同点是反对独裁、拥护"民主"。顾孟馀曾对方君璧说："常务委员若不能说话，即等于做傀儡。做傀儡是无论如何不做的。"④ 那是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临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将全国抗战力量集中于蒋一人领导之下。这一新权力格局得到国民党内大多数党员拥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就在日记中说："自总理逝世，党的重心失堕，以常务委员制维持党统者十三年矣。党制贵能集中运用，始能灵活，……（蒋先生）于抗战艰危之日，毅然而出领导本党，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最重要之大事也。"⑤ 顾孟馀却说"傀儡是无论如何不做的"，反映出他对党内民主的坚持。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时代，汪、顾等人所追求的民主政治、言论自由等，并无实现的历史条件，而且与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是脱节的，后者不能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根本无法动员民众。就像卡尔·曼海姆所批判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它"太专注于规范，以至不能关心真实存在的实际状况"。他们专注于构造政治理想，结果脱离了现实，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真实

①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94页。
② 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第144、154页。
③ 参见黄克武《顾孟馀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
④ 《方君璧日记》手稿，1938年4月8日。
⑤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4册，1938年3月31日、4月2日，2001，第430、431页。

关系”的感受。[①] 这套政治理想无法凝结成有力的政治力量，只能作为一种对现存政治的文化批判而存在。

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互助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重视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改组派理论的突出特点。他们基于一种实证主义的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分析，认为中国的阶级分化不严重，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共产党是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纵使没有阶级，也要创造阶级”。[②] 而改组派的阶级理论恰恰缺乏这样一种内含斗争性和辩证法的动态视野。有学者曾提出一种区别于结构性阶级概念的“政治性阶级概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他指出：“阶级间的对抗性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即没有阶级对抗的形势，阶级自身就不能形成；也只有创造出阶级对抗的形势，才能产生出阶级的主体。正是后一点，使得阶级概念从一个客观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主观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一个从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因此，阶级和阶级关系并不能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加以呈现，促进阶级意识萌发的观念、价值和理论并不能直接地从客观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推导出来。”[③] 这个“政治性阶级概念”的分析非常重要，他提出了一个从“新型政治主体”角度阐释现代中国阶级政治的新视野，同时回应了改组派提出的问题。

改组派不但缺乏有力的思想，其组织也很松散。陈公博说，成立改组同志会的时候，他是极力主张有组织的，顾孟馀则不大赞成有组织。陈树人是表示加入的，但“有他诗人的风度，对于政治兴趣似乎不高，谈到政治斗争更似无此习惯”。甘乃光“始终和改组同志会做朋友，而不参加任何会议”。[④] 汪精卫领导的派系中，不乏这类既鄙弃政治又依恋政治的人物。他们的“清高”，其实是缺乏强烈斗争意志的表现。

根本而言，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哲学不是斗争，而是妥协，想在对立

---

①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第442—445页。

②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情误》，《陈公博先生文集》，第266页。

③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第17—18页。

④ 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第279页。

的两极之间，找到妥协折中之道。但政治的核心就是冷酷无情的权力斗争，以及与权力相伴随的责任意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你可以改变手段，改变环境，甚至改变基本的行动方向以及对那个方向负责的人，但你不可能把斗争本身撤到一边。……用'和平'手段代替斗争形式，代替对敌作战，代替作战环境，最终代替选择机会，那将一无所有。"① 想在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在左右之间寻找平衡的人，是容易丧失自身之立足点的。

最后，改组派注重吸收青年，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重视党的基层组织，主张严密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也不讨论"党性"的问题。尽管认识到"组织"的力量，但不认为"自我"可以用组织的强力去改造和"提升"。不讨论人的精神、心灵与组织建设的关系，缺乏对于如何锻造一个坚强革命主体的思考。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人，就个性而言，都带有反专制、反权威的色彩，对"党"并无坚定的信仰，亦无与"主义"生死与共的决心。而容易被改组派吸引的青年，也多是一些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这些思想和主体状态，都导致改组派无法集结成一股坚强的政治力量。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中有"左派"存在，对于该党仍是有积极意义的。左派很清楚民气不可抑制，青年的革命性不能压抑，因而提倡恢复民众运动。他们知道社会矛盾激化终会危及国民党统治，故而希望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和恶势力对民众的侵夺，赢得民众对国民党的拥护。国民党左派的失败，意味着在国民党内试图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以民族主义为统合基础，寻求阶级合作、社会和解，以改良主义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路线的破产。

国民党政权在汪蒋合作之后，本来有足够的空间回应左派提出的问题。正如中央民运会副主任王陆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所说，"过去党政机关，因镇压反动之故，遂与民众疏隔，反驱以供他方之利用，极为失算"，现各民众团体负责人，均失望于改组派之利用与抛弃，"既为群众

① 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第42页。

所责难，又无新获之援助”，歧路彷徨，极愿与中央发生政治上之联系，此正可以因势利导。“民之所愿，只须授之一二，已使感激百千”，唯望“主持党之枢密者”，能稍顾及底层民众的诉求，“矜之持之，天下归仁”。①

但南京国民党当局对底层民众的悲苦境遇始终关注不够，不重视左翼批判思想的合理性，视青年的激进化为共产党的煽动，视民众反抗为危害政府的行为。以“攘外安内”为名，合法化其暴力独裁统治。这反过来更助长了社会腐恶势力的蔓延，慢蚀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让越来越多有理想，有热血，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青年开始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阶级矛盾和底层民众的痛苦，必须采用激进革命的方法。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青年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入了一场通过战争和群众动员根本改造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实践。

三

在这场漫长、艰苦的革命实践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自觉承担民族历史命运的知识青年，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转向投身于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无数从旧家庭、旧伦理中挣脱出来、漂流在社会上的青年“自我”，被组织进革命团体。他们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诉求下，批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对“自我”展开斗争。这个过程塑造了新的革命主体，无数“小资产阶级流浪人的知识青年”，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实现了再造国家“中心势力”的历史任务，也塑造了革命中国的政治文化。

与国民党左派一起隐入历史烟尘的，还有他们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理想。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大多数中国人过着贫困、流离的生活，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其实是一种关于“过好日子”的生活理想，一种对于免除贫困、暴力和痛苦，好好健康生活的普遍需求。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这些诉求在人们的心中并未消失，事实上也是普通人拥

① 《王陆一电蒋中正上海工人及各地民众团体情形》（1932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055-009。

护革命的动力之一。

小资产阶级文化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崇尚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尊重个体，推崇“自我”，重视文学、艺术。在文学和艺术中，蕴含着人类在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营养，承担着文化教养的功能。在中国文化遭遇全面危机的时代，一些人感受到现存人性的巨大缺陷，希望通过文学、艺术使人性得到普遍提升。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民还深陷饥寒贫困、流离失所的痛苦时，这套超越政治和具体时代环境的文化诉求，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它缺乏阶级分析视野和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事实上变成一种少数人的特权。

而“五四”以后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最初动力，正是要改变那种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占有人类物质和文化成就的现存社会政治结构。作为中国没落士大夫阶级的后裔，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自我”，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占有性“自我”，它是在“人我之际”的文化中觉醒的。这个群体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产生了分化。鲁迅曾指出，1920年代一些青年的作品，“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蹁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同时，有一些青年，努力着“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①] 后一类青年“自我”的觉醒，本身就包含着克服“自我”、超越“自我”的要求。

投身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为这类青年的“自我”成长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与广大底层民众相接触，使他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人民的痛苦；革命组织使他们进入家族社会之外的生活团体；革命工作让他们与社会产生了更深刻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社会政治视野和阶级分析理论，为青年“自我”突破个体身心感受与狭小生活世界、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关联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这些理论工具，帮助他们对宏大历史展开分析和理解，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人生的意义，对很多青年构成了强大的吸引。

---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50—251页。

就投身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而言，从“自我”出发的细腻感受和日常生活实践，与革命工作本身，也不必然形成矛盾。1946 年左翼画家黄新波、符罗飞等人在香港筹组人间画会，发表的《“人间画会”宣言》，就体现了一种立足日常生活、建立人与人之间连带关系的自觉：“我们固然要画血火交流和那些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或者可憎可怖的诸种形象，但一切都和大局有关，我们绝不放过那些向不为人注意的人间小事。强烈固然是好的，但我们也重视平淡，在平淡中可以发掘到人生社会的深处。我们不愿意违背自己意志，……我们是这人间的一员，我们热爱人间，我们表现的都属于这人间的一切。”① 黄新波作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杰出代表，深受鲁迅思想与人格的影响。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耕耘、反省、倾听内心声音的革命意识，也反映了鲁迅的思想方法。

在中国革命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很多细腻而有效的文化生产，连同它们的作者一起受到过批判，一些革命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受到过压抑。极左时期的革命话语，将个人的生活全面纳入民族国家的总体性历史进程中，否定生活和文化有独立于政治的意义。激进革命话语讴歌光明、勇气和战斗的力量，赞颂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对信仰的追求，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敏感心灵和脆弱情感，同时给许多“人间小事”和人在历史中真实、绵长的幽暗体验留下了叙事的空白。

1980 年代以来，随着革命的退潮、革命史叙事的式微和现代化叙事的兴起，那些曾经受到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方案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使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能具体阐明革命与个人的关系、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那么中国革命的真实意义将会磨损。正是这样的关切，促使我们重新回到“五四”以来新青年“自我”诞生和走向革命的时刻，回到 1920 年代中国革命力量分化的时刻，认识中国现代“自我”本身的丰富性，反思革命政治与个人主体成长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国革命实践进展顺利的时候，

---

① 黄蒙田、陈实等著，黄元编《刀笔、画笔、文笔——黄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第 247 页。

正是革命的宏大叙事，赋予日常生活以指向，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也正是人们真实的情感和生活，使革命的宏大叙事有了质感和扎实的根基。宏大叙事不是一套脱离人们实际生活感受的空洞说教，碎片化的情感体验也不是全部的生活。人们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着、表达着、实现着宏大叙事所传达的理想，同时改变着自身的主体状态。仅从个人自由角度出发，无法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仅强调组织性，也无法培育内在充实、饱满、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

最后，中国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问题重要而且复杂，远非关于国民党左派的讨论所能涵盖。本书仅仅提出这些问题，以期进一步打开观察、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尽量贴近历史实践的复杂性，去建立对中国革命更加丰富的历史叙述。

参考文献

一　档案

汉口档案、环龙路档案、会议纪录、吴稚晖档案、五部档案、一般档案、中政会档案

以上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数位档

戴笠史料、“蒋中正总统文物”、汪兆铭史料、阎锡山史料

以上台北“国史馆”藏

二　民国报刊

《北平晨报》《晨报》《大公报》《党声·迎汪专号》《党声旬刊》《贡献》《广东青年》《广东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日刊》《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国闻周报》《汉口民国日报》《解放》《民声旬报》《民意周刊》《南华评论》《南华文艺》《平议旬刊》《前进》《青年呼声》《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新国家》《新生》《新生命》《新思潮》《一般》《政治训练周刊》《中华日报·小贡献（副刊）》《中央半月刊》《中央导报》《中央副刊》《中央汇刊》《中央日报》

三　民国时期专书

白薇：《悲剧生涯》，文学出版社，1936。

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4。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商务印书馆，1936。

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之中国国民党》，商务印书馆，1929。

《当代史剩》，上海周报社，1933。

甘乃光：《怎样做农工行政》，中国国民党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编印，1927。

革命旧人：《汪精卫的全貌》，旦华出版社，1939。
革命评论社编《革命评论全集》，复旦书店，1928。
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1928。
贺君山：《改组派的检讨及汪精卫理论的批判》，南京提拔书店，1930。
《护党救国集》，出版地不详，1931。
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7。
江苏评论社编印《中国国民党左派ABC》，1930。
林风眠：《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47。
柳亚子等编《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光华书局，1933。
陆丹林：《革命史话》，大东书局，1947。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复旦书店，1929。
施存统：《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现代中国社，1928。
施存统：《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复旦书店，1928。
施存统：《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印行，1926。
时希圣编《吴稚晖言行录》，广益书局，1929。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鹰山社出版部，1930。
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31。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
《汪精卫集》，光明书局，1930。
《汪精卫先生讲演集》，爱知社，1927。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
《汪精卫先生三年来之重要言论》，民生社印行，1931。
《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中华日报馆，1937。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南京（伪）宣传部编辑出版，1940。
《现代史料》（1—4集），海天出版社，1933—1935。
杨家铭：《民国十五年中国学生运动概况》，光华书局，1927。
叶永蓁：《小小十年》，春潮书局，1929。
曾仲鸣：《法国的浪漫主义》，开明书店，1929。
曾仲鸣：《法国文学论集》，黎明书局，1932。

曾仲鸣：《中国与法国》，出版信息不详，1930。
战士周报社编《湖南农民运动问题论文集》第一种，战士周报社，1927。
张振之：《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民智书局，1929。
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
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
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编《中国农民》，1926—1927。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1944。
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
朱朴编著《张发奎将军》，群力书店，1938。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政纲政策概要》，独立出版社，1944。

四　文集与资料汇编

艾以、曹度主编《谢冰莹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986。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陈公博先生文集》，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7。
陈鹏仁编译《汪精卫降日秘档》，台北：联经出版社，1999。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59。
戴绪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
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州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987。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91。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

“国史馆”审编处编《“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二）宁汉分裂与清党》，台北：“国史馆”，2002。

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蒋光慈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

柯灵主编《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孔庆泰编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21。

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刘长徽等选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

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

潘松德、王效祖编《陆晶清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1991。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

孙子和编《民国政党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

王笑荣、程锦主编，济南市档案馆编《毋忘国耻——济南“五三”惨案档案文献选辑》，济南出版社，2003。

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张炯主编《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02。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83）》，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历年出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198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1965。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196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中央宣传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五 自传、回忆录、日记、年谱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A. B.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

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李玉贞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曹聚仁：《文坛三忆》，三联书店，1999。

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香港：十月书屋，1994。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邓飞黄自传》，岳麓书社，2012。

邓文仪：《冒死犯难记》，台湾学生书局，1973。

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郭廷以、王聿均访问，刘凤翰纪录《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雷啸岑：《我的生活史》，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林伯渠日记（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楼永芳、楼芳兰：《施存统年谱》，政协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金华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9。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84。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沈云龙访问，谢文孙、胡耀恒纪录《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王聿均访问，谢文孙纪录，郭廷以校阅《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录（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王驰译，李玉贞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
张党初：《往事》，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
张铁君：《蓬然梦觉录》，台北：阿波罗出版社，1971。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周开庆：《健庐忆语》，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

六 论著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王鹿鹿、马红星、张奇志译，张卫旗、谢亮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陈木杉：《从函电史料观汪精卫档案中的史事与人物新探》，台湾学生书局，1997。
陈谦平主编《中华民国史新论：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三联书店，2003。
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成台生：《胡汉民的政治思想》，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
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戴玄之：《红枪会（1916—1949）》，台北：食货出版社，1973。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刘平校，三联书店，2004。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年）》，杨品泉等译，谢亮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北：商务印书馆，2004。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广东省政协、韶关市政协、始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赫尔曼·马斯特尔：《由传统中崛生之革命——戴季陶的政治理念》，收入李国祁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

横山宏章：《关于孙文对西欧式代议政体的批判》，台湾《近代中国》第106 期，1995 年。

侯外庐：《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侯外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胡兰成：《战难和亦不易》，香港：远景出版集团，2001。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收入卢建荣主编《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2001。

黄克武：《顾孟馀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江上清：《政海秘闻》，香港：致诚出版社，1977。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蒋永敬：《近代人物史事》，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蒋永敬：《汪兆铭传》，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1999年6月。

蒋永敬：《现代史料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柯惠玲：《她来了：后五四新文化女权观，激越时代的妇女革命，1920—1930》，台北：商务印书馆，2018。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民国丛书》第一编88，上海书店据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影印。

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

雷啸岑：《啸岑文存》，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1965。

李吉苏：《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李又宁主编《胡适与国民党》，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14。

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马五先生（雷啸岑）：《新世说》，台北：大西洋图书公司，1970。

茅盾：《蚀》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潘英：《正统史学下之民国史上的非正统政治团体与人物》，台湾：谷风出版社，1989。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

尚明轩：《何香凝传》，北京出版社，1994。

尚明轩：《廖仲恺传》，北京出版社，1982。

尚明轩：《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

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石源华：《陈公博全传》，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

史夫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黄沫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司马璐：《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家》，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

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宋亚文：《施复亮政治思想研究（1919—1949）》，人民出版社，2006。

谭崇恩：《唐生智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汪新、刘红编《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王关兴：《汪精卫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

王羡真编著《汪精卫传》，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闫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

吴相湘：《民国政治人物》，台北：文星书店，1964。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谢晓鹏：《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2000。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1999。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

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陈体芳、乐刻等译，郑文华校，商务印书馆，1978。

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2002。

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张光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张海鹏主编，王奇生著《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张静、李志毓、罗敏等：《民国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张荫麟：《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

张玉法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郑重光：《中国国民党属性变迁之研析（1894—1924）》，台北《近代中国》第101期，1994年。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大事记（1914—194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

朱英：《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Arif Dirlik, "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Vol. 1, Jan., 1975.

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George T. Yu, *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Kuomintang, 1912–*

19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 Bernard Thomas, "*Proletarian Hegemon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anton Commune of 1927*,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o Wai-chor, "The Making of the Guomindang's Japan Policy, 1932-1937: The Roles of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Modern China*, Vol. 28, No. 2, Apr., 2002.

后　记

本书写作起始于2004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跟迟云飞老师读硕士期间。迟老师是晚清史专家，他总是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并鼓励我们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在我表现出对国民党的研究兴趣之后，迟老师介绍我来到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拜访了王奇生老师。那天金以林老师也在，两位老师平易近人。王老师指点我以改组派的《革命评论》为中心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从此我开始研究国民党左派。2005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仍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内比较激进的政治势力，他们关注底层利益，重视工农问题，试图以改良主义手段解决阶级矛盾，建设一个民生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对当时的我具有一定吸引力。

2013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开始接触近代史所收藏的丰富资料，并利用研究所提供的优厚条件，数次前往台湾地区及海外各地查阅资料。2019年5月，我应曾仲鲁先生邀请，前往瑞士日内瓦曾先生家中，浏览他的父母曾仲鸣、方君璧保存的“福州方氏家族档案”。这批资料保留了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抗战期间，有关国民党高层的大量历史细节，极大丰富了我对国民党左派思想理论、政治实践及其失败原因的认识。如今，曾先生已将这些珍贵资料全部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此谨向他表达诚挚的感谢与敬意。

国民党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其代表人物随着历史变化不断发生分化聚合。有的一直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立场，有的主张调和阶级矛盾，还有的主张“反共”但仍打着“国民党左派”旗号，他们都曾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本书将他们全部纳入研究范围。21世纪以来的国民党研究，大多重视地域观念、人际网络、基层组织、权力斗争，淡化意识形态。本书有意回到传统视角，强调国民党左、右派斗争中的意识形态与路线分歧，呈现左派的政治主张与实践。

这项研究从国民党派系政治出发，扩展至散布于基层的大量国民党

左派青年、小资产阶级，最终立足于对现代中国政治主体建设的反思。在一步步扩大问题意识的过程中，要特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薛毅老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汪正晟老师、广州美术学院的蔡涛老师和何小特老师。我从2011年开始跟薛老师上课，学习从文学文本中解读历史，至今仍不能窥其堂奥。他的批评大大降低了我的“学术生产力”，却让写作变成了更加诚实、切己的工作。正晟老师的青年研究视野之广阔、思考之深刻，使我深受启发。蔡老师的“人间画会”研究和小特老师的策展，让我开始思考一种更具能动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文化自觉。我希望对左翼主体丰富精神世界和复杂情感体验的揭示，能有助于我们通向中国革命更深厚的历史地层。因为在革命文化建立起来的真理性、目的论的超越性解体之后，我们仍希望能找到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同情人本身处境的精神性与超越性。

二十年光阴稍纵即逝，在这项研究告一段落之时，让人最难忘怀的，是过去那些时代条件、历史机缘，还有师长们的叮咛教诲。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杨念群老师，始终关怀我成长的江湄老师、张志强老师、孙歌老师，他们的勇猛精进、平淡通达，常常让我对自己很容易陷入的怠惰和怀疑感到羞愧。感谢金以林老师对我不厌其烦的指导、年复一年的敦促。感谢徐思彦老师的不抛弃不放弃。他们的宽容和担当，每每促我反省，催我振作。

感谢汪朝光老师、王奇生老师、黄兴涛老师、黄道炫老师、王晴佳老师、周月峰老师、孙毓斐学弟、李晨以及很多师友在本书写作、修订过程中的批评指点。感谢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这里有优厚的研究条件、严谨笃实的学风和身边优秀的同人，我深感幸运。感谢宋荣欣和责任编辑陈肖寒的辛苦编校工作。本书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此谨向相关刊物致以谢忱。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历史的曲折、岁月的磨砺，让他们一天天衰老，但丝毫不曾消磨他们向上的信念和宽厚的人格。他们赋予我的不只是肉体生命，更是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血肉关联。感谢我的妹妹和妹夫对一家人的关爱，有时候妹妹更像姐姐，希望这本小书能让她在对我不规律的作息唠唠叨叨之后，感到一丝丝欣悦。

2025年10月19日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本书运用新史料，系统研究国民党左派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从客观环境和行动主体两方面，说明国民党左派及其所代表的“中间路线”的失败原因。同时将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基层左派青年纳入考察视野，再现知识青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分化与求索。从知识青年主体成长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队伍的形成和革命主体的壮大。为全面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理解20世纪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心灵世界，提供更丰富的历史真相和更复杂的分析框架。

ISBN 978-7-5228-5853-1

定价：89.00 元